

# 學風與傳統學術研討會

## 會議手冊

會議時間：二〇〇五年十二月七日（星期三）

會議地點：輔仁大學野聲樓一樓谷欣廳

主辦單位：八十週年校慶系列活動校史組







# 學風與傳統學術研討會

## 會議議程

二〇〇五年十二月七日（星期三）

輔仁大學野聲樓谷欣廳

時間	會議內容			
08:50-09:10	報到			
09:10-09:30	開幕式 行政副校長			
09:30-10:20	專題演講	胡僑榮 副校長 (輔仁大學國際貿易與金融學系)	汪榮祖 教授 (中正大學歷史學系)	利瑪竇傳統與輔仁學風
10:20-10:40	茶敘			
	場次	主持人	主講人	論文題目
10:40-12:00	第一場 「學風 - 北京輔仁」	李振英 教授 (輔仁大學前校長 輔仁大學哲學系)	孫邦華 (北京師範大學教育學院 歷史與文化研究所)	北京輔仁大學的辦學特色及其歷史啟示
			林智源 (輔仁大學北京校友會)	輔仁學風與中西文化一概述北京輔仁大學的外籍教職員
			柯博識 (聖言會)	聖言會於一九三三年接辦北京輔仁大學之記實
12:00-13:30	午餐			
13:30-14:50	第二場 「學風 - 台北輔仁」	王芝芝 教授 (輔仁大學歷史學系)	雷俊玲 (輔仁大學歷史學系)	聖神婢女傳教會與新莊輔仁大學(1963-1985)－多元化價值觀教育的建構
			朱秉欣 (耶穌會)	一位退休教授看台北輔大－台北輔仁的回顧與瞻望
			陳方中 (輔仁大學歷史學系)	龔士榮神父所參與的輔仁大學－輔大易長事件
14:50-15:10	茶敘			
15:10-16:10	第三場 「傳統與現代對話」	郭維夏 副校長 (輔仁大學全人教育課程中心)	程予誠 (輔仁大學影像傳播學系)	學蘊八十載：探討輔仁大學的大學競爭力 (Comparative Capability) 與領導 (Education Leadership) 特質－以前校長羅光總主教為引 (lead)
			吳瑞珠 (輔仁大學進修部哲學系)	輔仁大學校史檔案概況
16:10-16:30	閉幕式 校長			

## 議事規則與注意事項

1. 主持人致詞以五分鐘為限。
2. 每場次主講人宣讀論文時間以二十分鐘為限，時間終了前三分鐘時鈴聲一響，時間終了時鈴聲二響，主講人發言未依時間規定者，主持人可逕自宣佈結束。
3. 討論發言時，請先聲明服務單位和姓名，俾便工作人員錄音及紀錄，每人發言以一次為限，限時三分鐘，屆時鈴響一聲。
4. 發言後，請將發言之書面內容，遞交大會紀錄人員。
5. 綜合答覆時，每人限時五分鐘，屆時鈴響二聲。
6. 本次研討會論文，未經主辦單位及作者同意，不得擅自印行或以任何方式重製。

# 目 錄

## 專題演講

利瑪竇傳統與輔仁學風／汪榮祖

01

## 論文發表

1. 北京輔仁大學的辦學特色及其歷史啟示／孫邦華

09

2. 輔仁學風與中西文化——概述北京輔仁大學的外籍教員／林智源

27

3. 聖言會於一九三三年接辦北京輔仁大學之紀實／柯博識

55

4. 聖神婢女傳教會與新莊輔仁大學（1963-1985）——多元化價值觀  
教育的建構／雷俊玲

85

5. 一位退休教授看台北輔大——台北輔仁的回顧與瞻望／朱秉欣

105

6. 龔士榮神父所參與的輔仁大學——輔大易長事件／陳方中

119

7. 學蘊八十載：探討輔仁大學的大學競爭力（Comparative  
Capability）與領導（Education Leadership）特質——以前校長羅  
光總主教為引（lead）／程予誠

145

8. 輔仁大學校史檔案概況／吳瑞珠

177

## 附件

《北京輔仁大學校史》編寫工作淺談／王振稼

195

## 與會人員名錄

197







## 利瑪竇傳統與輔仁學風

汪榮祖\*

### 引言

輔仁大學是一座天主教大學，在史學家陳垣長期主持校政下，建立起中西兼備的學風。此一學風與十六世紀耶穌會教士利瑪竇提倡的中西調和傳統，頗有呼應之處。

利瑪竇傳統在十六世紀受到中國士大夫的歡迎，並有不少儒者入教，但因未被羅馬教廷認可而無法持續，然而歷史昭示我們，利瑪竇的理念與傳教方式具有特識與遠見。

十九世紀基督教隨西方勢力而來，並於二十世紀開始在華設立教會學校。一般教會學校比較洋化，偏重西方新學科，而輔仁以教會大學提倡西學之餘，特別重視中國國學。此一學風形成輔仁的特色，在近現代西潮衝擊下，維護國學於不墜。今日視之，陳垣校長與利瑪竇教士雖屬異代而同具慧眼，認識到中華文化不宜、亦不應被取代，以及理解到中西學術兼備的意義。

適逢輔仁大學八十年校慶，承蒙邀請作主題演講，甚感榮幸，謹以史學工作者的觀點，從學風與傳統此一主題著手，希望今後輔仁大學不僅承續創校以來的優良學風與傳統，而且能夠將之發揚光大。

### 利瑪竇 (Matteo Ricci) 傳統

利瑪竇在一五五二年出生於義大利教宗轄區，自小在耶穌會學校讀書，十九歲成為耶穌會見習修士，繼續在羅馬耶穌會學院學習。二十八歲在交趾時晉升為神父，三十歲那年抵達天主教對華傳教的基地澳門，<sup>1</sup>不久就定居廣東肇慶。他的中文水準頗高，甚至有學者指出「利瑪竇出神入化

---

\* 中正大學歷史學系教授。

<sup>1</sup> 有關澳門在明清之際對華傳教史上的地位與作用詳閱湯開建，〈明清之際澳門與中國內地天主教傳播之關係〉，《漢學研究》，20卷2期（2002年12月），頁29-56。

的中文水平和他對孔孟原典的精湛理解，成為他攻無不克的一道利器」。<sup>2</sup>然而他到底如何學習中文，如何能夠達到如此高水準，尚不得其詳。他掌握中國語文後，四十二歲時「因地制宜」改服儒裝，<sup>3</sup>並自廣東韶州前往南京，然止於南昌。兩年後開始主持在華傳教團工作，至四十七歲才得定居南京。

利瑪竇先於一五九八年曾入京師，但未獲居留權，至一六〇一年再次入京，才准居留，兩年後出版《天主實義》，再四年出版《幾何原本》。一六一〇年在京師逝世，享年五十八歲。<sup>4</sup>

利瑪竇不僅是有學問的耶穌會傳教士 (Jesuits)，也是一位貨真價實的漢學家 (Sinologist)。他到中國為了傳教，但為了達到傳教的目的，亦以介紹西方文化為手段，得到中國士大夫的歡迎。他同時認同中華風俗，願意融入士人社會，畢生在中國奉獻。

教皇授權的傳教事業隨十六世紀地理大發現而展開，然由葡萄牙人開始的傳教模式，本來要使亞洲、非洲、拉丁美洲等落後地區人民成為「二等公民」以及「次等基督徒」，西班牙人在菲律賓亦復如此，故不必注意在地文化。然而成立於一五四〇年的耶穌會，採用因地制宜極其靈活的傳教策略。耶穌會教士沙勿略 (St. Francis Xavier) 曾在日本傳教，感到要使日本皈依基督，必須先掌握影響日本的中國文化，因而到中國去傳教是關鍵，但沙勿略未及進入中國大陸，於一五五二年過世。<sup>5</sup>

由於明廷久採海禁政策，中國門戶難以打開，因而有些教士認為非用武力不足以進入中國，但當時的西方武力上尚不足以撼動中華帝國，而耶穌會深知直接傳教之不易，需要精通中國語言文字，洞悉中華風土人情入手。耶穌會最初要羅明堅神父 (Pompilio Ruggieri) 赴中國傳教，學習中文，進度緩慢，隻身又過於孤單，遂自印度臥亞修道院找來利瑪竇相助。利瑪竇到澳門時二十八歲，埋頭學習中文，開始畢生的在華傳教事業。他堅持用文化作為溝通的武器，認為中西方擁有共通的人文價值，勤研中文與儒家經典，與明季東林士子來往頻繁，<sup>6</sup>卒於一六〇〇年有著名儒者如徐光啟等人入教。他並不要在中國建立一個西方教會，而是要建立中國教

<sup>2</sup> 劉曉藝，〈利瑪竇的中文水平〉，《書屋》(1998年2月)，頁46。

<sup>3</sup> 關於改穿儒服問題可參閱羅光，《利瑪竇傳》(台北：台灣學生書店，1983年)，頁68-72；計翔翔，〈關於利瑪竇一儒服的研究〉，《世界宗教研究》，第3期(2001年)，頁77。

<sup>4</sup> 有關利瑪竇的傳記作品可參閱林全水、鄒萍，《泰西儒士利瑪竇》(北京：國際文化出版社，2000年)；羅光，《利瑪竇傳》(台北：學生書局，1983年)；(法)裴化行著、管鎮潮譯，《利瑪竇神父傳》，上、下冊(北京：商務印書館，1998年)；Jonathan Spence, *The Memory Palace of Matteo Ricci* (New York: Viking Penguin, 1985)。

<sup>5</sup> Donald W. Treadgold, *The West in Russia and China*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3), vol. 2, p.7.

<sup>6</sup> 參閱康志傑，〈利瑪竇論〉，《湖北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第2期(1994年)，頁61。

會，進而建立「中華基督文明」(Sino-Christian civilization)，成為普世基督文明之一部分。他認為耶穌固然不是中國人，但也不是義大利人。足見他不認為基督教僅僅屬於西方文化。李約瑟 (Joseph Needham) 博士稱之為「歷史上最了不起的智者之一」(one of the most remarkable and brilliant men in history)。<sup>7</sup>

利瑪竇的傳教方式基本上是耶穌會 (The Society of Jesus) 不拘一格的方式，他以西學，特別是科技為手段以達到傳教的目的，因而使西方近代物質文明得以東傳。他尊重中國文化，盡量在中西文化中求同存異。他不從中國文化論證西方文化 (包括宗教) 的合理性，而是通過重新解釋中國的儒教文化，使之與西方文化趨同。所著《天主實義》，即用儒家經典與中華文化語言來論證並闡述基督教義。他對中國文化的看法，可稱之為中西調適論。<sup>8</sup>他對建構在儒家傳統與西方宗教文化上的「中華基督文明」有所期待，在西方哲學思想與方法上樹立一種「調適」(syncretism)。當時中國士大夫亦多認同利瑪竇所謂儒教可由基督教「淨化」之說，展現了儒家文化可與西學、西教融會貫通的前景。利瑪竇誠如方豪神父所說，「實為明季溝通中西文化之第一人」。<sup>9</sup>

利瑪竇認可的中國文化傳教方式，「使天主教的天主通過印證於儒家典籍，而在晚明社會中獲得了來自中國自身的權威性，而這種權威性足以為那些皈依天主教，或者利用天主教的人，消除心理的與現實的障礙」。<sup>10</sup>導致令人印象深刻的業績，特別是徐光啟 (Paul Hsu)、李之藻 (Leo Li)、楊廷筠 (Michael Yang) 三大學者入教，即所謂「開教三大居士」。<sup>11</sup>當利瑪竇在中國逝世時，建有四所教堂，約有 2,500 名教徒，大都來自士大夫階層。明亡清興之後，滿清皇帝康熙也可以接受利瑪竇的傳教方式，至一七二六年北京一地就有教徒 7,000 人，幾乎都是受過教育的人。<sup>12</sup>

但利瑪竇的「調適論」遭遇到教內嚴厲的批判而挫折，一方面有許多人不同意自上而下的傳教策略，也對知識有不信任感，將利瑪竇的「調和」態度視為一種屈辱的「叩頭」。一六九三年，利瑪竇已經去世八十三年，

<sup>7</sup> Joseph Needham, *Science and Civilization in China*, vol. 1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54), p. 148.

<sup>8</sup> 參閱利瑪竇，《天主實義》，收入《續修四庫全書》子部宗教類 (上海：古籍出版社)，頁 479-549。

<sup>9</sup> 方豪，《中西交通史》(台北：中央文物供應社，1955年)，冊 4，頁 2。

<sup>10</sup> 何俊，〈跨文化傳播中的思想對話：利馬竇的天主論證與中西哲學比較〉，《哲學研究》，第 2 期 (1998 年)，頁 51。

<sup>11</sup> 此三名家之入教，影響不止於個人，三家成為天主教世家。光啟孫女有「教會之母」之稱，徐家十一世孫成為教士。楊廷筠的女兒也受洗入教。

<sup>12</sup> Treadgold, *The West in Russia and China*, vol. 2, pp.12, 25; 參閱郭熹微，〈試論利瑪竇的傳教方式〉，《世界宗教研究》第 1 期 (1995 年)，頁 24。

當時中國教區的行政主管 Charles Maigrot 就嚴厲譴責「調和」論，並禁止儒家禮義，禁止用「天」或「上帝」來指「神」(God)。至一七一五年教皇 Clement XI 正式發佈 *Ex illa die*，重申 Maigrot 之立場，完全否定利瑪竇的傳教理念與方式。<sup>13</sup>由於羅馬教廷內部的反對與不理解，使利瑪竇建立的傳統因無法繼續而功敗垂成。當包容天主教的康熙駕崩之後，繼統的雍正皇帝不再容忍，諭旨禁教，利瑪竇畢身之努力，幾盡付東流。

### 陳垣與輔仁學風

輔仁大學為近代中國的著名教會學校，肇始於民國元年，該年九月著名學者天主教教徒英斂之、馬相伯聯名上書羅馬教皇，請在華北設立公教大學。翌年英斂之就在北京香山靜宜園創辦輔仁社，取《論語》：「以文會友，以友輔仁」之意，與一般教會學校以地名或聖名命名有異，而課程也以國學為主，歷時五年後輔仁社才停辦。至一九二一年年底，教宗終於敕令美國本篤會在中國辦公教大學的決定，再兩年後羅馬教廷才正式發佈敕令，確定公教大學為教廷大學，遂於一九二五年歲末在北京創校。創校之初，就在校內設立國學專修科，即公教大學附屬之輔仁學社，英斂之任社長，聘請史學家陳垣、李泰棻、地理學家張慰西、以及前清進士郭家聲，講授中國文學、歷史、哲學、英文、數學等課程。陳垣因研究中國基督教史而為天主教教徒英斂之、馬相伯賞識。翌年年初英斂之過世，遺命委託陳垣繼續籌辦大學。<sup>14</sup>輔仁大學正式成立後，由美國神甫奧圖爾 (Rev. George Barry O'toole) 為校長，陳垣副之。一九二七年所定「私立北京輔仁大學組織大綱」，明載：「本校以介紹世界最新科學，發展中國固有文化，養成碩學通才為宗旨」。<sup>15</sup>兩年後為了在中國立案，由於教育部有「必須以中國人充任校長」之規定，遂由陳垣出任校長，奧圖爾為校務長。斯為陳垣長期治校之始。

陳垣字援庵，清光緒六年 (1880) 生於廣東新會，早年入私塾讀書。民國六年 (1917) 之春，已開始研究基督教史，因收集材料，結識在香山主持輔仁社的天主教徒英斂之。陳垣的第一篇學術作品《元也里可溫教考》<sup>16</sup>即在英斂之支持下印行，並為之作跋，馬相伯寫序。他曾二度赴日本訪求有關基督教史料。民國十三年 (1924) 又完成巨著《元西域人華化考》

<sup>13</sup> 參閱 Treadgold, *The West in Russia and China*, vol. 2, pp 23, 25。

<sup>14</sup> 參閱《北京輔仁大學校史》(北京：中國社會出版社，2005年)，頁3-6。

<sup>15</sup> 轉引自同上書，頁12。

<sup>16</sup> 此為陳垣「古教四考」之一，其他三考為〈火祿教入中國考〉、〈摩尼教入中國考〉、〈開封一賜樂業教考〉，均收入《陳垣學術論文集》，第一集。

一書，八卷二十九章，詳述蒙元時期西域各族各類人士，向慕與傳佈中華文化之事跡，以及中外交通與民族融合的歷史趨向，內容豐富，考證細微，分析慎密。他既認為「儒學為中國特有產物，言華化者應首言儒學」；所言之儒學自亦包括基督教在內的儒學，肯定宗教潛移默化的力量。<sup>17</sup>他所寫有關基督教教史之重要著作，尚有《基督教入中國考》、《浙西李之藻傳》、《大西利先生行跡》、《基督教人物四傳》、《從教外典籍見明末清初之天主教》等等，但他的研究並不限於基督教，也研究佛教、道教、回回教，並把重點放在外來宗教與本土政治形勢的關係，本土社會制度對外來宗教所起的作用，以及本土思想文化對外來宗教的影響。但他並不認為中外文化交流是單軌的，而是一種互動關係，外來宗教對本土文化也留下不可磨滅的印跡。<sup>18</sup>

陳垣專治史學，追慕乾嘉考據大師錢大昕，錢氏嘗言：「通儒之學，必自實事求是始」，<sup>19</sup>而實事求是不二法門就是考據功夫，陳垣就是求實事求是的通儒之學。他反對五四以來否定本土民族文化的虛無主義，但他絕非保守的國粹派，而是像利瑪竇一樣，認可中華民族文化的生命力。他任教會大學校長，曾入天主教，但同時「向天主教神父們大力宣傳中華民族歷史文化」，不能容忍「借宗教貶抑中華民族文化」。<sup>20</sup>他大力表揚國學有造詣的神甫學者，如吳漁山在傳統藝術與文化上的重大貢獻。<sup>21</sup>

輔仁大學作為教會大學在陳垣領導下，於創校之初即重視中國學問的校風，除了奠定堅實的史學研究與教學之外，還於一九三八年創辦史學研究所，於一九四一年成立輔仁大學史學會，更於創校之初即規定大一國文為各系所必修，講究語文基礎知識與寫作能力。並由名家如沈兼士、余嘉錫等幫助在校同學籌組文字語言學會，學術活動頻繁，陳垣本人亦積極參加。在八年抗戰期間，由於教會中德籍人士周旋，日偽未直接進駐輔仁，使滯京中國文史名家如沈兼士、余嘉錫、羅常培、唐蘭、顧隨、張星烺、趙萬里、鄧之誠等轉入輔仁，形成一個超強的文史陣容。<sup>22</sup>

為了推廣國學研究成果，陳垣出版《輔仁學誌》強調中西文化之溝通，中國基督教之研究，並高度評價中國傳統學問，超趕西方漢學，曾於一九二一年之秋在北京龍樹院聚會時宣稱：「現在中外學者談漢學，不是說巴

<sup>17</sup> 《元西域人華化考》之章節曾先在《國學季刊》與《燕京學報》上發表，後收入《勵耘叢刊》（1934年），台北世界書局印有單行本，美國加州大學出版社印有英文譯本（1966年）。

<sup>18</sup> 參閱周少川，〈論陳垣先生的民族文化史觀〉，《史學史研究》第3期（2002年），頁2-3。

<sup>19</sup> 錢大昕，〈盧氏群書拾遺序〉，《潛研堂文集》（台北：商務印書館，1968年），卷25。

<sup>20</sup> 牛潤珍，《陳垣學術思想評傳》（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1999年），頁234。

<sup>21</sup> 參閱〈吳漁山管鐸二百五十年紀念〉，《輔仁學誌》，5卷1、2期合刊（1936年12月）。

<sup>22</sup> 參閱《北京輔仁大學校史》，頁257-368。

黎如何，就是說日本如何，沒有提中國的，我們應當把漢學中心奪回中國，奪回北京」。<sup>23</sup>《輔仁學誌》自一九二八至一九四八，二十年間重未間斷，影響深遠。一九三五年又創刊英文《華裔學誌》(Monumenta Serica)，由陳垣命名，推廣漢學研究，包括譯介中國經典名著，溝通中外。一九三五年創刊，至今仍在出版。

陳垣與余嘉錫在輔仁大學教學與研究的傑出表現使他們於戰後同時當選為第一屆中央研究院院士，一校兩院士，為他校所無，亦使輔仁以國學聞名於世。不過，一九四九年神州易手，中共建政，陳垣認同新政權，教會不再提供經費，由中華人民共和國教育部接管，再經一九五二年院系調整後，輔仁併入北京師範大學，仍由陳垣出任校長，講求一專多能的通才教育，雖脫胎而未盡換骨，但校名既改，規模擴大，輔仁的原有風貌終不免淡化。

輔仁在大陸消失後，於一九五九年在台復校，原擬擇址於高雄大貝湖（後改稱澄清湖）勝景，不幸功敗垂成；最後選擇了新莊，新莊校園裡美輪美奐的各類西式建築，不再有原輔仁古色古香的風貌。新輔仁仍以引進歐美先進科技與發揚中華固有文化為理想，並繼續以文會友，以友輔仁的校訓。然而由於時空條件之劇變，歐美先進科技繼續可求，中國固有文化反而難以發揚。屆此天主教輔仁大學創校八十週年校慶之際，不妨重新思考輔仁創校之初所強調國學研究的特色與意義。黎建球校長在「學風與傳統」北京論壇上提出：「士林哲學倫理學的理論」，設想從融合中國道德思想的內容與西方哲學架構來建立「輔仁學派」，<sup>24</sup>再度令人懷想起利瑪竇想要建立的「中華基督文明」。

## 結 論

利瑪竇的最主要目的固然是要傳教，使中國皈依天主，但他認知到為達此目的文化交流之重要性。一方面他運用他以及其他耶穌會士所熟悉的西洋科技贏得中國士人的青睞，另一方面尊重中華文化，相信儒家思想具有普世價值，可與基督教有互通，故不排斥本土禮儀。利瑪竇想要建立的是一種具有中國特色的基督教文明，但他的傳教理念與方式不被教廷認可而失敗。不過，利瑪竇在中西文化交流史上仍佔有不可動搖的地位。他留下中西文化互通的傳統，亦經得起歷史的考驗。

輔仁以教會大學於講求傳教與西學之餘，由於創辦者以及陳垣之背

<sup>23</sup> 轉引自牛潤珍，《陳垣學術思想評傳》，頁 226。

<sup>24</sup> 黎建球，〈輔仁學派之哲學架構〉《學風與傳統》北京論壇，頁 1-20。

景，特重國學與中國文化，建立了與利瑪竇尋求中西調適傳統異代同調的學風。國學或中國人文之學為中國文化的根本，然而國學在現代之式微似乎已成不可逆轉的趨勢。輔仁當年中文系與史學系在文字、訓詁、聲韻、考據、經典研讀等方面的優勢不再。而這些優勢乃中國文史之學的根本。

西方科技與基督教必將在中國持續發展，但中國文史之學的前途猶難逆料。黎校長的輔仁學派需要重振中西兼備的學風，或可帶動現有之「中西文化中心」，以及中文系「漢學中心」，作為與西方各人文研究中心交流的一個重要據點。漢學或國學中心或可由文學院統籌，目前輔仁文學院包括許多社會科學系所，包括體育學系在內，而社會科學院則包括宗教學系，似乎有調整的空間。

輔仁八十年校慶之際，勢必回顧與展望建校特色，也就是輔仁學風。重視中國文史之學的舊傳統若能復興，或不失為發展輔仁特色的一個方向。



## 北京輔仁大學的辦學特色及其歷史啟示

孫邦華\*

### 摘 要

北京輔仁大學儘管存在時間很短，但是，它以其富有特色的辦學活動、培育了不少精英人才的顯著成就，在中國現代高等教育史上寫下了濃墨重彩的一筆。以中西文化的融會與貫通為宗旨、在學科建設上以突出重點為發展戰略、在教學方法上以注重培養學生的研究能力為目標、實行嚴進嚴出的教學管理以精英人才為培養目標、在科學研究上強調「動國際而垂久遠」的精神等辦學特色是一筆值得珍視的精神遺產，對當前高等教育管理、學風建設、學科發展、大學精神的弘揚、大學生人文素質的培育、學術發展等諸方面都有很好的借鑒意義。

關鍵詞：北京輔仁大學、陳垣、辦學特色、歷史啟示

---

\* 北京師範大學教育學院歷史與文化研究所副教授。

北京輔仁大學（1925-1952 年）儘管由於特殊的歷史原因而只存在了近 27 年，未及「而立」之年便已夭折，但是，它以其富有特色的辦學活動、培育了不少精英人才的顯著成就，在中國現代高等教育史上寫下了濃墨重彩的一筆，它的許多辦學思想、方法，即使對當代高等教育辦學實踐仍有不少重要的借鑒意義。

## 一、以中西文化的融會與貫通為宗旨

自從英國新教傳教士馬禮遜（Robert Morrison）於 1807 年遠涉重洋來到廣州，重新揭開西方文化教育在中國傳播的序幕之後，中西文化教育的交彙、衝撞、融合成為中國近代社會的一個永恒主題。不同歷史時期、不同政治派別、不同學術流派的人對待中西方文化的態度和觀點是各不相同的，甚至是相互矛盾、針鋒相對。如果說整個清末的中西文化關係的特點是「中體西用」、「東風」壓倒「西風」，那麼，以新文化運動為歷史界標，則是逐漸「全盤西化」、「西風」壓倒「東風」。倡設於民國元年、誕生於新文化運動之後的北京輔仁大學在辦學宗旨上對待中西方文化是怎樣的態度呢？我們不妨從創始人英斂之、校長陳垣的辦學思想到輔仁章程等方面入手進行分析。

英斂之的態度非常鮮明，就是既要輸入西方先進科學，又要保存優秀傳統國學。英斂之出身旗人之家，自幼習武，將近弱冠時，漸漸發現「此等伎倆見遺於社會，無補於身家，遂棄之」，<sup>1</sup>便棄武從文。依靠自學，博覽中外群書，尤其愛好當時介紹西方新知識的著作或譯述，<sup>2</sup>因此而躋身於文化人行列，從事辦報、辦學活動。

1902 年 6 月 17 日，英斂之在天津創刊《大公報》，並以介紹歐西學術，啟牖同胞民智，「以化我陋俗而入文明」為宗旨。<sup>3</sup>民國初年，他從報館事務退下來之後，致力於中國天主教高等教育。他主張以西方科學開啟民智，但並不排斥中國固有文化。一方面，他於 1917 年撰寫文章痛斥法國天主教傳教士掌控的天主教修會所實行的愚民傳教策略，漠視高等教育，蔑視中國文化。<sup>4</sup>另一方面，他對於自清末以來一些粗通西學、喜新厭舊的青年人所表現出的厭棄中國文化的不良傾向和「國學」淪喪的局面而憂慮不已，他說：「最可惜者，粗解橫書浮慕西法之輩，襲取人之皮毛，犧牲

<sup>1</sup> 英斂之，〈自序〉，《也是集》，天津大公報館光緒丁未（1907 年）夏刊行。

<sup>2</sup> 方豪，〈英斂之先生創辦《大公報》的經過〉，上，《傳記文學》（台灣：傳記文學出版社），第三卷第二期。

<sup>3</sup> 英斂之，〈大公報序〉，《大公報》（1902 年 6 月 17 日）。

<sup>4</sup> 英華，〈勸學罪言〉，1929 年重印本（自刊）。

其所可貴，買置還珠，邯鄲學步」<sup>5</sup>又對當時的「保存國粹」思潮不以為然，<sup>6</sup>認為厭棄國學固然可憂，「苟但醉心歐化，稗販唾餘，致失其固有之良，豈非下喬入幽，而不善變者耶」。<sup>7</sup>但是，也不能簡單地提倡「保存國粹」，因為「國粹」中有糟粕。對待古今中外文化的正確態度，應該是吸取和保存各自的優秀部分。「介紹西歐新得科學文化之最精者，並保存中國舊有文學美術之最善者，舍短取長，不使偏勝。」<sup>8</sup>

英斂之自 1912 年在北京香山創辦輔仁社，到 1925 年開辦公教大學輔仁社（又名國學專修科），均以「輔仁」命名，可謂他的用心良苦。其一，就是專事國學之研究，故取《論語》「會友輔仁」之義，<sup>9</sup>兩個輔仁社，在課程上也都是中文、歷史、哲學等國學內容，把重視國學教育、以保存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思想付諸教育實踐。其二，「會友輔仁」的義蘊還包括吸取西方最新科學文化，用「西方新得科學文化之最精者」補中國文化之不足者。

輔仁大學很好地繼承了奠基人英斂之的辦學理念。譬如，1927 年夏，大學正式建立時，校董事會便決定把它命名為輔仁大學，<sup>10</sup>並且把英斂之倡導的「注重介紹世界最新科學、發展中國固有文化」思想寫入學校章程，確立為辦學宗旨<sup>11</sup>目的在於培養融會古今、學貫中西的新式人才。作為一所天主教大學，輔仁的教師和行政管理人員，約 70% 為中方人士，30% 則為先後由本篤會、聖言會派遣來的天主教學者或其他學者，中西結合的教師和管理隊伍為融會與貫通中西文化提供了良好而必備的師資條件。在輔仁大學執教的著名漢學家、聖言會神父鮑潤生於 1935 年創辦《華裔學志》（*Monumenta Serica*），以英文、德文、法文發表中外學者（以西方學者為主）有關研究中國社會、歷史、風俗、宗教等內容的學術論文。它出版至今，而不間斷，因而是以西方語言出版的歷史最悠久、同時也是最重要

<sup>5</sup> 英斂之、奧圖爾，〈美國聖本篤會創設北京公教大學宣言〉，《輔仁生活》，第四期（1940 年 2 月 25 日）。

<sup>6</sup> 英斂之，《論保存國粹》（1906 年）；英斂之，《也是集》（天津大公報館光緒丁未，1907 年夏刊印）。

<sup>7</sup> 英斂之、奧圖爾，〈美國聖本篤會創設北京公教大學宣言〉，《輔仁生活》，第四期（1940 年 2 月 25 日），第 12 頁。

<sup>8</sup> 英斂之、奧圖爾，〈美國聖本篤會創設北京公教大學宣言〉，《輔仁生活》，第四期（1940 年 2 月 25 日），第 12 頁。

<sup>9</sup> 英斂之，〈北京公教大學附屬輔仁社簡章〉，《輔仁生活》，第五期（1940 年 3 月 25 日），第 11 頁。

<sup>10</sup> 輔仁大學檔案·案卷號：12，〈函教育總長請派員視察正式認可〉（現藏北京師範大學檔案館，下同）。

<sup>11</sup> 輔仁大學檔案·案卷號：8，〈私立北平輔仁大學組織大綱〉。

性的漢學期刊之一，是天主教唯一有關漢學的期刊。<sup>12</sup>僅此一項，我們就可以說輔仁的外籍教師不僅通過教學把西方科學文化介紹到中國，而且通過學術研究和期刊把中國文化傳播到西方社會，以實際活動詮釋了「會友輔仁」、融會中西的辦學宗旨。

輔仁大學非常重視語言的教學，首先，它作為教會大學自然非常重視外語教學。由於初期的外籍管理人員和老師多為美國人，第一外語自然為英語。輔仁大學英語教育並不是為了培養一批到洋行裏做事的買辦，而是培養直接獲取西方科學文化的能力。正如時任教務長的劉半農所說：「我們以為時至今日，學術已有了世界化的趨勢；無論學文學，學科學，倘不能直接看外國書，只憑翻譯本子，那終是隔靴搔癢。倘使能直接看外國書，就可以增加許多知識的源流和做學問的門徑。」<sup>13</sup>按照當時的大學教育法令，高校學生必須學習兩門外語，但是，有的大學對第二外國語「多視若具文，有沒有幾乎一樣」，但是，輔仁對兩門外語課都很重視，劉半農認為：「一個人不懂一種外國語是太陋；倘只懂一種外國語，則很危險。」因為人們容易以為他所瞭解的一種文化都是好的，而排斥其他文化，如果在掌握兩種語言的基礎上，瞭解兩種不同文化，並對兩種文化作比較研究，就不會犯那樣的毛病。<sup>14</sup>這同樣體現了會友輔仁的宗旨。輔仁大學的第二外語首選為德語，其次是法語，日本侵佔時期（1937-1945 年）增加日語。兩門外語的掌握為輔仁大學把世界西方最新科學知識、理論納入學校的教學內容提供了良好的語言條件。除西語系外，物理系、化學系、生物系、心理系、哲學系等教師先後以美籍、德籍教授為主，課程也相應地採用美國和德國大學制度，各基礎和專業課程一般都使用原版英文、德文原版教材。

輔仁非常重視國文教育及其作文。國文課不僅被確定為一年級各專業的公共必修課，而且從師資的選聘、教材的編寫、教學方法的指導、統一考試等整個教學環節，都由校長陳垣親自負責，陳垣每學年都要親自擔任這門課的教學工作，以引起全校師生對它的重視。課文主要選自《史記》、《漢書》古代正史著作和古代文史大家的文章，約計 30 餘篇，絕大部分為文言文，陳垣要求學生對課文「熟讀如流」。<sup>15</sup>

<sup>12</sup> 柯慕安 (Miroslav Kollar) 撰、查岱山譯，〈鮑潤生神父為《華裔學志》的創辦者——他的生平與事業〉，收入魏思齊 (Zbigniew Wesolowski) 編，《有關中國學術性的對話：以〈華裔學志〉為例》(台北：輔仁大學出版社，2004 年)，第 21 頁。

<sup>13</sup> 劉半農，〈輔仁大學的現在和將來〉，《半農雜文二集》(上海：良友圖書公司出版，1935 年 7 月)，第 206 頁。

<sup>14</sup> 劉半農，〈輔仁大學的現在和將來〉，《半農雜文二集》，第 207 頁。

<sup>15</sup> 陳智超編注，《陳垣來往書信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 年)，第 647 頁。

在全球化時代，學習世界一切先進科學和優秀文化已是再尋常不過的事，但是，總會面臨如何對待民族傳統文化的問題。面對西方強勢文化的衝擊，民族傳統文化日漸式微，已是不爭的事實。有些人甚至言必稱西方，對傳統文化不屑一顧，乃至全盤否定。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我們需要培養的是融會中西的人才，而不是西方化的殘缺之士。大學作為思想、文化的傳承者、創造者，發揚和保存民族優秀文化應當是義不容辭的任務。輔仁大學從辦學伊始就既注意接受世界最新科學知識，又不排斥中國優秀的傳統文化，重視外語和國文教育，是非常難能可貴的，也是值得當代中國大學教育借鑒和發揚的優良傳統。

## 二、在學科建設上以突出重點為發展戰略

輔仁大學位於當時中國的文化中心北京，大學林立，更有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北京師範大學、燕京大學等四所名校，置身這種名校集中的環境裏，激烈競爭在所難免。新生的輔仁大學如何立足和發展便成為擺在學校主辦者面前的一道難題。

大學發展的關鍵是學科建設，學科建設的根本在於建立一支教學和科研水平很高的教師隊伍。教師無論在任何時候都是大學的靈魂和核心，正如著名教育家、清華大學校長梅貽琦所說：「所謂大學者，非謂有大樓之謂也，有大師之謂也。」<sup>16</sup>陳垣等人首先注重在教師聘任上下工夫。

輔大一開始就從多種方式延請教師。首先，利用後發優勢，注意從國內特別是北京的一些著名大學網羅名師，其中，以北京大學名教授為主，如沈兼士、劉半農、魏建功、羅常培（以上為著名語言文字學家）、朱希祖（著名文史專家）、沈尹默、鄭振鐸（以上著名文學家）、李泰棻、鄧之誠（以上著名歷史學家）、馬衡（著名金石學家、考古學家）、劉鈞（著名教育學專家）、王仁輔（數學家）。另外，從北京師範大學敦請孫人和、孫楷第（均為著名中國古典文學和文獻學家），從清華大學聘請薩本鐵（化學家），從清華大學延請趙萬裏（著名版本學家、目錄學家）；其次，惠眼識才，注意從社會上發掘人才，包括沒有大學文憑而自學成才和沒有大學執教經歷的名學者，如余嘉錫（著名目錄學家、文史學家）、倫明（著名目錄學家和古物古籍收藏家）、溥雪齋（著名書畫家）、唐蘭（著名古文家學家、金石學家）、於省吾（著名古文學家）等；再次，非常注意延聘從國外名校留學歸來的博士、學者，如英千里（著名英國文學家）、張星烺

<sup>16</sup> 梅貽琦，〈就職演說〉，收入楊東平，《大學精神》（瀋陽：遼海出版社，2000年），第353頁。

(著名中西交通史專家)、姚士鼇(著名蒙古史專家)、張懷(教育學家)、徐恃峰(教育學專家)、王征葵(教育心理學家)、朱光潛(著名文學家評論家、美學家)、王靜如(著名西夏語言學家)、張漢民(著名生物學家)、王晨(化學家)、張重一、趙錫禹、魏重慶(以上經濟學家)、劉景芳(法國國家數學博士、數學家)、王普(著名核子物理學家)、錢思亮(著名化學家)等人。他們來輔仁後，有的擔任專任教授，有的是兼職教授，但大都是骨幹教師。第四，天主教修會本篤會、聖言會先後派遣學者到輔仁援教，或應邀物色歐美學者前來執教，其中不乏名教授、科學家，譬如，嚴池(著名物理學家，物理系教授兼理學院院長)、歐思德(著名物理學家，物理系教授兼主任)、李嘉士(著名物理學家，數理系教授兼主任)、卜樂天(著名化學家、化學系教授兼主任)、郝岑(化學系教授)、蔣達士(生物系教授)、馬德武(生物學系教授)、雷冕(著名人類學家，校務長)、史祿國(世界著名人類學家之一、社會經濟系教授)、鮑潤生(著名漢學家、社會經濟系教授兼主任)、吳保黎(社會學專家)、司徒資(西洋史專家)、薩達利(西洋中古史和近世史、印度史專家)、顧爾格倫(西洋上古史專家)、包敏(西洋史學理論與方法、民族學專家)、艾克(條頓及斯拉夫民族文學專家、西語系教授)、桑德厚(英國文學專家)、黎白(修女，英國文學史專家)、葛爾慈(心理學家、心理系主任)、裴德(修女，心理學專家)胡魯士(西洋史學家、教務長)、費知本(西方哲學專家、哲心系教授兼哲學組組長)、謝理士(西語系教授兼圖書館館長)、吳彬雅(修女，著名民生學家，家政系教授兼主任)等；第五，在抗日戰爭期間，華北、華東、華中等地大學被迫向西南、西北地區遷移，輔仁成為當時華北地區唯一不懸掛日偽旗幟、不讀偽教科書的大學，在此情形下，學校及時地把一些原來在其他大學任教而無法隨學校內遷的教授、學者聘請進來，如顧隨(著名古典文獻學家，原燕京大學教授)、高步瀛(著名古典文獻學家，原北京師範大學教授)、劉盼遂(著名文字學、考據學、目錄學家，原清華大學、燕京大學教授)、楊成章(教育學家，原燕京大學、民國大學教授)、李霽野(著名翻譯家、文學家，原河北女子師範學院教師)、唐悅良(英國文學專家，原北京師範大學教授)、褚聖麟(著名物理學家，原燕京大學教授)、薩本棟(著名物理學家，原清學大學教授)、王晨(化學專家、原北京大學和北平大學教師)、張子高(著名化學家、原清華大學教授)等人，自1938年至1945年先後轉到輔仁，進一步加強了學校教師力量。

陳垣等主辦者為學校延聘中西教師，中文系是清一色的中國教師，歷史學、經濟學等教師以中國學者為主，輔之以歐美專家、著名學者。物理、

化學、外語、哲學、心理學、社會學等學科的教師則以來自美國、德國、荷蘭、義大利、俄羅斯等外籍名教授、科學家為主，輔之中國著名學者。正是由於陳垣等人在教師延聘上頗下心力，使輔仁大學從創辦之初就彙集了不少名教授、名學者，從而較快地跨入了名校行列，30年代，與北大、清華、燕京、北師大等合稱為北京「五大學」，起點很高。30年代末至40年代中期（「抗戰」時期），輔仁大學在華北地區孑然屹立，一枝獨放，不僅名師薈萃，更是淪陷區愛國青年向往的知識殿堂和精神家園。

縱觀輔仁大學的發展，在教師隊伍建設上，一方面從國內大學和社會上深入挖掘名師或真才實學的人才，擔任專任或兼職教授，但是，兼職教師一律親執教鞭，不設「兼而不職」的掛名教授，另一方面則很好地利用了全球化給大學教育所帶來的積極影響，非常注意從歐美大學敦聘外籍教授、學者和吸引學成歸來的中國留學生，充實和加強師資力量。

輔仁大學在學科建設和發展上，沒有追求「大而全」，也不是謀求均衡發展，而是實施突出重點的發展戰略。在文學、理學、教育三個學院中，根據主客觀條件，重點建設國文系、歷史系、物理系、化學系、心理系，尤其是國文系、歷史系是輔大建立最早的學科，也始終是學科發展的重中之重，因而很快就發展成為人才濟濟、名師薈萃的名牌學科。其國學師資力量，與當時國內任何一所著名的國立和私立大學相比，也是不遜色的，輔大因此成為了當時中國國學教育和研究的重鎮。重點學科的建設和發展，既提升了輔仁大學的社會聲望，也帶動了校內其他學科的發展。

把建設一支隊伍整齊、實力雄厚的教師隊伍作為學科建設的重點；注意從國內外多渠道網羅教師，實施名師戰略；選取一個到幾個有條件、有基礎的學科進行重點建設，力求達到國內乃至國際一流，然後帶動其他學科的發展，這幾個方面無疑是輔仁大學在學科建設戰略上的特色，也是一條成功的辦學經驗，在當前的大學教育中仍不失其借鑒意義。

### 三、在教學方法上以注重培養學生的研究能力為目標

輔仁大學有研究生和本科生兩種層次的教育，<sup>17</sup>但是，由於研究生招收和培養的規模很小，本科生培養始終是學校教育的主體。輔仁大學辦學者深受蔡元培先生關於大學是研究高深學問的最高學府的思想影響，學校從正式創辦伊始便實踐了這一辦學思想，注重本科生的科研能力培養，以

<sup>17</sup> 1937年6月，輔仁大學經教育部批准正式設立文科研究所史學部、理科研究所物理學部，並於次年（1938）秋季開始正式招收研究生。以後又陸續增設了人類學研究部（1944年）、經濟學研究部（未招生）、化學研究部（1941年秋）、生物學研究部（1941年秋）。

養成研究高深學術的人才為主要目標。「大學設教，在應社會之需求，養成高深學術之人才，以期將來致用於社會。所謂高深學術之人才，必須賴大學教育培養者。」<sup>18</sup>

為了實施培養學生研究能力的辦學思想，在陳垣等人的領導下，輔仁大學採取了一些具體而有特色的舉措。

首先，聘任教師注重專才。陳垣始終堅持聘請學有所長的專才而不是通才原則，以史學系教師為例，他主要是選擇研究某一二個朝代的斷代史和某一二類的專題史人才，不歡迎做「空泛弘廓」學問的人。聘請學有專長的教師，為學校實施培養研究高深學問的人才提供了必要的師資條件。

其次，在課程體系的功能上，既注意傳授基本知識，更注重於「啟發學生自動研究之能力」。如文學院社會經濟學系在制定課程體系時，明確揭示：

本系之目的，為應我國現勢之需要，造就有充分社會學與經濟學知識之人才，課程之設備，于明理、致用二端雙方並重，講授方面，不但注重於基本知識之灌輸，現代科學方法之訓練，尤著重於啟發學生自動研究之能力，使學生修業期滿之後，無論應世或作更高深之研究，皆有相當之準備。<sup>19</sup>

在課程設置上，學校各院系一二年級「授以各種基礎科目」，三四年級「即導以自動研究各項專題」。<sup>20</sup>

再次，在教學方法上注重研究能力的培養。如陳垣為史學系三年級學生開設的選修課「史源學實習」就是注重研究能力培養的典型，該門課程先後以《廿二史劄記》、《日知錄》、《鮚埼亭集》等清代史學名著為物件，要求學生「將文中人名、故事出處考出，晦者釋之，誤者正之。」<sup>21</sup>通過學生的親身實踐和反復訓練，使其掌握中國傳統考據學研究方法，培養學生史學研究的基本技能，即「自動研究之能力」。

第四，試行導師制。為了激發學生的「自動研究」能力和興趣，輔仁大學除了在課堂教學中注重培養學生的研究學問的能力外，還注意在課外活動中對學生進行指導。為了使之制度化、規範化，張懷領導的教育學院採取了實質性舉措，即最遲於1932年率先試行導師制，「本院為增進學生學業，提倡自動研究，並將教授于課外更盡啟迪指導之責任起見，施行導

<sup>18</sup> 〈北平輔仁大學教育學院概覽〉（民國21年度），輔仁大學生秘書處印（1932年），第4頁。

<sup>19</sup> 〈北平輔仁大學文學院概覽〉（民國24年度），輔仁大學生秘書處印（1935年）。

<sup>20</sup> 〈北平輔仁大學文學院概覽〉（民國24年度），輔仁大學生秘書處印（1935年）。

<sup>21</sup> 陳智超編注，《陳垣來往書信集》，第694-695頁。

師制。」<sup>22</sup>將各系學生分成若干個組，每組由一名導師擔任指導工作。導師的責任為：指導自學方法；指定參考書；引導參觀或課外實驗；組織學術講演比賽。每學期，學院召開二次導師會議，由導師報告各組活動情況，討論活動中出現的問題。<sup>23</sup>後來教育學系又把它發展成為由該教授每人負責指導一個年級學生的研習工作。譬如，1939年度時，一年級由院長兼系主任張懷教授負責，注重讀書指導。並指定桑戴克與蓋滋合著的《教育原理》，要求學生逐章深究，或質問疑難，或討論問題，或輪流講演，或讀書報告，其目的在於讓學生奠定教育基本原理的初步根基。二年級由楊成章教授指導，注重自動之研習，先教之利用圖書館進行研習的方法，再指導個別問題的研究。三年級由徐特峰教授指導研習中等教育問題。按規定，每名學生在學年結束時，必須寫出書面研習報告，並取名為升級論文。四年級的研習指導則與畢業論文指導合而為一。<sup>24</sup>輔仁教育學系要求學生必須有升級論文，<sup>25</sup>明顯把西方大學辦學方法移植過來，並以通過課外活動培養學生研習學問的興趣和能力為基礎，從而臻於制度化，這是其辦學的重要特色。不久，沈兼士領導的文學院則規定所屬各系（國文系、史學系、社會經濟系）分別設立研究室，由教授指導高年級學生，「以期養成自動研究之學風」。<sup>26</sup>

第五，實施特別研究工作指導。輔仁大學各學院還根據各教授的學術研究領域和本科學生的實際能力等情況，集體公佈一些研究課題目錄，由學生自願選擇其中的一個問題，在教授指導下進行研究，並將之取名為「特別研究工作」。所公佈的研究目錄，實際上對本科學生學士學位論文的選題起到了指導作用。<sup>27</sup>

輔仁大學長期致力於傳授高深學術，非常注重培養本科學生科學研究的能力和興趣，也就是培養學生在學習和學術上的可持續發展能力，還為此而採取了各種具體的措施或辦法，並使之制度化、經常化、規範化，這是輔仁大學辦學的一個重要特色，也是輔仁大學在不太長的時間裏，培養出眾多學術研究人才的重要原因。今天中國大陸的知名大學紛紛把「研究型」作為各自大學的發展目標，但是，這些大學幾乎都把擴招和培養碩士

<sup>22</sup> 〈北平輔仁大學教育學院概覽〉（民國 21 年度），輔仁大學生秘書處印（1932 年），第 11 頁。

<sup>23</sup> 〈北平輔仁大學教育學院概覽〉（民國 21 年度），輔仁大學生秘書處印（1932 年），第 11-12 頁。

<sup>24</sup> 〈介紹輔仁的教育學系〉，《輔仁生活》，第四期（1940 年 1 月 25 日），第 16 頁。

<sup>25</sup> 〈關於教育學院〉，《輔大年刊》（1939 年）。

<sup>26</sup> 〈北平輔仁大學文學院概覽〉（民國 24 年度），輔仁大學生秘書處印（1935 年）。

<sup>27</sup> 孫邦華，《身等國寶 志存輔仁——輔仁大學校長陳垣》（山東教育出版社，2004 年），第 212-221 頁。

生、博士生作為對「研究型大學」的理解，而相應地忽視了培養本科生研究興趣和能力的重要性，這無疑是本末倒置，曲解了「研究型大學」的真義。

#### 四、實行嚴進嚴出的教學管理以精英人才為培養目標

輔仁大學對學生一直實行高標準、嚴要求的教學管理制度，並且體現在招生、培養過程、畢業考試等人才陶育的整個過程之中。

正如企業要提高產品質量必須要有好的原材料，因而需要把好原材料關一樣，大學為了人才培養的質量也必須從入學招生抓起。

當時的大學招生沒有實行聯考制度（全國統一的考試），考試都是由各大學自己組織，自定考試科目、自主命題。凡是進入輔仁的學生都是經過非常嚴格入學選拔考試。考試又分筆試和口試。

筆試分各院系共同考試科目和分系加試科目兩種。以 30 年代中期為例，共同考試科目為：國文、英語、數學，後來增加黨義 1 科。加試科目與各系的專業基礎知識密切相關，具體情況如下表：<sup>28</sup>

系 別	國文系	西語系	史學系 哲學系 社會經濟系 教育學系	數學系 物理系	化學系 生物系	心理系	美術專修科
加試科目	1、國學常識 2、中外史地	西洋歷史	中外史地	1、物理 2、數學	1、物理 2、化學	科學常識	1、繪畫 2、書法

當時的大學入學考試沒有範圍，筆試只是就高中畢業的水準命題，<sup>29</sup>沒有紮實的基本功是無法通過的。以國文試題為例，內容包括文言文加新式標點，文言文翻譯成白話文，命題作文 1 篇等。儘管作文是用文言文，還是白話文，悉聽應試者尊便，<sup>30</sup>但是，由於當時的國學老師陳垣、余嘉錫等人都喜歡文言文的緣故，因而輔大同學總結出通過國文筆試的秘訣是作文用文言文，<sup>31</sup>這樣的要求不可謂不嚴格。筆試通過後，還有口試關，「口

<sup>28</sup> 輔仁大學檔案·全宗號：J218，目錄號：1，案卷號：81，《北平輔仁大學入學考試簡章》（民國 23 年 7 月訂）（現藏北京市檔案館）。

<sup>29</sup> 傅試中，〈憶余季豫先生〉，收入董肅總編輯，《學府紀聞——私立輔仁大學》（台北：南京出版有限公司，1982 年），第 124 頁。

<sup>30</sup> 輔仁消費合作社編，〈歷年入學之試題〉，《輔仁向導專刊》（1939 年 7 月 10 日）。

<sup>31</sup> 祝士維，〈介紹輔仁化學系〉，《輔仁生活》，第八期（1940 年 6 月 18 日），第 5 頁；林辰，〈憶恩師余嘉錫先生〉，收入董肅總編輯，《學府紀聞——私立輔仁大學》，第 151 頁。

試占相當地位」，並由系主任親自主持。內容是有關中學相關學科的基礎知識、基本理論。以化學系為例，「內容不過是問問普通儀器的名稱，化學的主要定理及主要反應式，並不是太難的，可是你要知道問答都是要用英文的。」<sup>32</sup>

輔大歷年報考、錄取情況統計表（1927-1936年）<sup>33</sup>

	1927年	1928年	1929年	1930年	1931年	1932年	1933年	1934年	1935年	1936年
報名人數	50	53	140	437	788	1020	571	594	749	1048
招生人數	34	35	79	197	301	233	235	293	291	331
錄取率（約）	68%	66%	56%	45%	38%	23%	41%	49%	39%	32%

從上表來看，輔仁大學最初兩年的報考人數和招生人數都是最低的，錄取率達66%以上，對一個新的私立大學來說，是很正常的事情。從第三年開始，報考人數和招生數呈現明顯增長之勢，錄取率逐年大幅度下降，競爭激烈程度明顯提高。教務長劉半農認為當時學校對新生的素質要求儘管比國立大學稍許差一點，但是已經比某些私立大學高得多了。譬如，1929年秋季招生時，某人投考本科國文系一年級，劉半農認為該生國文基礎太差，因而準備將他降至高二年級。該生不情願，提出可否作為一年級旁聽生，但未獲准。結果，幾天後，劉半農發現該人竟被北京的另一所私立大學國文系作為本科一年級的第一名錄取。<sup>34</sup>這足以證明輔仁大學對入學考試的嚴格性、規範性。前6年的新生錄取率呈逐年大幅下降趨勢，至第6年（1932年）降至最低點，僅為23%。該年報考人數比前一年增加了234人，錄取數反而較前一年減少68人，不增反降的原因有哪些呢？我以為有以下二個方面。

首先，可能與當時學校日常經費出現的困難有關。由於美國經濟危機爆發，輔仁主辦者美國本篤會籌集經費四處碰壁，出現了嚴重的債務危機，學校日常運作與發展受到影響。<sup>35</sup>那時北京有的私立大學收取高學費，把學費作為維持學校生存的經濟基礎，因此招生是多多益善。輔仁實施低收費制，每學期學費收入只及開支的1/10，「所以多一個學生，就要多賠一個人的錢。」<sup>36</sup>其次，與招生質量要求有關。儘管考生很多，但是，可

<sup>32</sup> 祝士維，〈介紹輔仁化學系〉，《輔仁生活》，第八期（1940年6月18日），第5頁。

<sup>33</sup> 資料來源：《北京輔仁大學》（1927年）、《輔仁大學年刊》（1936年）、《輔仁大學一覽》（1937年度）、〈輔仁大學歷屆畢業男女人數表〉（1948年），均為輔仁大學自印。

<sup>34</sup> 劉半農，〈輔仁大學的現在和將來〉，《半農雜文二集》，第201-202頁。

<sup>35</sup> (美)Jerome Oetgen 著，張琰譯，《北京輔仁大學創辦史：美國本篤會在中國（1923-1933）》（台北縣：輔仁大學出版社，2001年），第53-67頁。

<sup>36</sup> 劉半農，〈輔仁大學的現在和將來〉，《半農雜文二集》，第201頁。輔大的收費標準，

能高素質的學生人數並不是很多，怕招生人數太多而使招生總體質量下降。在這兩種因素中，後者很可能是最主要的。因為輔仁自 1933 年起轉給經濟實力比較雄厚的德國聖言會經辦，學校辦學經費有了可靠保障，招生人數有所回升，並逐漸增加，但沒有大幅度上升。因此，怕賠錢並不是主要原因，關鍵還是看學生素質。「我們不願招生太多的緣故，並不是因為怕賠錢；我們辦學之前，就預備賠錢的；怕的是招生太多，就不免濫收。」<sup>37</sup>嚴把招生關口，寧缺勿濫，保證學生總體質量，力求逐漸提高，是輔仁大學一貫堅持的原則。

考進輔大難，走出輔大更難。對於成功地通過入學考試進入輔大的幸運者來說，學校迎接他們的將是 4 年非常辛苦的學習生涯。由於輔仁大學授課的教授們個個都是學識淵博而又有專長的名師，教學態度始終非常認真、一絲不苟，對學生要求十分嚴格。比如陳垣所開設的《中國史學名著評論》、《史源學實習》等課程，都注重學生「在做中學」，通過學生親自動手實踐，培養研究的能力，同學們在學習過程中感覺十分辛苦。教育系張懷教授是位有名的嚴師，他把西方大學教學方法帶到輔仁，對學生要求「極為苛刻」：「每次上課，必指定看 10 多本參考書，只這一手兒，就把系內學生逼得雞飛狗跳了；何況考試時，他絕不按牌理出牌，所出的題目，都是課外的，沒瀏覽過參考書，拿起考卷，必然不知所云。」同學們總感覺「上他的課很頭痛」，但是他所上的課都是「教育概論」、「教育哲學」等必修課，是想躲也躲不掉的。<sup>38</sup>又如許多同學震於小學大師沈兼士先生的大名，以得到他的親炙受教為榮，而踴躍選修他的課，但十分畏懼他的嚴厲。<sup>39</sup>

就考試來說，輔仁教務處規定，每年必須經過四次嚴格的考試，較一般大學的一至二次為多，而每門課平常的臨時考試更是不計其數。<sup>40</sup>平常考試也是很難、很嚴。據同學回憶起沈兼士開設「說文研究」課所進行的一次情況說，當助教把沈先生出的試題寫在黑板上後，說大家可以翻書。但同學們都傻了眼，連題目都看不懂。助教把題目解釋之後，大家仍是不會做。助教於是指出幾本參考書，由一名同學立即到圖書館把它們借來，

---

以 1928 年度為例，學費：每人 20 元／學期；雜費：每人 1 元／學期；住宿及燈爐等費：每人 5 元／學期。輔仁大學檔案·案卷號：4，《輔大沿革》（1928 年）。

<sup>37</sup> 劉半農，〈輔仁大學的現在和將來〉，《半農雜文二集》，第 201 頁。

<sup>38</sup> 公孫熾，〈抗日愛國的張懷教授〉，收入董鼎總編輯，《學府紀聞——私立輔仁大學》，第 122 頁。

<sup>39</sup> 王靜芝，〈文學院院長沈兼士先生〉，收入董鼎總編輯，《學府紀聞——私立輔仁大學》，第 111 頁。

<sup>40</sup> 葉世英，〈輔大男部生活雜寫〉，《輔大年刊》（1939 年）。

助教與同學們共同翻閱、討論，大家有所啟發之後，才能夠答題。<sup>41</sup>這是輔仁大學老師對學生要求嚴格的一個縮影。

考試及格在輔大並不能萬事大吉。輔仁大學實行學分制和選修制，考試成績與學分、選修以及升級、留級、退學等學籍管理直接掛鉤。輔仁大學及格線定在 60 分，並把成績從 100 分到 60 分按每 5 分為一個等級，確定相對應的成績分。如成績 95-100 分，等級定為 A+，對應 4.5 成績分；成績 90-94 分，等級定為 A，對應 4 成績分；依次類推，成績 60-64 分，等級定為 D 等，對應 1 成績分。

輔大對學生在學分與成績上的要求作了明確而嚴格的規定。首先，本科學生在 4 年間，除了按教育部要求修畢 134 學分，還必須得到 201 成績分，才能取得畢業資格；其次，每學年所得成績分與其應得學分的關係為至少達到 3 比 2 才能升級；第三，每學期所得學分不足應得學分之半，或已經留級一次，成績分又不足，不能升級者，便被認為是學業劣等的人，令其退學；第四，包括二年級在內的高年級學生，學年總成績平均為 C、B、A 等者，允許下學年每學期分別可加選修課程 2 學分、3 至 4 學分、5 學分，<sup>42</sup>也就是說平均成績為 D，儘管達到及格要求，但沒有上選修課程的資格。沒有學完選修課，不能畢業，每年選修課少，則無法按時修畢規定學分，不能按時畢業。通過這些學籍管理制度，我們便不難看出當時輔大學習是很不輕鬆的。難怪當時輔大學子這樣感歎道：「輔仁是華北各大學中辦理得最嚴格的一個」。<sup>43</sup>

輔大辦學伊始對學生的要求就非常嚴格，而且是它一貫的校風和精神。在這種情況下，不少同學在中途被淘汰，有的因留級則多學 1 至 2 年，最後的成功者不多，按時畢業者更是少數。譬如，1927 年招收的首屆學生是 34 名，等到 1931 年僅有 11 人畢業，畢業率僅為 32%。至 1936 年，6 屆畢業生總數為 401 人，而前 6 年招生數是 879 人，年平均畢業率也只有 46%。這裏的每一名畢業生無一不是經過千錘百煉。嚴要求才有高標準，嚴師才能出高徒。正是輔大一貫的嚴格校風，才使當年的「天之驕子」們在經過艱苦的磨練之後，既獲得了紮實的基礎知識，又培育了非凡的發展能力。它也由此在短短的 20 多年時間裏儘管培養的畢業生不多，但是，其中不少成為了各方面精英人才。

在今天中國大陸高等教育已經達到大眾化發展階段，進大學的門檻較

<sup>41</sup> 王靜芝，〈文學院院長沈兼士先生〉，收入董鼎總編輯，《學府紀聞——私立輔仁大學》，第 113-114 頁。

<sup>42</sup> 〈輔仁大學學則〉（1936 年），收入吳惠齡、李壑編，《北京高等教育史料》，第一集，近現代部分（北京：北京師範學院出版社，1992 年），第 223-225 頁。

<sup>43</sup> 葉世英，〈輔大男部生活雜寫〉，《輔大年刊》（1939 年）。

之半個世紀前已大大降低，但是，大學培養人才的標準卻一點也不應該降低。根據發達國家高等教育發展的經驗，高等教育大眾化也不能使知名大學喪失培養社會精英人才的使命，因此，輔仁大學的嚴格校風及其某些學籍管理制度仍沒有失去它的價值。

### 五、在科學研究上強調「動國際而垂久遠」的精神

大學之所以稱為最高學府，最主要在於大學是科學研究的中心，從而對科學研究的承擔者教師在職責上提出的要求是，大學教師不僅是知識、思想的傳播者，而且是知識、思想的創造者。在現代社會後者的角色越來越重要。輔仁大學在科學研究上既有顯著的特色，在某些研究成果上也在國內乃至國際上都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輔仁大學史學、國文、物理、化學、心理、化學、教育、生物等學科都薈萃了不少學有專長的中外學術名家，他們在各自的學術研究領域都做出了卓越的成就，尤其是陳垣的史學研究、張星烺的中西交通史研究、沈兼士等人的中國語言文字學研究、余嘉錫的中國目錄學研究在國內學術界非常有開創性、經典性。陳垣的史學研究更是享譽國際學術界，陳垣、余嘉錫二人正是由於他們在學術上取得了非凡成就而於 1947 年當選為中央研究院第一屆院士。生物系教授張漢民主持的斑疹傷寒疫苗研製則是把世界最新研究成果介紹到中國，並有所創新，而且把所生產的疫苗服務於社會，取得於較好的社會效果。教育系張懷教授專注于天主教教育思想的研究和介紹，著述甚豐。化學系教授、著名化學家薩本鐵博士以對維生素的研究（實驗證明）而著稱於世，尤其是對維生素 C 和維生素 K「尤有心得」。1933 年，他應用澱粉質試製出維生素 C，並創立了「薩氏學說」進行解釋，1939 年應用衛生球制出維生素 K，從而證明瞭由丹麥人 Dam 於 1935 年發明的維生素 K 的存在及其性質。<sup>44</sup>物理學系教授嚴池（Augustin Jaensch）博士（德國人，天主教司鐸）在攻讀博士學位期間在超聲學研究方面成績突出，來輔大執教中繼續研究，該項研究在當時中國尚屬首創，而且「在遠東亦堪稱獨步一時之新學科」。<sup>45</sup>

輔仁大學在學術研究上最有影響力的人物非陳垣莫屬。陳垣作為一代史學大師，是輔仁大學的精神領袖和旗幟。陳垣原本是學習西醫的，從未到現代大學受過史學專業訓練，而是在早年私塾中的國學訓練中愛上史

<sup>44</sup> 〈薩本鐵博士〉，《輔仁生活》，第 9 期（1940 年 10 月 15 日）；白峰、趙旭，〈化學家薩本鐵訪問記〉，《輔仁生活》，第 10 期（1940 年 11 月 15 日）。

<sup>45</sup> 〈校史述略〉，《輔仁大學年刊》（1937 年）。

學，並通過張之洞的目錄學名著《書目答問》的指引，自學史學名著和廣泛閱讀史學文獻，由此掌握了清代考據學方法。他尤其服膺清代中葉考據大師錢大昕，並以他為師，運用考據學研究中國歷史問題。自 1917 年撰寫發表第一篇史學論著《元也里可溫教考》之後，一發而不可收。終其一生，他共發表史學著作 18 部，學術論文、雜文 159 篇，史學論著總字數約有 260 多萬。<sup>46</sup>

陳垣發展了中國傳統史學方法考據學，從而形成了有自己特色的史學理論和方法，並通過在輔大、北大、北京師大等校歷史系所開設的《中國史學名著評論》、《史源學實習》等課程以及談話、通信等方式把他的史學研究理論和方法傳承下去，影響了一大批史學人才。他教導學生不要再像中國傳統的國學家那樣「上自天文，下至地理，近自書本，遠至器物調查，什麼自然科學與哲學社會科學、文藝等無所不包。」而專做「窄而深」的研究工作。<sup>47</sup>他平時反復強調做史學研究比「別人」做得更好的秘訣就是「縮短戰線，專精一二類或一二朝代，方足動國際而垂久遠」。<sup>48</sup>即集中精力在斷代史和專題史等兩個方面下工夫。他自己率先垂範，始終專注於研究中國宗教史、歷史文獻學、元史等專題史和斷代史，而且所撰寫的一系列史學著作都是傳世的經典之作，具有很高的學術價值和「動國際而垂久遠」的學術影響。特別是關於中國各種宗教史（也裏可溫教、摩尼教、火祿教、猶太教、伊斯蘭教、天主教、佛教等外來宗教入華史）和中國歷史文獻學（校勘學、史諱學、年代學、目錄學）的研究，都是過去一般學者所忽視的重要問題，故陳垣「一經做出成績，即為學林所推重，這些地方，顯得先生常能適時尋空蹈隙，提出重要有意義的問題，用最大努力，搜集資料，寫成專書或論文，獲取學林的重視。」<sup>49</sup>早在民國時期（20 世紀 30 年代），中外學人就曾高度讚揚陳垣在中國史學界的學術地位，「日本多學人，今中國學人，止有馮友蘭之哲學，陳垣之史學，楊某（指楊樹達——引者注）之訓詁學，足以抗衡日本」。<sup>50</sup>世界著名漢學家法國的伯希和讚賞說：「中國近代之世界學者，惟王國維及陳先生（即陳垣——引者注）兩人。」<sup>51</sup>在治學態度上，陳垣一貫保持一絲不苟、嚴肅認真的嚴謹學風，形成了樸實無華，實事求是，不尚空談，文字簡潔，謙遜審慎等風

<sup>46</sup> 牛潤珍，《陳垣學術思想評傳》（北京圖書館出版社，1999 年），第 120-121 頁。

<sup>47</sup> 蔡尚思，《陳垣先生的學術貢獻》，《勵耘書屋問學記——史學家陳垣的治學》（北京：三聯書店，1982 年），第 8 頁。

<sup>48</sup> 陳垣，《致蔡尚思》，收入陳智超編注，《陳垣來往書信集》，第 355 頁。

<sup>49</sup> 嚴耕望，《史學二陳》，《大陸雜誌》（台灣），第 68 卷第 1 期（1984 年 1 月）。

<sup>50</sup> 楊樹達，《積微翁回憶錄》、《積微翁回憶錄·積微居詩文鈔》（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 年），第 57 頁。

<sup>51</sup> 尹炎武，《致陳垣》，收入陳智超編注，《陳垣來往書信集》，第 96 頁。

格，並且告誡學生在學術研究上也要以此為標準。比如在史料上，首先要竭澤而漁地搜集材料，重視第一手材料，其次是善於鑒別資料的價值、真偽、檢驗資料的正誤和可信程度，然後在此基礎上運用史料進行研究、撰著，但觀點、結論要慎重，「做學問一定要審慎，不可輕率下斷語。」<sup>52</sup>

陳垣常常教育學生：「一篇論文或專著，作完了不要忙於急著發表，好比剛蒸出的饅頭，須要把熱氣放完了，才能去吃，蒸的透不透，熟不熟，才能知道。」<sup>53</sup>陳垣總有一個習慣，寫好文章後，總是要主動請各方面的人（包括比自己水平高的人、與自己水平相等的人、比自己水平低的人）批評指正，耐心聽取學術上的「諍友」的意見，「因為這可以從不同角度得到反映，以便修改。」<sup>54</sup>從而儘量避免在文章發表時不留或少留遺憾、乃至錯誤。故此，他有時覺得論著尚不成熟，即使已經完成了的，也寧肯不發表。他還要求學生在對待別人論著中的錯誤更要謙遜審慎，「前人文章中偶有疏漏差錯，寫文指出以使讀者注意則可，萬不可自鳴得意，或得理不讓人。」<sup>55</sup>

當前中國大陸學術界出現了抄襲、剽竊、弄虛作假、文人相輕等不良學風，而且大有愈演愈烈之勢，並已引起國內外學術界的廣泛關注和思考。導致這種情況的原因並不是偶然和簡單的。這既有學者個人的道德品質問題，更與現有的學術評價體系、考核體系直接相關，無論如何，學術管理部門和政策制定者們是脫不了干系的。作為學者、教師、校長的陳垣先生所強調的謙虛謹慎學風，既值得學者們認真學習和效仿，也為學術管理者和政策制定者改革學術管理辦法提供了很好的啟示和借鑒。

輔仁大學的辦學特色當然不只以上 5 個方面。我們僅僅通過以上 5 個方面的特色，儘管存在很短（從創辦到終結僅存在 20 多年），辦學規模很小（僅有 3 個學院、10 餘個系，教師人數最多時也沒有超過 300 人，在校學生數最多時也僅有 2000 餘人，培養的畢業生也不多），辦學條件十分艱苦（常遇到經費的困擾），環境十分惡劣（時局動蕩，戰爭的侵擾），卻能很快躋身於當時的名校行列，不難理解其取得成功的原因。在我們今前創辦高等教育之時，毫無疑問必須向歐美國家學習最新辦學理念與方法，以趕上世界高等教育發展步伐，但是不能亦步亦趨。既如此，就必須注意總結中國近現代高等教育辦學的成功經驗，繼承優秀辦學傳統。輔仁大學的辦學傳統與特色就是一筆值得珍視的精神遺產，對當前高等教育管理、學

<sup>52</sup> 劉乃和，《勵耘承學錄》（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1992 年），第 83-84 頁。

<sup>53</sup> 《勵耘書屋問學記——史學家陳垣的治學》，96 頁。

<sup>54</sup> 《勵耘書屋問學記——史學家陳垣的治學》，第 39、96 頁；劉乃和，《勵耘承學錄》，第 82 頁。

<sup>55</sup> 劉乃和，《著作的標題與學者的用心》；劉乃和，《歷史文獻研究論叢》，第 204 頁。

風建設、學科發展、大學精神的弘揚、大學生人文素質的培育、學術發展等諸方面都有很好的借鑒意義。

## 後 記

多年來，我一直從事在華西人與中西文化教育交流史的研究，1999年秋到北京師範大學教育學院之後，開始把輔仁大學作為研究課題。由於輔仁大學與北京師範大學的「血緣關係」，對輔仁大學帶有天然的親切感，研究輔仁大學是北師大人義不容辭的責任。通過幾年的耕耘，出版了《身等國寶 志存輔仁——輔仁大學校長陳垣》（山東教育出版社，2004年）、《會友貝勒府——輔仁大學》（河北教育出版社，2004年）二部著作，並發表了幾篇相關學術論文。

今逢輔仁大學建校八十周年之際，承蒙台北輔仁大學邀請，赴台與各方人士研討、交流，十分感謝！

我今後仍將致力於輔仁大學史的研究，希望繼承得到各位前輩、同行及有關方面的支援、幫助、批評。

2005年11月



## 輔仁學風與中西文化 ——概述北京輔仁大學的外籍教職員

林智源\*

### 摘要

本文擬探討輔仁學風的形成和內涵以及以中西文化交流的角度，側重介紹北京輔仁大學外籍教職員的一些情況。

#### 一、輔仁學風的形成和內涵

輔仁大學是一所中國人參與創辦的大學，中國人是創辦輔仁大學的最早推動者，自創辦之日起就有自己鮮明的辦學特色。輔仁學風的表述和內涵似可概括為「以文會友，以友輔仁」，和「重視和發展國學，介紹和引進西學，中西文化交流，中西文化兼容，中西文化融合的學術輔仁，培養和造就國家所需之碩學通才」。

#### 二、代表「學術輔仁」學術地位的《兩志》

迄今仍在台灣輔仁大學編輯出版的《輔仁學志》和用英、法、德文出版的《華裔學志》(Monumenta Serica)是北京輔仁溝通中西文化的高水平學術刊物。二十年來，《兩志》在推動、促進中西文化交流，向西方介紹古老中華文化方面，產生了重要影響和作用。

#### 三、承擔中西文化交流任務的北京輔仁大學外籍教職員

北京輔仁大學任職的外籍教職員，據 1930 年至 1949 年統計，共有美、德等 19 個國家國籍的 837 人次，美、德兩國國籍的教職員占總人數的 80%。教授、副教授占總人數 64%，仍以美、德兩國最多。外籍教職員在理學院的數學系、物理學系、化學系，文學院的社會經濟學系和教育學院的哲學系、心理學系、家政學系，農學院的農學系長期擔任領導職務。所

---

\* 北京輔仁大學校友會理事。

授學科方面，外籍教職員在理科的物理學、化學、生物學和文科的人類學等均承擔了主課講授任務並使達到當時的國際水平。

#### 四、北京輔仁大學主要外籍教職員簡介

介紹了 46 位主要外及教職員的姓名、國籍、生歿年份、學歷、進離校年份、職稱、職務、所授課程等情況。

北京輔仁大學的外籍教職員為學校的創建發展作出了很大奉獻，他們遠離親人，不畏艱苦，不求報酬，不講待遇，與中國教職員合作共事，同心協力獻身教育事業。李嘉士、穆爾菲、鮑潤生、史祿國、馬德武五位教授病逝在執教期間，將自己的一生獻給了北京輔仁大學。如今，曾在北京輔仁大學執教的外籍教職員除個別外都已謝世。他們的名字和事蹟，他們辛勤工作和奉獻精神將永遠銘記在輔大人心中。他們的榜樣力量，將激勵我們前進，與時俱進地繼承和發揚傳統輔仁學風，實現 21 世紀的輔仁新飛躍。

關鍵詞：北京輔仁大學、外籍教職員、輔仁學風、《輔仁學志》、《華裔學志》

創辦於 1925 年的輔仁大學，其在北京 27 年的歷程，已見於 2005 年 8 月中國社會出版社出版發行的《北京輔仁大學校史（1925—1952）》一書。

本文擬探討輔仁學風的形成和內涵以及從中西文化交流的角度，側重介紹北京輔大外籍教職員的一些情況。

## 一、輔仁學風的形成和內涵

輔仁是一所羅馬教廷創辦的大學，中國天主教知名人士馬相伯、英斂之先生積極參與和推動了創校工作。自創辦之日就有自己鮮明的辦學特點。

1912 年中國天主教知名人士馬良（相伯）、英華（斂之）聯名上書羅馬教廷，請求在中國創辦天主教大學。在《上教皇請興學書》中，認為在中國傳教，利瑪竇時代用學術來擴大宗教影響的辦法是非常成功的。希望教廷「多遣教中明達熱切諸博士，于通都大邑，如北京者，創一大學，廣收教內外之學生，以樹通國中之模範。」這封上書著重點在於強調要繼承利瑪竇、湯若望開創的傳統，傳播西方科學文化，研究中國學術，溝通中西文化。馬相伯是中國近代高等教育的先驅人物（震旦、復旦大學的創辦人，曾一度代理北京大學校長，具有深厚的中國文化情懷，英斂之有著和馬相伯相似的中國文化情懷，他們都傾向辦一所本土化的教廷大學。

由於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爆發，《上教皇書》沒有得到回應，但是馬、英並沒有就此作罷，1913 年英斂之在北京香山靜宜園創辦「輔仁社」，專為教內子弟傳授國學。靜宜園「輔仁社」和《上教皇書》的創辦思想一脈相承，也是他們辦學實踐的一個小小實驗，雖然僅維持了 4 年於 1917 年 7 月隨著英斂之發表《勸學罪言》一文後宣告停辦。但是馬、英的思想實踐對以後北京公教大學「輔仁社」和北京輔仁大學的創辦過程中重視和發展國學、介紹和引進西學、提倡中西文化交流、不拘一格延攬中外文化精英的辦學方針，並逐漸形成獨具特色的輔仁學風有著深刻的影響和深遠的意義。

第一次世界大戰後，羅馬教廷開始支援馬、英在中國創辦大學的設想，數度派員來中國考察教育。但此時的中國，與 10 年前馬、英上書時的情景已大不相同，新文化運動對傳統文化的衝擊和矯枉過正的偏頗，使馬、英更相信在介紹和引進西學的過程中更要重視中國的傳統文化和文化遺產。1925 年 9 月馬相伯、英斂之起草的《美國本篤會創設北京公教大學宣言書》一文中說：「今本會創設大學於北京，……即介紹西歐新得科學文化之最精者，並保存中國舊有文學美術之最善者，舍短取長，不使偏勝，

此物此志也。」他們在《宣言書》中還強調：

辦此大學之人，雖皆美產，然其來華本意，絕非用殖民政策，造成附屬品，乃為吸收中國有志愛群之士，本此志願，同功合作，數十年後，不假外力，該會該學，純為中國自主自立之機關，即達其志願矣。

這表現了他們的民族主義立場，以及在他們心目中未來大學的方向。《宣言書》雖然出自中國人之手，但也得到美國本篤會的認可和同意。1924年3月北京公教大學和北京輔仁大學的首任校長奧圖爾（George Barry O'Toole）給英斂之的一封信中說：

當這所大學開學後，我們希望您能擔任中國文學、歷史的教授。我們希望在中國人民的眼裏，天主教會並不是他們的敵人，而是他們在本民族語言、傳統、古典文學等方面的朋友。我們希望北京公教大學成為一個中國文化的儲聚點，一個中國文化的中心，並通過自己特有的天時、地利，將其發揚光大，有助於中國這一強大、古老的國度發展自己的藝術、語言、哲學等。

1929年11月13日在北京輔大教學主樓開工奠基典禮上，教廷駐華第一任代表剛恒毅樞機主教致詞時提出輔仁大學的建校目的：

……輔仁大學是保持完成中華文化的有力工具，正如教宗庇護第十一曾以莊嚴的語詞所說的：「輔仁大學擔負著中國新生的使命。」  
 ……本校整個建築採取中國古典藝術式，象徵著對中國文化的尊重與敬仰。  
 ……本篤會修士皆抱著崇高的理想來支援這座大學，其目的使教育達到完美神聖境界；我們也保證絕不藉教育來干涉學生們的宗教自由信仰，我們歡迎對教會的教義有興趣的學生們以客觀誠懇地態度來研究，我們對學生以啟發及開導的方式，而不是以壓力要學生接受宗教；事實上，改良社會風氣與培育品德修養皆與宗教有不可分隔的關係。所有的天主教徒皆領悟到這座大學是保存中華文化的最佳及安穩的地方，興建大學的先賢們皆抱著天主教的精神興學，其創校的動機絕對沒有政治性陰謀及營業的企圖；相反的，輔仁大學是以「天下為公，世界大同」的原則來推動中國文化，裨益大眾。  
 ……美國聖本篤會士援助興建此大學的目的，是希望在未來的時日，將這座大學的管理權交付給中國人繼承者的手中，在此，本人以同情的心及誠懇的態度祝福將來負責管理這座大學的繼承人。

1925年1月創辦的北京公教大學僅設講授國學的「輔仁社」，聘請英斂之擔任社長，英氏沿襲1913年香山靜宜園「輔仁社」的辦學理念，主要講授中國文學、歷史、哲學、英文和數學等課（見複印件）。

1927年北京公教大學決定以輔仁二字命名將大學更名為北京輔仁大學，當時實際是一所以國學為主的文科大学（文學院）設國文學系、英文學系、史學系、哲學系。1929年為在國民政府立案註冊，增設了理學院、教育學院，共有12個學系、1個專修科。

輔仁二字出於《論語·顏淵》：曾子曰「君子以文會友，以友輔仁」。1935年夏，陳垣校長為北平輔仁大學廣東同鄉會會刊題詞有：「孔子曰君子以文會友以友輔仁孟子曰一鄉之善士斯友一鄉之善士一國之善士斯友一國之善士天下之善士斯友天下之善士已友天下之善士為未足又尚友古之人」（見複印件）這裏的「孔子曰」是陳垣校長引述《論語》上的話，實際上是曾子說的。《論語》一書是記載孔子言行的經典，這裏的「孔子曰」似可作為孔子的思想來領會。《孟子·萬章》「一鄉之善士……。」善士，是品行高尚的人。「以文會友，以友輔仁」就是通過文字文章，交結朋友，共敘友誼。《晉·祖約》詩：「以文常會友，唯德自成鄰」（見複印件）。

「以文會友，以友輔仁」實質上可以看做是北京輔仁大學的校訓。

1928年「私立北平輔仁大學組織大綱」正式定稿，文中第二章宗旨「本大學以介紹世界最新科學發展中國固有文化養成碩學通才為宗旨。」較之草稿的宗旨「本大學以介紹西歐科學保存中國舊有文藝灌輸國學必須之常識養成中華國民之領袖為宗旨。」二者對比明顯感到定稿文表述的全面和定性的準確。而對照筆跡，似為陳垣校長親自修改定稿（見複印件）。

綜上所述，輔仁學風的表述和內涵似可概括為以文會友，以友輔仁，重視和發展國學，介紹和引進西學，中西文化交流，中西文化相容，中西文化融合的學術輔仁，培養和造就國家所需之碩學通才。

## 二、代表學術輔仁學術地位的《兩志》

迄今仍在台灣輔仁大學編輯出版的《輔仁學志》和《華裔學志》是北京輔仁溝通中西文化的高水準學術期刊。

《輔仁學志》1928年12月創刊。主編陳垣校長擔任，編委會成員有英千里、張懷、余嘉錫、張星烺、張重一等。《輔仁學志》的發刊詞申明了是新潮刊物的宗旨：「隨著世界形勢的變遷，中外學術的交流，學者必須發掘利用新材料，開闢新領域，採用新方法，只有這樣才能取得新的成就。」發刊詞有兩點反映輔仁學風的學術傳統。一是高度評價中國傳統治

學方法，指出：「百年以往，乾嘉諸老努力樸學，極深研幾，本實事求是之精神，為整理珍密之貢獻，三古文史燦然大明。」二是對新方法和中西合作的肯定，指出：「迨海國棣通，新知輸入……傾向既異，工作自殊然則欲適應時代之要求，非利用科學方法不可。闡發邃古之文明，非共圖歐亞合作不可。昭昭然也。」《輔仁學志》的目標和使命是「溝通中西文化交流」。

《輔仁學志》第一卷第一期刊登了 6 篇文章：中國造紙術輸入歐洲考（姚士鼐）；從古器款識上推尋六書以前之文字畫（沈兼士）；唐時非洲黑奴入中國考（張星烺）；跋倖存錄（朱希祖）；四庫總目索引與四庫撰人錄（鞠增玉）；新嘉量之校量及推算（劉復）。《輔仁學志》雖也接受外稿，但文章的作者基本上是輔仁的教師。《輔仁學志》的內容比較廣泛，按其徵稿要求：「凡關於歷史、語言、文字、宗教、哲學、美術、金石等著作或譯文，均所歡迎。」但從發表的論文看，古代史占了絕對主導地位，其次是古文字研究，古籍、古書、古器物的考訂。這和當時學術界的傾向是一致的。《輔仁學志》發表了一系列著名學者的論著，介紹了西方學者對中國歷史文化的研究，對當時中國學術的發展產生了積極的影響，提高了輔仁在國內學術界的地位。

《華裔學志》1935 年 1 月創刊。是以英、法、德文在國外發行，專門刊登研究中國古籍文章的刊物。創刊主編是以研究中國古代文學家屈原文學著作而獲萊比錫大學漢學博士的鮑潤生（Francis Xaver Biallas）教授，編委會成員有歐洲漢學家孟斯達特（A. Mostaert）、鋼和泰（Von Stael Holstein）、艾克（G. Ecke）、謝理士（E. Schierlitz）、和中國學者陳垣、沈兼士、張星烺、英千里等。鮑在一年後病逝，乃由新任校務長、奧國維也納大學人類學博士、英國倫敦大學哲學博士的雷冕（R. Rahmann）教授擔任直至 1948 年，先後擔任編委的還有顧若愚（H. Koester）、福克斯（W. Fuchs）、衛德明（H. Wilhelm）謝盛德（Koster Hermann）等人。刊物的中文名字《華裔學志》是陳垣校長選定的，「華裔」二字現在一般理解為在外國的中國人後代，但當時陳校長選的「裔」字指遠方的人民。《華裔學志》就是中國與遠方人民間文化關係的學術研究刊物。《華裔學志》的英文名字為 *Monumenta Serica*（原意為絲域的史跡），它是面向西方專業性很強的刊物，專載漢學方面的研究成果，不登一般性的文章，中外學者發表的文章都是西方漢學界比較感興趣的問題，同時也是距離現實相當遙遠的所謂「純學術研究」和當時歐洲漢學流連于中國古代文明的風格是一致的。

《華裔學志》第一卷第一期刊登了 8 篇文章：亞洲最古的文化圈

(Wilhelm Schmidt)；北平武英殿雕版技術 (Ernest Schierlitz)；商代銅器花紋和製造的起始 (H. G. Creel)；阿巴亥的死 (Walter Fuchs)；佛說淨土盂盆經譯注 (Jan Jaworski)；德譯杜甫詩 (E. Von Zach)；德譯《楚辭》 (F. X. Biallas)；十七、十八世紀公教在中國文化演進中的地位 (Henri Bernard)。到 1948 年底《華裔學志》共出刊 13 卷，刊載中外學者的論文 104 篇，短文 102 篇。其中除了西方學者的作品外，也翻譯陳垣、沈兼士、張星烺等中國著名學者的文章。這些文章內容深湛，考證扎實，論述的科學性、系統性強，顯示了這一時期中國北方地區漢學家學術成果的精粹。《華裔學志》除發表當代學者研究成果外，還把中國文化中的精品如杜甫詩、楚辭等譯成德文，真正起到了溝通中西文化的作用，它刊出的主要文獻也成為世界上漢學研究的寶貴財富。

1949 年後《華裔學志》遷至日本，先在東京後在名古屋設立了研究室，繼續出刊，主編是漢學家布希 (Heinrich Busch) 博士。至 1954 年，在東京出版了第 14、15 卷，1955 年至 1963 年在名古屋出版了第 16 至 22 卷。1963 年《華裔學志》應美國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 (UCLA) 的邀請遷至該校的東亞研究所，仍由布希主編。1972 年遷入西德北部人類學研究所，作為該所的出版物，並在聖·奧古斯丁設立了編輯部、圖書館、會議廳和接待廳等學術活動場所。幾十年來《華裔學志》始終保持原訂宗旨，所刊均為內容以古代為主的漢學研究，包括文學、藝術、語言、歷史、哲學、宗教等。

今年是《華裔學志》創刊 70 周年，70 年來它在推動、促進中西文化交流，向西方介紹古老的中華文化上，產生了重要影響和作用。我們期待繼承 70 年前傳統的《華裔學志》將和《輔仁學志》一起，成為學術輔仁體系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繼續發揮更大的作用。

### 三、承擔中西文化交流任務的北京輔大外籍教職員

據 1930 年至 1949 年統計，在北京輔大任職的外籍教職員共有 242 位 (占中外教員總數約 30%)，837 人次 (見附表一)。其中：德國籍 532 人次，占 64%，美國籍 138 人次占 16%，德美兩國國籍占總人數的 80%。共 19 個國家國籍 (美國、德國、日本、英國、俄國、法國、加拿大、義大利、奧地利、荷蘭、比利時、西班牙、瑞士、瑞典、愛爾蘭、波蘭、羅馬尼亞、拉脫維亞、捷克斯洛伐克)。在外籍教員中，教授、副教授一級占了很大的比重，約占 64%，仍以德美兩國最多。教授、副教授一級的外籍人士約占中外籍教授、副教授的 50%，有的年份甚至超過 50%。

按文理科觀察，文科外籍教員數高於理科，但在理科任教的基本是教授副教授一級。

按外籍教職員擔任院系領導職務情況觀察：

年份	外籍教職員擔任領導職務的院系
1930	醫預科、數理學系、社會學系、教育學系
1931	醫預科、數理學系、英文學系、社會經濟學系、心理學系
1932	醫預科、數理學系、化學系、生物學系、西語學系、心理學系
1933	理學院、化學系、社會經濟學系、心理學系
1934	理學院、數理學系、化學系、社會經濟學系、哲學系、心理學系
1935	理學院、數理學系、化學系、社會經濟學系、哲學系、心理學系
1936	理學院、數理學系、化學系、社會經濟學系、哲學系、心理學系
1937	理學院、數理學系、化學系、哲學心理學系
1938	理學院、數理學系、化學系、哲學系
1939	理學院、數理學系、化學系、社會經濟學系、哲學心理學系
1940	理學院、數理學系、化學系、社會經濟學系、哲學心理學系、家政學系
1941	理學院、數理學系、化學系、家政學系
1942	理學院、數理學系、化學系、日文學系、家政學系
1943	理學院、數理學系、化學系、日文學系、社會學系、家政學系
1944	理學院、數理學系、化學系、日文學系、社會學系、哲學心理學系、家政學系
1945	理學院、數理學系、化學系、社會學系、哲學心理學系、家政學系
1946	理學院、數理學系、化學系、社會學系、哲學心理學系、家政學系、農學系
1947	理學院、數理學系、化學系、西語學系、社會學系、哲學心理學系、家政學系、農學系
1948	理學院、農學院、數學系、物理學系、化學系、西語學系、社會學系、人類學系、哲學系、心理學系、家政學系、農學系
1949	理學院、物理學系、化學系、西語學系、社會學系、心理學系、家政學系

外籍教職員在理學院以及數學系、物理系、化學系、文學院的社會經濟學系和教育學院的哲學系、心理學系、家政學系、農學院的農學系長期擔任領導職務。生物學系、西語學系、醫學先修科有的年份亦曾有外籍人士擔任主任。所授學科方面，外籍教員在理科的物理學、化學、心理學和文科的人類學等均承擔了主課講授任務並使達到當時的國際水平。

如理學院院長嚴池教授早在 1931 年因在超聲學的研究中成績優異而被德國波萊斯大學授予物理學博士。他為本科生講授理論物理學，為研究生開設量子統計學、波動力學、量子力學、原子光譜學、分子光譜等課程，其中許多課程是當時國際最新物理學理論，他對超聲學的研究，是當時國際領先水平；數理學系主任李嘉士教授，德國孟安斯德大學物理學博士。他為本科生講授光學，為研究生開設張量研究、相對論、分子光學、各向異性介質之光性質等課程，大多是當時物理學的前沿科學，在德國《物理學志》上發表了不少有分量的科學論文，德國物理學界認為他的研究成果對物理學的發展做出了成績和貢獻；化學系主任卜樂天教授，德國哥廷根大學化學博士。為本科生和研究生開設化學概論、無機化學、物理化學等課程。他對結晶學和土壤學的研究有很高的造詣，德國化學界認為他的來華使本國失掉了一位良師，為輔大增添了一位名教授；心理學系主任葛爾慈教授，德國萊比錫大學哲學博士，師從德國實驗心理學大師林德渥斯基（Lindwors K.Y）專攻意志生活及關係知識等問題。他 1934 年來到北京輔仁大學執教直至 1949 年，長期擔任心理學系主任，並曾兼任教務主任、圖書館主任。主講被學生戲稱為心理系「三大法寶」的三門必修主課；普通心理學（General Psychology）、實驗心理學（Experimental Psychology）和理論心理學（Theoretical Psychology）並講授高等心理學、兒童心理學、社會心理學、教育心理學、心理問題、發展心理學、人類心理學、理化心理學、變態心理學、應用心理學、心理學史等課程；人類學研究所和人類學系是教務長雷冕教授創辦和發展起來的。雷冕教授是一位知名的人類學家，畢業于維也納大學和倫敦大學，分別獲得人類學和哲學博士。北京輔仁大學人類學研究所創辦於 1944 年，人類學系成立於 1948 年，是中國大學中最早開辦的人類學研究所和人類學系。而早在 1935 年輔大就曾邀請了一位世界著名的人類學家施密特（Father Schmidt）來校做學術交流，胡適日記中曾有記載：1935 年 5 月 29 日「到輔仁大學晚飯，客人 Father Schmidt（F·施密特）是天主教中的一個人種學者。還有伯希和夫婦。」雷冕教授從 1937 年起在社會學系授課，並曾兼任系主任、人類學研究所主任，從 1937 年至 1948 年他開了十餘門社會學和人類學方面的課程，如社會學原理、社會學概論、人種學研究、文化體質人類學、人類學術語、印

度支那及南洋民族研究等。人類學研究所畢業的碩士生數量不多（1946 至 1950 屆共有 8 人），都很傑出優秀。在人類學研究所和人類學系任教的外籍人類學家還有施格萊、賀松崧等教授。

北京輔大主要外籍教職員進校年份、年齡、校齡情況：

姓 名	年 份	年 齡	校 齡	姓 名	年 份	年 齡	校 齡
奧圖爾	1925	37	9	刑錫禮	1927	36	7
穆爾菲	1933	38	3	雷德曼	1929	35	5
韓克禮	1933	32	4	尚 嘉	1931	25	2
雷 冕	1936	34	13	施濤客	1931	38	9
芮歌尼	1946	46	4	白立齋	1933	42	17
嚴 池	1934	52	15	胡博德	1931	26	2
胡魯士	1936	33	13	蔣達士	1936	32	12
李嘉士	1933	59	2	施格萊	1936	62	14
鮑潤生	1933	55	4	司徒資	1937	60	3
豐浮露	1934	32	10	葉德禮	1938	36	10
歐斯德	1934	35	15	賀松崧	1945	34	4
葛爾慈	1934	30	16	黎 白（女）	1935	36	15
李士嘉	1937	44	13	裴 德（女）	1935	51	14
卜樂天	1934	32	16	盧德思（女）	1935	44	15
吳彬雅（女）	1938	31	12	孫士選	1935	29	13
馬德武	1934	31	16	伊德風	1925	56	8
桑德厚	1946	39	4	艾 克	1934	38	15
費知本	1938	30	11	柴 熙	1942	40	8
關維廉	1938	29	11	韓斯樂	1929	23	5
謝理士	1930	28	9	郝 岑	1937	29	11
司徒豹	1930	36	4	史祿國	1932	45	8
師立模	1929	31	5	沙博理	1958	35	2
鮑尼腓	1928	39	4				

北京輔仁大學主要外籍教職員年齡結構合理，都很年輕。幾位校務長均在 40 左右，雷冕校務長到校時僅 34 歲。院系領導除嚴池院長到校時已 52 歲外，擔任系主任的大多在 30 歲左右，1931 年曾出任生物學系主任的胡博多僅 26 歲，1929 年曾任社會科學系主任的韓斯樂僅 23 歲。

從主要外籍教職員在北京輔大任教年限觀察，45 位中任教期限超過 10 年的有 22 位，占 49%，也就是說有將近一半的主要外籍教職員較長時間在輔大任教，特別是 1936 年已經 62 歲英國籍的施格萊教授來到輔大後一直到 1949 年整整任教 14 個年頭才不得不離開，他曾擔任人類學系主任，是歷年來在輔大任教的外籍教授中年齡最大者。

北京輔大中外教師隊伍相對穩定對教學水平的提高和教學成果的顯效是不言而喻的。

#### 四、北京輔大主要外籍教職員簡介

**奧圖爾**（George Barry O'Toole, 1888-1944）美國籍，美國聖約翰大學文學碩士、意國羅馬大學哲學博士，曾任美國攀西沃尼亞省文森大學哲學及社會學教授、西東喜大學生物學教授。1925 至 1933 年在輔仁任教授。

1925 年 1 月至 1927 年 5 月北京公教大學校長、1927 年 6 月至 1929 年 5 月北京輔仁大學首任校長、1929 年 6 月至 1933 年 5 月北京輔仁大學首任校務長。曾兼任北京輔仁大學理學院院長、醫學先修科主任、生物學系主任、哲學系主任。講授動物學概論及實驗。

**穆爾菲**（Joseph Murphy, 1895-1935）美國籍，意國羅馬安格利克大學博士，曾任美國各大學教授 10 年。1933 至 1935 年在輔仁大學任教授。

1933 年 7 月至 1935 年 9 月北京輔仁大學校務長。曾兼任心理學系主任。講授英文修辭學及作文、心理學史、純理心理學等。1935 年 9 月 5 日因心臟病在北京逝世。

**韓克禮**（Joseph V.Henkels, 1901-1997）美國籍，美國聖瑪麗學院學士。

1933 至 1936 年在輔仁任教授。1935 年 9 月至 1936 年 9 月北京輔仁大學代理校務長。講授大學物理。

**雷冕**（Rudolf Rahmann, 1902-1985）德國籍，奧國維也納大學人類學博士、英國倫敦大學哲學博士，曾任前安斯如普斯雜誌主編。

1936 至 1948 年在輔仁任教授。1936 年 9 月至 1946 年 8 月北京輔仁大學校務長、1946 年 9 月至 1948 年 12 月副校務長。曾兼任社會學系、人類學系主任、人類學研究所主任。講授社會學概論、社會學原理、社會經濟原始、宗教起源及其發展、社會工作、人種學及史前史研究法，社會哲學概論，民族學綱要、印度支那南洋民族研究、印度非雅利安人之宗教、社會思想史、原始民族社會生活、文化體質人類學、人類學術語、宗教通牒。

**芮歌尼**（Harold W. Rigney, 1900-1980）美國籍，美國芝加哥大學生物、

哲學博士，倫敦大學教授。

1946 至 1949 年在輔仁任教授。1946 年 8 月至 1949 年 1 月北京輔仁大學校務長。並曾任理學院院長。

**嚴池** (Augustin Jaenseh, 1882-1963) 德國籍，德國博瑞司蘭大學哲學博士、波蘭 Breslau 大學物理學博士，並曾在維也納大學攻讀數學、物理學和醫學，在柏林大學攻讀工程學。曾在巴西大學任教。

1934 年至 1948 年在輔仁任教授。曾任副校務長、理學院院長、數理學系主任。講授高等波動力學、原子光譜、高等量子力學、統計力學等。

**胡魯士** (Henry Kroes, 1903-1989) 荷蘭國籍，羅馬葛瑞高瑞大學歷史與教育碩士。

1936 年至 1948 年在輔仁任教授。1937 年至 1941 年、1946 年至 1948 年年任教務長（主任）。講授西洋中古史、西洋近世史、西洋文學史、美國史、公教史、近代西洋史學史。

**李嘉士** (Stephan Richarz, 1874-1934) 德國籍，維也納和慕尼克大學地質學、礦石學、地理學博士。1933 年至 1934 年在輔仁任教授。曾任副校務長、理學院院長兼化學系主任。1934 年 7 月 13 日在我國山東省做野外調查工作時不幸中暑逝世。

**鮑潤生** (Francis Xaver Biallas, 1878-1936) 德國籍，萊比錫 (Leipzig) 大學漢學博士。曾任聖溫德大學教授。

1933 年至 1936 年在輔仁任教授。曾任社會經濟學系主任。創辦《華裔學志》並任總編輯。講授社會思想史、世界文明史、人類學與社會原始、社會心理學、社會調查。

1936 年 5 月因斑疹傷寒症在北京逝世。

**豐浮露** (Eugene Feiel, 1902-1999) 德國籍，東京帝國大學學士，北京輔大文科研究所碩士。

1934 年至 1943 年在輔仁任教授。曾任副校務長、教務長、哲學系主任。講授西洋哲學史、現代自然科學問題研究、杜威實用主義、印度哲學、現代哲學、認識論、日文。

**歐斯德** (Frank Oster, 1899-1979) 德國籍，聖蓋伯利大學學士，芝加哥大學理學研究所碩士。

1934 年至 1949 年在輔仁任教授。曾任物理學研究所所長、數理學系主任。講授高頻律及電聲學、氣象光學及氣象電學、力電學實驗、電學測量、無線電測量、質點、力學、剛體力學、物理選讀、真空技術及實驗、X 射線等。

**葛爾慈** (Fr. Joseph Goertz, 1904-1980) 德國籍，羅馬大學博士。

1934年至1949年在輔仁任教授。曾任哲學心理學系主任。講授心理學概論及實驗、教育心理學及實驗、社會心理學及實驗、兒童心理學、純理心理學、高等心理學及實驗、心理問題、理論心理學、心理學史、理化心理學、人類心理學、實驗心理學。

**李士嘉** (Michael Richartz, 1893-1982) 德國籍，德國蒙斯特 (Muenster) 大學物理學博士。

1937年至1949年在輔仁任教授。曾任理科研究所物理學部主任、數理學系主任。講授理論物理學、物理誤差觀察論、大學物理實驗、電學實驗、動體光學、近世物理、力學實驗、光學實驗、晶體光學、分子光學、傅立葉級數、實變數函數論、向量解剖、光放射色散及吸收。

**卜樂天** (William Bruell, 1902-?) 德國籍，德國哥庭金 (Goettingen) 大學化學博士，曾任哥庭金大學化學實驗室指導。

1934年至1949年在輔仁任教授。曾任理科研究所化學部主任、化學系主任。講授化學概論、物理化學及實驗、無機化學及實驗、初等物理化學、電化學、重要無機藥物。

**吳彬雅** (Urbania, 1907-2000) 女，德國籍，馬尼拉聖神學院學士。

1938年至1949年在輔仁任教授。曾任家政學系主任。講授家政學、英文、嬰兒保管學、衛生學、編織法、烹飪及實習、社會工作、食物選擇法及實驗、食物學、營養學、家事學及實驗、家事管理、家政教學法、應用營養、家庭教學法、家庭工藝學及實驗。

**馬德武** (Gregory Mathews, 1903-1949) 德國籍，伯思蘭大學學士，芝加哥大學生物學博士。

1934年至1949年在輔仁任教授。曾任農學系代主任、農學院負責人。講授生物學概論及實驗、昆蟲學及實驗、生物學、古植物學及實驗、植物病理學及實驗、農業植物學及實驗、農業英文、二年德文。

1949年2月4日因病在北京逝世。

**桑德厚** (Joseph Sandhaas, 1907-1951) 美國籍，美國天主教大學英國文學碩士。

1946年至1949年在輔仁任教授。曾任西洋語言文學系主任。講授現代西方文學、現代文學選讀、英國文學史、文藝批評、美國文學、小說選讀、美國小說。

**費知本** (William Fitzgibbon, 1908-1994) 美國籍，羅馬格瑞高瑞大學哲學學士。

1938年至1948年在輔仁任教授。曾任副校務長、哲學心理學系哲學組組長。講授形上學、哲學原理、哲學系統、自然哲學、拉丁文選讀、英

文選讀。

**關維廉** (William E. Hogan, 1909-?) 美國籍，1938 年至 1948 年在輔仁任講師、副教授。曾任社會學系主任。講授社會學原理、社會學選讀、社會思想史、社會問題、人口論、犯罪學、社會學概論、近代思想史、教宗通牒、英文誦讀及會話、英文修辭學及作文、英語演說及辯論。

**謝理士** (Ernest Schierlitz, 1902-1940) 德國籍，德國瑞明志大學圖書館學博士。

1930 年至 1938 年在輔仁任教授。曾任圖書館主任 (館長)。講授西洋文學史、歐洲圖書館史、歐洲文學、希羅文學、中世紀拉丁民族文學、西洋代表名著研究、德文。

**司徒豹** (Adrian Stallbaumer, 1894-?) 美國籍，美國聖約翰大學文學學士、芝加哥大學化學碩士。

1930 年至 1933 年在輔仁任教授。曾任化學系主任。講授化學概論及實驗、定性分析、物理化學及實驗、化學史。

**師立模** (Gregory Schramm, 1898-?) 美國籍，華盛頓大學心理學碩士，博士。曾在聖文森學院任教授。

1929 年至 1933 年在輔仁任教授。曾任心理學系主任。講授普通心理學及實驗、動物心理學及實驗、教育心理學、兒童心理學及實驗、社會心理學、心理衛生學、人格測驗。

**鮑尼腓** (Boniface Martin, 1889-?) 美國籍，美國伊尼諾瓦省立大學經濟學碩士。

1928 年至 1931 年在輔仁任教授。曾任體育主任、事務長、社會學系主任。講授經濟原理、社會史、英國經濟發達史。

**邢錫禮** (Syivester Healy, 1891-?) 美國籍，美國密西根大學物理學碩士，華盛頓公教大學數學碩士。

1927 年至 1933 年在輔仁任教授。曾任數理學系主任。講授大學物理及實驗。

**雷德曼** (Cuthbert Redmond, 1894-?) 美國籍，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碩士。曾任美國聖安素倫大學英文學系主任。

1929 年至 1933 年在輔仁任教授。曾任英文學系主任。講授美國文學、英作文。

**尚嘉** (Francis Shonka, 1906-?) 美國籍，美國芝加哥大學理學碩士。曾任芝加哥大學副教授。

1931 年至 1932 年在輔仁任教授。曾任數理學系主任。講授微積分、大學物理及實驗、熱學實驗、物理實驗、電學實驗。

**施濤客** (Cornelis S.Stolk, 1873-?) 荷蘭籍，亞斯特大 (Amsterdam) 工業學院工學士。

1931 年至 1949 年在輔仁任講師、副教授、教授、名譽教授。講授工業化學及實驗、油脂臘研究及實驗、肥料技術化學、高等定量分析化學、肥皂學、實業化學及實驗、實驗化學、工業分析實驗。

**白立薰** (Franz Brueckner, 1891-1985) 奧地利籍，維也納師範大學學士。

1933 年至 1949 年在輔仁任講師、導師、副教授、教授。曾任美術學系西畫組組長。講授西洋畫、透視學、解剖學、西洋美術史、西洋畫史、比例學、美術理論及實習、西洋畫理論。

**胡博德** (Hubert Sheehan, 1905-?) 美國籍，恩斯樂學院學士、諾特達大學碩士。

1931 年至 1932 年在輔仁任教授。任生物學系主任。講授普通動物學及植物學及實驗、普通生物學及實驗。

**蔣達士** (M. Taschdjian, 1904-?) 義大利籍，維也納農業學院農學博士。

1936 年至 1947 年在輔仁任教授。講授生藥學及實驗、動物生理學及實驗、植物生理學及實驗、應用遺傳學及實驗、科學的哲學。

**施格萊** (Hans C. E.Zacharias, 1874-?) 英國籍，吉森 (Giessen) 大學哲學博士、法國 (Lille) 公教大學歷史學教授。

1936 年至 1949 年在輔仁任教授。曾任人類學系主任。講授近代歐洲經濟史、政治學、教宗通牒、希羅宗教、英國海外發展史、人類學、歷史與民族學。

**司徒資** (Joseph Stulz, 1877-1940) 德國籍，萊比錫 (Leibzig) 大學歷史學博士。曾任科隆 (Cologne) 大學歷史學教授。在美國 10 年用德文編著了《美國歷史》一書。

1937 年至 1939 年在輔仁任教授。講授西洋中古史、西洋近世史、西洋史學方法概論、西洋外交史。

**葉德禮** (M.Eder, 1902-1980) 奧地利籍，柏林大學人類學博士。

1938 年至 1948 年在輔仁任教授。曾任人類學博物館主任 (館長)。講授民俗學、日本文明史、亞洲東部考古學、語言學、地理方言。

**賀松崧** (William Grootaers, 1911-1999) 比利時籍，魯汶大學學士。

1945 年至 1948 年在輔仁任講師、教授。曾任人類學研究所方言地理學研究室主任。講授方言學。

**黎白** (Wanda Ryba, 1899-1990) 女，美國籍，洛雅拉大學醫學士、

音樂學士。

1935年至1949年在輔仁任教授。曾任女部圖書館主任(館長)。講授英文、英文法及修辭、英文誦讀及會話、英文作文、英語演說及辯論。十七、十八世紀英國文學、英國文學史、音樂原理、音樂史、英散文選讀、盎格魯撒克遜詩曲選讀。

**裴德**(Elisabeth Bette, 1884-1966)女,美國籍,洛雅拉大學碩士。

1935年至1948年在輔仁任教授。講授心理學概論及實驗、理論心理學、西洋教育史、高等心理學、教育心理學及實驗、高等教育心理學、心理學史、英文、二年德文。

**盧德思**(Gertrud Luters, 1891-1982)女,德國籍,1935年至1937年任北京輔大附中女部主任,1938年至1949年在輔仁任教授。任女院院長。講授公教史。

**孫士選**(Clemens Schapker, 1907-1964)美國籍,1936年至1948年在輔仁曾任總務長、副校務長。

**伊德風**(Ildephonse Brandstetter, 1869-?)美國籍,聖文森學院文學碩士。曾任美國聖文森會院副院長、北京本篤會會院院長。

1925年至1932年在輔仁任教授。講授拉丁文、現代歷史、德文。

**艾克**(Gustav Ecke, 1896-1971)德國籍,德國Erlangen大學哲學文學博士。曾任廈門大學、清華大學教授。

1934年至1948年在輔仁任講師、教授。講授條頓及斯拉夫民族文學、美學、西洋美術原理、希臘羅馬文學、美術史、德文。

**柴熙**(Albert Czech, 1902-1993)德國籍,羅馬額我略大學博士。

1942年至1949年任輔仁教授。曾任哲學心理學系哲學組組長。講授哲學系統、邏輯學、人生哲學、哲學概論、實體論、哲學問題、哲學人類學、測理學。

**韓斯樂**(Carl Hensler, 1906-?)美國籍,聖文森學院文學碩士、哲學博士、羅馬大學神學博士。

1929年至1933年在輔仁任教授、任社會科學系主任,講授社會思想、倫理學。

**郝岑**(H. Holzen, 1908-?)奧地利籍,維也納大學化學博士。

1937年至1947年在輔仁任教授。講授無機定性分析及實驗、化學計算、高等無機化學、無機定量分析及實驗、化學概論及無機化學實驗、實業化學及實驗、有機化學及實驗、生理化學、藥物化學。

**史祿國**(Serge Michaei Shirogoroff, 1887-1939)俄國籍,法國巴黎大學人類學博士。曾任俄羅斯帝國科學院人類學教授、清華大學人類學教

授、世界著名人類學家。

1932年至1939年在輔仁任教授。講授人類學、體質人類學、人種學。1939年因病在北京逝世。

**沙博理**（Sydney Sharpiro, 1915-）美國籍，美國約翰遜大學法律學系學士。美國紐約市執業律師，1947年來中國，上海市執業律師。新中國成立後，曾任全國政協第六、七、八、九屆委員、外文出版局編輯、中國翻譯工作者協會理事、中美友好協會理事。曾將《水滸》等古典小說和10多部當代中國文學作品譯成英文出版。著有《一個美國人在中國》、《四川的經濟改革》等。

1950年至1951年在輔仁任教授，講授英文。

**艾德柏·格瑞斯耐**（Adelbert Gresnigt）比利時籍，享譽國際的建築藝術家及建築師。他1927年來中國，在中國南方設計教堂和學校。1928年受委託設計北京輔大教學主樓，1929年11月13日教學主樓開工建設，1930年9月竣工。

它是一座宮殿式的建築，也是中西文化交流與融合的產物。主樓除東西南北四個角樓及中間大門為三層樓外，其餘都是二層樓。樓頂鋪有綠色的琉璃瓦，每一個玻璃窗都是雕花的木框，所用的磚都是二尺厚、四尺長的淺灰色的水磨磚，不用粉刷就能永遠保持平滑的外貌。校舍大門是仿宮殿式的大門，木制紅漆各鑲有金黃色的銅乳頭，最上層的窗凸出，像個佛龕，美奐美侖之中又不失一番莊嚴的氣氛，當時被譽為北平三大建築之一。（另二大建築為燕京大學和協和醫院。）全樓共500餘間。除辦公室、圖書館、實驗室外，有教室若干間，約可容納學生800餘人，宿舍可容納200餘人，大禮堂可容納1000餘人。

北京輔大的外籍教職員為學校的創建發展作出了很大奉獻，他們遠離親人，不畏艱苦，不求報酬，不講待遇，與中國籍教職員合作共事，同心協力獻身教育事業。有幾位還將自己的一生獻給了北京輔大，在執教期間病逝，他們是：

**李嘉士**：德國籍，教授。曾任副校務長、理學院院長、化學系主任。1934年7月13日在我國山東省做野外調查時不幸中暑逝世，享年60歲。

**穆爾菲**：美國籍，教授。曾任校務長、心理學系主任。

1935年9月5日因心臟病在北京逝世，享年40歲。他逝世後學校當局將新建成的男生宿舍樓命名為穆爾菲樓，以紀念他對北京輔大的奉獻。

**鮑潤生**：德國籍，教授。曾任社會學系主任。創辦《華裔學志》並任總編輯。1936年5月因斑疹傷寒症在北京逝世，享年58歲。

**史祿國**：俄國籍，教授。1939年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52歲。

**馬德武**：德國籍，教授。曾任農學系代主任、農學院負責人。1949年2月4日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46歲。

如今，曾在北京輔大執教的外籍教職員除極個別外都已謝世。他們的名字和事蹟、他們的辛勤工作和奉獻精神將永遠銘記在輔大人的心中。他們的榜樣力量，將激勵我們前進，與時俱進地繼承和發揚傳統輔仁學風，實現21世紀的輔仁新飛躍。

附表一：北京輔仁大學外籍教職員國籍統計表

年份	國 別																總計			
	美國	德國	日本	英國	俄國	法國	加拿大	義大利	奧地利	荷蘭	比利時	西班牙	瑞士	瑞典	愛爾蘭	波蘭		羅馬尼亞	拉脫維亞	捷克斯洛伐克
1930	11	2		3							1	1							18	
1931	13	2		3							1	1							20	
1932	7	5		2					1	1	1								17	
1933	6	8		1			1	1	1				1						19	
1934	5	11		1	1			1	1				1						21	
1935	3	11						1											15	
1936	4	16		1				2	2										25	
1937	5	11		2	1	1		1	2	2									25	
1938	9	19	1	1	1			1	3	2									37	
1939	8	29	2	1	1			1		2									44	
1940	8	27	2	1	1			1		3									43	
1941	11	39	3	2	1			1	1	3									61	
1942	16	50	7					1	1	3									78	
1943		42	10		1	1		1						1					56	
1944		57	12			1		1				1		1					73	
1945	2	54				1		1	2	1		1							62	
1946	8	42		1		1		1	3	4	1								61	
1947	10	48		2	2	1			3	4	2				1	1	1		75	
1948	8	40		1	1	1			2	3	2							1	59	
1949	4	19		1	1				1	1								1	28	
總計	138	532	37	23	11	7	1	10	23	33	8	3	2	2	2	1	1	1	2	837

附表二：北京輔仁大學外籍教職員情況統計表

年份	教 員										職 員									
	教授	占 比 %	副 教 授	占 比 %	講 師	占 比 %	其 他	占 比 %	合 計	占 比 %	文 科	占 比 %	理 科	占 比 %	校 領 導	行 政 各 長	院 長	學 系 主 任	其 他	合 計
1930	13	62			4	17	1	25	18	37	9	23	9	90	1	1		4	1	7
1931	14	61			4	13	2	15	20	30	12	27	8	67	1			5	1	7
1932	8	44			9	17			17	24	10	33	7	58	1			6		7
1933	8	35	1	25	5	9			14	17	9	13	5	33	1		1	3	5	10
1934	13	50	1	13	7	15			21	26	14	26	7	39	1		1	5	3	10
1935	8	38							8	38	4	30	4	100	1		1	5	7	14
1936	16				2		2							2		1	5	5	13	
1937	16	52	4	57	3	13	2	8	25	28	17	29	8	28	1	1	1	3	4	10
1938	22	55	4	80	3	9	2	5	31	26	25	23	6	18	1	2	1	3	6	13
1939	24	53	4	57	2	5	8	14	38	25	29	28	9	18	1	2	1	4	7	15
1940	19	50	6	46	6	13	6	9	37	22	27	23	10	21	1	1	1	5	6	14
1941	28	56	3	43	15	30	9	11	55	29	42	29	13	27	2	2	1	3	7	15
1942	27	57	6	67	16	25	6	7	55	26	43	26	12	22	2	1	1	4	23	31
1943	22	49	8	62	16	23	5	6	51	24	41	26	10	20	2	2	1	5	6	16
1944	23	52	10	56	20	30	5	8	58	30	47	34	11	19	2	2	1	6	13	24
1945	26	49	3	20	12	19	8	10	49	23	37	25	12	21	1	1	1	5	14	22
1946	25	49	7	50	13	17	2	4	47	24	35	23	12	24	2	2	1	6	17	28
1947	26	49	9	50	20	22			55	33	43	33	12	38	2	2	1	7	24	36
1948	23	30	3	23	16	19			42	24	33	24	9	25	1	1	1	9	18	30
1949	14	20	3	18	11	14			28	17	19	16	9	19			1	7		8
總計	375		72		184		58		669		496		173		26	20	17	100	167	330

說明：一、教員一欄：「占%」為占前項：「中外籍」總數的百分比；「其他」含外籍導師、教員、助教；「文科」、「理科」含各職稱的外籍教員。  
 二、職員一欄：「校領導」含校務長、副校務長、校務長首席秘書；「行政各長」含教務（主任）長、訓育（主任）長、總務（事務主任）長；「其他」含行政各部門課長、工作人員等。  
 三、有的教員與職員因職稱與職務兼有，故有重複計算。

## 參考書目

《北京輔仁大學校史（1925—1952）》，中國社會出版社，2005年8月。

K. Kuepers, Chapter Six, *Fu Jen History*.

北京輔仁大學校友會編，《輔仁校友通訊》。

北京輔仁大學檔案，北京師範大學檔案館。

孫邦華編著，《輔仁大學、會友貝勒府》，河北教育出版社，2004年4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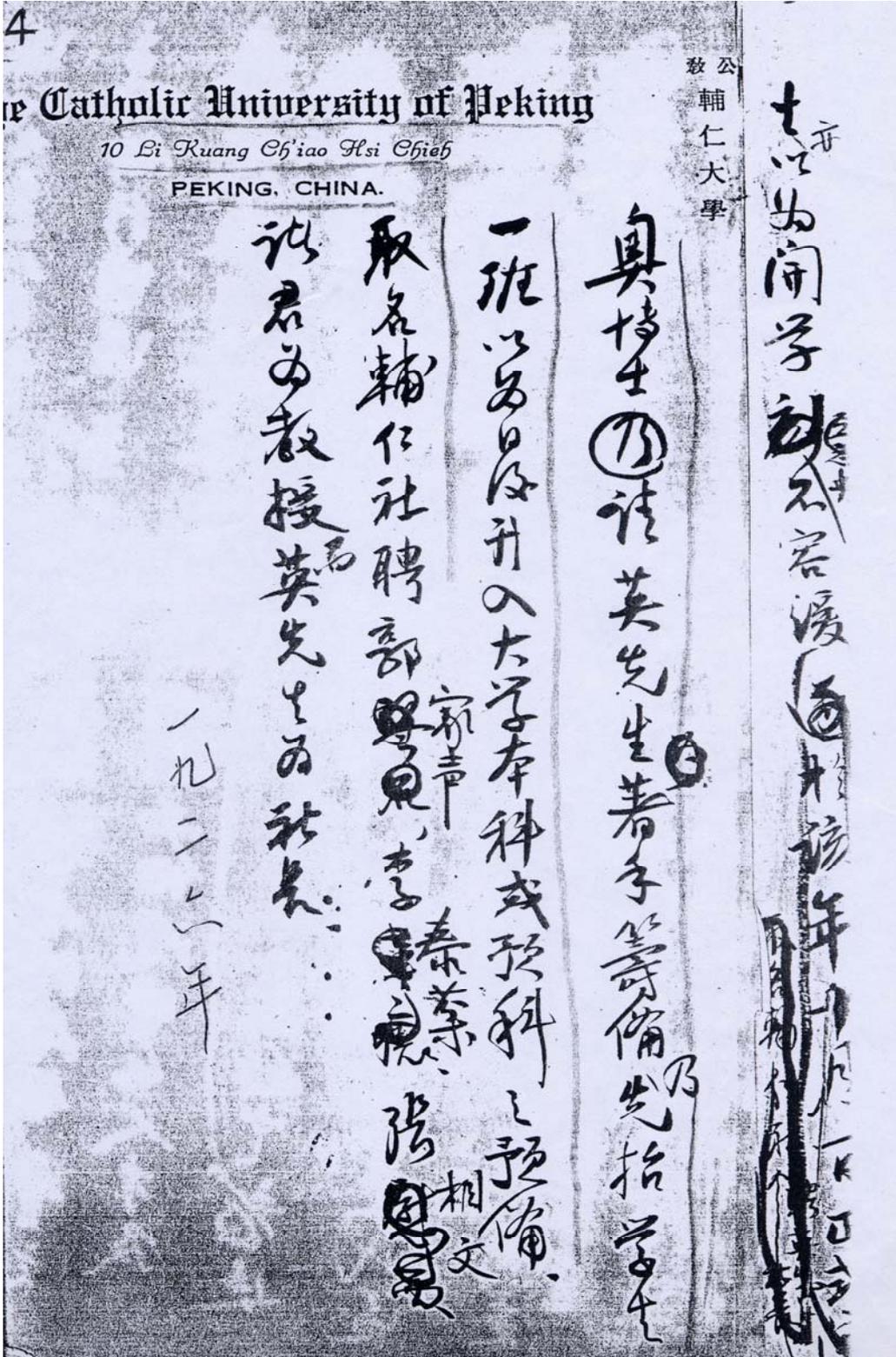
習賢德著，《北平輔仁大學札記》，輔仁大學出版社，2004年7月。

陶飛亞、吳梓明著，《基督教大學與國學研究》，第一輯，福建教育出版社，1998年5月。

1. 戰後羅馬教宗派員來華巡視者有<sup>狀况</sup>年公教<sup>狀况</sup>。
   
 報告<sup>中</sup>亦以為公教<sup>等</sup>教育機關<sup>尚</sup>屬缺乏。
   
 故教廷始確<sup>志</sup>中國公教教育設之<sup>志</sup>大學為刻不容緩。
   
 之<sup>志</sup>事。次年有美國奧爾特士來華調查教育。
   
 審察社會所需<sup>志</sup>重要與人民所缺<sup>志</sup>之乃傳教
   
 於英敘<sup>志</sup>先<sup>志</sup>二人所談<sup>志</sup>極相<sup>志</sup>。
   
 恰實。奧特士乃赴羅馬進謁教宗。陳述情形。
   
 又謁傳教部長。臆列利害。又瞻全球<sup>志</sup>本<sup>志</sup>。

均以此  
 本館今長  
 及美國本館今總長  
 請求  
 拜之義  
 用本館  
 合為最  
 宜其  
 事  
 奔走教  
 不辭  
 勞  
 於一九二一年十一月  
 羅馬教  
 廷  
 始  
 論  
 本館  
 長  
 商議在華  
 與學  
 事  
 委託美國本館  
 司  
 奉  
 來  
 此  
 費  
 教  
 旋旋教宗本館十五  
 組  
 為  
 今  
 教  
 宗  
 比  
 約  
 十  
 接  
 任  
 注  
 重  
 中  
 華  
 亦  
 無  
 已  
 更  
 以  
 謙  
 誠  
 懇  
 切  
 之  
 辭  
 教  
 宗  
 會  
 眾  
 急  
 起  
 赴  
 此  
 事  
 功  
 更  
 親  
 捐  
 義  
 幣  
 十  
 萬  
 以  
 為  
 之  
 倡

三、  
 迨一九三二年八月七日，美本全瓊更爲公開大會，而此項連字  
 之孳始行通過。將在此系至一九三二年，劍加大學之全校各美國禁學以外，凡省  
 森院長司泰來氏，爲此校而地院皆以人才及  
款項輔助，此亦達之公教大學之至也始定教廷  
 得此復日，襟極爲欣慰，致函嘉獎，即泰來氏遂  
 委校啟人奧博士爲校長，該校於一九三二年夏末  
 華  
 遠各處教會紛來，清前自遣子弟來校肄業，大學本科以其  
 先至者，在學子一以爲人



孔子曰君子以文會友以友輔仁孟子曰下所  
 之善士斯友一鄉之善士一國之善士斯  
 友一國之善士天下之善士斯友天下  
 之善士以友天下之善士為未足又  
 為友古之人 乙亥立夏 陳垣



私立北平輔仁大學組織大綱
第一章 名稱
第一條 私立北平輔仁大學
第二章 宗旨
第二條 本大學以介紹世界最新科學發展中國固有文化養成碩學通才為宗旨
第三章 位置
第三條 本大學設在北平李廣橋西街十號舊濤貝勒府

1928年北平輔仁大學組織大綱

<p>私立北京輔仁大學組織大綱</p>	<p>第一章 名稱</p>	<p>第一條 私立北京輔仁大學</p>	<p>第二章 宗旨</p>	<p>第二條 本大學以介紹<small>世界最新科學</small>與科學<small>發展</small>保衛中國<small>國</small>有文<small>明</small></p>	<p>凡本領地為宗旨</p>	<p>第三章 位置</p>	<p>第三條 本大學設在北京<small>李老樹西街十</small>城龍頭井<small>十</small>口號舊濤</p>	<p>貝勒府</p>
---------------------	---------------	---------------------	---------------	--	----------------	---------------	---	------------

## 聖言會於一九三三年接辦北京輔仁大學之紀實

柯博識\*

### 摘 要

羅馬教廷在有名望的中國天主教徒的積極倡議下於 1925 年成立北京公教大學。教廷要求美國本篤會接下辦大學的任務。在美國經濟大蕭條在 1930 年開始後，本篤會無法繼續承受經營輔仁大學的財務負擔。於是教廷要求聖言會接辦輔仁大學。

雖然他們無法募足足夠的款項並欠了很多的債，但是為本篤會來說放棄輔仁大學是一件痛苦的決定，因為為了成立和發展輔大在頭八年中，他們投資很大的人力及財力。最後輔大的一切財產從他們手中被奪走了，並留下巨大的債務。

聖言會之所以被邀請接辦輔大是因為他們是一個傳福音有效力並在美國有了蓬勃的年輕分會的傳教修會。他們在中國也有不少傳教士，雖然不曾辦理大學以及沒有很多有教授資格的會士，但他們認為教廷的邀請是個福傳的大挑戰而願意為此付出大的代價。因此他們從世界各地找適合的人才，尤其是正在大學進修的會士來輔大服務。他們第一年只能勉強的能擔任大學最重要的職務。但像本篤會一樣，最大困難還是財務方面，每年只有最起碼的預算工作。

中國籍的教職員對學校的轉移有很多的憂慮，但是他們都留在崗位，後來也能很快的跟新來的負責任的團隊合作。

天主教輔仁大學的轉移在輔仁的歷史是個相當危險的關鍵時刻，很幸運的輔大繼續發展並在 1930 和 1940 年代變成北京和中國有名望的大學。

關鍵詞：辦大學、辦學經費、教育領導團、教育機構的轉移、天主教大學

---

\* 聖言會神父。

## 序 論

在當時傑出有名望的中國天主教徒積極倡議及奔走下，教廷於一九二五年諭令成立天主教輔仁大學。早在一九一二年時，馬相伯（1840-1939）及英斂之（1867-1926）二位先生已上書籲請教廷在北京創設非黨派的純正天主教大學，希望藉此提高華籍聖職人員的教育水平，加強對中國知識份子廣播福音的工作，並且協助中國面對現代化新世界的挑戰。

羅馬教廷要求美國本篤會加西尼聯會接下在北京成立天主教大學的任務。一九二三年八月八日他們接受指令，但將計劃的執行委由賓夕法尼亞州聖文生總會院，並承諾：所有其他會院皆會提供財力及人力支援。聖文森會院奧瑞留斯·司泰萊（Fr. Aurelius Stehle, 1878-1930）總院長被委派為監督全權處理在北京設立天主教大學事宜。托雷多教區的教區神父、聖文森學院的教授、及本篤會的獻身者——喬治·巴瑞·奧圖爾神父<sup>1</sup>曾至北平訪問並鼓吹此辦學計畫，故獲任命為校長。一九二五年三月時，租用了滿清貴族載濤的濤貝勒府為校址，同年十月一日成立了「輔仁社」又名「國學專修科」，英文名為“McManus Academy of Chinese Studies”，由英斂之出任社長。一九二六年一月十日英斂之社長過世後，此「國學部」添授英文、數學等課程當作大學的預備科。一九二七年七月二十九日由國民政府正式核准，校名為輔仁大學。一九二九年時增設理學院和教育學院，以符合教育部對大學的規定。一九三〇年—三一年學年度初，全新教學主樓落成。

## 財務及其他困境

斥資增設兩個學院及建造一棟新校舍，使本篤會承受巨額的財務負擔。為了蓋校舍大樓及支應其他支出，司泰萊總院長在一九二九年十月初向紐約花旗銀行貸款二十五萬元，利息百分之七，約定於十八個月內償還。司泰萊是以北京天主教大學監督的名義借款，因為他並未得到聖文森會院會議同意授權借貸。但當月底股市崩盤且美國經濟大蕭條開始後，要

<sup>1</sup> 奧圖爾神父，1925-1929年任輔仁大學校長，1929-1933年任校務長奧圖爾神父（George Barry O'Toole, Obl. S. B, 1888-1944）美國俄亥俄州托雷多教區神父，美國聖約翰大學文學碩士，1912年在羅馬讀神學博士，1917年在本篤會聖文森大學教哲學，1919年在西東喜大學 Seton Hill College, Greensburg 教生物學，1923年在哥倫比亞大學研習生物學，1925年1月15日被司泰萊任命為第一位北京公教大學校長，1925年9月就職，1926年1月回美國組織為輔大作募款的活動，1927年3月回北京準備秋季成立大學第一個學院，就是文學院。他教哲學，1927-1933年哲學系的系主任，1944年病故。

募款獲得收入的可能性已是微乎其微，更別提要償付為學校所借款項。司泰萊總院長在一九三〇年二月十二日過世，很明顯是因為負擔的壓力過重、心力交瘁所致。從來不曾熱烈支持聖文森在中國的工作的艾佛烈·柯區神父（Archabbot Alfred Koch, 1879-1951）繼任為新的總院長，就任後他前往羅馬商討輔仁大學的財務問題。他明白指出學校每年基本支出就需要七萬五千元經費，這已超過美國加西尼聯會修會團體所能籌募到收入，更別提要償還先前的借款——該筆借款加上利息已逾四十五萬元。教廷同意將傳信部每年的補助金從一萬五千元增加到兩萬五千元，但堅持由本篤會繼續輔仁大學的辦學工作。教宗並未任命柯區總院長接任司泰萊留下的北京輔大監督一職，而是指派原已在北京輔大任教的法蘭西斯·高福德神父<sup>2</sup>擔任。柯區總院長相當高興這樣的安排，因為本篤會會院和輔仁大學兩者便能有所分隔，如此一來，學校才能慢慢的脫離姆院的供養而自力負擔財務問題。<sup>3</sup>不過，學校在一九三〇年時呈現良好的進展：在該學年初新校舍落成，新設的理學院及教育學院也聘用了足額的合格教授，所招收的學生人數也有大幅的成長。一九三一年六月二十七日為輔仁大學的第一屆畢業典禮，完成文學院四年大學課程的共有十一名學生。此後也得到了中國政府確定性的認可。

在財務問題外，學校的行政管理方面也有狀況。輔仁大學有兩個管理系統：一是伊德風神父，<sup>4</sup>他是北京本篤會約二十人修會的團體上司；另一是教廷派任監督的高福德神父及大學校務長奧圖爾神父。由於輔大是由本篤會負責，而伊德風神父身為其代表並為北京本篤會會院的院長，認為凡是本篤會教授的派任或是大學預算都必須先徵詢他的意見。不過實際運作卻非如伊德風神父所願。奧圖爾校務長認為他只需向教廷所指派的監督高福德神父負責，所以他們兩位可自行決定學校事務。始終未經伊德風神父許可就自由花費學校的基金，甚至用於支付與校務無直接相關的事務，而且不經背景調查便作出聘用教員的決定。他們也自行對外以學校名義募款。這些內部衝突破壞了校內的合作，而且金錢使用十分浪費。<sup>5</sup>當羅馬方

<sup>2</sup> 高福德神父，1930年8月11日被任命為輔仁大學教會監督高福德神父（Francis X. Clougherty OSB, 1895- ），美國賓州布拉道克教區神父，1920年獲得馬里蘭州艾密茲堡的聖馬麗修道院 Mt. St. Mary's College 文學博士學位，1921-1927年在河南省開封市創設美國式的高中學校：培文中學，1921-1923年在鄭州大學教英文文學。1927年到輔大，1928年在輔大入本篤會，1927-1930年任訓育部主任兼教授英文文學，1933年回到開封在光復中學教書，1948年回美國。

<sup>3</sup> 《北京輔仁大學創辦史：美國本篤會在中國》，56-57頁。

<sup>4</sup> 伊德風神父（Ildephonse Brandstetter, OSB, 1869-1945），生在德國美籍本篤會士，美國聖文森會院副院長，1924年7月8日來北京，聖文森學院文學碩士，教拉丁文，現代歷史，任北京本篤會會院院長，1933年離校到開封在光復中學教書，1945年病故。

<sup>5</sup> 《北京輔仁大學創辦史：美國本篤會在中國》，68-69頁。

面與宗座駐華代表剛恆毅總主教（1876-1958）<sup>6</sup>要求伊德風院長離職時，柯區總院長於一九三二年五月間前往北京訪視，親自調查並了解修會和大學的情況。柯區總院長認為伊德風神父是個優異的會士和術德兼備的人。主要問題在於北京修會會士們散居在舊濤貝勒府各建築和大學校區各處，因此他們缺乏一所合適的共同會院以供正常修道生活。不過問題的核心似乎是肇因於這些本篤會會士們分別來自於不同的獨立修院，尤其是像高福德、奧圖爾他們原本不隸屬於本篤會。即使高福德在一九二八年時發願加入本篤會，而奧圖爾成為聖本篤的獻身者，但原本是教區神父的他們生活習慣本就不同，要改採本篤會嚴謹的修道生活實為不易。因此，在北京本篤會會士中衍生成兩個小團體各行其是，對彼此的生活方式或是校務管理互不認同。<sup>7</sup>柯區神父認為在目前已經非常艱難的情況下，伊德風院長已無法恢復紀律、管理會士。因此，柯區神父不再由聖文森會院找人，而指派來自明尼蘇達州聖若望會院的貝索·史泰門神父（Fr. Basil Stegmann, 1893-）取代伊德風神父。但是史泰門直到一九三二年底才到達北京就任。那時本篤會在北京的命運則幾乎已經確定，<sup>8</sup>沒有他可努力的空間了。

柯區總院長在回美國時途經羅馬，向教廷提出他此行對學校狀況的調查報告。八月份時，美國加西尼聯會召開大會，會中柯區總院長對與會人士說明學校現況，而且特別提到了羅馬當局的態度。教廷對於輔仁大學的困境及美國本篤會的表現感到失望。教廷認為美國本篤會會士對北平辦學計劃已熱忱不再，並且吝於資助。全世界都在關注，若是計劃失敗將帶來大劫難，非但使教會蒙羞，也會招致各界對本篤會的責難。因此，他鼓勵美國本篤會應該再度盡全力支持輔仁大學，每個會院每年至少應捐助四千元。不過，柯區總院長其實心裡有數，在不景氣的狀況下這是不可能達成的目標，而且他對於各會院院長們會否齊力襄助輔大其實也不抱期望。在一九三二年十月二十三日，柯區總院長悄悄地發了一封電報到羅馬告急，內容表明聖文森會院及美國加西尼聯會已無力再挹注資金給北京輔仁大學，並且請求教廷接管該機構的財務責任。<sup>9</sup>看來這促使了羅馬方面正視問題並著手另為輔大尋找其他接辦的修會。

在一九三二年底美元再度大幅貶值，財務吃緊，奧圖爾回美國企圖募款。在一九三三年一月時他向美國的主教們募得了近二萬五千元，之後他

<sup>6</sup> 剛恆毅（Celso Constantini）總主教於 1922-1933 年間為宗座駐華代表。他以推行「本地化的傳教」（也就指是傳教士在中國傳教時要因地制宜，使基督教適應華人社會文化）及發展中國基督教藝術聞名。

<sup>7</sup> 參見聖言會檔案：1933 年 6 月 24 日苗德秀致葛林德信函。

<sup>8</sup> 《北京輔仁大學創辦史：美國本篤會在中國》，63-66 頁。

<sup>9</sup> 《北京輔仁大學創辦史：美國本篤會在中國》，67 頁。

到羅馬希望能得到還不足的二萬元，以支付該學年度的支出。

## 最後的決定

然而當奧圖爾抵達羅馬時，他聽說教廷傳信部已著手將輔仁大學轉交其他教會負責。依剛恆毅總主教的提議，輔大將交付給聖言會。在三月八日奧圖爾與聖言會總會長會晤後，他了解學校轉移已經成為事實了。他立刻聯絡美國加西尼聯會總會長艾爾昆·杜區 (Alcuin Deutsch)，請他速來羅馬針對學校行政權改變的利弊得失共商對策。杜區與柯區皆了解如果他們無法保住輔仁大學，必將遭受責難。他們也從北京方面得知剛恆毅總主教被召到羅馬。在剛恆毅總主教離開北京前，他威脅說，如果各會院院長不趕快提供財務支持的話，大學就會從他們手中被拿走。教廷方面似乎認為本篤會有能力但只是不願意幫忙。當杜區於四月初抵達羅馬時，教廷方面請他以美國加西尼聯會會長的身分保證能提供學校運作所需的資金，但杜區不認為自己有權做此決定。教宗碧岳十一世賜見他時嚴厲地告訴他：「本篤會是個『沒有紀律的修會』(an Order without order)」。

爾後傳信部就決定將輔仁大學轉交由聖言會接辦。同時還決議當初在紐約花旗銀行的貸款仍由聖文森會院償還。柯區總院長的回應如下：

真是慷慨大方啊！我們把學校的資產送給聖言會，然後還得自行負擔債務。聖言會得到價值五十萬元的財產，而我們有幸承擔償付二十五萬元負債一事。只要我在位一天，我絕不允許此事發生。法律是站在我這邊的。

然而六年後，梵蒂岡及美國法院皆認定聖文森會院必須負責償還借款。<sup>10</sup>

## 聖言會的態度

在一九四一年至四六年間曾於北京輔仁大學任教的包敏神父 (Fr. Bornemann)，之後成為聖言會歷史的編輯者。依他的記載，早年曾是聖言會會士的柯區總院長在一九三二年六月從北京行回來時曾去羅馬拜訪聖

<sup>10</sup> 參考資料：傑若米·歐特金 (Jerome Oetgen) 所著美國芝加哥天主教大學出版社 2000 出版之《美國聖文森總修會傳教史》(Mission to America: a history of Saint Vincent Archabbey, the first Benedictine Monastery in the United States)，347 頁及 387-406 頁。經過長年法院訴訟及羅馬教廷的決議，終於在 1940 年解決這筆借款。其中三分之一由本篤會負責清償 (主要四萬五千元由聖文森會院負責)，剩餘款項則由密爾瓦基和紐約的主教轄區來償還。請參見《北京輔仁大學創辦史：美國本篤會在中國》69 頁。

言會。「他現在身在羅馬，以一個本篤會總院長的身份，和曾教育他的聖言會總會進行談判。當然他的提議是由聖言會接辦北京輔仁大學。如果聖言會同意，那麼羅馬教廷有關的各部會，以及教宗碧岳十一世最終也會認可。」<sup>11</sup> 在當時似乎只是提出由聖言會接手的可能性。直到十月二十三日，總院長才認真的與梵蒂岡討論本篤會無力財務援助學校一事。隔年的二月九日，聖言會獲知因為學校財務吃緊、幾近無力支持的狀態，但教宗不希望見到學校結束，所以屬意並要求聖言會接辦學校。聖言會得知來自監督的秘密報告，其中對校方艱鉅的狀況有詳細的描述。<sup>12</sup> 聖言會總會仔細討論此事之利弊得失。除了把此事視為上主旨意、服膺教宗指示、榮耀上主與教會等宗教理由外，接辦學校也被視為極佳的傳教工作，畢竟福傳正是聖言會的宗旨及使命。其他實際的理由還有：把此工作視為挑戰，此將刺激這個年輕修會的成長，聖言會也將獲得眾人的尊敬及影響力，並且也可藉此展示聖言會不是如傳言所指的只對做生意和賺錢感興趣，他們也願意犧牲奉獻。透過辦大學，聖言會可以將其會士著名的宗教科學知識廣為傳播。相信熱愛科學的聖言會創辦者也會滿意於這樣的決定。反對接辦的論點有：聖言會缺乏辦學方面的人才，輔大的美國身份，在北京的本篤會士和法國遣使會士可能會不悅，還有最重要的一點——財務問題。針對最後這一點他們做了更仔細及周全的考量，也因此提出一些對應的條件。一、聖言會將不會承接校方任何短期或長期的債務。二、聖言會的傳教資金不得被動用來支應校務營運支出，所有經費應來自於特別募款。三、為易於募款，教宗應聲明輔仁大學直屬教廷，並鼓勵所有天主教徒支持該校辦學。四、該學年度仍應由本篤會管理直到期末。五、期末後學校應交由宗座駐華代表，再由其將學校交付給聖言會，財產所有權也應明確分清楚。六、輔仁大學應該屬於教廷的，只有使用權是交托給聖言會。

聖言會總會二月十三日報告在上述條件下，他們同意接辦輔仁大學。教廷傳信部也在二月二十二日表示同意。同時，奧圖爾校務長抵達羅馬，稍後美國加西尼聯會總會長艾爾昆·杜區也來到羅馬。最後，宗座駐華代表剛恆毅總主教也在四月初到達羅馬。於是羅馬教廷和本篤會進行最後的

<sup>11</sup> 見包敏 (Fritz Bornemann a.o.) 著,《聖言會傳教史》(*A History of the Divine Word Missionaries*. Rome 1981), 第 310 頁。

<sup>12</sup> 聖言會總會檔案保管處 (簡稱聖言會檔案), 羅馬 641 案, 1933-34 年: *Kurze Zusammenstellung der Verhandlungen betr. die Uebernahme der Kath. UNIVERSITAET in PEKING durch die SVD* (檔案編號 7018)。這份報告應該是指“Promemoria de Prioratu S. Benedicti in Urbe Pekino necnon de Universitate Catholica Benedictinorum Pekinensi”於 1932 年 7 月 5 日由剛探訪過北京輔大的柯區總院長而非高福德監督所寫。(見歐特金之 *Mission to America* 第七章註 26)

協商。聖言會總會長葛林德神父<sup>13</sup>之後曾寫信給山東兗州府主教韓寧鎬（1862-1939），<sup>14</sup>信中說聖言會與教廷的協議需要更長的時間，而接管學校一事要到四月份才能告知在中國的聖言會傳教士。理由是因為

奧圖爾博士不智且輕率的行動，把事情搞得一團糟，從人的立場來看他所呈現的品格不是很高尚的。也因為如此，才有這近兩個月的「間奏」。此時我們原則上一切採取被動，一方面絕對不願意介入（本篤會跟教廷的關係）。另一方面，僅管是教宗諭令，我們對於接受新工作戒慎恐懼……。另一個大問題是，即便我們能取得傳信部的官方文件，我們獲得的資訊仍舊完全不夠，甚至有部份是錯誤的訊息。以後我們清楚看到在北京也有許多反對聲浪，以及有真正的陰謀詭計在進行。<sup>15</sup>

在四月八日及九日與剛恆毅總主教商討聖言會的接受交辦聲明，這份最後構思完成的文件<sup>16</sup>在四月十三日交由傳信部。增列了更多細節如下：以北美會省之名聖言會接辦輔仁大學，以確保輔仁能續有美國機構的形象；聖言會將盡力保存學校現有的組織架構及人事安排，尤其是若奧圖爾博士<sup>17</sup>願意，聖言會希望他能繼續留在輔大擔任哲學系系主任；聖言會也希望本篤會修女們能繼續負責輔仁女院的部份。密爾瓦基總主教史崔區蒙席（Msgr. Stricht）的資金<sup>18</sup>應當用於償付欠花旗銀行的借款；聖言會將不負責在該學年結束前的任何債務。四月二十九日時正式告知聖言會接辦輔仁大學一事。<sup>19</sup>在四月二十九日後，聖言會才能正式開始接辦事宜。原本

<sup>13</sup> 葛林德神父，1933年8月5日被教宗任命為輔仁大學教會監督直到1947年葛林德神父（Joseph Grendel, S.V.D. 1878-1951），德籍聖言會士，在羅馬讀神哲學，在奧地利維也納聖言會聖嘉博天使神哲學院教書，1932-1947年做國際聖言會總會長

<sup>14</sup> 韓寧鎬（Augustin Henninghaus SVD）生於德國，於1886年加入聖言會並來到山東。1904年至1939年間，他出任山東南部教區的主教。

<sup>15</sup> 聖言會檔案：1933年葛林德致韓寧鎬信函。

<sup>16</sup> 全譯文參見附錄一。

<sup>17</sup> 奧圖爾是在剛恆毅的特別請求下而被邀請留在輔大任教。雖然奧圖爾是位受人敬重的學者，他為學校的付出也是有目共睹，但在北京的聖言會會士們認為以他對學校轉手的強烈反應看來，請他留任恐怕不太合適。最後，奧圖爾自己決定離開。

<sup>18</sup> 聖言會檔案：美國芝加哥聖言會會省的省會長赫格柏爾神父（Fr. Hagspiel）於1933年6月3日致葛林德神父信函。信中所載，芝加哥大主教樞機蒙德萊因（Mundelein）表示他沒聽說過輔大在美國約七十萬元的基金。請參見 *Mission to America* (292頁)：1925年，底特律一位富有的捐助人迪奧多·麥瑪納（Theodore MacManus）設立了信託基金，每年可有一萬元孳息供學校動用。在麥瑪納過世後，這筆基金如何處置不得而知。（300頁）：1927年時密爾瓦基天主教婦女傳道協會提供六萬元貸款，加上教廷捐助一萬五千元，準備用予購置恭王府邸。然而這筆交易沒有成，因此這筆七十萬元的基金似乎只是傳言。

<sup>19</sup> 聖言會檔案：“Kurze Zusammenstellung……”（檔案號碼 7023-7024）。1933年4月13

規劃在下學年初也就是在八月一日才開始辦交接，但為求務實，在六月二十日畢業典禮後不到兩個月內即開始著手。

### 聖言會 (SVD)

聖言會建立於一八七五年，會士約三千名，相較於本篤會，聖言會是個相當年輕的修會；聖言會以到未聞福音之處宣揚天主教為宗旨，十分活躍，而本篤會則屬於默觀修會。聖言會是屬於一個非常中央集權的團體，可以將所有會士帶領到任務所需之處；相對的，本篤會的團體比較分散，每個會院各自獨立而他們的會士幾乎終生只處在一地不會遷移。聖言會是個國際性的團體，並有著強烈的德國傳統。梵蒂岡希望輔大能繼續維持美國傳統，但是以美國聖言會這樣一個新會省，實在無法獨力經營像輔仁大學這樣規模的機構。因此，接辦之初大部分的新教員都是德國人及非美國籍者，只有校務長和少數幾人才是美國聖言會的會士。早在一八八二年聖言會就開始在中國——特別是集中在山東南部——展開傳道工作，因此在中國已有約一百七十名傳教士。而他們其中有些是具學術背景的專業人士，甚至還包括一名漢學家，他們都會講中國話而且可隨時接受召喚來服務。四名美國籍傳教士立即由河南南部的信陽（該處為美國聖言會傳教的地區）轉調至輔仁大學服務。

### 為何屬意聖言會？

當本篤會已無力再繼續於輔大辦學時，梵蒂岡求助於聖言會接手，即使聖言會不像道明會或是耶穌會這些歷史悠久、規模較大的修會那樣有辦學的傳統。促成聖言會雀屏中選的因素如下：聖文森的柯區總院長在還負責輔大時曾向聖言會建言，而且也可能曾向教廷方面提出建議；加上教宗碧岳十一世與隸屬聖言會的施密特神父<sup>20</sup>的私交，教宗相當欣賞他將宗教研究與傳道結合。在傳信部關於北京輔仁大學要交由聖言會接辦的訊息中，提到幾個關於為何選定聖言會接手更重要的理由——那就是聖言會在傳道工作中展現了活力及效率，因此也應該有能力克服現有的困境，成功經營這所艱辛締造的大學；再者，聖言會的美國會省正蓬勃發展，當時約

日的答應接辦聲明以及九項條件請見編號 7046-7049 之檔案。交接信函則見編號 7052-7054 之檔案。本篤會於 5 月 16 日收到傳信部的正式書面通知。

<sup>20</sup> 施密特神父 (Fr. Wilhelm Schmidt SVD, 1868-1954) 是聖言會成員，也是維也納著名的人類學家，研究主題包括原始民族的宗教信仰。他的重要著作為《上帝觀念之起源》( *The Origin of the Idea of God* )。

有二百名成員；聖言會在中國也有一些傳教區表現良好；聖言會的成員裡有好些是博學的漢學家及學者等等。<sup>21</sup>另一個原因則很可能是由於宗座駐華代表剛恆毅總主教的緣故。駐歐洲的教廷大使或代表一般而言不會介入當地教會的事務；不同於他們，在中國，宗座駐華代表從學校開辦之初已相當投入。投入程度之深，好像學校的最高決策者不是本篤會的總院長、和教廷委派的駐校監督、或當地本篤會的會長，而是他。宗座駐華代表可說是學校轉讓的締造者。<sup>22</sup>中國主教的公教教育聯合會裡有位秘書長。這位苗德秀神父（Fr. Theodore Mittler, 1887-1956）<sup>23</sup>屬於聖言會一員，他是位相當能幹的人，而且觀察力相當敏銳。<sup>24</sup>他曾寫道：

在（一九三三年）一月期間，我與宗座駐華代表多次談話時，他曾透露出對本篤會極度的不悅，這種憤怒是我以往未曾見過的。當時代表曾提到由耶穌會或聖言會接辦輔大。我（對聖言會美國省的能力）有些懷疑，因為無法對美國會省有所評論。不過後來我聽說在一月時有兩封信送到羅馬，而且正是因為這兩封信才做了（學校轉移）決定。<sup>25</sup>

雖然苗德秀似乎沒有直接涉入學校交由聖言會接辦一事，不過他身為聖言會一員並且常與宗座駐華代表接洽，而透過他宗座駐華代表對聖言會相當了解是不爭的事實。宗座駐華代表有可能因他而注意到聖言會。能確定的是，在對於選擇接辦輔大的對象上，剛恆毅總主教的意見是很有分量的。

### 移轉給聖言會

直到一九三三年三月一日羅馬的聖言會總會才第一次秘密地向山東

<sup>21</sup> 參考資料：厄尼斯特·布蘭德威（Ernest Brandewie）所著之《聖言會北美會省》（*In the Light of the Word. Divine Word Missionaries of North America*. Maryknoll, New York 2000）266-267 頁。

<sup>22</sup> 直到剛恆毅抵達羅馬，與聖言會的契約措辭才得以定稿（見上文）。此外，就轉移一事，傳信部授命宗座駐華代表全權處理。

<sup>23</sup> 苗德秀（Fr. Theodore Mittler SVD），德國籍，在 1903 年加入聖言會，並於 1913 年來到山東。在 1932 年到 1936 年間，他擔任中國主教的「公教教育聯合會」的秘書長。於 1936 年出任輔仁大學的教務長。1937 年至 49 年間，他在山東教授傳教士們中文。

<sup>24</sup> 因為苗德秀神父和宗座駐華代表之間的關係，所以奧圖爾校務長認定是苗德秀造成由聖言會接辦輔大，而因此對他相當生氣。但是苗德秀寫給葛林德總會長的信中指出，他是到四月時才知道學校轉移的決定，而且他還說他對聖言會在中國的領袖們到那時才只被告知而從未被徵詢意見一事非常不滿。見 1933 年 6 月 24 日苗德秀致聖言會總會長信函。

<sup>25</sup> 聖言會檔案：1933 年 6 月 34 日苗德秀致聖言會總會長信函。

兗州府宗座代牧韓寧鎬主教提及可能會接辦學校一事。四月二十九日美國聖言會芝加哥會省的省會長赫格柏爾神父收到一封電報，內容是：「教宗將北京天主教大學指派給我們。本會〔名義上〕代表美國會省接下，以維持表面的延續。目前先別聲張。」<sup>26</sup>雖然四月十八日時，在北京這件事已是眾所皆知了，不過聖言會山東區會長舒德祿神父<sup>27</sup>直到五月七日才收到電報告知他：「教宗將本篤會手中的輔仁大學轉〔給了〕聖言會。從下個學期開始。將來在輔大的修會團體就交給你負責。傳信部要求給一個未來的教授〔代表聖言會〕協助 Antoniutti（安東紐蒂）。<sup>28</sup>本篤會已準備交接。因此陪鮑潤生〔去〕北平。把他安置在苗德秀之下。凡與學校相關事宜皆需苗德秀的同意。苗德秀推薦〔的〕教授都留下來。儘量不要改變。」（五月六日，羅馬）<sup>29</sup>傳信部在五月十六日時發信給柯區總院長，告訴他因為財務狀況岌岌可危，教廷面臨關閉學校或是另尋機構或修會接手的兩難。在此同時，聖言會的美國會省被委付以接辦輔仁大學的重責大任。<sup>30</sup>四月中時，學校交接一事在北京已傳開了。五月二十日時，聖言會總會長已寫信給陳垣校長<sup>31</sup>及英千里秘書長，<sup>32</sup>告知他們聖言會已同意於新學年開始接

<sup>26</sup> 聖言會檔案：1933年5月11日，聖言會總會長致赫格柏爾神父函。

<sup>27</sup> 舒德祿神父（Fr. Theodor Schu SVD, 1892-1965）在德國出生，於1906年加入聖言會，並在1921來到山東。在1933年他成為聖言會山東區會長。1937年至49年期間，他擔任兗州府主教。1952年時，他到了菲律賓；1955年返回德國。

<sup>28</sup> Ildebrando Antoniutti（安東紐蒂或安童業，1898-1974）是宗座駐華代表於1924至1934年間的秘書。

<sup>29</sup> 聖言會檔案：電報（檔案編號 7059）。在當時苗德秀神父是唯一一位知道北京及輔大狀況的聖言會士。聖言會總會長葛林德神父很尊重也很信任他。漢學學者鮑潤生神父是當時在中國的傳教士中最適合派去學校的人選，不過鮑潤生曾和上司們有過一些問題。所以才賦予苗德秀神父比鮑潤生高的權力。參見：P. Miroslav Kollár, SVD, 發表於第一屆漢學國際研討會——「有關中國學術性的對話：以《華裔學志》為例」（台北，2003年9月26-27日，頁14-16）論文集中之〈鮑潤生（F. X. Biallas, 1878-1936）為《華裔學志》期刊的創立者—他的生活與事業〉。宗座駐華代表對苗德秀神父在中國主教的委員會的工作表現相當賞識，但卻不希望讓他直接負責學校交接一事。這可能是因為苗德秀神父很敏銳、說話又坦率直接，所以不太會與中國人打交道。再加上奧圖爾把學校轉移給聖言會歸咎於苗德秀。所以才讓舒德祿神父和鮑潤生神父來辦理學校交接，而苗德秀只能私下給予協助。請見聖言會檔案：1933年6月3日，舒德祿致葛林德函。

<sup>30</sup> 聖言會檔案：柯區總院長信件之副本。來自聖文森會院及學院檔案室。檔案編號 1673-33。

<sup>31</sup> 陳垣（1880-1971），字援庵，號圓庵，廣東新會石頭鄉人，著名歷史學家，特別研究個各宗教在中國的歷史；前中國教育部次長（1921），北大和師大的導師，前北京圖書館主任，1925年在輔仁社教書，1926年1月26日為社長；1927年輔仁大學副校長和中國文學系系主任，1929年6月任命為輔仁大學校長，1931/2為了整理個人著作，休假一年，由沈兼士董事代理校長職務，1935年當選中央研究院評議員，1939年教宗碧岳十一世誥授「聖額我略加徽騎都尉」（Commander of the Order of St. Gregory the Great with Badge），1948年3月校董胡適，校長陳垣，文學院院長余嘉錫當選中央研究院院

辦學校。聖言會

接受這個重責大任，唯一的目標是希望透過這個學術機構能復興中華民族自遠古累積至今深厚豐富的文化，而這也是聖父（教宗）在他給我們的信中所諭示的想法。如同我們向聖父回信所言，這是我們該努力以赴的。當學校交給我們之後，我們會以此為目標帶領學校，期望最終能將其交付予中國教徒中的有識之士，讓輔大成為完全的中國學校。

葛林德總會長也強調將會盡量不做改變以維持學校現況，希望到時候所有的教授們能留任，並繼續為輔大服務。<sup>33</sup>

### 接管輔仁的最後準備

聖言會山東區會長 Fr. Th. Schu（舒德祿神父）和在上海的 Fr. F. X. Biallas（鮑潤生神父）<sup>34</sup>於五月三十一日到達北京，並由 Msgr. Antoniutti（安東紐蒂蒙席）代為接待。安東紐蒂蒙席在當時也代表宗座駐華代表處理校務交接事宜。舒德祿神父和鮑潤生神父想知道他人如何看待聖言會接收輔大一事。他們聽說，因為聖言會是一個真正的傳道團體，而且傑出的傳教方式極受推崇，所以雖然法國遣使會士希望事情發展不是如此，但還

---

士；1950年10月10日教育部接辦私立輔仁大學而後任命陳垣為校長；1952年9月陳垣被任命為北京師範大學（包括併入的大部分本來輔仁大學的學系）的新校長。曾出版很多歷史和教學書籍，像《勵耘書屋鈔本名理探》。

<sup>32</sup> 英千里先生 Ignatius Ying-Ki(1900-1969)，北平市人英斂之的兒子，天主教徒，1911-1913年南開中學，1913到外國（荷蘭，比利時，英國，愛爾蘭等國家，學法文、英文），1918年畢業在牛津大學，繼續進修政治和經濟學在倫敦，1920-1924年在愛爾蘭教漢語，1924年做輔大註冊主任和在輔仁社做秘書，同時是香山女子中學校長。教英國文學，跟奧圖爾神父合著並且出版論亞里斯多德的邏輯的雙語教科書，1927-1946年任輔仁大學秘書長；1933-1946年西方語言學系主任；1939年教宗碧岳十一世誥授他「聖額我略騎都尉」（Commander in the Order of St. Gregory the Great），1944年3月11日被日本軍隊逮捕，以後被判15年有期徒刑入獄，1945年7月15日出獄；1945年出任北平市政府教育局局長，以後被調任教育部社會教育司司長，1948年冬以輔仁大學當局堅邀回校，遂辭去教育部職務，1949年到台灣由台灣大學聘為英文系系主任，1960年應聘為輔仁大學在台復校校董兼任副校長，1964年因病而辭去副校長職，1969年10月8日以肺疾而死。

<sup>33</sup> 聖言會檔案：1933年5月20日，葛林德致陳垣及英千里函（檔案編號 7086-89）。

<sup>34</sup> 鮑潤生神父，社經學系系主任兼社會學組組長鮑潤生神父（Francis Xaver Biallas SVD, 1878-1936），德籍聖言會士，1918年獲得萊比錫大學的漢學博士學位，1922到山東傳教，1926到上海做研究工作，1933年到北京為聖言會負責從本篤會手中接管輔仁大學，1935年把《輔仁英文學誌》改變更具有學術性的《華裔學誌》，1933-1936年社會經濟系主任和社會組組長，1936年5月28日去世

算是滿意於目前的安排。而且據了解人們期待學校能有更好的改變，因為在本篤會的領導下，在輔大服務的神職人員缺乏紀律——本篤會會士內因對立而分裂，他們還接受了在別處有不良紀錄的神職人員。<sup>35</sup>

當舒神父和鮑潤生抵達當日，安東紐蒂蒙席希望他們能住在學校內，高福德監督拒絕了。而當安東紐蒂蒙席堅持時，高福德神父利用秘書長英千里先生說是陳垣校長不願意他們兩位住在學校。看來高福德神父和前任院長伊德風神父不合，而若讓舒神父和鮑潤生和本篤會會士一同住在學校，他們可能會聽到另一方的說法。所以最後他們只得借住代表處直到六月二十日交接當天。之後安東紐蒂蒙席帶他們與相當幫忙的本篤會會士同住。<sup>36</sup>

六月初時，舒德祿和鮑潤生已和學校內主要的中國籍教授們——陳垣校長、英千里秘書長、兩位院長及兩位系主任——有了愉快的長談。但是，在這些教授的書面備忘錄上仍顯示出他們對未來的不確定感。記錄的最後一部份是這麼記載的：

羅馬教廷會採取這麼激烈的手段，將北京天主教大學由本篤會手中交給聖言會，據我們了解是因為本篤會拒絕明確承諾支持學校。然而，新的管理者是個年輕又陌生的團體，中國的教育界對他們幾乎一無所知。因此，新來的神父們要從教員和學生們方面得到他們應有的尊重、認同及信心，還有許多要努力的。到目前為止，對我們大多數人而言，聖言會仍是個未知數，因此很自然地，這裡的人會對聖言會言抱持疑慮及不安。「他們會如何對待中國教職員？」「他們除了是有學識的人外，有沒有實際的教學經驗？」「他們能補救過去缺失，而且完成應有的改革嗎？」上述這些、還有其他類似的問題，都是和輔大有聯繫或是關心輔大的人們一再提出的疑問。

因此，我們堅信，若要學校成功的延續，聖言會的神父們必須全心贊同輔大的理想和宗旨，盡他們全力贏取全校師生的喜愛及信心，還要準備充裕的資金以補救以往的不足，並且為學校提供專業幹練的師資及行政人員。<sup>37</sup>

<sup>35</sup> 聖言會檔案：1933年6月3日，舒德祿致葛林德函。

<sup>36</sup> 聖言會檔案：1933年6月22日，苗德秀致聖言會總會長函。

<sup>37</sup> 陳垣校長及英千里秘書長於1933年6月4日寫了一份備忘錄給聖言會的神父們。最後一部份收錄於聖言會檔案資料中（檔案編號 7099）。宗座駐華欽使的代表安東紐蒂蒙席針對這份備忘錄及6月10日對教職員安排的要求寫了一封慰勉的信，他說在學期末前校長和他的行政團隊負責明年人事任用，校長書面所提的安排在學期末會處理。請見聖言會檔案：1933年6月13日安東紐蒂致陳垣函（檔案編號 7100-7101）。

除了這份文件外也列了學校新學年所需安排的完整清單，一併交給了聖言會。

## 交接方式

雖然聖言會與教廷傳信部約定從新學年，也就是八月一日起，才正式開始接手學校事務，而且到那時聖言會才需開始負擔財務支出；<sup>38</sup>但本篤會會想在六月十九日畢業典禮一結束立刻離開也是可以理解的，加上在學期末即需要為下學年的事務做準備，因此交接事務在畢業典禮後便提早展開。在這個莊嚴的場合，安東紐蒂蒙席向教授及來賓們介紹三位聖言會神父。陳垣校長在致詞時提到教廷對輔大的發展所表現的關懷，感謝即將離開的本篤會修士們，也特別提到對奧圖爾神父的謝意。隔日，也就是六月二十日，駐校監督 Fr. Francis Clougherty（高福德神父）和會計主任 Fr. Hugh Wilt OSB（韋休神父）<sup>39</sup>將在賓夕法尼亞州西摩蘭郡本篤會名下的財產契據、證書以及在美國使館登記的產權文件（包括濤貝勒府等土地、校園主樓對面的附中宿舍、體育場、還有體育場南側的地產）一併交給宗座駐華代表使團的稽核員安東紐蒂蒙席。同一天，安東紐蒂蒙席便在鮑潤生神父（代理的校方代表）的監交下將這些文件轉給了聖言會的代表舒德祿神父及 Fr. Cremers（商樹勛神父）<sup>40</sup>（新任的會計主任）。在交給聖言會的文件中也提到上述算是教廷財產，也繼續屬於教廷所有，現下只是暫時交由聖言會。聖言會的使用權需符合當初天主教大學設立所奉行的教育目標及宗旨，對於學校動產的處理權也是同樣的道理。<sup>41</sup>安東紐蒂蒙席所面臨的問題在於，學校的產權者是聖文森會院，但聖文森會院從未賦予這些本篤會會士們代為處理產權的權利。<sup>42</sup>因此，交接時沒有任何文件提到學校的債務，交出的只有學校的地契、產權等文件。交接時，高福德神父是以學校的監督身分（他簽署文件時甚至沒有註明本篤會會士身份），而韋休是以

<sup>38</sup> 日程改變已為聖言會派來的管理人鮑潤生神父接受。（鮑潤生致葛林德函，1933年7月14日）到7月31日該學年底前的支出都由傳信部負責（1933年6月20日安東紐蒂報告，檔案編號 7132-37）。這筆款項據計約為二十二萬六千墨西哥銀元。

<sup>39</sup> 韋休神父（Hugh Wilt OSB, 1904- ），美籍本篤會士，1929年訓育職員，1930年事物長秘書兼齋務員（1931），1933年離校。

<sup>40</sup> 會計主任：商樹勛神父（Fr. William Cremers SVD, 1901-1985）會計部主任，德籍聖言會士，1935-1943年會計課主任（會計課課長），1948年到美國讀圖書館學，1950年到菲律賓宿霧市（Cebu City）聖卡羅斯（San Carlos）大學教書，1985年在菲律賓去世。

<sup>41</sup> 聖言會檔案：這份簽好的文件歸檔在編號 7103-5 及 7138-9 檔案中。聖言會檔案：美國使館登記有案的契據及證書的副本。（無檔案編號）

<sup>42</sup> 聖言會檔案：1933年6月20日，安東紐蒂報告，（檔案編號 7132-37）。

學校會計主任的身分，他們都不是代表本篤會。所有權似乎從沒有轉移給教廷或是給聖言會，所以在法律上仍存有問題。<sup>43</sup>

本篤會的北京修會院長 Fr. Basil Stegmann（貝索·史泰門神父）在畢業典禮後立即解散修會團體，他本人也在隔日離開。<sup>44</sup>鮑潤生神父記述：

就史泰門的立場來說這是可理解的，因為這狀況並不好受，但對於其他還留著的、尤其是並沒有旅費<sup>45</sup>只能晚後再走的本篤會士們來說，這樣做很不好，而對我們而言也很麻煩。前院長伊德風神父沒有權利，而負責人又沒能留到最後，像是付清前債、財產造冊、辭退雇員等很多事的安排便無法順利處理。<sup>46</sup>

在七月交接中，爆發了第一個大問題，也就是政府宣布要介入調查。一連串的不實指控，佯稱輔大很不穩定面臨倒閉，可能撐不過一年。所幸最後該調查並未達到某些對輔大不友善的有心人士所預期的效果。<sup>47</sup>

### 聖言會之接辦

聖言會所要面對的首要問題則是為本篤會離開後所空缺的校務長及系主任等重要職位尋找接手的人選。於六月二十五日召開一九三三—三四學年度第一次校務會議，要求共十五位聖言會教授們擔任數學、物理、化學、生物、心理、哲學、社經系等系的系主任，以及英文、歷史等系的教

<sup>43</sup> 所有權仍在本篤會名下。後來當聖言會要以學校名義借款時，便無法以學校財產來抵押。1934年2月24日葛林德神父正式要求教廷傳信部來釐清這件事(檔案編號7167)。但傳信部沒有處理。

<sup>44</sup> 史泰門神父返家時，聖言會特別注意在他途經的每一處都以禮相待，例如當他經過山東兗州府或上海時，都派人熱情的接待。史泰門神父在上海時住在聖言會好幾天。史泰門神父不屬於聖文森會院，他是由明尼蘇達州聖若望會院借調來的。

<sup>45</sup> 特別是來自聖文森會院的七位本篤會會士尚未收到來自柯區總院長關於他們未來動向的任何指示或是錢。柯區似乎是遲遲下不了決定，或可能在等駐華代表伸出援手為會士們付旅費。伊德風神父和高福德神父留在中國，並在開封成立了一所修道院。

<sup>46</sup> 聖言會檔案：1933年7月14日，鮑潤生致函葛林德(檔案編號7141-43)。他也提到在中國人所辦的告別餐會上，若奧圖爾和高福德這些人對與學校交接相關人士的評論能謹慎發言的話就好了。聖言會的人已儘量對於他們的評論不予理會。不過前任的北京本篤會修院院長伊德風神父就相當友好而且十分合作。

<sup>47</sup> 聖言會檔案：穆爾非(Joseph P. Murphy, SVD)所著《聖言會在中國首都》(*The SVD in the Capital of China*) (檔案編號7161-65)。參考資料：Karl Josef Rivinius SVD, *Die Katholisch Fu-Jen Universitaet in Peking und ihre Uebernahme durch die 'Gesellschaft des Goettlichen Wortes' im Jahr 1933*, in *Verbum* 21 (1980), pp. 206-228, p. 222-223。該書中引用1933年10月20日德國駐華大使陶德曼(Trautmann)所言，外力介入欲影響學校政權，使中籍校長下台。不過政府調查後沒有發現任何問題。

授。<sup>48</sup>他們應該立刻上任，因為新學年的課程規劃及教員聘請等工作刻不容緩，需要在七月份時定案，另外還需要準備七、八月份間入學考試試務。其餘尚有許多關於中國籍及外籍人事異動需要處理，因為有些奇怪的狀況不容繼續忽視。幸好，陳垣校長與新任管理人鮑潤生神父合作愉快，因此這些事得以妥善安排。

新任校務長 Fr. Joseph Murphy (穆爾菲神父)<sup>49</sup>是位美國籍神父，在羅馬取得教理神學的博士學位，原任教於聖言會在密西西比州聖路易斯灣的神學院；在六月二十二日交接後，他立即獲得任命，但直到九月九日才抵達北京，在九月十八日學校開學。在第一年，聖言會只能提供九位神職人員為學校服務，這九位包括——鮑潤生神父，德籍漢學家，教授歷史，研究所所長，社會科學系代理系主任；校務長穆爾菲神父，教授哲學並兼任心理學系的代理系主任；德籍的 Fr. Stephan Richarz (李嘉士神父)，原在美國教授地質學，在輔大教化學和物理，並擔任理學院院長兼化學系系主任；張守忠神父是甘肅人，自羅馬取得教理神學的學位，來輔大教哲學並擔任系主任，還兼訓育課主任；Fr. Rushman (羅詩曼神父) 及 Fr. Henkels (韓克禮神父) 兩位原在河南傳道的美籍傳教士被安排教英文；奧地利籍的 Br. Berchmans (白立釐修士) 原在山東傳教，被指派教德文及藝術；原在山東教區的德籍神父 Fr. Sonderkamp (宋德剛) 擔任中學校務長；從菲律賓調來的美籍 Fr. Edwards (艾德華神父) 有英國文學學位，所以教授英國文學，並擔任體育課主任；原在河南教區的美籍神父商樹勳及其他來自山東的四位聖言會的德籍修士則負責行政工作。算起來總共有四位美籍和四位德籍神父，一位中國籍神父，和四位德國籍修士。另外，還有一位相當幹練的加拿大籍平信徒 Mr. Edge (艾治先生)，他與穆爾菲神父一同抵達，擔任事務長襄助穆爾菲神父處理校務。不過，一年不到就有一位神父及兩位修士不適應輔大的工作。直到一九三四—三五學年度聖言會教授們才夠達到最低員額。然而，在接管後第一學年度即將結束時就有三位重

<sup>48</sup> 聖言會檔案：1933年6月25日，1933-1934學年度首次校務會議之紀實，第11頁。(無檔案編號)

<sup>49</sup> 參見聖言會檔案：1933年6月3日赫格柏爾致葛林德信函(檔案編號 7110)：聖言會美國會省總會認為穆爾菲神父的身體狀況不適合去中國，大家都知道他體弱多病。另一封於6月9日的信件指出，醫生判定穆爾菲神父心臟有些問題，體能也比一般人差，但是這些都不是太危險的問題。省會會長表示他會比較希望由 Fr. Stephan Richarz (李嘉士神父) 來擔任校務長，因為他的校務經驗比較豐富，而且對科學的學養很高。「不過，既然你明白指出校務長一定要是美國人，那麼除了穆爾菲神父外已別無人選了」(檔案編號 7112)。德籍的李嘉士神父 (Stephan Richarz SVD, 1874-1934) 是知名的地質學家，在美國任教。穆爾菲神父 (Joseph Murphy, S.V.D., 1895-1935)，美籍聖言會士，1930年在羅馬獲得神學博士學位，1930-1933年在美國南部聖言會神哲學院教書。1933年7月4日由葛林德聖言會總會會長任命為校務長，1935年9月5日因心臟病去世

要的教授突然辭世。他們是理學院院長兼化學系與物理系主任的李嘉士神父，<sup>50</sup>協助研制斑疹傷寒預防疫苗的醫學博士及微生物實驗室主任 Dr. Gajdos（蓋道世醫生），<sup>51</sup>以及曾為輔仁奔走爭取正式認可、獲得立案的教務長劉復（劉半農）<sup>52</sup>教授。

一九三三—三四學年度間，中國籍人士共有八十四名在輔仁大學、四十五名在附屬中學部任教。包括聖言會會士、中、外籍教授（7）、及職員們在內全體共有一百五十九名教職員。學生人數如下：大學部五百九十一人，中學部三百五十七人。女子高中部有六名外籍、八名中籍教師、及四十七名學生。全體學生中有約二百人是天主教徒。在一九三四年約有七十七名畢業生，其中包括了首屆由理學院及教育學院畢業的學生。輔大的校董胡適博士應邀於畢業典禮致詞。

當時有感輔大畢業生對高等教育仍有不足，故決定在新學年度時籌設研究院。配合設立的是大學翻譯出版部。然而，一年後因為師資及招生人數皆不足下，決議放棄開設研究院的計劃，直到一九三八年研究所才正式開辦招生。然而大學出版部仍照原定計劃設立。

除了人事安排外，第二項急需處理的事務乃是建造學生宿舍。政府單位和師生們皆殷切期盼能有一樓新建的宿舍樓。若能在第一學期蓋好宿舍，將會大力增進大家對聖言會的信心及接受度，也能避免學生們的不安。<sup>53</sup>當時六百名的大學生中半數以上都不是北京本地人。教學主樓可安置約八十名學生，另外其他租用的樓舍也可收容約一百名。但大多數外地學生還是只能散居北京的民居，處境常常很差。這對學生的管理及紀律有相當不良的影響，為了營造一個良好的學習環境，也為學生們的健康著想，蓋宿舍有其必要性。在一九三四年夏天，以二萬元等值黃金的費用，蓋了可容納約二百人的宿舍樓。該宿舍樓位於體育場南側，穆爾菲病故後命名為穆爾菲樓。

<sup>50</sup> 李嘉士神父（Stephan Richarz SVD, 1874-1934），德籍聖言會士，獲得維也納和慕尼黑大學地質學、礦石學、地理學博士學位，以後有豐富學術成果，1921-1933 年在美國聖言會任教，1933-1934 年到輔仁大學任理學院院長兼化學教授，1934 年 7 月 13 日在山東做野外調查工作時中暑去世

<sup>51</sup> 蓋道世（Stephen Gajdos），匈牙利國籍，布達佩思大學醫學博士，被 Fr. Josef Rutten CICM（呂登岸神父）邀請來輔大發展預防注射疫苗預防斑疹傷寒症，1931 年到 輔大，1934 年離開但由於腸子的腫瘤而在非洲突尼斯去世。

<sup>52</sup> 劉復（半農）（1891-1934），江蘇人，是五四新文學運動的先驅、新詩人、雜文家和著名的語言學家，1924-1926 年巴黎大學文學博士，北大語音學教授，1927 年在輔大任教，1929-1931 教務長和建立教學制度聘任一流的學者來輔仁教書，1929 年為輔仁大學辦理登記和政府立案工作，1934 年 7 月 14 日因在內蒙古作語音學的田野研究時所發生的病而在北京去世。

<sup>53</sup> 出處同上，鮑潤生致葛林德函。

負責女子中學的六位本篤會修女獨立工作，故沒有隨著本篤會修士們離開。她們曾花一年修習中文，所以足以應付留在當地。然而她們在美國的上司無力募款維持她們在中國的所需經費，所以希望能把她們召回美國。女子中學才開辦不久，所以最後她們承諾再留兩年，到三年一屆的學生畢業。一九三五年時，她們離開北京到開封服務，修女們開設了一間醫務所，並協同高福德神父在當地中學講授教理。

財務問題仍舊是最大的隱憂。在當時學校的經常性支出大約是七萬五千元等值黃金。一九四八年時，擔任校務長的芮歌尼神父曾記載道：「根據聖言會於一九三三年答應接辦輔仁並與教廷傳信部所立的契約，聖言會只承諾負責學校三分之一的管理費用，另三分之一則由學費支應，餘下三分之一則由傳信部的補助金支應。但自一九三三年以來，聖言會所付出的已超過三分之一的額度。要是我們所付出的剛好只打平學費收入的話，學校絕無法繼續支持到今天。」<sup>54</sup>然而，這些年來不管美金如何貶值，傳信部的補助金還是沒有調高，仍舊維持在二萬五千元等值黃金。舉例來說，傳信部的二萬五千元黃金在該年初（一九三三年）可換到十二萬五千元墨西哥銀元（當時可在中國流通的貨幣），但在年底錢匯到時，換算後只剩八萬元墨西哥銀元的價值了。此外，因為聖言會經驗尚且不足，所以在參考前學年的預算以及考量不同學系的要求下，首次通過的預算額度頗高。由於是學校核准的預算，所以各系覺得他們有權把錢花光，即使校務長極力希望他們能盡量節省。一九三三—三四學年度的預算是三十六萬八千九百元，其中百分之五十六是人事費、百分之十五是儀器設備、百分之八是圖書經費、百分之二十一為修繕費，此外還有百分之六額外費用。在北京的五所主要大學中，輔大的預算是最低的。教授們的月俸約為二百二十元到三百元間，和同在北京的其他大學平均月薪相比，已經少了一百元。即便如此，每月發薪餉的資金仍常常不足。由於國家社會黨對匯款的限制，所以德國方面的資金難以送往中國，而美國的基金募款單位在頭幾年的募款成果有限。因此，校務長必須多方借貸，特別是向聖言會上海總務處募集。勞心勞力下，穆爾菲最後於一九三五年九月病逝。

## 結 論

當年突然被交付接辦北京天主教輔仁大學，對聖言會這個年輕的修會而言是個相當大的挑戰。儘管聖言會在會士們的培訓一直很注重學術，也

<sup>54</sup> 聖言會檔案（1948年檔案），芮歌尼神父（Fr. Rigney）1948年報告之附錄。然而，本人卻未在聖言會檔案資料室中找到這份詳細的約定書。

在大學培養學術人才，他們對於人類學也很擅長並用於傳教工作方面。不過在現有的神學院外，他們沒有設立任何學術機構或大學，也只有少數幾個有名的學者院士。因此聖言會很難從內部組成一個專業師資團隊來接管學校。

本篤會失敗殷鑑不遠，聖言會仔細檢討後並從中學習經驗、記取教訓。本篤會的財務方面處理不善，是因為他們從未齊心協力的來支持這個辦學工作，各會院間如此，甚至連聖文森會院自己內部的修士們也是如此。在當時嚴峻的經濟情勢下，承辦學校的聖文森會院的規模及能力根本不足以應付。聖言會無論是人事或是資金都是由中央統一管理，只要是總會的決議，轄下的會院皆全力支持。不過，就接辦輔大一事，許多在中國鄉間的聖言會傳教士並不贊同，因為他們認為對中國知識份子傳教不會有結果，中國的救贖不會是由上而下、而是由下而上，不是由有識之士發起，而是會由廣大的天主教信眾展開。<sup>55</sup>此外，聖言會在美國設立了極有效率的募款機制，<sup>56</sup>在學校的預算花用也十分節省。所幸當時已有了一棟大的教學主樓，所以得以避免像本篤會那樣必須挹注大量的建設資金。話雖如此，在接辦初期和後期，所面對的財務問題仍舊與本篤會所面臨的相差不大，如同本篤會的司泰來總院長，聖言會的穆爾菲神父也因為財務壓力在一九三五年過世。

本篤會組織的另一弱點在於領導權分散，司泰來總院長逝世後情況更為嚴重，這問題可從三方面來談。第一，北京修會有一個院長擔任團體上司，而學校內又有教廷派任的駐校監督，兩者的權限及管轄範圍從未明確劃分。理論上，學校是由聖文森總院長全權負責，而院長身為他在北京修會的代表，應有權管理人事及財務。但是監督和校務長對於人事安排和經費支出卻總是自作主張。兩方勢力無法合作下，便造成了彼此的摩擦爭執和金錢浪費。因此，聖言會決定校務長和當地修會的領導要是同一人擔任，而監督由葛林德神父、也就是聖言會總會長來擔任，<sup>57</sup>他人在羅馬搖控、督導與負責，是最後的把關者。

其次，領導權的問題還包括宗座駐華代表的強力介入，這使得校內勢力整合更加困難。宗座駐華代表對各項事務都有意見；若有人不滿，便會去找宗座駐華代表抱怨。剛恆毅總主教對如何在中國傳教，特別是傳教本

<sup>55</sup> 參見 Bornemann(包敏)著：*Wilhelm Schmidt, SVD 1868-1954*. (Analecta SVD-59) Rome 1982, 第 233-4 頁。

<sup>56</sup> 泰肯神父 (Fr. Ralph Thyken SVD) 在芝加哥設立一個為在北京的公教大學募款辦公室，在創立後幾年即有了足夠支應學校支出的經費。

<sup>57</sup> Nuntius SVD, Vol. II, Fasciculus 1 (1934), No. 54, p. 58-9. 由羅馬於 1933 年 8 月 5 日任命。

地化的議題總是相當有主見，所以，他因病請辭無法續任駐華代表對學校可算是好事。當蔡寧<sup>58</sup>在一九三三年底接任駐華宗座代表時，校方得以與代表團建立新合作關係，因此，聖言會在接辦學校後也可少了些外力干預。

第三，北京的本篤會會院內大部份修士是來自於聖文森總會院，也有另一群由其他本篤會會院來的會士，還加上像奧圖爾神父這樣的教區神父。不同的出身背景和生活習慣，再加上散居校區、沒有共同生活的會院，因而無法過團體生活維持共同的修道作息及禱告。也因此對於神職人員的紀律問題有諸多抱怨，也對在北京的天主教會的形象有所損傷。聖言會對於這一點也有預防措施，只有持身嚴謹、無不良紀錄的會士才有資格被派到北京。因此，雖然聖言會的成員來自不同地區不同國籍，行事卻能十分團結。

在美國經濟大蕭條、以及德國國家社會黨開始一個反對教會的運動而對匯款設限之際，由聖言會接辦北平的天主教大學之舉是相當冒險的。而校內的教職員對於由這個德籍而非美籍的團體來接辦也有極大的疑慮，畢竟這個團體與本篤會、耶穌會或遣使會相比之下非但經驗不足而且又寂寂無名。在聖言會總會接受任命的背後是相當複雜的心情。他們懷抱著對教宗的順從，對於自己是資淺團體卻被選中擔負大任而相當自豪，身為傳教會能展開偉大傳教任務當然是躍躍欲試，但同時對於人事、財務等負擔也心懷畏懼。不過，事實上聖言會的接辦可說是相當平順，除了一些小問題，對原有的人事只新增聖言會來的教員外沒有太大的異動，和即將去職的本篤會會士們的交接氣氛相當和睦。

（輔仁大學英文研究所 李桂芬譯）

<sup>58</sup> 蔡寧總主教(Archbishop Mario Zanin, 1890-1958)於1933-1946年間為教廷駐北京專使。

## Attachments

**I. Conditions** under which the SVD accepted the responsibility for the Fu Jen Catholic University in Peking. These were proposed by the SVD during the negotiations with the Propaganda Fide and then accepted by the latter on April 27, 1933 under Prot: N. 1303/33.

April 13, 1933

Most Reverend Eminence,

In filial obedience to the desire of the Holy Father which was communicated to us by Your Excellence and eager to serve the Holy Church, in so far and in which ways this with the help of the Grace of the Lord will be possible, the Society of the Divine Word declares itself willing to accept the Catholic University of Peking.

In order to fully clarify the matter and to settle uncertain aspects of the future work, we think it opportune to specify the contract on the following points:

1. The Society of the Divine Word accepts in name of its North-American Province the Catholic University of Peking. Within the limits of its possibility, especially in the beginning, it will call members of that Province, in order to maintain, at least in outward appearance, the continuity of the present work.
2. The University will be transferred to the Society with a public notification of assignment in which the faithful and the ecclesial authorities of America also are invited to support the undertaking as a Pontifical Work.
3. The effective assumption of the University from the side of the Society will take place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academic year 1933-1934. The transfer will be done directly from the Benedictine Fathers to the Holy See or the Apostolic Delegate, and then from there to the Society. On that occasion also the existing property rights of the Benedictine Fathers must be clarified and regulated. From our side permit us to respectfully recommend that the University in the future will remain the possession of the Holy See and that we only get its use for the time during which the Holy See entrusts

- the governance to us. In this way during a time of disorder the property will be more secure than when it belongs to one single religious congregation.
4. The Society considers it but natural that the contracts and the existing relationship with the civil authority be kept unchanged. Also with regard to the internal organization and the personnel it should in the beginning be kept as much as possible in its present condition, in order that the changes show themselves to be as little as possible. Furthermore, we are prepared to continue the employment of the present teachers, in so far as they are able and prove themselves. In particular, we are happy if Professor O'Toole would continue as head of the department of Philosophy or in any case would cooperate within the University.
  5. In a particular way the Society would wish that the Women's Section which at the moment exists and is directed by the Benedictine Sisters be kept in its present teaching capacity in collaboration with the University. Thus it is our desire that the Benedictine Sisters continue their present activity. However, if for some reason or other they want to give it up, the Society will then make an appeal to the Sisters of the Holy Spirit in order to found a similar institute.
  6. The Society shall consider the Catholic University of Peking as a missionary work. Therefore, in conformity with the instruction and the desire of the Holy Father, it will be from the beginning its aspiration and care to prepare and to set in motion, through opportune choices and education of additional indigenous personnel, that mission in such a way that when circumstances in the future permit, the University be operated by Chinese priests and lay people, so that it will become a fully Chinese institution.
  7. The Society agrees that the yearly interest of the legacy of Milwaukee, which belongs to the University, will be used as far as necessary to pay back the amount borrowed from the National City Bank of New York which has effectively been spent for the Catholic University. The Society therefore asks His Eminence, if this solution is acceptable, to give the necessary instructions to His Excellence Msgr. Stricht, Archbishop of Milwaukee, who administers in name of the Holy See this legacy, in order that he can hold negotiations with the National City Bank of New York.

8. For the payment of the debts so far incurred during the further functioning of the University till the end of academic year in the month of June we cannot take any responsibility.

Expecting a definitive response in order that we can start now already the work for a good result of this great undertaking I pay my highest respect,

To His Eminence Pietro Cardinal Fumasoni-Biondi, Prefect of the Sacred Congregation of the Propaganda Fide

Fr. Jos. Grendel, Superior General of the Society of the Divine Word

1

---

<sup>1</sup> Nuntius Societas Verbi Divini, Vol. II, Fasciculus 1 (Anno 1934), Rome 1935, no. 49, p. 52-53.

**附錄一：**聖言會接辦北京天主教輔仁大學的**附帶條件**。聖言會在與傳信部協議時提出，後經傳信部於一九三三年四月二十七日接受。書信編號1303/33。原文是義大利文，由作者翻譯成英文。

1933年4月13日

樞機主教閣下，

閣下告知我們聖父的指示，我們願意順從並樂於為教廷服務，並在天主的協助下全力以赴。聖言會在此宣佈願意接掌北京天主教輔仁大學。

為了明確表達立場，也為未來的工作不確定之處能有所釐清及規範，本會認為應當立約具體訂出下列條件：

9. 聖言會以北美省會之名接下北京天主教輔仁大學。在能力限度內，特別是初期時，將召喚該省會會員來服務，至少在表面維持校內現況。
10. 教廷將頒布敕命公告輔大交由聖言會這項安排，並在命令中號召美國各界虔誠的教友和教會領袖們共同支持輔大辦學這項宗座事業。
11. 聖言會接收輔仁大學將於一九三三—三四學年度開始正式生效。轉移的工作將由本篤會會士們直接交接給教廷或宗座代表，再由教廷或宗座代表交接給聖言會。交接時，本篤會現有的產權問題要闡明及規範清楚。本會敦請教廷繼續擔任輔仁大學的所有人，聖言會對學校的權利只在教廷將學校付託給我們的期間。在時局動盪之際，學校若只屬於一個修會恐不穩當，唯有在教廷庇護下，學校的財產權比較安全無虞。
12. 聖言會認為校方與當地政府的現行約定及關係自然應保持不變。關於校內組織及人事安排在初期應盡量維持現狀，不做任何大的變動。只要現有教員表現稱職，我們預備全部延聘。特別是，若奧圖爾教授願意，我們希望他能留下繼續擔任哲學系主任，或者無論如何能為學校服務。
13. 本會希望現有由本篤會修女們負責的輔仁女院，能依現狀繼續辦下去。因此，我們期待本篤會修女們能留下服務。若是她們無法繼續，本會將請求聖神婢女會的修女們開辦一個類似的機構。
14. 聖言會會將接辦北京天主教輔仁大學視為文化傳教工作。這也是聖父的指示和期望，因此從接手起便會著手致力於達成此目標。希望透過

選擇及培育合宜及勤奮的華籍人員，將來時機成熟時，學校能全由中國籍的神職人員及平信徒來掌管，以成為名實相副的中國機構。

15. 聖言會同意將密爾瓦基贈予輔仁大學的捐款的每年孳息依需要用於償還向紐約花旗銀行借來用於學校的貸款。若此舉可行，本會請求閣下代為向以教廷之名捐款的密爾瓦基總主教史崔區蒙席傳達，以便他和美國花旗銀行協調進行必要的手續。
16. 學校之前至六月底本學期末為止所負債務的清償，聖言會概不負責。

期待您明確的回覆，我們才能著手進行以期良好成果。

獻上最高敬意——

致 皮特羅·夫瑪松尼-白翁迪 (Pietro Fumasoni-Biondi) 樞機，傳信部部長  
若瑟·葛林德神父聖言會總會長 上<sup>1</sup>

---

<sup>1</sup> Nuntius Societas Verbi Divini, Vol. II, Fasciculus I (Anno 1934), Rome 1935, no. 49, p. 52-53.

## **II. The Transfer of the Catholic University of Peking to the SVD as a Pontifical Work:**

April 29,

1933

Sacred Congregation “De Propaganda Fide”

Protocol No. 1302/33

Most Reverend Father,

Your Reverence knows how the His Holiness Pope Pius XI watches with special attention and with the most loving interest over the Catholic mission territories spread everywhere in the different continents.

Among all the mission territories the Mission in China occupies a privileged place in the august heart of the Pope. This immense population indeed comprises almost one fourth of the entire mankind, and in this numerous people the Church already enjoys an abundant and promising spiritual flowering.

The noble Chinese nation possesses an old and famous civilization, and since the most remote times it has developed a great and wonderful scientific and literary culture.

Therefore to gain for the faith not only the souls of the poor and of the simple Chinese farmers, but also the minds of the learned and of the leaders, this is the most fervent aspiration of the Holy Father. When the Chinese culture would be pervaded by the Christian spirit then it would not only be raised and activated, but also would be the most certain guarantee of a radiant Christian future for the entire nation.

These intentions inspired the foundation of the Catholic University, undertaken a few years back in a fervent and generous spirit by a small group of meritorious persons. The work, strongly encouraged and supported by the Holy See, was blessed by the Lord, and very soon showed a satisfying development. The competence and the name of the college of professors, among which figured famous Chinese men of learning, the sound methodology and the discipline of the students, which numbered over one thousand, were duly appreciated by the National Chinese Government, which recognized the University on an equal basis with the other state Universities.

Already ample blessings have been produced for the religion and

civilization by the University, but one can expect much more for the future which seems full of even greater promise, if the zeal and love of the Catholics, and in particular the Catholics in America and in China, would concern themselves even more fervently with this providential institute and would overcome the difficulties of the present hour.

To direct and operate successfully such a great and important undertaking, indeed, requires extraordinary ability and means.

Now the Society of the Divine Word which You so worthily govern, in particular your flourishing North American Province, show themselves very able to strive after the desired purpose and to overcome obstacles of all kind which hinder the life and development of the University.

This Society already in its short existence has shown such a vitality and efficient activity for the missions, that it appears capable to undertake successfully the new enterprise. The Institute in fact already has big and important mission territories in China, counts among its members distinctive sinologists and scientists, and enjoys the esteem and sympathy of a great number of Catholics in different countries especially in the North of Europe and of America.

Therefore, the Holy Father now appeals to the spirit of sacrifice of Your Reverence and of your Confreres that you be willing to take upon yourself with the usual readiness also this new and most important task, which certainly will demand big and long-term efforts, and he is sure that that he will get a broad and generous acceptance.

The Catholic University of Peking from now on will be exclusively entrusted to the care of this Society, which will hold with full authority the governance and administration, and only be depended on the Sacred Congregation of the Propaganda Fide.

The University itself is of such concern to the Holy See that it rightly be considered a Pontifical Work, and as such it recommends itself to the generosity of all the Catholics and in particular to the American Catholics, which in the past have shown their lively interest in this enterprise of capital missionary importance.

May the Divine Grace which I invoke ardently, and the most special blessing of the Holy Father guide both the staff and the benefactors of the

University, so that through it new and unexpected progress be made, for the greater glory of God and for the conversion of China.

With the all best wishes for Your Reverence and renewing the expression of my deepest respect, I remain

Your Reverence's most dedicated servant

P. Cardinal Fumasoni-Biondi, Pref.

+ Carlo Salotti

Arc. Tit. di Filippi, Secretary

To the Most Reverend Father Joseph Grendel  
Superior General of the Society of the Divine Word

1

---

<sup>1</sup> Nuntius Societas Verbi Divini, Vol. II, Fasciculus 1 (Anno 1934), Rome 1935, no. 50, p. 53-55.

## 附錄二：將宗座事業北京輔仁大學轉移給聖言會

1933年4月29日

教廷傳信部

書信編號. 1302/33

會長大人，

如您所知，宗座碧岳十一世對世界各處的傳教區皆非常關注及愛護。

中國的傳教工作在宗座心中佔有特別的位置。中國擁有的廣大人口幾乎是人類總數的四分之一，而在這麼多人中已有許多領受了教會的福傳，教會也見到了大有可為的牧靈園地。

中國文化博大精深，數千年來這個悠遠知名的古國在科學與文學皆有特出的發展。

因此，我們不只要對窮苦及無知的中國農人福傳，也要讓那些知識分子及領導人物信奉天主，這是聖父最殷切的期盼。當我聖教福音能深入中國文化之時，就不僅只是提倡或推行，必將能風行草偃，全國奉行。

因為懷抱著這些目標及理想，在數年前一小群令人敬佩的教徒，他們熱情無私的促成了天主教輔仁大學的設立。教廷強力支持及鼓勵他們的工作。在天主護佑下，很快地就見到令人滿意的進展。學校的教授包括了中國優秀知識份子，整體師資的能力及名聲、紮實的教學法、和已逾千名的學生的良好風紀，在在令中國國民政府相當賞識，也因此給予輔大與其他國立大學相同的認可。

輔大在福傳及教化已有相當不錯的成績，但是可能的成就應不止於此。若天主教徒們——特別是美國及中國的教徒們，能持續他們的熱誠及關愛，甚至加倍投入於這個宗座事業並齊力克服現有的困難，前景尚大有作為。為求能成功管理及營運這個重要的事業的確需額外的付出及財力。

如今，在您可敬的管理下，聖言會，特別是正蓬勃發展的北美會省，相當有能力為上述目標而努力，去克服各種阻礙學校發展的困境。

在聖言會成立以來為時不久的時間內在祈福傳工作已展現了足以成功擔負辦大學這新任務的活力及效率。聖言會在中國已佔有相當多重要的傳教據點，擁有許多傑出的漢學學者及科學家，在許多國家特別是北歐和北美，享有為數眾多尊敬及認同貴會的天主教徒。

因此，聖父請您及聖言會能如同以往那樣隨時願意犧牲奉獻，同意接下這個重要、且需要長期投入及努力的新任務，聖父相信會得到你們慷慨

的允諾。

此後北京天主教輔仁大學將交由聖言會的手中，聖言會將可全權處理，直接面對教廷傳信部。

教廷十分關切輔大的事務，輔大的辦學可說是宗座事業，也因此全天主教徒應該要無私的給予協助，美國的教徒在以往已對這興學傳教事業展現高度熱忱，他們也應將繼續支持。

我誠心祈求上主恩典與聖父的特別賜福能引導輔大的教職員及贊助人，為榮耀上主及為中國的歸依帶來嶄新出奇的進展。

謹致以最好的祝願，再度表達本人最深的敬意——

您誠摯的僕人，

夫瑪松尼-白翁迪樞機，傳信部長

+ 卡羅·沙洛提 (Carlo Salotti)

Filippi 教區的領銜總主教，秘書

致若瑟·葛林德神父

聖言會總會長<sup>1</sup>

---

<sup>1</sup> Nuntius Societas Verbi Divini, Vol. II, Fasciculus 1 (Anno 1934), Rome 1935, no. 50, p. 53-55.



# 聖神婢女傳教會與新莊輔仁大學（1963-1985）

## ——多元化價值觀教育的建構

雷俊玲\*

### 摘要

聖神婢女傳教會 (Missionary Sisters Servants of the Holy Spirit 簡稱聖神會 SSps)，於 1889 年由創會石柱楊生阿諾德神父 (Arnold Janssen, 1837-1909，之前已先創立聖言會) 創立，其工作即在支援神父們，輔助宣揚福音。1905 年首批聖神會修女抵華，修女們除了傳授婦女和兒童宗教真理外，也從事非直接傳教性的教育工作和社會工作，在中國境內陸續建立了五個區會。其中又以北平區會與輔仁大學的關係最為密切。

聖神會於民國二十四年受聖言會邀請接管輔仁大學附屬中學女生部，由北平區會長盧德思修女 (Sr. Otgerina) 主導行政與教學工作。民國二十七年輔大女子部成立，盧德思修女出任女部主任，帶領聖神會的修女們負責規劃校區、協助創立家政系 (吳秉雅修女 Sr. Urbania) 並參與各系教學工作。從民國二十四年到民國四十一年 (1937-1952)，前後約有三十餘位修女任教和服務於學校的各個單位。擘劃艱辛，貢獻良多。引進西方新思潮，作育英才，有助於開啟我國女子高等教育之先河，影響深遠。

輔仁大學於民國五十二年獲教育部核准在台復校。聖神會的修女們又奉派協助復校工作，積極投入女生宿舍之管理、醫療室之護理、理學院及外語學院各系所之規劃與教學。尤其是外語學院最初設立的五個系之中有四個系 (英文、法文、德文、日文) 以及家政營養學、數學等系，均由聖神會的修女們主持系務，擔任系主任，在她們 [賀永光修女 (Sr. Heliena)、鮑坤儀修女 (Sr. Teresa Baues)、古怡心修女 (Sr. Fidelis Goebbel)、山崎陽子修女 (Sr. Philomena)、吳秉雅修女、羅麥瑞修女 (Sr. Maryta)、白恆光修女 (Sr. Hildegard)] 的努力下各系迅速發展茁壯。由此可見聖神會與輔仁大學關係

---

\* 輔仁大學歷史系副教授。

之密切，貢獻之良多，實不言可喻。

聖神會對輔仁大學之貢獻良多，歷來卻未見有系統的整理和研究。目前國內外對於北平輔仁大學的研究，幾乎都集中於陳垣校長，以及簡略的編年記錄。至於對各修會的研究則極少，僅有對本篤修會之研究。「聖神婢女傳教會與新莊輔仁大學」此一課題之研究，不僅可以瞭解近代中國女子高等教育的情況、西方思想如何經由教育傳播於中國，更可深入了解輔仁大學與聖神婢女傳教會對我國教育事業的貢獻。

關鍵詞：聖神婢女傳教會、輔仁大學、女子教育、吳秉雅

## 一、創會經過

有鑑於德國教會在俾斯麥統治下，宗教活動受到諸多牽制。因此，創會始祖楊生神父（Arnold Janssen, 1837.11.5-1909.1.15）<sup>1</sup>於 1875 年 9 月 8 日在荷蘭史泰爾（Steyl）創立聖言會(the Society of the Divine Word)，進行傳教工作。楊生神父曾說：

一個神父聖召的恩寵是在教友家庭的懷抱裡慢慢成熟、茁壯。大體來說，神父就像是慈祥母親的苗裔，母親的祈禱和聖德蘊育了她們兒子所獲得的恩寵。……因此，很明顯，外方的傳教需要有許多熱心的母親，也因此，只有修女們最能實現此事。<sup>2</sup>

修女們比神父和修士們更容易接近，因此容易影響外教婦女。於是在 1889 年 12 月 8 日<sup>3</sup>又增創傳教女修會——聖神婢女傳教會(Missionary Sisters Servants of the Holy Spirit 簡稱聖神會 SSpS)，其工作即在支援神父們，補助宣揚福音。後又創立另一支會——聖神婢女永禱會(Sisters Servants of the Holy Spirit of Perpetual Adoration)，她們以祈禱和犧牲來支持傳教工作。<sup>4</sup>

聖神會有兩位協創人施海倫修女（Mother Maria, Helena Stollenwerk, 1852-1900）<sup>5</sup>和史涵德修女（Mother Josepha, Hendrina Stenmanns, 1852-1903）。修會會員在她們所提示，「榮耀歸於天主，恩惠歸於近人，負擔歸於我們」的原則指導下，為了預備從事傳教工作，除了學習藉自我聖化，光榮天主的修會外，還要學習「對一切人，我就成為一切」(all things to all men)。她們的工作主要是管理女校、孤兒院、醫院、診所和教導婦女要理等。欲達此理想她們必須接受技能和知識方面的訓練。「傳教修女應會做各類的工作，但最重要的是在女校裡當老師。因此為那些未來的老師

<sup>1</sup> 於 2003 年 10 月 5 日與福若瑟神父一同被教宗若望保祿二世冊封聖品。

<sup>2</sup> 周華德著，薛保綸譯，《天國的拓荒者》（天主教聖言會，1996），頁 150。

<sup>3</sup> 聖神會創會日期有三種不同說法。一為 1889.12.4.見羅伊泰著，薛原譯，《聖言的傳播者——真福楊生神父傳》，頁 3；另一說為 1889.12.7.見周華德著，薛保綸譯，《天國的拓荒者》，頁 152；第三說為 1889.12.8.見薛保綸神父，〈會祖真福楊生·愛諾德神父的生平事功〉，收入《聖言會的軌跡》（財團法人天主教聖言會），頁 9。「他對聖母瑪利亞特別敬愛。……聖母聖誕瞻禮是聖言會的創會日，聖母無原罪瞻禮是兩個聖神修女會的創會日。」見羅伊泰著，薛原譯，《聖言的傳播者——真福楊生神父傳》，頁 95。因此聖神會創會日應是 12.8。

<sup>4</sup> 1896. 12. 8 創立。聖神會和永禱會是雙管式的修會，前者獻身積極性的工作；後者過默想式的生活。周華德著，薛保綸譯，《天國的拓荒者》，頁 153。

<sup>5</sup> 1995 年 5 月 7 日列真福品。

們，他（楊生神父）安排了三年的師範學校訓練。」<sup>6</sup>在經過各總嚴格的成訓練之後，修女們隨時準備離鄉背井往外地傳教，並學習當地的語言和習俗。

1895 年第一批聖神會修女首次離開歐洲前往外地傳教，首途為阿根廷。數年後她們就傳佈到世界各地。身為聖神的婢女是要在「降生」奧蹟內將基督帶給世人。「我只希望在天主的恩佑下，成為最卑微的，為福音的傳播工程犧牲我自己。」<sup>7</sup>就是在這種全心的犧牲奉獻之下，修女們給世人佈達基督的精神，使世人皈依基督。繼之，在修女工作的地區有不少的女青年加入修會的行列，修會遂在穩定中逐漸的發展，形成一個國際性的修會。<sup>8</sup>

## 二、聖神會在中國的發展

1905 年首批聖神會修女抵華，然而早在 1879 年楊生神父已派遣他的兩位司鐸福若瑟神父(Joseph Freinademetz, 1852.4.15-1908.1.28)和若翰安瑟神父(John Baptist Anzer)到香港學習中國語言和文化。兩年後聖言會以山東南部為傳教區，展開傳教工作。由於中國傳統的禮教規範，婦女社交範圍狹隘，使得外籍傳教士不易向她們傳授宗教真理，因此在中國傳播福音需要修女的地方比其他國家更為迫切。而這份工作的成就便成了修女們最卓越的貢獻。

經過幾十年的努力，聖神會在中國境內建立了五個區會-----山東南部(1905)<sup>9</sup>、甘肅西部(1924)、甘肅南部(1924)、河南(1926)、北平(1935)。她們照顧病人，撫慰受苦難者，照料孤兒、棄嬰，教育婦女以提高其地位和自尊。同時修女們還做了不計其數的家庭拜訪，時時流露出對眾人的關懷和愛顧以顯揚天主無限的愛。因此，福傳工作成效不凡。修女們除了傳授婦女和兒童宗教真理外，也從事非直接傳教性的教育工作和社會工作。其中又以北平區會與輔仁大學的關係最為密切。

<sup>6</sup> 周華德著，薛保綸譯，《天國的拓荒者》，頁 152。

<sup>7</sup> 修會協創人史涵德修女的信念。轉引自《聖神婢女傳教會在臺五十週年紀念》，首頁。

<sup>8</sup> 聖神會至各地傳播福音建立分會時間如下：1889 Steyl, Holland；1895 Argentina；1896 Togo, Africa(until 1918)；1899 New Guinea；1901 U.S.A.；1902 Brazil；1905 China Mainland；1908 Japan；1910 Holland；1912 Philippines；1912 Austria, North Germany；1917 Flores, Indonesia；1921 Poland；1921 Timor, Indonesia；1925 Java, Indonesia；1929 Germany, South；1931 Slovakia；1933 England；1933 India；1934 Chile；1937 Rome, Italy, Generalate；1940 Australia；1942 Switzerland；1945 Ghana, Africa；1948 Italy, North；1951 Spain；1952 Paraguay；1953 Taiwan, Republic of China。見《聖神婢女傳教會在臺廿五週年紀念》，頁 17。

<sup>9</sup> 1905 年韓寧鎬主教邀請了聖神會的修女來山東兗州，擔任教育女孩和其他的傳教工作。周華德著，薛保綸譯，《天國的拓荒者》，頁 161。

聖神會於民國 24 年受聖言會邀請接管輔仁大學附屬中學女生部，由北平區會長盧德思修女(Sr. Otgerina Luters)主導行政與教學工作。民國 27 年輔大女子部成立，盧德思修女出任女部主任，帶領聖神會的修女們負責規劃校區、協助創立家政系(吳秉雅修女 Sr. Urbana Tüshaus,1907. 12 10-2000.8.22)並參與各系教學工作。從民國 24 年到民國 41 年(1937-1952)，前後約有三十餘位修女任教和服務於學校的各個單位。擘劃艱辛，貢獻良多。引進西方新思潮，作育英才，有助於開啟我國女子高等教育之先河，影響深遠。<sup>10</sup>成立於十九世紀末和二十世紀初的教會學校<sup>11</sup>，可說是現代中國高等教育發展的典範，因為外國教會大學所引進的西方教育制度，譬如課程安排和教學法，男女教育平等的觀念，以及加入體育和音樂等課程，都對近代中國的大學教育制度產生深遠影響。

然而這一切都在中共佔據大陸後驟然中止。中共教育部自 1950 年 10 月正式接辦輔仁大學，1952 年院系調整，輔仁大學成為北京師範大學的一部份。就聖言會、聖神會和教會的高等教育事業而言，都是一大損失。1952 年 7 月聖神會最後一批外籍修女被迫離開，中國籍的修女有的因早些出國而獲自由，然而仍有廿八位修女留在大陸分擔同胞的苦難命運。<sup>12</sup>

### 三、聖神會在新莊輔大之源起

民國 40 年耶穌會士陸續遷入新竹，打算繼續宣揚福音。不久即感覺需修女協助。當時印寶如神父(Fr. Paul O'Brien)被派負責為被逐的耶穌會士開拓新的園地，正巧被召往羅馬。便向聖神會總會長提出，但未或立刻應允。因為當時世局不穩，各總會長都親身體驗到自己的修女在中國大陸曾經被棄、受監察和被驅逐，考慮是否應在這個地方再度辛勤耕耘。於是，總會長修女派了兩位修女由馬尼拉來新竹勘查，這種疑慮，很快的就

<sup>10</sup> 「有趣而值得記載的是，在日益增多的北平輔大女生當中，有幾個出自最好的家庭，她們入的聖神會，發願成了聖神會的修女；相對的有更多的天主教男生卻沒入聖言會，甚至連一個也沒有。」飽乃曼著，薛原、潘薇綺譯，《聖言會在華傳教小史》(天主教聖言會，1999)，頁 78。如張萃文(Sr. Marta Chang, 1919.1.6-)1945 畢業於輔仁大學教育學院教育系、張萃華(Sr. Arnolda Chang)修女姊妹二人，出身自上好家庭，父為孫傳芳的機要秘書，皆於北平輔大畢業時加入修會。姚景如修女(Sr. Antsila Yao, 1918.1.18.-2005.2.4) 1942 年畢業於輔仁大學理學院數學系，畢業後即留校為女院主任秘書兼女附中數學教師，1944 年加入修會。劉英修女(Sr. Rita, 1917.6.11-1977 4.3) 1938 年為北平輔大女院首屆新生，1943 年畢業於輔仁大學理學院化學系，1947 獲碩士學位並加入修會。

<sup>11</sup> 震旦大學(巴黎耶穌會於 1903 年在上海創立)、天津工商業學院(巴黎耶穌會於 1923 年在天津創立)、輔仁大學(美國本篤會於 1925 年在北京創立)。

<sup>12</sup> 見《聖神婢女傳教會在臺廿五週年紀念》，頁 18。

被中華民國政府的自由安定所排除。民國 42 年 12 月 18 日兩位先鋒：由北平及山東被驅逐的盧德思修女和沈恩愷修女 (Sr. Euphemiana Schenk) 被派達新竹。十年之後在新竹傳教發展卓然有成。<sup>13</sup>

天主教會本著在世人中服務天主的特性，創辦學校是其中重要項目之一。民國 52 年輔大在台復校委託中國聖職 (中國主教團)、聖言會、耶穌會和道明會 (後來退出) 聯合承辦。這跟以往由本篤會或聖言會獨力負責的北平輔大，情況極為不同。三個如此不同的團體合作來辦大學，實為創舉，雖然過程中曾遭遇一些困難，但三單位彼此間仍然合作良好。此舉不但舒緩了各團體財務上的負擔，也減輕了人才上不足的困難。<sup>14</sup>同年 7 月 7 日由董事會第二次會議決議中國聖職負責文學院，耶穌會負責法學院，聖言會負責理學院和外語學院。<sup>15</sup>據聖言會孫志文神父 (Fr. Arnold Sprenger) 寫給聖神會裴德修女 (Sr. Agathe BramKamp) 的信上指出：「最初似乎打算由方濟會來承辦外語學院，當他們拒絕後，聖言會的總會長舒德神父 (Fr. Schütte) 要求聖言會承擔這項挑戰。」<sup>16</sup>復校時擔任主任秘書的龔士榮神父也指出：「幾個單位在一起合作，他們在羅馬簽了一個協定，……要求自治……人事和經費是獨立的。」<sup>17</sup>

在「分地設校」、人事經費獨立的原則下，聖言會邀請聖神會修女參與復校工作。聖言會總會長舒德神父任命蔣百鍊神父 (Fr. Richard Arens, 1913-1990) 為聖言會開辦理學院及外語各組的負責人。他最重要的任務就是在聖言會中儲備人才。「在很短的時間就將未來英語、德語、法語、西語等系的師資，組織起來並加以訓練。我個人 (孫志文神父) 也接到舒德神父的委派去研習德語和語言學。」<sup>18</sup>聖神會亦然，趕緊將曾在北平輔大服務多年，或對科學及語言學感興趣而符合資格者派遣。民國 52 年 10 月 14 日在聖言會的邀請之下，吳秉雅、鮑德明 (Sr. Edna Polt, ?-1996.12.4)、劉英 (Sr. Rita Liu, 1917.6.11-1977 4.3) 和鄧迪德 (Sr. Clemens Dietl) 等四位

<sup>13</sup> 聖神會修女們在新竹筆路藍縷，講授道理、教授語文並做診療工作。1960 年聖神會院在新竹落成。曙光幼稚園、中學、小學相繼開辦。因為修女的愛心、耐心和用心，教育事業成績斐然，校譽蒸蒸日上，甚得家長和社會人士的好評和讚揚。

<sup>14</sup> 鮑乃曼著，薛原、潘薇綺譯，《聖言會在華傳教小史》(天主教聖言會，1999)，頁 87。

<sup>15</sup> 薛保綸，〈聖言會與輔仁大學〉，收入《尋美之旅》(新莊：輔大，民 93)，頁 354-355。

<sup>16</sup> 轉引自裴德修女，〈輔大德文系：服務與學習之泉〉，收入《尋美之旅》，頁 193。最初方濟會曾表示願意參與復校過程，辦理外語組教學。後來其總部於 1960 年由傳信部批准在新加坡辦一個學院，方濟會於是放棄在輔大的合作，而由聖言會接辦外語組教學。見魏思齊，〈聖言會及其大學事業——為落實教會的福傳使命而做〉，收入《尋美之旅》，頁 534。

<sup>17</sup> 邵台新，《龔士榮神父訪問記錄》(新莊：輔仁大學出版社，民 89)，頁 79。

<sup>18</sup> 聖言會孫志文神父 (Fr. Arnold Sprenger) 寫給裴德修女 (Sr. Agathe BramKamp) 的信。轉引自裴德修女，〈輔大德文系：服務與學習之泉〉，收入《尋美之旅》，頁 193。

修女抵達輔大校園，開始協助輔大復校的使命，有如雙方在北平時期的合作一般。<sup>19</sup>在學校的行政及名稱上，聖言會和聖神會共為一體。修女們也派代表參加聖言會單位的行政及管理系統，有議員參加聖言會的行政會議。在聖言會單位整體的管理及發展上，兩者共同計畫，共同議事並付諸實行。<sup>20</sup>據聖神會吳秉雅修女保留的「輔大聖言會團體與中華省聖神會合約」(An Agreement Between the SVD Section of Fu Jen University and the China Province of the Sisters Servants of the Holy Spirit, 1985.4.12) 中載明：

聖言會與聖神會在輔大理工學院和外語學院建立親密伙伴的工作關係。

這親密的伙伴關係是共同致力於維持輔仁大學為教會在中國福傳的機構。基於財務責任完全由聖言會負責，因此兩會同意提供必要的人力，來執行共同的使命。

這親密的伙伴關係亦使雙方相互委任。

聖言會委任聖神會：

1. 聖言會行政會議得有聖神會二名代表與會。
2. 聖言會在行政、學術和教區（靈性生活）執行上兩會平等。因此兩會需仔細考慮在學校任命時資格和規則之協調。
3. 在校園中聖言會將免費提供房舍給聖神會。
4. 聖言會將提供薪水和其他福利（如保險、退休金等）給大學中的專任老師修女。

聖神會委任聖言會：

聖神會承諾提供必要的人力以執行共同使命。最少提供十名修女加入聖言會之各項工作。

1. 聖神會應委派二名代表參加聖言會的行政會議。
2. 聖神會會提供合格的教師任教於兩學院（理工、外語）。
3. 聖神會將在聖言會的女生宿舍提供行政管理和牧靈工作。宿舍的管理人有類似於輔大行政體系應有的權責。
4. 聖神會將提供護士（修女）於學校診所並負責其業務。<sup>21</sup>

合約中規定雙方以平等地位攜手合作，一同進行理工、外語兩院的各項院

<sup>19</sup> 《聖神婢女傳教會在臺五十週年紀念》，頁 14。羅麥瑞修女，〈輔仁大學與聖神婢女傳教會〉，收入《尋美之旅》，頁 412。吳修女、劉修女分別負責籌辦理學院的家政營養學系和化學系，鮑修女負責醫務室，鄧修女則管理女生宿舍。

<sup>20</sup> 薛保綸，〈聖言會與輔仁大學〉，收入《尋美之旅》，頁 363。

<sup>21</sup> “An Agreement Between the SVD Section of Fu Jen University and the China Province of the Sisters Servants of the Holy Spirit,” 1985. 4. 12 《聖神修女會檔》，輔大校史室。

務之發展。聖神會承諾在教學、行政、宿舍及醫務等工作上提供必要的支援。

## 四、校務參與

### (一) 教學與行政

#### 1. 外語學院

聖言會負責理學院和外語學院，因此理學院及外語學院各系所之規劃與發展都邀請聖神會參與。身為國際修會，因此聖言會團體在從事語言教學工作上較具優勢地位。譬如在師資方面，相當容易找到適當的德籍、法籍、美籍和日籍等傳教士來負責各系教學。「外語學院開始時很好，因為好多外籍神父來教書，他們都是專家。」<sup>22</sup>龔士榮神父在回憶時亦證實了外語學院師資優良。在體制上，外語各系隸屬於文學院，但師資的聘用、教學的管理和經費的籌措則由聖言會負責。外國語言學系於民國 52 年成立，下設英文與德文兩組，民國 53 年又增加法文和西文<sup>23</sup>兩組。直到民國 56 年四組同時升格為學系。東方語文學系則於民國 58 年設立（民國 73 年更名為日本語文學系）。民國 69 年外文各系方改隸外語學院。

聖神會在接受邀請後，鮑坤儀修女（Sr. Teresa Baues, 1913.1.4-1993.11.5）、安琪樂修女（Sr. Angela Mennemann）、古怡心修女（Sr. Fidelis Goebbel）、賀永光修女（Sr. Heliena Krenn）、山崎陽子修女（Sr. Philomena Yamasaki）、裴德修女等分別受修會委派至輔大外語學院開始長期的教學工作。為什麼要開辦外國語言學系呢？有鑑於台灣當時逐漸發展的國際經貿，與世界各國接觸日益頻繁，亟需培養具有廣闊的國際視野，能充分瞭解對方文化傳統、思維方式的人才以因應之。<sup>24</sup>而輔仁的德文系是當時臺灣各大學最早開辦的，因為之前從未開辦德文教育科系，故缺乏適當可用的教科書、視聽器材等等，開辦工作極為艱難。創辦者需花費極大心力去製作教材。其他各系亦是如此。法文系第七屆的校友回憶道：

<sup>22</sup> 邵台新，《龔士榮神父訪問記錄》，頁 95。

<sup>23</sup> 西班牙語文學系 53 年設組，56 年與英文、德文、法文一起升格為學系。是外國語學系中唯一沒有聖神會修女服務的系所。專任教師有西籍安秀貞（教授 53.9 到校）、莫若蘭（副教授 57.8 到校）、范靜貞（講師 62.9 到校），兼任教師有西籍梅文彬（講師 58.9）、陸佩芳（講師 61.9）、孟哲慧（講師 64.9）、田松韻（講師 67.9）、法籍柏海星（講師 59.9）、山東籍劉巴丁那（教授 53.9）。莫、安、范、陸、田等位為耶穌孝女會修女。柏、孟 2 位為仁慈聖母院修女。輔仁西文系的發展茁壯，耶穌孝女會修女和仁慈聖母院修女的無私奉獻，居功厥偉。《私立輔仁大學教職員錄》，66.5，頁 57-58；68.1，頁 69。

<sup>24</sup> 裴德修女，〈輔大德文系：服務與學習之泉〉，收入《尋美之旅》，頁 194。

當年學法文的辛苦，是今日學子無法想像的：沒有課本的我們，所有的語言教材都由助教在打字機上，一字一字敲打影印出來，更遑論那本總是不夠用單薄的法漢字典。然而，我們擁有神父和修女的關愛卻是永不匱乏的。<sup>25</sup>

就是在這種艱苦的環境下，在神父修女等師長的關愛呵護下，各系草創、成長、茁壯。英文系的創辦，聖神會擔任重要角色。裴德修女打從一開始就加入英文系的陣容，為學生開授各種課程。在民國 50 年代並與聖言會的孫志文神父一同接受政府的委託，為高中教師開辦「如何教英文」研習營。是第一位深入原住民村落研究鄒族語言的外籍女性。後來赴美攻讀博士學位，於民國 75 年返臺繼續服務於輔大德文系。來自菲律賓的柯蘭修女 (Sr. Laetifera Colet) 教授戲劇，在當時非常罕見。在她的努力擘劃之下，戲劇公演成為輔大英文系的特色。此後更擴及整個外語學院各系，都有戲劇公演，蔚為風氣。

賀永光修女長期在理圖和英文系任職，民國 71 年接掌系主任並擔任「輔仁學誌」外語學部主編，除教學工作外，研究工作成果豐碩，為學界稱道。「教授文學提供無數的機會，使中國青年的心靈熟悉基督徒的觀點和價值」。<sup>26</sup> 法文或德文的基本教學技巧也給予古怡心修女好多的機會領導學生領略更多的價值。尤其是在聖經課內，他們藉著與天主聖言的邂逅而與基督相遇。山崎陽子修女的活動領域由教授現代日本文學延展至舞台上的戲劇演出。後者不僅發展學生的表演潛能，更訓練他們負責和分工合作的精神。

## 2. 理學院

聖言會所創辦的教育事業和其會祖對自然科學的愛好，及其所接受的培養訓練應該有相當的關聯。在 1875 年 8 月 5 日的會議上，楊生神父給即將成立的聖言會明確而清晰的目標：

我們的總目標是藉傳揚天主聖心的知識和愛，服侍天主和我們周圍的人。……我們特別的意向是：1) 在外教的國家傳揚信仰，2) 以聖多瑪斯的精神培植真正的科學（神學和自然科學）。……因此，我們修院的開設是為執行這兩個目標——即是為那些願做傳教士者和那些願以教師身份而準備獻身以教導傳教士者。<sup>27</sup>

<sup>25</sup> 李瑞媛，〈走入法文系的歷史憶法文系第七屆 1970-1974 這一班〉，收入《尋美之旅》，頁 240。

<sup>26</sup> 轉引自《聖神婢女傳教會在臺廿五週年紀念》，頁 34。

<sup>27</sup> 轉引自周華德著，薛保綸譯，《天國的拓荒者》，頁 47-48。

楊生神父創立聖言會後，就想要在傳教工作上把科學素養當作對聖言會會士們的基本訓練，希望他們秉持徹底研究的精神，來處理在傳教區所面對的種種不熟悉的情況，如新的文化語言和氣候等等。他追求更精準明確的認知和解釋，所以聖言會士自創立之後，在傳教士的培育學程中，除了神學之外，更將培育初期一年半的時間用來學習自然科學，如物理學、化學、生物學等等學科。<sup>28</sup>在楊生神父過世之前，曾重新強調聖言會傳教工作中所推動的科學精神。

我們向來較其他傳教修會更重視科學的研究精神。……天主教應在優秀的中高等教育中培育出有知識與學問，及能與當地相親的人才。以便能為當地的民族風格帶來有效的影響力，進而使對信仰產生好感。有鑑於高等教育在日本及其他個傳教區的重要性，因此對科學專業的栽培，自一開始便是我們傳教會的第二目標。<sup>29</sup>

由於聖言會士對自然科學有特別的訓練和研究能力，這可能便是在復校時願意承辦理學院的緣由。

相較於外語學院，理學院各系在儀器設備上的需求更急迫，經費龐大籌措更為困難。當時台灣已有不少大學具有設備完善的理學院，要與他們競爭不是件容易的事。為了建立一個良好的理學院，聖言會團體努力的向外籌募經費（尤其是德國政府和教會）。民國 52 年先成立數學系分設純數與應數兩組，53 年分別成立物理、化學、生物等學系。62 年數學系的純數與應數兩組分別升格為系，同年成立數學研究所，66 年成立電子工程學系，71 年理學院更名為理工學院。

北平輔大女院第一屆畢業的聖神會劉英修女奉派籌備化學系。舉凡課程的規劃、師資的延聘、建築物的興建、設備的購置與勸募，劉修女居功厥偉。實驗室的器材和藥品大部分來自德國。劉修女說：「因為儀器藥品的充足，同時為了培養學生的實際操作的能力，定性、定量分析和普通化學實驗，每個學生獨自成一組。」<sup>30</sup>為使學生們有更好的研究環境，她勤儉刻苦，也要求學生愛惜公物。60 年畢業的學生回憶：「大一修普化實驗，如有弄破鼎，除按章賠償之外，尚需擔心受到劉修女的責備。總之，劉修女是不折不扣化學系另設之專屬訓導主任，學生隨時會被叫住，在走廊邊

<sup>28</sup> 魏思齊，〈聖言會及其大學事業——為落實教會的福傳使命而做〉，收入《尋美之旅》，頁 523。

<sup>29</sup> 轉引自柯博識神父〈聖言會會祖楊生神父與科學〉，收入《求真之道》（新莊：輔仁大學出版社，2002），頁 79。

<sup>30</sup> 轉引自周善行，〈懷念劉英修女——輔仁大學在台復校首位系主任〉，收入《尋美之旅》，頁 322。

訓誡一番。」<sup>31</sup>可見對日常生活教育，修女們也是非常重視的。

李偉平修女民國 71 年開始於化學系專任，擔任導師十分關心學生，常鼓勵班上同學多辦活動以增進感情。常告訴同學：「最基本的就是愛惜自己的生命，尊重自己與他人，實實在在地去生活。」<sup>32</sup>白恆光修女擔任了 18 年的系主任，為輔大數學系盡心盡力，數學系的分組、碩士班及夜間部數學系，全是在她手上成立的。「教代數學教的既好又嚴，常常下課前測驗十分鐘，看看學生們有沒有專心聽講。她的考試題目很活。學生們為了要過她的科目很用功讀書。……給他們（打下）紮實的代數基礎。」<sup>33</sup>修女們都知道首先應獲得學生們對她們在學德專精上的尊敬，因此在專業範圍內持續不懈的努力，以滿足學生對她們的期望，然後方能使他們進一步體認到修女們奉獻生活的意義。

民生學院的創立及其存在特別呈現出聖言會與聖神會的合作精神。此歷史可追溯至吳秉雅修女在北京輔大家政系的創辦。52 年輔大復校，吳修女又再度授命繼續領導，克服萬難，成立全國第一個家政營養學系，隸屬理學院。54 年分為家政和營養兩組。59 年因應時代環境需求，家政營養學系衍生出全國唯一的織品服裝系，由羅麥瑞修女（Sr. Maryta Laumann）擔任創系系主任。60 年家政營養學系的營養組獨立成為食品營養學系，由何木蘭修女（Sr. Evamonica Jamlang）擔任首任系主任。家政營養學系則更名為家政系，直至 75 年，家政系為適應社會需要與時代變遷，改名為生活應用科系。早在民國 74 年吳秉雅修女就已經注意到未來的變化，而有前瞻性的提示：「新的營養學也將成立。……若我們沒有人有空或具備此資格，聖言會是否仍將保有權力繼續經營主導之？」<sup>34</sup>似乎應積極的儲備人才，以因應未來之需要。民國 83 年全國第一個民生學院正式成立。由民生學院各系所的創立可以見證聖神會修女們的魄力與遠見。

吳修女畢生致力於「提昇家庭生活品質」，是一位具有前瞻性，勇於突破與創新的教育家。她創辦輔園餐廳，創設輔幼中心，提供同學實習場所。民國 58 年，輔園的建造全由吳修女親自規劃設計監督施工，一樓為餐飲設備，二樓備有客房，當時已經具有「實習飯店」的雛形，可以看出吳修女對家政系未來在「餐旅管理」發展的前瞻眼光。67 年積極向德國募款，才得以順利完成輔幼中心的硬體建築。輔幼中心的設立不但充分展現

<sup>31</sup> 轉引自周善行，〈懷念劉英修女——輔仁大學在台復校首位系主任〉，收入《尋美之旅》，頁 327。

<sup>32</sup> 轉引自周善行，〈輔仁大學理工學院化學系系史〉，收入《尋美之旅》，頁 137。

<sup>33</sup> 顏一清，〈私立輔仁大學理工學院數學系系史〉，收入《尋美之旅》，頁 140。

<sup>34</sup> “The Relationship at Present of the SSpS and the SVD section at Fu Jen Outside the tow Colleges,” Jan 1985, 《聖神修女會檔》，輔大校史室。

吳修女對幼兒教育的關懷，同時為台灣幼教界培育許多菁英師資人才。同時更是受人愛戴的生命典範，一生活出基督福音精神的傑出傳教士。<sup>35</sup>

羅麥瑞修女說：「假如我早知道我的傳教生涯是花在大學中，並與織品服裝為伍，也許我會懷疑我的聖召。然而如今，我總算明白了，沒有一件人所關懷的事不為上主所掛慮的。」<sup>36</sup>因而於民國 58 年籌備織品服裝學系，59 年擔任第一任系主任，在台灣服裝界引領風騷，樹立典範，對織品學系、所的發展及民生學院的創立貢獻良多。「一位德國修女，因著愛而奉獻一生，因為聖神修女會需要，而奉派修習服裝碩士學位，成就了台灣綜合大學裡第一個及獨特的織品服裝系，她一輩子都著修女服，卻要使每個人穿著時髦合乎禮。」<sup>37</sup>這充分表露出羅修女的信仰引領她勇往直前，而修會的團體生活也使他深深體會，「團結合作，無往不利」的強大力量。在教學之餘，她還在輔大創立了「中國聖神福音傳播會」幫助許多教友老師、職員認識天主聖神。這件工作她持續投入了二十餘年，不但親自陪伴新會員的所有研習，並帶領已陶成的會員在每月的聚會中繼續成長。

## （二）宿舍管理

宿舍之於大學學府，參與了培育完整人格及落實全人教育的功能。宿舍管理及輔導，雖非大學教育的核心目標，但宿舍除提供學生求學的住宿需求外，實有加強生活教育之功能。因此聖神會修女們除了教學和行政工作之外，又接下了女生宿舍的管理和輔導之責。幾乎是二十四小時全年無休的照顧住宿學生。

聖言會負責興建和管理女生 AB（宜真宜美）樓、C（宜善）樓和男生理一舍（格物學苑）、理二舍（立言學苑）。一切依校規管理。若無學校規定，則四個宿舍規則一致。由聖神會的一位修女負責兩個女生宿舍之行政管理總監。有關紀律則由訓導處協助處理。這位修女也負責宗教和其他教導，但在 C（宜善）樓也有另一位聖神會修女負責宗教事宜。另有一位（無約的）聖神會修女管理 AB 樓。且一些修女也住在宿舍。宿舍行政管理總監一職雖隸屬學校總務處，但薪水由聖言會支付。負責宗教事務的修女則隸屬學校宗教中心，

<sup>35</sup> 蘇雪玉，〈輔仁大學民生學院兒童與家庭學系系史「天佑兒家」〉，收入《尋美之旅》，頁 295。「他隨時隨地都是自然表達出神職人員的誠懇，全新（心）全意投入並奉獻一生在教育我們這些外國女孩身上。」第二屆學生湯聿昂如是說。湯聿昂，〈悼念文〉，收入《感恩和追思》，頁 25。

<sup>36</sup> 轉引自《聖神婢女傳教會在臺廿五週年紀念》，頁 38。

<sup>37</sup> 李寧遠，〈序〉，收入羅麥瑞、陳貴糖，《輔仁大學織品服裝教育》（新莊：輔大，民 94），頁 X。

薪水亦由聖言會支付。<sup>38</sup>

經由以上的協定，聖神會派遣了周慕貞修女（Sr. Cornelita Buck，1901.3.5-2003.9.12）、梅貽納修女（Sr. Ellen Marchner, 1909-1992）、安琪樂修女、鮑坤儀修女、陳彩音修女（Sr. Hilda Chen）等幾位修女到 AB 樓（宜真宜善）服務。C 樓（宜美）則有鄧迪德修女（Sr. Clemens Dietl）、海景星修女（Sr. Erlinda Kemper）、施納德修女（Sr. Marie Benedicta Sporer）、陳彩音修女、莫立杉修女（Sr. Lynn Marie Morrison）等修女服務。<sup>39</sup>

周慕貞修女曾在北平輔大工作，民國 53 年一復校就來到新莊，照顧住宿女學生，並負責管理工友，一待就是 26 年。<sup>40</sup>無數離家北上求學的年輕女孩，都受過她無微不至的照顧。「她那笑容可掬的面孔，令人很容易接近，因此昔日在輔大服務宜真宿舍時，能得到學生和同學的愛戴，有些學生返回宿舍時，偶遇情緒不好，能有這位知心如母親的舍監，多時也稍解她們思家的念頭。」<sup>41</sup>在周修女的追思彌撒中，有位昔日企管系的學生，雖然時隔三十年，依然回憶起住校時，因患肋膜炎半夜發燒，修女照顧她的情景，仍感念不已。修女們對家境清寒的學生特別幫助，甚至免費住宿。「返校的第一個學期，我住在 AB 樓，是免費的。管宿舍的包（鮑）修女還為我準備了一個食品盒——裡面裝滿了各式點心。」<sup>42</sup>讓她們不致挨餓，得以安心求學。傳教士以宿舍為家，視學生如子女；晚年落葉時，仍歸根於台灣。因為有這種落土投身的精神，教育方能感動生命而有所成就。藉著修女們的身教與言教，住宿學生學習到紀律與尊重、互助與博愛的利他精神。<sup>43</sup>

<sup>38</sup> *The Relationship at Present of the SSpS and the SVD section at Fu Jen Outside the tow Colleges*, Jan 1985, 《聖神修女會檔》，輔大校史室。

<sup>39</sup> *The Relationship at Present of the SSpS and the SVD section at Fu Jen Outside the tow Colleges*, Jan 1985, 《聖神修女會檔》，輔大校史室；羅麥瑞修女，〈輔仁大學與聖神婢女傳教會〉，收入《尋美之旅》，頁 474 中有詳細表列。羅修女在這篇文章中仔細的將聖神會在輔大服務（1963-2004）及駐留的所有修女整理列表，詳列其中、英文姓名，服務期間，服務年資等。收集考證，費時耗力，貢獻至巨。分別有〈Holy Spirit Sisters involved in Fu Jen University-taiwan〉；〈SSpS Sisters as heads of departments and graduate inatitutes〉；〈SSpS Representatives on the SVD Administrative Council〉；〈SSpS administrative influence on the university level〉；〈SSpS administrative influence and initiatives on the college and SVD Section levels〉；〈SSpS administrative influence and initiatives on the departmental level〉；〈SSpS in dormitory management( female students)〉；〈SSpS in health care service〉等 8 張表。

<sup>40</sup> 加上北平輔大的歲月，周修女一生前後服務於輔大宿舍有 40 年之久，真可謂鞠躬盡瘁。她待人和善，督導校內男工友，頗孚眾望。她去世後，在耕莘樓聖言會聖堂的追思彌撒，因前來參與追思者眾多，聖堂顯得特別擁擠，可見她確實受到大家的懷念。

<sup>41</sup> 張萃文，〈追思一位平凡高壽的修女〉，未刊稿。

<sup>42</sup> 陳麗蘭，〈風中的鶴〉，收入《感恩和追思》，頁 31。

<sup>43</sup> 呂慈涵，〈輔仁大學宿舍歷史淵源與宿舍文化——以生命陪伴生命，以生活教導生活〉，

### （三）醫療護理

聖神會會規中明言：「在醫護工作上，我們仁慈的對待病患和需要照顧者。」<sup>44</sup>因此不論在新竹、基隆、奮起湖或是新莊輔大，聖神會修女都擔負起醫療保健的工作。「醫務室由聖言會興建在聖言會的土地上，隸屬於訓導處的健康中心。由三單位和夜間部依學生人數來支付費用。醫務室由聖言會負責管理，並由聖言會負責任命主管。」<sup>45</sup>

聖神會李偉平修女、鮑德明修女 (Sr. Edna Polt, ? -1996.12.4)、任若芙修女、甘佳玫修女 (Sr. Carmen Castro) 都先後在醫務室服務。劉英修女曾任衛生組主任。另有幾位修女負責總管。鮑德明修女任醫務室主任多年，為全校師生的健康付出心力。因此，在民國 60 年獲頒「好人好事」獎，以表彰其「博愛濟眾」之精神。

總之，醫務室雖小，卻是輔仁大學全體師生健康之所寄。聖神會的修女們恪守崗位，為全校師生服務。

## 五、聖神會的貢獻

民國 73 年 12 月，吳秉雅修女對新莊輔大復校二十餘年來聖神會修女對於理學院的貢獻做一評估：

我個人認為聖神會修女對學校之特殊貢獻如下

1. 家政等相關科系之發展（家政學系、織品服裝系、食品營養學系）。  
聖神會修女們對這些科系之發展方向有顯著的主導。
2. 關懷學生。修女們創造了一種關懷學生的氛圍，尤其是對不幸的貧困的同學，強化學校的輔導。包括課業和個人問題之關懷與輔導。
3. 精神使命。修女們極為關懷大學中的使命工作。積極投入校園宗教活動和個別宗教教誨。<sup>46</sup>

吳修女的評估極為正確，她已預見將來家政等相關科系有極大的發展空間。而聖神會的修女從復校以來，就全心投入草創擘畫，主導整個相關科系的發展，至今已呈蓬勃發展之勢。83 年民生學院的成立，可說是在聖神

收入《求真之道》，頁 143。

<sup>44</sup> 聖神會會規 111.2，轉引自《聖神婢女傳教會在臺五十週年紀念》，頁 32。

<sup>45</sup> “The Relationship at Present of the SSps and the SVD section at Fu Jen Outside the tow Colleges,” Jan 1985,《聖神修女會檔》，輔大校史室。

<sup>46</sup> “Comments on the Service of the Sister Servants of the Holy Spirit in the College of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of Fu Jen University,” December 5, 1984,《聖神修女會檔》，輔大校史室。

會修女多年主導努力之下，水到渠成的必然結果。而吳秉雅修女被稱為「民生之母」，誠然當之無愧。在教學，行政，宿舍管理輔導和醫務工作中，積極關懷學生、發揚使命精神，確實是聖神會的一貫宗旨。

一直以來聖神會提供的師資，不但學養一流，而且陣容堅強。據當時英文系副教授兼外語學院院長歐陽璋神父 (Father Vargo)，1985 年 1 月 21 日的對聖神會修女在輔大外語學院服務之評論報告指出：以往有 9 位聖神會修女在外語學院服務，學歷博士 1 位，Staatsexamen 1 位，碩士 5 位，學士 2 位。目前仍有 4 位修女在外語學院服務：一位是英語系的主任，一位是日語系的主任，一位是德語系的主任，另一位修女已取得博士學位，將於這個學期返回德文系服務。

以民國 74 年的一般標準而言，9 位聖神會修女中 7 位學歷高達碩士以上，素質之高，卻實難能可貴。「聖言會的專任教授多為外國人，但要聘請高品質的外籍教授比中國教授更難。」<sup>47</sup>好在聖神會是個國際性修會，主事修女們排除萬難，委派學歷高素質佳的教師前來任教，有助於教學品質的提升。若無現成人選，則已注意到未來可能的發展方向，規劃適當人選進行專業人才的培育。如吳秉雅修女在報告中就進一步建議，聖神會應繼續提供合格之學術與行政人才給學院。<sup>48</sup>不但顯示吳修女有德國人高度的守法精神，更充分顯示其前瞻性的遠見。評估在家政相關科系的發展上聖神會扮演重要角色，亟需專業領導人才。因此早在民國 60 至 63 年，就已遣發羅麥瑞修女赴美進修織品服裝專業，以因應未來之需求。

除日常教學外，修女們對系所行政工作所投注的精力，亦極為可觀。

輔仁在台復校的 22 年裡，聖神會的修女們在外語學院總共服務了 71 年。平均每年有 3 點多位修女 ( $71/22=3.23$ )。在這 71 年的服務中，聖神會修女出任各系主任有 14 年之久，平均一位修女擔任行政主管的時間就佔了復校 22 年中的 2/3。從目前外語學院 5 系中，有 3 位系主任是聖神會修女 (賀永光，英國語文學系副教授兼系主任，奧地利，58.8 到校，71.8 就現職；古怡心，德國語文學系副教授兼系主任，西德，61.8 到校，72.8 就現職；山崎陽子，日本語文學系教授兼系主任，日本，65.8 到校，68.8 就現職)。<sup>49</sup>

<sup>47</sup> 鮑乃曼著，薛原、潘薇綺譯，《聖言會在華傳教小史》(天主教聖言會，1999)，頁 88。

<sup>48</sup> “Comments on the Service of the Sister Servants of the Holy Spirit in the College of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of Fu Jen University,” December 5, 1984,《聖神修女會檔》，輔大校史室。

<sup>49</sup> “Comments on the Service of the Sister Servants of the Holy Spirit in the College of Foreign Languages and Literatures of Fu Jen University,”《聖神修女會檔》，輔大校史室；《輔仁大學教職員錄》，74 年 1 月，頁 68、70、76。

以往修女們在外語學院各系擔任系主任行政工作時間頗長，現在 5 系中又有 3 系主任為聖神會修女，則總體而言影響不可謂不大。各系所主管對系務處理、使命發展、師資聘任、課程研發、團隊研究、系所目標與宗旨等各項議題，都需投注大量時間和心力，系所方能運作順暢。由此觀之，聖神會修女們在籌辦擘畫外語學院、理學院各系時的全力投入、辛勞付出和卓越的行政能力，實非常人所及。因而歐陽璋神父在報告中，很肯定的表示，由學術到行政主管職務，在未來的三五年內，仍將由聖神會修女出任。

其實，在例行的教學和繁重的行政工作之餘，聖神會修女們在學術研究上的表現，也頗令人刮目相看。起初歐陽璋神父深知修女們各種工作繁忙，在學術研究領域並未期待她們有所表現。

由以上所言，顯而易見，聖神會修女對外語學院的教學有重大的貢獻。基於責任感和奉獻精神修女們承擔各項與教學有關的工作。深受學生和同事的愛戴。雖然學術研究並非重點，但是仍有幾位修女多年來都在輔仁學誌 (Fu Jen Studies) 或其他刊物發表學術論文。<sup>50</sup>

輔仁學誌於民國 57 年創刊，1 至 5 期自然科學與外國語文合刊 (Fu Jen Studies: Natural Science & Foreign Languages)。第 6 期起分為自然科學和文學與語言學兩種學報 (Fu Jen Studies: Natural Science ; Fu Jen Studies: Literature & Linguistics)。輔仁學誌自然科學之部何木蘭修女參與第 6 期的編輯工作。由 57 至 74 年聖神會修女發表的論文共有 5 篇。其中何木蘭修女 2 篇、莊文嫻修女 2 篇、羅麥瑞修女 1 篇。輔仁學誌文學與語言學之部賀永光修女參與第 6 期的編輯工作。由第 21 至 32 期 (民國 76-88 年) 則一直擔任執行編輯，長達 13 年之久。第 33 期還特地出版賀永光修女榮退專刊以資紀念，表彰她對輔仁學誌的貢獻。由 57 至 74 年聖神會修女發表的論文共有 8 篇。其中柯蘭修女 1 篇、賀永光修女 6 篇、裴德修女 1 篇。

51

<sup>50</sup> “Comments on the Service of the Sister Servants of the Holy Spirit in the College of Foreign Languages and Literatures of Fu Jen University,” 《聖神修女會檔》，輔大校史室。

<sup>51</sup> 1968-1985 聖神會修女發表於輔仁學誌自然科學之部的論文共有 5 篇，如下：

何木蘭修女 Sr. Evamonica Jamlang, “The Aflatoxins; A Review,” 1972. No.5, pp. 121-135.

何木蘭修女 Sr. Evamonica Jamlang, “The World Food Problem,” 1973. No.6, pp. 115-127.

莊文嫻修女 Sr. Wen-Li Jwuang, “Preparation and Evaluation of Soybean Curd,” 1977, No.11, pp.79-92.

羅麥瑞修女 Sr. Maryta Laumann, “Effectiveness of Five Local Detergents: A Comparative Study,” 1977, No.11, pp. 93-114.

莊文嫻修女 Sr. Wen-Li Jwuang, “Dietary Fiber in Baked Products and Starch-Snack Food Systems: Review,” 1982, No.16, pp. 49-64.

1968-1985 聖神會修女發表於輔仁學誌文學與語言學之部的論文共有 8 篇，如下：

柯蘭修女 Sr. Laetifera Colet, “Woman as Symbol in the Novels of Gertrud von Le Fort,”

在第 33 期（民國 89 年）的輔仁學誌文學與語言學之部——「賀永光修女榮退專刊」的前言中，特別指出：「是以一位編輯者、教師和學者的三重身份為之慶賀」。做為一位編輯者，她致力提升本學報的專業性和成熟度；做為一位教師，民國 58 年起至輔仁大學英語系、所服務，並於民國 71 至 76 年擔任系主任，她教導學生和服務同事前後長達 30 個寒暑；除了當老師外，她是一位不折不扣的學者，她出版 *Conrad's Lingard Trilogy* 一書及無數篇有關康拉德的論文。在民國 78 至 88 年這十年間，她連續獲得 12 次學術獎助。民國 88 年她又出版了 *Classical Mythology* 一書，重新詮釋希臘羅馬的古典神話。基於對其學術研究之尊敬和仰慕，本期特別刊載她的兩篇有關康拉德的近期著作。她的學術成就令人景仰萬分。

對我和對許多同學以及我的同事而言，賀永光教授是賀修女，一位傳教士，她散發出溫暖和幽默，對周遭的人們和生命充滿敏銳的洞察力。她的宗教信仰，在與學生和同事的接觸中自然流露。……她在接受學生訪問時曾說：『教授文學提供無數的機會，去溝通和傳達各種不同的價值觀，目的在於豐富人生。』賀修女您不僅豐富了學生們的生命，同時也豐富了您的同事和輔仁學誌所有讀者的生命。<sup>52</sup>

1968, No. 1, pp. 87-107.

賀永光修女 Sr. Heliéna Krenn, "Joseph Conrad's Predilection for Isolated characters," 1970, No. 3, pp. 63-86

賀永光修女 Sr. Heliéna Krenn, "Prometheus in Twentieth Century American Literature," 1973, No. 6, pp. 57-82.

賀永光修女 Sr. Heliéna Krenn, "The American Identity in the "Novels of Manners," 1977, No. 10, pp. 41-58.

賀永光修女 Sr. Heliéna Krenn, "The Perfidy of Fidelity in Joseph Conrad Fiction," 1980, No. 13, pp. 27-46.

賀永光修女 Sr. Heliéna Krenn, "Joseph Conrad's Polish Heritage of Hopefulness, in "YOUTH", " 1982, No. 15, pp. 37-54.

賀永光修女 Sr. Heliéna Krenn, "The Shadow of a Successful Man: Conrad's Hollow Man in *The Outcast of the Islands*," 1983, No.16, pp. 33-48.

裴德修女 Sr. Agathe C. Bramkamp, "An Austrian Effie Briest? - The Image of Woman in Marie von Ebner-Eschenbach's Novel *Unsühnbar*," 1985, No. 18, pp. 41-58.

第 33 期賀永光修女榮退專刊，論文 2 篇，如下：

賀永光修女 Sr. Heliéna Krenn, "Conrad's Women and Art: 'The Return' and 'The Planter of Malata' As Signposts in Conrad's Creative Landscape," 2000, No. 33, pp. 1-15.

賀永光修女 Sr. Heliéna Krenn, "Representation or Presentation? Joseph Conrad's Freya and Felicia," 2000, No. 33, pp. 16-26.

<sup>52</sup> Preface, "Fu Jen Studies: Literature & Linguistics," No. 33, 2000, p. iii. 聖神會羅麥瑞修女的文章中顯示，賀永光修女在輔大工作前後一共 27 年，中間曾一度出國進修，服務期間為 1969-74；1977-99。見羅麥瑞修女，〈輔仁大學與聖神婢女傳教會〉，收入《尋美之旅》，頁 414。欣逢創校八十週年校慶，據聞聖神會賀永光修女、陸衛樂修女已分別接受英文系、生物系之邀請，將返校參加盛會，在此竭誠的歡迎她們。

賀修女的研究能量充沛，成果豐碩，學術成就著實令人景仰萬分。然而其人格修為的溫暖光芒，宗教信仰的自然流露，多元價值觀的傳達散佈，才是真正讓輔仁師生感念不已之所在。

事實上，教學認真負責，全心關懷學生，是聖神會修女們共有的特質。數學系楊南屏老師特別提到學生對白恆光修女的敬重：

我本身也是白修女的學生，所以能深刻體會吳東賢學長對白修女的敬重。修女上課非常嚴謹，每一位學生只要隔天要上她的課，不管平時玩得再兇，前一天一定會拿起書來溫習，否則很容易「再來一次」的。但即使修女對學生要求如此嚴苛，但系友們回憶起當年修課的種種，不論是順利過關者或是曾經二修或三修者，都對修女有許共同的回憶。除此之外，修女和學生有良好的互動關係，她時常主動詢問學生的近況，遇到有困難的學生，修女亦盡其所能的協助，使學生在求學路程上，能夠順遂些。所以，一直到如今，被修女教過的學生，無不感謝修女當時的教導。<sup>53</sup>

同樣的感念也發生在，民國 58 年入學的家政系校友對吳修女的懷念之中：

夏天時吳修女穿著一襲白色的修女服，冬天則改為藍色的，當時是我生平第一次如此近距離的接觸外國修女，雖然覺得奇特，不過給人的感覺是很親切的，她身為系主任，每天非常忙碌，四年大學中只有在她任課的『家庭管理』課堂上，才能好好仔細的看清楚她，上她的課，絕對準時上下課，學生不允許遲到早退，而且課堂中不苟言笑。<sup>54</sup>

法文系第七屆的校友在回想起當初大學時代，物力維艱、求學環境困難之時，仍不忘表示：「然而，我們擁有神父和修女的關愛卻是永不匱乏的」。<sup>55</sup>

今日，由各系系友們紛紛捐款，設置紀念聖神會修女們的獎助學金的情形，即可窺知她們是多麼受人敬重與懷念了。<sup>56</sup>

<sup>53</sup> 《輔仁》，第 18 期，第 6 版，90 年 2 月。

<sup>54</sup> 陳貴糖，〈最尊敬的系主任、最親近的長者——吳秉雅修女〉，收入《感恩和追思》，頁 27。

<sup>55</sup> 李瑞媛，〈走入法文系的歷史憶法文系第七屆 1970-1974 這一班〉，收入《尋美之旅》，頁 240。

<sup>56</sup> 如生科系設置〈劉英修女紀念獎學金〉、〈李偉平修女紀念獎學金〉；數學系設置〈白（恆光）修女獎助基金〉；兒家系設置〈吳秉雅修女獎助學金〉；英文系設置〈賀永光修女獎助學金〉等。

不論今昔，不論工作性質，我們除了個人的專業外，都用心追求全人教育，總是注意學生的全人發展。身為傳教士，我們努力為福音做見證。也發現有很多機會可以傳播天主的喜訊，如：在授課時、在學生活動中；在講授要理和準備學生領洗時；當學生在生活中遇到信仰的挑戰，我們陪伴他們面對時；都是福傳的好時機。……身為聖神的婢女，我們感謝聖神召喚我們為祂服務，藉著我們在輔仁大學的角色助長教會的使徒福傳。<sup>57</sup>

藉由以上聖神會修女們所說的這段話，就充分彰顯了修女們在輔大多年來教學、服務和關懷學生的特殊貢獻。

## 六、結語：時代意義

輔大復校在當時發生了兩個作用，第一，穩定民心。民國 50 年代，台灣政局並不穩定，國際不看好其前景之際，各外國修會的辦校舉措，確實發揮了穩定民心的積極作用；第二，培育青年、為國育才。外國修會排除萬難，將人力物力大量投資於輔大，栽培中華民國的青年，為台灣日後的發展厚基人才，可謂功在台灣。復校第一任校長于斌樞機對外國修會願意奉獻犧牲，栽培我國青年，為此也屢次表示「感激和歡迎」。<sup>58</sup>

三單位共同辦校的創舉，過程中雖然有些問題，但它最主要的獨特見證是：它在多元性社會中的合一作用。輔仁大學成為東西方、眾國籍人士，不同語言和不同修會團體攜手合作的明證，明證出對於肩負鑄造明日世界的中國青年的一致關懷。

聖言會單位在輔仁大學的組織結構中握有重要的行政決策權，但更重要的是它代表著一個精神傳統，單位裡比較重要的財務或人事決定，是由一個領導群，聖言會的神父、修士和聖神會的修女共同組成。<sup>59</sup>這兩個修會從開始就有著國際性的特色，會士們視野自然較為開闊而多元化，恢宏

<sup>57</sup> 《聖神婢女傳教會在臺五十週年紀念》，頁 14。

<sup>58</sup> 據主任秘書龔士榮神父回憶，當時于校長常跟他說：「我們應該讓他一點沒關係，他們花錢、派人來，前花在我中華民國，栽培的是我們中華民國的青年，我們只有感激只有歡迎。」相忍為國之情溢於言表，今日聞知令人感動萬分。邵台新，《龔士榮神父訪問記錄》，頁 78。

<sup>59</sup> 在《聖神修女會檔》吳秉雅修女檔案中 1985.4.15 即可見雙方契約有規定聖神會得派兩位代表出席聖言會單位的行政會議。但在羅麥瑞修女的文章中卻僅有一位代表參與。修女代表分別為吳秉雅（1967-71）、何木蘭（1971-74）、白恆光（1976-80）、羅麥瑞（1978-84；1995-02）、任若芙（1980-83）、賀永光（1984-87）、李偉平（1984-90）、黃淑媛（1987-90）、裴德（1990-2000）、古怡心（1994-95；2000-02）。見羅麥瑞，〈輔仁大學與聖神婢女傳教會〉，收入《尋美之旅》，頁 460。

前瞻具國際觀。相對的也提供學生接受多元價值觀的學習環境，賀永光修女就認為，「教授文學提供無數的機會，去溝通和傳達各種不同的價值觀，目的在於豐富人生。」因此訓練出較具包容性、能多元思考的青年。輔大學生在這種極為特別，不同於當時台灣其他大學環境的薰陶下，氣質與見識卓爾不凡。「1967年進入輔大化學系……當時輔大的洋氣、化學系美麗的建築，教會主導的理學院以及派一位修女（劉英）來指導新生，都是全新的經驗。」<sup>60</sup>在這些全然不同的經驗中學習、成長、茁壯。「從 Sr. Urbania（吳秉雅修女）處學得的日爾曼民族精神、思維、價值觀卻深深影響我的一生認真、執著的態度，常在我遇到困難時，不輕言放棄，堅持直到度過難關。」<sup>61</sup>日爾曼民族精神、思維、價值觀，確實與眾不同。

「從吳修女的身上，我看到『家政』專業的尊嚴，也體驗到『家政』專業者的性格：堅強的意志力、思辯的能力、堅定的使命感和宏觀的胸襟，這些都深深的影響著我。」<sup>62</sup>我們看到新青年的塑造過程就具體而微的出現在新莊輔大。新青年、新女性在這種環境的薰陶下於焉誕生。相較於北平輔仁校友來函，感謝恩師吳秉雅的教誨：

奉上五十年前您和我們家政系同學的合影，……現在，這些同學均已成材。她們有從事營養工作的，有醫務工作者，還有兒童教育者。生活在中國各地，您辛勤培育的桃李結碩果，已滿天下。……我們想念您，感謝您對我們的培育。<sup>63</sup>

西方思潮的傳入情景、聖神會（教會）對近代中國（北平輔大）女子教育的深遠影響和貢獻，又再一次的於民國 50 年代（新莊輔大）重演。

<sup>60</sup> 轉引自周善行，〈懷念劉英修女——輔仁大學在台復校首位系主任〉，收入《尋美之旅》，頁 327。

<sup>61</sup> 李春芳，〈Sr. Urbania 以教育為基督做見證〉，收入《感恩和追思》，頁 33。

<sup>62</sup> 蘇雪玉，〈懷念吳修女——一位「家政」專業者〉，收入《感恩和追思》，頁 24。

<sup>63</sup> 范容給吳修女的信，2000年9月9日，收入《感恩和追思》，頁 16。

## 一位退休教授看台北輔大 ——台北輔仁的回顧與瞻望

朱秉欣\*

### 摘 要

台北輔仁自創校迄今已達四十多年（一九六三至二〇〇五）。一如宇宙萬物的進化，輔仁也出現了不少變化。比較明顯的是十多年前的突變。簡單地說：突變之前輔仁的校風既純樸又高雅。許多神父、修女以校為家，同學們天賦很高尊師重道；學習的環境幽靜，學習的風氣良好。台北輔仁的校訓是真、善、美、聖，輔仁的教育目標是教人知物、知人、知天；追求科學真理之外，還要找到永恆的真理——上帝。輔仁的傳統特色是出錢辦事而不是興學賺錢。獻身教會的師長黑夜白日以校為家，所領薪金回饋教會。輔仁的優良傳統是教職員工們職掌分明，彼此間互相信任；校園內有事就有人做，有人就有事做。師長們教學認真，同學間情同手足。台北輔仁三創辦單位主權的消失是校史上的一大轉折。新校長大展鴻圖，設計開闢第二校區；事實上計劃未成，但校園的氣氛卻產生了轉變。相當明顯的是校董介入了校政。輔大附設醫院在施工前夕叫停是抹不了的鐵證。隨著多位副校長的增設、校園人事的大幅變動，同仁之間信任大減、士氣低沉。近年來，輔仁員工的怨言多，同學的批評多，上層主管對輔大的前途有隱憂。主要的理由是什麼？可能的答覆是：學生人數多、校方冗員多、校園變化多、校區商店多、水電浪費多、人事調動多、慶祝活動多、師長出國多、觀光考察多、團體邀宴多、院系評鑑多、學術交流多、校內開會多、文書宣傳多、政策改變多、校董干預多。人性本來傾向於私利，教育界人士同樣重名又重利。如何重振輔仁好學風，上層的主管責任重；欲保輔仁好傳統，祈求上帝賜恩寵。輔仁是天主教的大學。舊約聖經裡，天主有這樣的話說：我的想法不是你的想法，你的路線不是我的路線。

---

\* 耶穌會神父。

為確保輔仁的傳統與它的優良學風，不能僅靠俗世的智慧與口才而更有賴天主聖神的指引。輔仁的師長及上層的主管倘能藉研讀聖經獲得智慧——愛人的神，則輔仁的精神傳統與優良學風必將永遠常存。

關鍵詞：台北輔仁、輔仁校訓、輔仁學風、輔仁傳統、輔仁突變、回顧輔仁、瞻望未來、天主恩寵、智慧——愛人的神

## 引言

人生存於客觀的世界，但每人對世界事物的知覺免不了是主觀的。

本文對於台北輔仁的回顧與瞻望祇代表一位退休教授的觀察與期盼，失當之處，歡迎指正。

一九六六年，筆者由台北輔仁首任校長于斌總主教接受了第一張聘書。包括退休以來的兼任聘書，筆者已在台北輔仁任教快四十年了。本人為耶穌會士，但開始六年都應聘於聖言會主辦的外語學院；於德文、法文、英文、西班牙文四系，主講心理學。上課地點是在外語及理工學院的綜合教室，學生共二百多人。教室是階梯式的，老師站在最低地位，同學們的座位則級級上升、高高在上。當時教室內沒有擴音設備，更沒有空調。同學們很少缺席無需點名。老師踏進教室，班長就喊立正、敬禮、坐下。老師開講，同學們靜聽；老師越講越有勁。下課之後，甚至週末假日還有同學們到台北找老師個別討論有關心理問題。回憶當時的上課，為老師實在是一種享受。說到這裡，我們開始碰到了本研討會的主題——台北輔仁的學風與傳統。

## 壹、台北輔仁的學風

一九六零年代與一九七零年代的輔大畢業生，現在大多已是年近花甲。獻身於教育事業的，有的當上了大學校長、教務長、學務長、總務長、院長、系所主任等；有的從政，現在當了大官；有的經商成了商業巨子、董事長、大老闆；更有許多成了各行各業的專家學者。教育家們都認為學生的成就也就是教師們的成功。教師的成功也代表學校校長以及各級行政主管的成就。談到學風，我們可以從多方面來觀察。

一、輔仁的校風：台北輔仁的校址選在台北縣的新莊。四十年前輔仁的周圍幾乎都是農田。在這綠野的環境裡，輔仁興建起幾幢四、五層高的西式大廈。在一大片空曠的校園裡，整齊美麗的花草把校園點綴成一個大花園。任何人從比較髒亂的小鎮踏進校園便呼吸到新鮮空氣而感到心曠神怡。輔仁校園以無聲的言語告訴大家，這是個清靜幽雅的教育環境。整體來說，輔仁的校風是純樸高雅。加上這校園裡首先居住的都是常穿道袍的神父、修女，輔仁的校風帶些神秘。在當時的周圍環境中，也許可以說：台北輔仁顯得既高貴又神聖。現任校長是當時的學生，他可以親身的體驗加以佐證。

- 二、輔仁的師長：直到一九八四年，筆者開始在輔大兼任行政工作。校務會議時，主席台上坐著一大排行政主管。主席是校長羅光總主教，其他都是穿著黑西裝帶羅馬白領的神父。當時，修女上台的並不多見。以校為家常駐校內的神父、修女至少一百多位。教職員工中，天主教徒的比率約為三分之一。全校的師長都是衣冠整齊，沒有教授穿拖鞋上課，更沒有老師穿短褲在校園內奔跑。師長們與同學之間的互動較多，同學們對師長明顯地表示敬愛。住校的同學們在男女宿舍，分別有神父、修女陪伴督導他（她）們。同學們遇有任何困難可隨時獲得幫助解決。當時的師長大多比較嚴肅，但尊師重道的風氣保持得相當良好。
- 三、輔仁的學風：二十多年前，全台灣的大學不到五十所，而且私立大學比國立的還多。每年參與大學聯招的考生約十二、三萬，真能被錄取進入公、私立大學的人數僅四萬左右，佔全體考生比率約三分之一。能踏入大學校門的考生，智商的總平均約為一百十五（I.Q. 115）。當時，智商在一百零五以下能跨入大學的僅約百分之一、二。台北輔仁在私立大學中應屬前端，所以學生的素質相當優秀。筆者曾經抽測輔仁八百位同學，所得的結果是：男生智商的總平均為 115.5，女生為 115.3。所以，過去輔仁同學們的天資聰穎，學習風氣良好。借閱圖書的人數很多。同學們在課餘之暇，個別向老師請教的大有人在。整體來說，過去輔仁的學習環境不錯，學習的風氣良好。同學們的行為表現可稱端莊純樸。那時代同學們的父母大概比較保守，同學們都重視生活紀律，顯得頗有教養。

## 貳、台北輔仁的傳統

台北輔仁是北京輔仁的復校。北京輔仁創於一九二五年，前身是北京公教大學附屬輔仁社；一九二七年更名為私立北京輔仁大學。<sup>1</sup>二十世紀初年，中國天主教名人馬相伯與英斂之為輔仁大學的創始人。<sup>2</sup>前者曾於一九零三年在上海創辦震旦大學，<sup>3</sup>一年後放下校長職又創辦復旦大學；後者則於一九二六年初逝世。北京輔仁正式成立，羅馬教廷委託美國賓州聖本篤會會士負責。該會上司派奧圖神父（Rt. Rev. George O'Toole, O.S.B.）為

<sup>1</sup> 徐乃乾主編，《北京輔仁大學校史（一九二五至一九五二）》（北京：中國社會出版社，2005年），頁三。

<sup>2</sup> 同上。

<sup>3</sup> 阮仁澤、高振農主編，《上海宗教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頁六九六。

首任校長。<sup>4</sup>台北輔仁繼承北京輔仁校名與其創校精神。

一、台北輔仁的傳統精神：教育的目的是培養學生在德、智、體、群、美各方面到達完美的境界。台北輔仁的校訓是真、善、美、聖。所以輔仁大學的同學不僅是追求知識真理，同時還要求善、求美，甚至求聖。首任校長于斌總主教為校歌填詞時，他寫下了這樣的字句：吾校之魂，聖美善真；三知是求，明德日新；福音勤播，神旨永遵；<sup>5</sup>來說明輔仁的教育目標以及輔仁的教育使命。三知二字指的是知人、知物、知天。這與敬天、恕人、約己、儉物儒家的倫理原則相近。校長身為教會的總主教，他不忘記他的神聖使命；所以他期望青年學生在追求真、善、美之外，還要追求聖。超凡入聖，神旨永遵。

北京輔仁始于一九二五，終于一九五二；它雖祇有二十七年的壽命，它的精神傳統都已深刻在校友們的心坎。台北輔仁所以能有今天，北京輔仁的傳統精神明顯地發揮了它的功能。在這裡，我們該向曾在北京歷盡艱辛的本篤會士、聖言會士以及避難來台推動輔仁在台復校的輔大校友們表達感恩。

二、台北輔仁的創建：一九六三年，台北輔仁於新莊復校。原南京總主教于斌，由教宗若望二十三世任命為首任校長。大學由中國聖職、聖言會與耶穌會共同合作，三足鼎立；人事經濟各自獨立，分別負責文學院、理學院與法學院。<sup>6</sup>台北輔仁草創期間，經濟來源全由歐美募捐，即使中國聖職也都依賴國外友好支援。首任校長總主教，後又升為樞機主教，但大學的財務、人事，他不干預，均由三單位各自負責。校長可能盡力捐錢但不管錢，也不拿錢。第二任校長羅光總主教，身為天主教主教團主席，亦即台灣天主教最高領導；他也不干預輔仁財務。屬中國聖職單位的第三任校長，依舊遵照原始協定，不干預其他單位的人事及財務；雖然聘請大學的教、職、員、工，都由校長發出聘書。台北輔仁傳統上的一大特色，一如其他國家的天主教大學祇是拿錢出來辦大學而不是創辦大學為賺錢。

創校不久，由於社會的需求，台北輔仁迅速擴展。聖言會最早成立外語學院，耶穌會增設商學院（以後更名為管理學院），中國聖職增設藝術學院。輔仁校區幾乎每三年矗起一棟大樓。首任校長于斌樞機的願望是：輔仁要創辦十個學院。前三位校長任期共計三十二年。台北輔仁所以能如此順利發展，無疑地該歸功於教會神職人員辦校的

<sup>4</sup> 徐乃乾主編，《北京輔仁大學校史》，頁四。

<sup>5</sup> 李震，《天主教輔仁大學的精神傳統》（台北：輔大出版社，2001年），頁三。

<sup>6</sup> 朱秉欣，〈耶穌會與輔仁大學〉，《教友生活周刊》，第五版，2003年。

傳統。神父、修女不但以校為家，黑夜白日獻身於輔仁；連他們所領的薪金也都回饋於教會。自台北輔仁復校以來，耶穌會士獻身於輔大的已有八十多位，其中半數以上已去世歸天。仍在繼續服務的，包括神學院在內，尚有三十多位。聖言會與聖神修女會曾于輔大服務的人數可能更多。他們中不少是德國籍的神父、修女。中國聖職單位兩位偉大的主教校長在二十八年內的貢獻，有目共睹。他倆的傳統特色是知人善佳、大膽授權。由於三單位的負責人都是終生獻身的神職人員，校長雖不住校也可信任。凡遇重大事件，神父、修女們都會向校長請示報告，一般日常事務無需校長操勞。

- 三、台北輔仁的前輩：四十年前應聘輔仁的資深教授大多已不在人間。當時開始任教的年輕教授現在也已七老八十，不少已經退休。回憶當年的師長都是衣冠整潔、道貌岸然。他們準時上課下課，認真批改作業；課本之外分發大批講義，提供補充教材，少用錄音帶、錄影帶來替代。考試認真，評分嚴格，絕不輕易放水。同學們大多繩規蹈矩，師生互動良好；年長教授常獲同學們慇懃扶助。導師善用時機傾聽同學心聲，歡迎同學建議，儘量回應同學需求。教室內氣氛溫馨，同學們言行得體，師長們內心深感欣喜。導師為同學們的操行評分，同學們並不評量老師。畢業生懷念母校，以輔仁為榮；學成歸國、成家立業，不忘為系友會捐獻，支援學弟學妹。近年來校方能由國內外校友，獲得巨額募款，可見當年的同學，現在的年長校友如何關懷母校，深愛母校以及母系的學弟學妹。
- 四、台北輔仁的員工：往日輔大的服務人員，包括本校畢業後留校擔任助教或秘書的青年男女頗多深愛母校；有的連續服務母校數十年而捨不得離去。所有服務人員及工讀生彼此間都能互助合作、相親相愛，與神父、修女們都變成親朋好友。校園內一片祥和氣氛值得留戀。輔仁的校園傳統，師生有敬有愛，全體服務人員好似一個大家庭。校區內哪裡有事，那裡就有人做；哪裡有人，那裡就有事做。一位神父擔任總務長，長達十八年之久。他至少每二週一次巡視校園死角；垃圾必須處理，水溝必須疏通。各棟大樓，夜間有人負責。電燈、冷氣機沒人使用時，立即有人關閉，週末假日不致造成大筆浪費。在濟時樓出現以前，輔仁的每棟校舍都是講究堅固耐用、美觀大方；不重視豪華的外貌，不浪費室內的空間。凡承包輔仁工程的建築師或營造商大多是天主教徒。他們儘量為輔仁節省費用，絕不浪費教會財物。

## 參、台北輔仁的演變

按進化論的觀點，宇宙萬物莫不隨時在變。在演變的過程中，有的是進化，有的是退化，也有的是突變。例如自然科學界經常在電視螢幕上呈現的：一隻鴨子忽然生了三隻腳，一頭小牛竟然出現了兩個頭。台北輔仁隨著時代巨輪的旋轉，也不斷演變。演變的過程中，有的確實在進步，也有的可能是退化甚至惡化。

一、台北輔仁的突變：首任三位校長領導管理的三十二年之間，輔仁的行政管理在體制上也曾有所改變；先是由完全的分治漸趨局部的整合。例如教務、訓導（現稱學務）、總務全部納入野聲樓綜合行政大樓。凡為全校同學共同使用的中美堂（大禮堂）、淨心堂（聖堂及心理輔導中心）、焯焯館（學生活動中心）、運動場所均由三創辦單位共同撥款興建。至於三單位按創校原定計劃與社會需要逐漸擴展的教學大樓、學生宿舍等雖經由校長核可，但一切費用及建築設計均由各單位代表通過主教團或修會會長同意，自行建造。三單位的神職人員平時都很節省，負責監督興建信義、和平兩大學生宿舍的外籍修士竟採用部份外國貨輪上卸下的門窗。

一九九六年，台北輔仁已有三十三歲。這次新校長已不再是教會的神職人員。他是虔誠的天主教徒，深獲董事會及教會神長的信賴。年輕力壯的校長新官上任，身懷雄心壯志，當然希望對台灣唯一的天主教大學有所貢獻。

上任不久，在幾位雄心勃勃的年輕教授支持下，發起輔仁體制的徹底改革，讓輔仁全校的人事、經濟由校長一人掌控。在不明瞭天主教大學的使命與特色、復校時三單位的苦辛以及三足鼎立相輔相成的原始協定，校務會議竟通過了全校整合的決議。三單位留下的積蓄約有台幣三十多億。

二、計劃的失敗與成功：一九九九年，台北輔仁編印「慶祝輔仁創校七十週年紀念特刊」，<sup>7</sup>當時的校長在「未來展望」的標題下，刊出下面的一段：

為了培育值得依賴、能力過人、為人誠懇的學生，學校積極籌設第二校區，並在系所結構方面，力求周全完備，擴充成十二個學院的規模：在未來數年內預定陸續成立：體育學院、教育學院、傳播學

<sup>7</sup> 北京輔仁創於一九二五年，本年二〇〇五故慶祝創校 80 週年，一九九九年為何大事慶祝創校 70 週年？

院；設立宗教學院、國際學院等。<sup>8</sup>

七年過去了，校長已換了兩任。台北輔仁還在原地踏步，不知第二校區現在哪裡。上面列出的五個學院，一個也沒有出現。台北輔仁要擴展到十二個學院，不知何年何月才能實現？值得令人欣慰的倒是首任校長于斌的願望：輔仁要辦到十個學院。目前輔大按昔日三個創校單位，恰巧各有三個學院。二〇〇三年，社會學系所、社工系所、經濟學系所、宗教學系所脫離法學院，獨立成為社會科學院。加上耶穌會的附設神學院，台北輔仁正好是十個學院。第四任校長上任時，輔大已有九個學院、四十一個學系、五個研究所。最近三任校長期間，輔仁研究所增加了三十多個。這是在學術機構方面最大的改變。為應因教育的改革以及社會的需要，輔大在這方面的進步可算是近年來的一大貢獻。

三、輔仁人事的更替：第一、第二任校長兩位主政二十八年，三、四、五任校長總加起來才十二年。往年一位總務長可延續十八年，近年來總務長及總務處的人事，幾乎經常有所調動。往年的校長能因事、因病，一兩個月不到學校辦公，校務、教務、學務、總務各有主管負責。大小事務無需層層簽呈開會討論，在本崗位上各級主管獲得充份授權，隨時處理問題、解決問題；文書工作減少，處理時程快速。往年的董事們信任校長、尊重校長甚至順從校長，現今的董事會似乎在指揮校長、監督校長、評鑑校長。台北輔仁因教育部核設醫學院的要求，獲衛生署設置醫院的許可，台北縣政府已核發建築執照，經由羅馬派樞機主持動土典禮，建築師已領取一千二百萬設計費，辛苦籌劃五年的附設醫院竟於施工之前胎死腹中。這是輔仁突變之後的一齣悲劇。事後，還要退回恩人已經捐贈的兩億四千萬元及另一恩公捐贈的五甲土地。

近年來，董事會大幅改組，增聘專家、增設駐校董事，另分業務小組，可見董事們的用心良苦。

行政體制改變以來，副校長多了三位，增設的單位愈多，很自然地人員也大幅增加，開會的機會特多。午餐時間、午休權利也為會議剝奪。為了區區瑣事數十位博士爭論不休，難怪部份與會人士戲稱：現時代就是開會的時代。行政主管習慣把公文帶回家去處理，批閱公文甚至拖到習翌日凌晨，不知後現代的人們是否認為這就是革新？這就是進步？

<sup>8</sup> 王初慶、林立樹撰述，〈未來展望〉，《輔緣》（台北：輔大出版社，一九九九年），頁一九二。

四、輔仁氣氛的轉變：自從神職人員由領導主管降為邊緣人物以來，輔仁的行事作風不知不覺地逐漸演化。比較明顯的是：輔仁開始重視包裝或說化妝，注意外在的美及媒體的宣傳。講的比做的更加響亮，寫的比實際表現的更加漂亮。中美堂房頂上每一個屋楞裝上一盞探照燈，整夜去照亮黑暗的天空是一個實例。

校園、校舍加上各式的燈光彩圖，的確比往日更加漂亮；部份校園的花草每隔數月更換一批，當然顯得新鮮可愛，但輔仁的開支自然也相對提升。

中美堂前砍下了大樹，擴展了廣場，舖上精心設計的圖案為校園增添了美感，可惜磁磚脆弱、工程粗糙，現今彩色磁磚成了碎塊，孔隙間冒出了雜草。

輔仁草創時期的確是萼路藍縷，但經三十多年的經營，校園早已是碧草如茵、樹木成林。神職人員不善於裝飾，但更重視持久耐用。校園的確需要綠化，但整齊清潔更值得注意。附近明志科技大學的校園裡，琪花瑤草到處可見，但有專人管理。輔大校園全部外包，水管漏水處聽讓花草淹死枯槁；清掃樹葉帶走了泥巴，校園裡許多處的草皮已變了沙地。中央路兩旁的人行道將逐漸被灰塵所掩蓋；出入坐轎車的人平時碰不到灰塵，祇有走路的人才會注意。校園裡明顯地出現了：有的事沒有人做，有的人沒有事做。辦公室內的員工面對電腦看來都很忙碌，事實上不少人正在電腦裡與世界接軌，玩電動遊戲；士氣卻非常低迷。

五、輔仁學生的權益：天主教大學的教育常以學生為中心。在傳道、授業、解惑的同時，特別重視學生的生活紀律以及他們的權益。近年來，校區內除了早有的幾家大型餐廳以外，增加了不少商店；有的明顯地傷害了大學的門面，有的利用原來的車庫改建。速食店、咖啡廳、糕餅店、自動販賣機大多就設在教室的旁邊。名義上是為了學生方便，事實上也是為了收租金的錢。當然，這是為學校有利，但破壞了大學的名譽，也傷害了同學們的學習風氣，助長了同學們上課時又吃又喝的習氣。

明志科技大學內，除了公共的大廚房、大餐廳以外，只有一家郵局而看不到商店。輔大校區內商店林立。說得好聽，這是考慮到學生方便，其實是讓青年學生掏空了口袋裡的錢。

台北輔仁前第三任校長在「輔仁在台復校四十週年慶」的機會上，撰文二十八頁；談到輔仁當前的危機，引用了工友的話說：「輔

大已經不像天主教大學了」。<sup>9</sup>緊接著，又引用當年 BBS 網站同學們的長篇大論，有關社團合併的怨聲。同學們指出校方的粗暴，漠視學生的權益。<sup>10</sup>同學們的呼聲，為今天的行政當局，還有參考的價值。

輔大整合之前，分屬三單位的校區，花草樹木、水管電器各有專人負責；現今輔仁的門面、行政中心的周圍相當美麗，但多處側門及後半校園，亂草及垃圾沒人處理。進修成長學院將灰色的水泥道路畫上了彩色圖案，明顯地錦上添花，令人刺眼；而側門外輔大同學每天停放三、四百輛機車的空間，近年來未見有人清理。每年靠颱風來襲沖走了部份垃圾，現有十幾公尺長的水泥地面已經龜裂壓成碎塊、水溝蓋因而鬆動；輔大行政當局未見有人重視。以上僅是一、二實例，藉以證明輔仁還有人能看到人家看不到的，說別人所不便說的。這也正好實踐輔仁校訓的第一個字「真」。

#### 肆、瞻望未來

台北輔仁今後要將如何發展？是增設更多的學院、學系嗎，或再開闢另一個校區、招收更多的學生？按近年來的社會變化：一、全台灣大學的數字在最近十多年內，由五十多所增加到一百六十多所，包括不少學院。二、台灣中、小學的人數近年來不在增加反而減少。三、爭取赴歐美留學的大學生、研究生每年增加。四、大陸的重點大學發展迅速，逐年吸收更多的台灣學生。五、台灣的工商鉅子往大陸投資發展的人數愈來愈多。在這現實的社會環境中，台灣大學生的來源越來越少。目前某些大學學院及系所已招不滿學生。前面提過，二、三十年之前的大學聯招僅錄取考生中的三分之一，現今的錄取率是百分之七十以上。大學生的素質明顯地鬆降。事實上，不少考生智商在一百以下也升入學大學。這現象祇有授課教授在批閱作業、評鑑學生成績時才會發覺。大學不在乎校園之大、學生之多，而更在教授教學與研究的認真以及學生素質的提升。

一、大事擴展的隱憂：近年來，台北輔仁研究所的數字增加了五倍、六倍，新聘的博士教師大幅增加；但各研究所的教授名額未見大幅提昇，部份研究所掛著虛位的教授，而任教的大多是助理教授還有某些講師。台北輔仁的校區不算大，比起北京輔仁已不算小。在生源逐漸下降的情況下，硬體建設是否還有擴增的必要，基礎科學的研究所是否對輔仁的名望有很大的幫助？假如五年十年之後，輔大招生不足；學生人

<sup>9</sup> 李震，《天主教輔仁大學的精神傳統》，頁 25。

<sup>10</sup> 同上，頁 27。

數由兩萬五千降至一萬五千，輔大的人事支出恐將難於負荷。二十年後，現任的教授團體平均年齡將近花甲，退休金能否保障值得注意。大學重質不重量，歐、美許大學歷時八十年、一百年很少有重大的改變，但在學術界的聲望卻常高高在上。

輔仁在台復校已快四十三年（一九六三至二〇〇六）。在這段時間裡，輔仁已逐漸成長如一棵大樹，掉落一些枝葉無關緊要。多年前，急迫催促輔仁整合的重要人物，大多已捨棄輔仁遠走高飛；輔仁並沒有開闢第二校區，也沒有創建十二個學院；輔仁依舊是輔仁。輔仁的校訓並未改變，天主教大學的精神繼續存在，輔仁的教育目標與福傳使命毫不動搖。

二、樂觀的建議：隨著大時代的轉變、社會風氣的轉移，願意終生獻身教會的人士越來越少；未來的時日裡輔仁的教職不可能有更多的神父、修女。輔仁體制的突變是禍是福將由歷史來驗證。值得慶幸的是輔仁自己培育的校友中已人才輩出。今天的同學四十年前並不存在。今天的校長便是四十年前的同學。四十年間生活在輔大的校園裡，幾乎每天作神職人員的同工伴侶。輔大的真、善、美、聖，為校長並不陌生。自小受過教會薰陶的哲學家深明人生的真諦，絕不致像某些野心的政治家們貪圖一己之利而迷失方向。任何團體的領袖，其主要功能有二：一是提高工作效率，二是促進良好的人際關係。服務信仰、促進正義是現時代天主教的崇高目標。輔仁的領袖們祇要以耶穌基督的眼光看事，以耶穌基督的耳朵聽話，應不致發生偏差。耶穌基督曾說：我來是為人服務而不是受人服侍。輔仁天主教大學的師長們都該懷有為青年男女服務的精神。

為維持古老的傳統與良好的學風，人生哲學一門是台北輔仁自創校以來所規定的必修課程。四十多年來未曾鬆懈。輔仁改制以來，神、哲學院的教授們特別在每一學院、學系推廣專業倫理，這為輔大師生在人生的旅途上多了一盞明燈。隨著經濟的發達、社會的繁榮，台灣青年傾向於自我中心、貪圖吃喝玩樂，輔大教育課程特別推介「服務學習」，培養同學們跳出自我、關懷他人。為宏揚輔仁天主教的福音精神，新校長上任以來特別邀請一級主管，每週一小時研讀聖經，且聘聖經學家從旁指導。校長的特別措施正證明他心懷大志用心良苦。台北輔仁四十多年來堅持信仰自由，但由研讀聖經學者專家們不難發現，原來科學的真理之外還有啟示的、超自然的真理。歐、美的天主教大學，神職的教授人數也在快速減少，但其他的教職員工不少是天主教徒。台北輔仁為教會接納為天主教大學，教職員工中信徒的比率

不到十分之一。就讀輔仁的學生中，天主教的信徒不到百分之一。可見台北輔仁要保持輔仁傳統、永延輔仁學風實在是任重道遠。不過，無論神職人員如何短缺，校牧與宗教輔導絕不會取消。使命與特色的副校長大概是一位神父或修女。所以懷有信仰的校長、深信全能天主的照顧，不論遭遇任何驚濤駭浪，祇需注視救主基督，大海也會立即風平浪靜。自第三任校長接掌以來，台北輔仁開始與世界接軌，與五大洲的高等學府結拜姊妹。最難能可貴的是與北京輔仁相互擁抱、重修舊好。希望北京輔仁也能奔向真、善、美、聖的光明前程。

本文屬應邀撰寫而非自由投稿，全文似乎並非學術研討而更像實務檢討；不妥之處，敬請指教。

## 參考資料

- 朱秉欣，〈天主教為什麼辦大學？〉，《益世評論》，2004年。
- 朱秉欣，〈北京與台北輔大的傳承〉，《益世評論》，2004年。
- 朱秉欣，〈耶穌會與輔仁大學〉，《教友生活周刊》，第五版，2003年。
- 朱秉欣，〈輔大兩位偉大的校長〉，《益世評論》，2003年。
- 朱秉欣，〈德高望重的袁廷棟院長〉，《益世評論》，2003年。
- 李震，《天主教輔仁大學的精神傳統》，2001年。
- 阮仁澤、高振農主編，《上海宗教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
- 徐乃乾主編，《北京輔仁大學校史（1925—1952）》，北京：中國社會出版社，2005年。
- 張春申，《于斌樞機與輔仁大學——教育理念的泉源與大學使命的實踐》，2001年。
- 習德賢主編，《輔緣——輔仁大學70週年校慶紀念特刊》，台北：輔仁大學出版社，1999年。
- 陳福濱主編，《于斌樞機教育理念與天主教大學使命》「輔仁在台復校四十週年慶」特刊，台北：輔仁大學出版社，2001年。



## 龔士榮神父所參與的輔仁大學——輔大易長事件

陳方中\*

### 摘要

自輔仁大學在台復校之初，迄二〇〇二年龔士榮神父去世為止，一直都是輔仁大學的一員。但若講到深度的參與，則主要是在于斌樞機擔任校長的時候，當時他擔任主任秘書的工作。在中國主教團、耶穌會及聖言會所共同組成的行政團隊中，龔神父是中國主教團一方的重要幕僚，在于斌長期為國家及教會奔走的情況下，龔神父的重要性不言可喻。

當時輔仁大學最主要的問題為其組織架構，本文係從龔神父的角度，看這些問題的來源及發展形式，並試圖從中理出龔神父認為最合理的形式為何。

關鍵詞：輔仁大學、于斌、龔士榮、費濟時、蔣百鍊

---

\* 輔仁大學歷史學系副教授。

## 前言

### 一、龔士榮神父簡介

龔士榮神父，江蘇無錫人，生於民國元年一月十二日。父廷爵公，母周氏，龔係家中長子。民國十年其父去世，母周氏此後撫養龔士榮在內二子一女之責。龔士榮母親信仰虔誠，受其影響，十四歲時乃有修道之念，同年入上海徐滙中學，民國十七年入江南代牧區修道院，民國十九年其弟士福突得病去世，但其母仍鼓勵繼續修道。<sup>1</sup>民國二十五年南京代牧區成立，無錫屬之，故龔士榮乃歸首任南京代牧主教于斌管轄。民國二十八年，龔士榮晉鐸，奉派擔任江陰后塍副本堂，一年後入北平司鐸書院，修習三年後轉入輔仁大學歷史系三年級，迄民國三十四年畢業。在司鐸書院念書時，主持司鐸書院的第二任駐華宗座代表蔡寧（Mario Zanin）總主教，對其贊賞有加。進入輔大歷史系後，輔大校長陳垣亦對其極為賞識，<sup>2</sup>此皆因龔士榮認真踏實，學問猛進之故。

龔士榮返回南京教區後，民國三十五年至三十七年奉派擔任無錫原道中學校長。在民國三十五年十月，陳垣來南京參加中央研究院會議，得知龔士榮在教區內從事行政工作，頗表惋惜。<sup>3</sup>于斌不應不知道龔士榮可做學問，龔士榮自己或也有意朝教會學者之途邁進，但南京教區人力不足，龔士榮的沈穩風度，條理分明的思考，也是教區行政不可多得的人才。

民國三十七年三、四月間，龔士榮被調往南京石鼓路主教座堂任總本堂。當時中央圖書館想在教會地基上興建，時任館長的蔣復璁曾為和教區交換土地事，向法院興訟。當時擔任教會代表的龔士榮還為此與蔣復璁對簿公堂。沒有人會料到民國四十年十月，蔣復璁在台北由龔士榮付洗成為教友。<sup>4</sup>這也是日後龔士榮津津樂道的事。

民國三十八年四月下旬，南京為中共軍隊佔領，局勢緊張之際，于斌發電報命龔士榮帶南京教區年輕神職及修士南下，所乘貨輪原本要赴廣州，但抵基隆後即不再前進，於是龔士榮率眾神父修士登岸。龔士榮自己也未料到，民國三十八年七月，教廷竟任命他為上海主教，其時他在台灣

<sup>1</sup> 龔士榮，《另一個窮寡婦——先母逝世十周年紀念》，頁 9-10。（作者自印）

<sup>2</sup> 邵台新訪問，《龔士榮神父訪問紀錄》（台北：輔仁大學出版社，民國八十九年十月初版），頁 54。

<sup>3</sup> 黃克武，〈訪問龔士榮先生〉，《蔣復璁口述回憶錄》（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00年5月出版），頁 142。

<sup>4</sup> 龔士榮神父口述。

正為安排南京教區旅台神職忙得不可開交，事後訪談時，龔士榮並未透露他當時的內心掙扎，只淡淡表示他已經在台灣，不能再回上海。無論如何，經過于斌、羅光等人的協助，教廷在民國三十八年十二月同意龔士榮不必擔任上海主教，但此事多少也引起一些教會人士對龔士榮的誤解。<sup>5</sup>

龔士榮抵台未久，經英千里之介紹，得在台大教授法文，同時配有宿舍一間。兩年後，其母偷渡抵港，乃接其母赴台居住，其後二十八年龔士榮一直照顧其母起居。這段時間于斌總主教奉教宗庇護十二世命令幽居美國，龔士榮與之接觸較少，同時必須自謀生計。當時南京教區旅台神職，方豪與龔士榮皆在台大任教，毛振翔則為赴美工作事，與教廷駐華公使黎培理鬧得不可開交，或在這種氣氛下，龔士榮對於于斌有疏遠之感，<sup>6</sup>不過這應該只是一時的情形。這段期間，不少逃難來台的知識份子對天主教教義有興趣，<sup>7</sup>龔士榮除教學外亦忙於講道，從其受洗者為數不少。民國四十五年龔士榮到北投天主堂服務，民國四十六年至四十八年還擔任台中靜宜英專校長，生活的忙碌可想而知。

民國四十七年底庇護十二世去世，新任教宗若望二十三世在民國四十八年任命于斌為在台復校的輔大校長。為復校相關事宜，輔仁大學復校籌備處在民國四十九年十二月十八日正式成立，由牛若望擔任這個籌備處的主任，龔士榮則任副主任，<sup>8</sup>這兩位神父都是昔日于斌在南京教區倚重的左右手。從此之後，龔士榮的生命重心即轉向輔仁大學。他在于斌任校長時期，一直擔任主任秘書工作，大致上亦兼任董事會秘書。于斌校長事業眾多，活動繁忙，在輔仁大學中國神職班、聖言會、耶穌會的共治體制中，龔士榮經常代表于斌發言，而他當然也捲入了民國五十九年三單位間最嚴重的衝突事件——「輔大易長案」。用輔大易長案這個稱呼，是因為在外交部檔案中有此一卷，原來輔大換校長不只是教育問題，還成了外交問題。

在民國六十七年于斌樞機主教辭去輔大校長後，龔士榮即逐漸退出輔仁大學行政工作，但在民國八十三年以前，他仍擔任董事會秘書，蓋其經驗及智慧很難找到替代者。同時又擔任校史室主任，他努力蒐集輔仁創校、復校前後相關資料，編輯出版了一本相當翔實的《輔大五十季》。在他長時期與于斌相處的過程中，因感受他這位長上人格之偉大。于斌雖不留資料，龔士榮則秉其歷史素養及行政經驗努力為其從美、歐、港、台蒐集資料。數千份的文件、信件、相片、記事本，是日後編輯于斌樞機畫傳

<sup>5</sup> 龔士榮不一定是不願返回大陸的，原因之一是他事母至孝，而他母親當時寡居於無錫。

<sup>6</sup> 張體謙口述。張體謙神父此時在台北教區，後離開神父職。

<sup>7</sup> 其中自然有些動機不一定純正的，龔神父當然瞭解，但他認為應勸化他們，他們的動機可以再慢慢改變。這是某次與龔神父談話時他的說法。

<sup>8</sup> 〈輔仁大學復校籌備處成立誌慶〉手抄稿。

及傳記的最重要素材。

## 二、本文所使用的材料

民國八十九年十月左右，在撰寫《于斌樞機傳》的過程中，一日龔神父慎重帶來一個夾子，裏面裝有二、三十份函件及書信，此即民國五十九年于斌首次辭職時的相關文件，他要我看看這些資料，並據此撰寫。當時校史室正巧亦獲得了聖言會提供的當年相關資料，校史室吳瑞珠主任乃將此部份資料亦交給我參考。同時我亦在與此事有關人士的傳記中搜尋資料，在羅光總主教的《牧廬文集》中看到〈輔大改組日記〉。比對這三個不同來源的資料，寫成了《于斌樞機傳》中的〈辭職風波〉一節。當時龔士榮看了文稿後大為驚異，詢問資料從何而來，但未改一字。

民國九十二年九、十月間，撰寫《中梵外交關係史》時，以先前〈辭職風波〉之內容為底，再加上了中華民國外交部開放的檔案——「輔大易長卷」，撰寫成〈輔仁大學問題〉一節。其時龔士榮已去世一年，此前輔仁大學校史室已將其珍藏之資料近三十匣攜回保存。

民國九十三年八月至九十四年七月間，校史室開始整理龔士榮資料，其中一匣即為民國五十九年易長風波相關文件，但其中份數較之前撰寫《于斌樞機傳》時為多；另有一份龔士榮事後筆錄的〈輔大改組日記〉，龔士榮應有所本，但在整輯其遺物時並未發現。另有部份相關文件，零散夾雜在其他各匣中。

本文即是根據以上各種資料，將龔士榮最關心的一次事件，做更為完整的描述。

## 壹、 輔大易長案之背景

### 一、輔大組織型態

在台復校的輔仁大學是由不屬修會的中國神職、聖言會及耶穌會共同組成。這在教會大學而言並非常態，通常教會大學常由單一修會或教區主辦，由主辦單位決定辦學方針及相關發展措施。在教會大學中或有不屬主辦單位之神職，但通常只是因其專長，在此學校服務而已。在北平的輔仁大學是由聖言會主辦，而耶穌會則在天津辦有工商學院，在上海辦有震旦大學；不過輔仁大學創立之初，即以注重中國文化為其特色，而要在台復校，于斌在政府高層的關係也很重要。基於這樣的關係，在輔大創辦之初，

教廷即指示這三個單位合作共同復校。<sup>9</sup>

開始這樣的合作關係時，兩修會原本只想名義上屬輔仁大學，但以分校形式，在南部覓地自行辦學。不過找地一事一直不順利，於是在教廷駐華公使高理耀（Joseph Caprio）的建議下，兩修會在民國五十年底同意與中國神職在同一校園內辦學，他們提出了一份共同備忘錄：「兩個團體同意在唯一相同的校園內建設他們的學院，文學院（除了外語系）交由中國教區神職經營。...在如此的情形中，他們應該為校園、建築及立即的公共建物負擔三分之一的費用。」<sup>10</sup>「共同的建物包括：大學教堂、大禮堂、圖書館、體育館、場、水電設施。」<sup>11</sup>「兩個修會是其個別基金的管理者，他們會向董事會提出財政報告以符合教育部法規。」<sup>10</sup>這個備忘錄為中國神職方面接受，在此基礎上，合作與分治成了輔大復校的原則。

輔仁大學這種三單位合作又分治的情況是複雜而微妙的，彼此間的關係和界線經常很難界定清楚。例如：既然財務獨立，有必要將每年各單位預算送董事會審核嗎？<sup>11</sup>又例如：校長辦公室的錢如何支付？或是宿舍的分配使用方式？類似這些財務和人事上如何分治的問題，從復校之初就不斷造成兩修會與中國神職間的磨擦，經常兩修會意見較為一致，而與中國神職方面意見不同。

財務統編由董事會報部，不觸及各單位權利，是比較容易協商取得共識的。當時最為人詬病者是三單位自有其教務、訓導、總務處，所謂教務長、訓導長及總務長之權責，根本不及於各單位。民國五十三年以後這種爭執即愈益嚴重，不但在董事會中討論此類問題，也在學校的行政會議中討論。于斌認為可將各單位所轄的三個處改為三個組，即可解決問題。<sup>12</sup>不過兩修會並未完全同意其做法，因此民國五十四年六月九日，又為此召開會議，于斌要求大家分工合作，「以處對內，以三長對外」，各單位各處設召集人，但「三召集人非三長」。<sup>13</sup>

在此紛擾時刻，教育部又因家長檢舉輔大「權責不統一，組織不健全」要求輔大「詳為申復，並檢送該校組織系統表」一併報部。<sup>14</sup>因為這所謂的家長投書，民國五十四年八月十四日，于斌再與兩單位的院務長費主教

<sup>9</sup> 〈龔士榮神父訪談記錄〉。

<sup>10</sup> *Memorandum Concerning Fu-Jen University, Submitted by the Society of Jesus and the Society of the Divine Word to Sacred Congregation for the Propagation of the Faith, 1961.*

<sup>11</sup> *Minutes of the 10th Meeting of the Board of Trustees of Ju Jen Catholic University, September 2, 1964.*

<sup>12</sup> 于斌一九六四年記事本，五月七日。

<sup>13</sup> 于斌一九六五年記事本，六月九日。

<sup>14</sup> 〈教育部致輔大令〉，民國五十四年七月二十四日發，這個所謂的家長投書，引用了《輔仁》第四期蔣百鍊的報告，看來是校內人士發動的。

及蔣神父談三單位問題。在于斌記事本上寫他與「蔣、費談話，講高度自治之意義與界限。」龔士榮解釋這段話說，意即人與錢可以自治，但在學制上必須統一，並且不與政府法律相違背。<sup>15</sup>此次風波在民國五十四年十月，輔大向教育部呈報組織系統表後，暫時結案。

類似的檢舉函在民國五十七年又出現，但這次教育部的口氣較為和緩，只是要求輔大「查照參考」。<sup>16</sup>無論如何，在教育部官員心目中，有關輔大組織型態已經是一個老問題，遊走於合法不合法的灰色地帶，其中拿捏分寸就見人見智了。

在此同時，有關院務長的法律地位問題，一直是費濟時及蔣百鍊兩人與中國神職，主要也就是與龔士榮間的爭論。龔士榮的〈輔大改組日記〉中記有民國五十七年一月十一日他與費濟時的談話記錄。費濟時認為其實中華民國教育法規是有彈性的，但輔大校方在處理院務長問題時並不積極，他直指龔士榮應該負責。他說：「……校長答應，部長答應，司長答應，而就是我們中間有人反對。」且說：「法禁校董任校長，而于校長是由校董兼。你是台大專任，而可來此任秘書，還是主任秘書，為什麼我們不能使院務長合法化？」龔士榮稱這是個人未按法律，但要院務長合法，則是制度問題，牽涉到大學法，必須要由立法院修法。費濟時仍責怪龔士榮不積極向政府請託，繼又稱要請耶穌會總會長與教廷傳信部商議，龔士榮則稱此案已送教育部，「待教育部送立法院通過後，即可成為定案；故請現時先以院長名義，後改為副校長。」龔士榮稱費濟時生氣的說：「都是你在從中作梗，你們可以不守法！」龔士榮也生氣的回答：「我如在美國，應不應守美國法律，你們到中國來，不守中國的法律...非特不是好外僑，且是帝國主義！」龔士榮寫道：「費拍桌大怒：你罵我帝國主義！」龔士榮接著答：「是！你是帝國主義，今天只要我任主任秘書一天，我決不讓□□再有帝國主義的作風得逞，我尤應保護于樞機，他是一位愛國愛教者，我不能也不許人用任何名義讓他成為二毛子。」於是雙方不歡而散。

17

## 二、夜間部問題

費濟時給耶穌會總會的報告稱民國五十七年九月二十四日，于斌向他及蔣百鍊說將開辦夜間部；有關夜間部的管理方式，于斌說將由中國神職

<sup>15</sup> 〈龔士榮神父訪談記錄〉。

<sup>16</sup> 〈教育部致輔仁大學函〉，民國五十七年九月二十八日發。

<sup>17</sup> 龔士榮，〈輔大改組日記〉手抄稿。此段對話記在一頁記事本上，很明顯是事後補記，因于斌升樞機在民國五十八年。字跡潦草，部份無法辨認，此頁龔士榮加有標題：“Imperialism”。

自行運作管理；蔣費二人則認為應像日間部一樣，由三單位共同管理。于斌認為這不是當初議定的範圍，且他亦曾就夜間部籌設與蔣、費二人商議，但當時二人不願興辦，現亦不應再有意見。<sup>18</sup>因此他在民國五十八年二月，任命林棟為教務長以及夜間部籌備處主任。七月七日，林棟正式被任命為夜間部主任。<sup>19</sup>

林棟民國二十八年在美國讀書時與于斌結識，長期交往，于斌對他相當信任。這時林棟的身份是立法委員，就能力和資歷言，應該沒什麼問題。不過林棟當時涉入一件中央民意代表藉進口黃豆牟利的案件，雖然經調查後宣判無罪，但仍有不少人認為他有貪污嫌疑。而于斌在此時任用他，當然引起了不少批評。於是費濟時、蔣百鍊聯絡了兩修會的相關神父，共同署名寫了一封信給于斌，建議派一位神父來管理夜間部，以取代林棟的位置。于斌答覆他會請問教育部的意見，這種答覆使費濟時更為不滿，因為教育部怎會管夜間部主任是否為神父，他們只會看其資格是否符合。費濟時寫道：

總結一句話，我們覺得今天發生在夜間部的事情，明天也會發生在日間部。……公平地說過去任何分享的權力，已從我們手上流向一些僅僅向他效忠及負責的俗人。

而這並非外國人對抗中國人，亦非修會對抗中國神職。只是我們對現況憂慮，並對未來感到恐懼。聖言會的神父們比我們更傾向一個折衷方案，即在羅馬為樞機（按：于斌）找一個位置，從而使他離開輔大。<sup>20</sup>

在種種不愉快的氣氛中，設法使于斌下台已成了兩修會的共識。

### 三、導火線——蔣匪事件與教育部要求輔大改組

民國五十八年十一月二十六日，一位在輔大附設國語中心念書的美國籍學生史恩德，在下午一點四十五分，在外語學院教室的黑板下寫下「蔣匪」二字。因為有德語系四年級的學生走進來，並在看到後感到震驚，他隨即將該二字擦去。這些學生立即將此報告教官，教官向戒嚴時期的治安機關呈報後，有安全局的人來審訊這個學生，審訊完後，隨即釋回。

因為事情發生在外語學院，因此負責處理這件事的是聖言會的蔣百鍊。民國五十八年十二月十三日，校本部要求蔣百鍊慎重處理此事，並將

<sup>18</sup> 龔士榮口述。

<sup>19</sup> Eugene E. Fahy, *A Report on Jesuit Participation in Fu-Jen University*, September 14, 1969.

<sup>20</sup> Ibid.

處理經過報告校長室，蔣百鍊即召見史恩德。史恩德向蔣百鍊陳述他無意污蔑中華民國元首，只是學了「匪」字後，寫著好玩，他並在蔣百鍊前表示悔意。於是蔣百鍊將其從輕發落，仍讓他學習中文，但不准他繼續住在宿舍中。

教育部高教司司長周廣周注意及此，認為輔大出此問題是因組織體系不完善所致，乃以嚴厲命令要求輔大立即改善組織體系。<sup>21</sup>因此于斌在民國五十九年二月七日召開院務長會議，主要即在討論此事。蔣百鍊在會中指出教育部原不管此事，但有校內人士向教育部相關官員打小報告，才使得事情擴大。他還質疑他所做有關蔣匪事件的報告是否已轉達給教育部，他要求于斌向教育部表示于斌支持院務長制度。于斌則表示他從一開始就不完全贊成院務長制，以前政府不問，不表示准許，現既已要求改變組織型態，那就要去檢視輔大組織是否違背了教育法規。于斌還強硬的說若政府堅持，而輔大不願接受，那文學院就退出輔大，因文學院想完全合法。費濟時隨即打圓場，說政府要求不會那麼嚴格。于斌也轉趨緩和，認為費、蔣、龔等準備和教育部官員先磋商的辦法是對的，隨即散會。<sup>22</sup>

在史恩德事件發生後，總教官天天問校長室如何處理，校長室以無消息相告。未向總教官提供消息的就是龔士榮，他可能覺得提供的說法總教官不見得滿意，也可能不覺得有向總教官說明的必要。因此，可能在認為外籍的院務長袒護外籍學生，又不用向校長負責的情形下，有人向政府中的情治系統舉發輔大內部各種問題。在情治單位轉知的情況下，教育部在民國五十九年三月十日發出一道措辭強硬的命令給輔大董事會：

- 一、「據報（一）輔仁大學美籍聽講生史恩德乙名於去（五八）年十一月廿六日中午一點四十五分在該校外語大樓一〇四教室黑板上書寫『蔣匪』二字反動文字，雖由該校張總教官報請校方研究處理，該校校長室並曾書面通知理學院院長蔣百鍊神父促請注意糾正，而蔣院長則認為此事並不嚴重，遂予擱置不再追究。（二）輔大現設有三所學院除文學院（建築物外牆為紅色）由校長于斌直接領導外，理學院（建築物外牆為灰色）由蔣百鍊神父主持，另法商學院（建築物外牆為綠藍色）由美國方面出資興辦，各學院各自為政，均設有教務處及訓導單位，故校總部教務處與訓導處權責甚輕，而校長于斌亦不過問理學院與法學院內部業務。（三）該校現聘有外籍教授數十名，分隸十二個國籍，由於校方以崇高學術自由為口號，各外籍教授

<sup>21</sup> 此份公文未見，由龔士榮〈輔大改組日記〉一九七〇年二月七日所記得知。

<sup>22</sup> 龔士榮，〈輔大改組日記〉，一九七〇年二月七日。

授課時均可以自由發言，甚至討論我國國策批評我政府行政措施，形成我國教育界一種反常現象。(四)該校外籍聽講生不受訓導處約束，已成慣例，又該校引用大陸時代大學法，自行招收旁聽生，此類學生大都畢業於美國學校，由於我政府不承認其學歷，乃赴輔大旁聽，四年期滿後，由該校發給英文成績單即可向外國研究所申請入學與正式大學畢業生無異，此種情形，實有故意破壞我國學制之嫌。」等情。

- 二、關於該校美籍旁聽生史恩德於教室內書寫污辱我國元首之字樣校長室曾函知該校德籍理學院院長蔣百鍊糾正，竟不予追究一節，查外國學生污辱一國元首世界各國均所不許，為維護優良學風，希即予以嚴重處分，該德籍院長應一併嚴予糾正。
- 三、關於該校行政體制問題，查本部五十四年十一月廿三日台(54)高字第一八〇五二號令曾飭該校應遵照教育法令辦理，不得違背在案，茲該校仍於校長及教務、訓導、總務三長外，設有院務長，於該校法學院辦公室門上懸「院務長」字樣之名牌，各院亦復設有教務、訓導、總務各處，顯與法令牴觸，前因有人檢舉，迭以台(54)高字第一一三八〇號及台(57)高字第二二二四一號令飭該校知照改正，現仍故違，殊屬非是，該校應即遵照大學法及有關法令辦理，現設院務長及各學院中分設之教務、訓導、總務等處應立即撤銷，該校教務、訓導、總務三處應與校長合署辦公，由該校校長統一指揮，以專權貴，教授授課及訓導活動應遵守國家政策及政府法令，不得違背。再查該校為天主教會所創辦，其協助辦理學校之各修會，目的在以德智教育青年，不應各據一院，破壞我國學制及法令，應嚴予糾正責由該校長迅即商同董事會負責辦理，限本年五月底以前將處理情形具報，如遭遇困難，應報請本部經由外交途徑轉知教廷，請予糾正，以維我國法令之尊嚴。
- 四、至該校外籍教授批評我政府行政措施，校長應注意妥為疏導。
- 五、該校招收外籍聽講生一節今後應依照規定報請本部核辦，該校不得逕行招收。至招收旁聽生發給英文成績單一節應一併糾正並不承認其學資。<sup>23</sup>

<sup>23</sup> 教育部致輔仁大學董事會令，一九七〇年三月十日。此令中內容由檢舉函來，檢舉者可能係負責全校訓導工作人員，應與林棟無關。

## 貳、輔大易長的經過

### 一、兩修會的共同商議

教育部的命令發下後，似乎使得兩修會將在民國五十八年九月想法付諸實施的決心更為加強。費濟時三月二十二日給羅馬的耶穌會總會寫了一份報告，內容主要是以其觀點說明自民國五十八年九月以來有關輔大各種事情的經過。費濟時認為這些事情的幕後黑手是林棟，他最後的結論是：「看起來會使校長丟臉，但事情的結果會實現校長的最大願望，就是完全控制。」<sup>24</sup>為了避免被完全控制，那就必須使不適其職的于斌辭職。

使其辭職的做法為何，缺少直接資料佐證，只知道于斌在三月十六日請見教廷駐華大使艾可儀，記事本中僅載：「宗座大使談 Case of Uni.」。另外針對這次事件，費濟時也在其報告中建議，由兩修會總會長、教廷教育部長以及于斌在羅馬共同商議解決。<sup>25</sup>于斌在民國五十八年三月二十八日被教宗冊封為樞機主教，樞機主教在羅馬都有一所屬的聖堂，民國五十九年四月于斌將往羅馬接受這個聖堂，因此費濟時乃做此建議。

于斌於四月七日抵達羅馬，四月八日的記事本載：「往訪 Cinedoli，對契約允必要時取消，大公會後之重訂契約者甚多，況換部後另訂。」四月十三日，入覲教宗。談了香港主教徐誠斌任輔大代校長一事，記事本中載：「Hsu 牧事應由 P.F.（按：傳信部）及教部（教廷教育部）共商。」當日他心血來潮寫了「生日雜感」詩四首，第四首為：

難得今早謁聖座，頌我遐福誨諄諄；  
松柏梅竹歲寒友，風雨雞鳴振斯文。<sup>26</sup>

由上面這些敘述可以看出，很有可能兩修會總會長在于斌到羅馬之前，已商議好對輔大改組問題採取相同態度，然後將他們的決定告訴教廷傳信部及教育部。然後于斌在到達羅馬後，就由教廷教育部告知兩修會要重訂三方合作契約。兩修會也將更換校長的要求告訴教廷相關官員，這些官員轉達給教宗保祿六世。於是于斌謁見教宗時，教宗告以樞機位尊，校長位置太小不宜，應擔任董事長或所謂教廷監督的角色。教宗既有要求，于斌只能答應，然後和教宗建議可由香港主教徐誠斌接任輔大校長一職，但這只是初步的建議，因為尚未詢問過徐誠斌意見。對這一切于斌心

<sup>24</sup> Report of Eugene E. Fahy, March 22, 1970. 從各種文件研判，林棟應與此事無關。

<sup>25</sup> Ibid.

<sup>26</sup> 于斌一九七〇年記事本，四月前 Note 部分。

中當然有很多感觸，同時感覺似另有內幕，於是用松柏歲寒、風雨雞鳴描寫其處境及心境。

耶穌會總會與聖言會總會在羅馬的動作，其實是由在台北的費濟時和蔣百鍊所發動，他們當然也不應忘記和艾可儀大使聯絡，因為國務院和傳信部在接到兩修會總會長要求時，一定會徵詢教廷駐華大使意見。而艾可儀在這一連串的事件中，應該也比較支持蔣、費兩人，因為從教廷大使的觀感，很容易會感覺中華民國教育部干涉太多。

## 二、輔大改組

教育部在三月發出嚴格部令後，可以想見龔士榮「事緩則圓」的處理方式。但此次教育部不接受輔大的拖延，要求五月底前必須回覆。因為是重大事件，因此應該召開董事會。另外，也應該先與教育部官員先溝通。蔣夫人雖為輔大董事長，但她並不出席董事會，實質上董事會是由艾可儀大使任主席，因此為時間及議題，龔士榮都當先面見艾可儀商議。五月五日在會面時，艾可儀向龔士榮表示：

①原則上當服從國家法律。②我們係少數，不能為了輔大一校而要求政府修改法律。③為求合作，對其他單位（按：指耶穌會及聖言會）當有保障。④為此已去信羅馬請求指示。⑤對於三長應當有妥當安排，否則為私人友誼及其他理由而用人，則全校權力全在校長及三長手掌中，則談不到合作。⑥為此在人事上需犧牲人時，當犧牲，為了教會及大學的利益。⑦康寧……⑧董事會之召開，最好在羅馬有指示後再議。<sup>27</sup>

五月七日于斌見過艾可儀後，決定五月二十六日召開董事會。

龔士榮在五月十一日與費濟時商議，與教育部主管會談。費稱待董事會開過後再談。但不久耶穌會內有人告訴龔士榮，兩修會在五月十三日晚間，請教育部高教司周廣周司長吃飯。耶穌會方面有朱勵德、費濟時，聖言會方面有蔣百鍊、彭會長。周廣周表示史恩德事件及旁聽生證件問題都容易解決，但最嚴重的是組織問題，應該打成一片，蔣百鍊提出捐款混淆問題，費濟時提出以駐院常務董事名稱取代院務長，或副校長取代院務長，周廣周一一回答，基本上即要求按照中華民國學制，統一校內分立現象。<sup>28</sup>

<sup>27</sup> 龔士榮，〈輔大改組日記〉，一九七〇年五月五日。從第五、第六點看，艾可儀對輔大校務已有定見，而且與兩修會相近。第七點與輔大事無直接關係，第八點即是要求被犧牲者服從教廷指示。

<sup>28</sup> 同前，一九七〇年五月十四日。

五月中又有張總教官請求輔大增加軍訓教官人數的申請案。經院務長會議，一致議決因經費困難，無法增加教官人數。當時費濟時「問及總教官如何」，龔士榮回答：「a. 無論如何，這次不能請換。b. 我們當視情形再作討論，現在必須忍耐。」張總教官不滿，向林棟表示將退還訓導處業務。林棟問張總教官：「那麼生活管理組也退嗎？你的副訓導長也不做嗎？」張答：「這是國家法令！」林棟說：「所以你退不了。」<sup>29</sup>

學校改組問題，定於民國五十九年五月二十六日開董事會。在開會前，台北教區總主教羅光和耶穌會遠東省省會長朱勵德交換意見。然後朱勵德將他的想法告訴費濟時：

昨天羅光主教說教廷大使在董事會的態度很重要，因此我建議你和蔣百鍊在董事會召開前去看大使。1. 給他看你們的兩本陳情書。告訴他羅光主教的建議，如果這兩本陳情書不能被接受，你將建議在羅馬由兩個總會長召開高峰會。.....2. 應該由院務長(或常務董事)為中國教區神職(或俗人)的學院負責，因此羅光應是文學院的院務長。<sup>30</sup>

這個內容可看作是兩修會與羅光達成的默契。

五月二十六日董事會在主教團秘書處召開。教育部高教司周司長列席，桌上置有錄音機。會議開始，周司長致詞抨擊輔大組織，要求按照法令修改輔大組織法。于斌一一詢問董事們意見，據羅光回憶：

大家都客氣說當然接受教育部指示，一切按照大學法辦理。.....討論如何改革輔大組織法，周司長催促即日進行修改。董事們的意見不大一致，我乃提議以修改組織章程事交由校長及三位單位負責人辦理。全體投票贊成。」<sup>31</sup>

第二日于斌即往榮總住院檢查身體，在院中致函給主任秘書龔士榮

.....為集思廣益，面面俱到，請神父邀費、蔣二神父，林東木與遐民密商如何進行，將來校務由秘書主任、三長及會計長代予協商推進，既可群策群力，又可統一校務，如何希研究具體方案速報。<sup>32</sup>

所堪注意者，並未提到夜間部歸屬；顯見于斌認為已直屬校長管轄，

<sup>29</sup> 同前，日期不詳，由此可看出龔士榮對張總教官的做法也不滿。

<sup>30</sup> "Letter of Michael Chu to Fahy," Taipei, May 24, 1970.

<sup>31</sup> 羅光，〈輔大內部改組問題日記〉，《台北七年述往》，台北：學生書局，一九七九年十一月，頁一四八。

<sup>32</sup> 〈于斌致龔士榮函〉，一九七〇年五月二十八日。

此係不需討論之問題。另外提出由三長、主秘及會計長共商校務，似乎于斌的改組方案是由分治改為合議制，他則將權力下放給他們。

經由協商，五月三十日輔仁大學發函予教育部：

董事會出席董事全體一致無異議舉手通過決議案如下：

「本董事會接受教育部有關輔仁大學行政體制之命令並交于校長與有關單位執行之」

本校於接奉董事會之決議案後即決定

甲、取消院務長之設置

乙、取消各院分設之教務訓導總務各處……交由校長統一指揮

丙、下學年度起各分處合併於統一處辦公

隔日于斌到教廷大使館，與艾可儀有一段精采對話：

艾：不應邀請教育部代表列席。

于：教部有權，不請亦來，請□禮貌，且事前首先和你談過，你說可以，且未指導，不損自由發言權，僅備詢。

艾：不應將公事未經本人看過而送出，為何及早送出，羅馬訓令未到。

于：援引董事會命令，似不必；教部有期限；我們等羅馬很久了，且董事議決案係董事一致舉手通過。

艾：你不能干涉我的權利，我要保護教會。

于：我不侵犯你的權利，我僅□行董事會決議案；我不如此做，我錯。我的愛護和保衛教會不亞於你。

艾：你不能以樞機身分治校。

于：我以校長身份，且奉董事會命令行事，沒有錯誤。<sup>33</sup>

### 三、辭職

民國五十九年六月四日，艾可儀接到教廷教育部電報，於是召集于斌、羅光、郭若石、費濟時及蔣百鍊開會，上述各人皆為輔大董事會常務董事。艾可儀先告訴大家接獲電報，要求停止一切與中華民國教育部的接觸，當待書面指示後再進行處理。然後艾舊話重提，指責于斌未經其同意即將覆教育部函寄出，又稱三單位成立輔大的原則不能改。同時質疑于斌不尊重其傳信部代表身份。于斌回答傳信部代表亦當有教廷的特別委任狀，才能直接管理學校行政。蔣百鍊抱怨在學校高層有俗人，無法控制。

<sup>33</sup> 龔士榮，〈輔大改組日記〉。當時龔士榮不在場，故應是于斌轉述。

于斌則稱在梵蒂岡第二次大公會議中的決議是要與教友合作的，不能培養神職主義，更何況神父也有不可靠的。艾可儀堅持天主教大學的國際特性及背後的外交特色，故不同於其他私立大學。于斌則認為天主教大學不應要求在中國教育法規之外的特權，他反諷的說如能得到特權，「則中國教會有新境界」，「但注意後果，你當負全部責任。」羅光另開話題，稱兩修會應與主教團訂約。艾可儀則稱不必簽訂任何合約，因輔大是宗座大學。

此時艾可儀突然用強烈的語氣告訴于斌：「你是中國人也是天主教的總主教！你是天主教的樞機，抑國民黨的樞機？」于斌也憤怒的回答：「我是總主教也是中國人，我守法做好中國人，我也不違反信仰道德。我不守法是瀆職，我違反信仰道德是異端，我都不敢做。」于斌告訴龔士榮，當時心中氣憤想立刻離開，「後覺不必如此無修養」，又坐下繼續談話，龔士榮以附記的方式記下：

對此事，樞機十分難過，當晚十二點來電話，告訴我：「艾大使居然責問我是：天主教樞機抑國民黨樞機？我實在受不了！」余答：「請勿難過，請你少講話，這事我們是真正保護教會，最後一定勝利！因為我們是在正路上，正不怕邪！」<sup>34</sup>

民國五十九年六月八日，教廷傳信部發了一函給于斌，對於于斌推薦香港主教徐誠斌任輔大代校長一事，表示不可能達成，因為香港教區需要徐誠斌繼續領導；然後希望于斌在中國教區神職合資格的人中，任命一人為代校長。這個人選應和台灣的教務會議、輔大董事會及三單位的院務長協商。<sup>35</sup>

傳信部的信函應係與教育部信函同時寄出，六月二十二日教廷教育部函亦發出，二十五日晚艾可儀將此信交給于斌，當時于斌因腿部受細菌感染，住榮民總醫院。二十六日，于斌給龔士榮看教廷教育部訓令，龔士榮摘要如下：

#### A. 有關董事會部份

- a. 請蔣夫人不再擔任董事長而任名譽董事長。
- b. 請于樞機擔任董事長和 Grand Chancellor。
- c. 董事會的組織：由三單位各出三人，由主教團出二人，由三長（教、訓、總）加入，再加教友或社會一二名流。教廷大使不任董事，但每次開會必須邀請。
- d. 成立董事會秘書處，每三個月至少開會一次。

<sup>34</sup> 龔士榮，〈輔大改組日記〉。

<sup>35</sup> “Letter de Propaganda Fide au Paul Cardinal Yu-Pin,” 8 juin 1970.

## B. 有關校長部份

- a. 由于樞機指定一位主教擔任校長。
- b. 未經董事會同意，校長不得和任何校外機構簽訂合同。
- c. 俗人必須道德學問□□善表，來校任職。

結論是：「輔大當守國家法令，但輔大的聯邦制必須保持，深信必能獲致一妥協辦法以解決政府要求的 Organic Unity。」<sup>36</sup>

六月二十六晚龔士榮離開後，香港徐誠斌主教到醫院探望于斌，對於艾可儀做法亦表不滿。于斌在二十七日轉住耕莘醫院，六月二十八日，文、法、理學院的中國神父代表，到耕莘醫院看于斌，帶來全體中國神父簽名信，要求撤換林棟。于斌沒在會面時答應是否撤換林棟，但告訴中國神父們他將被撤換。中國神父們當晚將聽到消息轉告龔士榮，他說：「余聞之不勝驚訝。」因恐消息外洩，可能引發許多不必要的紛擾。<sup>37</sup>

六月二十九日晨，龔士榮到校，不久即有人詢問于斌辭職事，果然消息已外洩。當晚于斌將羅光找到耕莘醫院，

見面，于樞機就說收到艾大使的信，關於輔大改組事，信很長，內容最重要者有兩點：（一）改組董事會。（二）校長可請辭職。樞機頗憤慨。把艾大使的信交給我，囑我研究。他說：「辭校長一事，早已有心，而且也向教宗說過，這次決心辭職。艾大使請推薦繼任人，但繼任人應是主教。中國主教中可以任校長者只有兩人，就是你和香港徐主教。徐主教不願放棄香港，所以請你考慮是否可以出長輔大。」

我沒有表示意見，只說將好好考慮，于樞機對改組董事會，堅決反對。教廷要他任「最高監督」(Magnus Cancellarius)，這個職位等於董事長，他不敢奪蔣夫人的位。

于樞機又說：「艾大使信內，說到任用教友，須選人品高尚，信教虔誠的人。我任用了林委員，許多神父反對，但是在盜豆案中，他宣判無罪。一年內，他替輔大做了很多的事，別人辦不到的，他都能夠辦好。」

按照龔士榮敘述，徐誠斌和羅光在與于斌談話時，皆提及此種作法是帝國主義作風。七月二日郭若石和新竹的杜寶晉主教皆分別來見于斌，「亦不同意艾的函件。」不過七月七日，輔大中國神父們又派代表送來全體簽

<sup>36</sup> 龔士榮，〈輔大改組日記〉。訓令中稱教廷駐華大使不任董事，是對艾可儀作法的評價方式，而俗人問題主要是因林棟引起。

<sup>37</sup> 同前。

名信，內容是要求于斌辭職。于斌對此非常難過，他憤怒的和羅光說：「這是受外國神父的蠱惑。」<sup>38</sup>同時于斌被迫辭職之事亦漸漸傳開，有政府人士亦已聽到風聲，開始探聽消息可信度。

艾可儀原本不希望羅光接任輔大校長；于斌亦有意請新竹教區的主教杜寶晉任副校長，暫代其職。但于斌這樣的安排，傳信部方面並不接受，命艾可儀再詢羅光意見。<sup>39</sup>傳信部之所以有此堅持，很可能係在羅馬對於接長輔大人選，已與耶穌會及聖言會有所商議。於是七月十七日，羅光表態願意接受輔大校長。

七月十八日，于斌透過羅光，將他設想的輔大改組方案，交予艾可儀。七月二十五日，教廷以羅光代于斌的命令送達，艾可儀即邀于斌至使館相談。于斌記事本中載：「與 Nuncio Ap.（按：宗座大使）談兩小時，對校務交換意見。」<sup>40</sup>于斌說得含蓄，實則兩人話不投機；艾可儀出示教廷函件，以樞機位尊，不宜擔任大學校長，只宜任總監督或董事長。于斌則稱輔大正在改組，現在更換校長將予人不良印象。艾可儀認為教育部的要求只需應付，于斌應保持耶穌會與聖言會的既有權力。于斌則堅持無法請教育部收回成命。<sup>41</sup>

據龔士榮回憶，七月二十五日晚上十時半于斌打電話給他，告訴他早上與艾可儀談話，艾可儀先告知于斌，羅光已同意出任輔大校長，這是于斌首次聽到這種說法。以下龔士榮所記于斌與艾可儀對話：

于：我認為現在為時太早。

艾：你不想走？

于：因這事牽涉到政府改組，恐政府生誤會！

艾：你不愛教會？

于：（生氣）我愛教會不下於你，我不接受你這種說法。我已經告訴你，教廷有令我必服從，我僅怕政府誤會，對教會有不利。

艾：我想不會。今天政府需要教廷，為了南美和非洲等邦交。

于：不見得；南美等國因看美國顏色，不是看教廷。非洲需我們的農耕隊……千萬不能如此想。

艾：反正事已決定。如果你有意見，可寫來，提教廷參考。

于：改組方案想你已收到了，應早日討論。

<sup>38</sup> 羅光，〈輔大內部改組問題日記〉，《台北七年述往》，頁一五一。龔士榮在訪問中稱其拒簽，他認為這是耶穌會省會長透過耶穌會神父進行的，主要是藉助於神職人員普遍對林棟的不滿。

<sup>39</sup> 同前，頁一四八。

<sup>40</sup> 于斌一九七〇年記事本，七月二十五日。

<sup>41</sup> 綜合羅光，《台北七年述往》，頁一五四及龔士榮口述。

艾：這不是你的事了，你不用管。

于：新學年即開學，你當早召開董事會處理此事。

艾：我當合法的辦理。<sup>42</sup>

七月二十六日于斌致函艾可儀，稱願遵聖座意，立即無條件辭職，

只是有一個主觀的想法，就是任命新人選的時機。匆忙行事可能會引起教育部的誤會。不要忘了我們才收到要求更換運作組織的命令。……<sup>43</sup>

七月二十八日，記事本中載：「賈主教偕狄剛來談。」時賈彥文任董事會代理秘書，來談之事主要為辭職相關事宜。然後賈彥文即電告羅光，稱于斌願與羅光見面談話。羅光回憶稱：

晚，九點鐘許，于樞機來天母，坐談到十一點鐘。樞機願意立刻辭職，並願向蔣夫人和教育部疏通，免有誤會。對輔大內部，樞機說林委員已辭教務長職，龔士榮神父也辭秘書長職。林委員辭職，不必挽留，否則多添麻煩。龔神父雖辭職，必協助幾個月。教務長不宜任命神父，因在教育部辦事辦不通。海洋學院已不能辦，因教育部來函，說私立學校不能設分校，海洋學院雖只一院，然遠在高雄，形同分校，故不能設。樞機說這樣他可以把這件事放下，很適當地下台，鬆了一口氣，只是籌備人員花了高雄市所贈一百萬元台幣，若是高雄市政府因不設校而要追回，則只好將來由校方補還，校董會曾經通過籌備海洋學院的議案。再者，他又因康寧醫院購地事借用輔大四萬多元美金，現在只能還利息。為辭職，大使該辦兩件事：第一應有教宗准許辭職的電報。第二應召開董事會。于樞機請我轉告艾大使。

于樞機辭出後，時已夜深十一點餘，我仍舊向艾大使通電話，以于樞機所講的兩件事相告。大使答應立刻照辦並決定於七月三十一日召開董事會，以長途電話通知在外市縣的董事。

但另一方面，教育部在此時已風聞輔大校長改選事，他們的訊息指出于斌辭輔大校長，應與改組案有關。於是立刻邀請輔大董事會的常務董事在七月三十日開會。當時艾可儀以宗座大使身分任常務董事，於是也在受邀之列。艾可儀認為以其外交官身分，只和外交部發生關係，不願理會教育部。其他常務董事亦託詞不去，僅費濟時一人出席。七月三十一日，于

<sup>42</sup> 龔士榮，〈輔大改組日記〉。

<sup>43</sup> Letter de Paul Cardinal Yu-Pin à Mgr. Accogli, 26 juillet, 1970.

斌記事本中載：「輔大臨時董事會，改為談話會，教宗電報任予為輔大 Grand Chancellor，遂辭校長職。」<sup>44</sup>

羅光的記載中則有教育部對這整件事的反應：

上午，十點，輔大董事會在主教團秘書處舉行非正式會議，開會後，艾大使以教廷國務卿來電送與于樞機，樞機請我宣讀，電文云教宗接受于樞機辭輔仁大學校長職，稱揚于樞機十年來對輔大的貢獻，希望以後以最高監督名義仍協助校務。費濟時蒙席報告昨天午後在教育部談話的經過，因常務董事僅他一人出席。教育部長，次長和高教司長以艾大使未能到會甚表不滿。教育部長說明輔大應按教育法令改組，改組時不宜換校長。我乃起立在這種情形下我不接受出任校長。董事等都說請于樞機向教育部解釋。<sup>45</sup>

教育部此時決定將此事層級提升，在七月三十一日發函外交部，請外交部致電駐教廷大使陳之邁，請其轉告教廷，中華民國政府要求輔大進行改組，並不准予斌辭職。同時社會各界亦開始動員，以蔡培火為首的中央民意代表，發動慰留于斌。士林官邸也有話傳出，稱若于斌不任校長，蔣夫人亦將不任董事長。

陳之邁遵外交部令往洽教廷教育部官員，八月五日他報告說：「該部對各國天主教大學向來政策為令其依照各國教育法規辦理；……關於于樞機主教退讓事，對方主動提出，謂已獲解決，惟暫不對外發表。……」<sup>46</sup>在八月五日這一天，教廷教育部從台灣獲得之訊息是于斌已辭職，故稱已獲解決；而陳之邁則將此事定位為教會內部事務，不擬干涉。

不過八月六日這一天，事態有戲劇性的變化。由於社會反應不佳，以及教育部的壓力，再加上大部份主教對艾可儀作法都有意見，於是中國主教們決定支持于斌續任校長。在這一天召開的董事會中，以六票贊成，四票反對，一票棄權通過慰留于斌。兩名主教成世光、蔡文興去拜會于斌，表達慰留之意，于斌順水推舟接受了慰留。

陳之邁為此在八月十八日往見教廷教育部官員，他發回電報稱教育部官員如此回答：「(一) 輔大修訂組織規程，即將呈我教育部核備，以符我國體制，殊堪欣慰。(二) 校長人選前議係經教廷國務院呈准教宗決定，現輔大董事會既另作決議，教廷可將前議暫時擱置云云。」由於教宗同意

<sup>44</sup> 于斌記事本，一九七〇年七月三十日，改為談話會的原因是未邀教育部官員列席。

<sup>45</sup> 羅光，〈輔大內部改組問題日記〉，《台北七年述往》（台北：學生書局，一九七九年十一月）頁一五六。

<sup>46</sup> 〈駐教廷大使陳之邁致外交部電文〉，一九七〇年八月五日，《外交部檔案——輔大易長》。

于斌辭職的電報已經發出，因此教廷教育部接到于斌留任的消息後，以推遲于斌辭職的時間相應。<sup>47</sup>

#### 四、外交事件

艾可儀在八月二十四日致函于斌，通知他教廷教育部的決定。在函中他用冷淡的語氣和于斌說：「在您曾和董事會建議的日期前，您仍是輔大校長。」在同一封信中，艾可儀也不滿的說：「閣下曾說過這些情況是外國神職反對中國神職的陰謀，我們能這麼說嗎？」<sup>48</sup>

于斌於八月二十六日回信給艾可儀：

我不記得如你信中說的，曾向董事會提過一個離開的日期；在任何情況下，我已準備在董事會及教育部認為合適時，無論何時都可離開。不論我喜歡與否，現在我是在他們權下。從你在中國這些時間的經驗，你了解教會不能做對抗政府意願的事。說我曾講過有外國神職反對中國神職的陰謀，這完全是一種最低級的流言或是錯誤的耳語。這一定是一種誤會或誤解，你真的相信我會以教會樞機的身分說這種事嗎？<sup>49</sup>

艾可儀對于斌留任的發展非常不滿，他用非常強烈的態度，在八月中旬向教廷國務院力爭，仍然要求于斌辭職。他一定提出此前的想法，也就是中華民國在外交上需要教廷。他可能以去留相爭，在這麼激烈的抗議下，教廷副國務卿在八月二十七日緊急召見陳之邁：

教廷經過最高階層慎重考慮，決定請于樞機讓出輔大校長職務，改任 Chancellor，校長由羅光總主教擔任，于樞機當即表示接受，有案可稽，現聞我教育當局對此措置不表同意，輔大董事會復決議慰留，教廷深感詫異。教廷作此決定，純係為發展教務著想，以于樞機主持大政，而以日常行政交由年事較輕學識湛深之羅總主教負責，並非對于樞機過去處理校務或人有所不滿，教廷認為此事極端重要，Most Serious，故將其升高為我國與教廷兩國之間外交問題，教廷與我國邦交敦睦，過去對於我國國際地位之維護，一再越出通常範圍盡力協助，深盼對於兩國間友好關係，不致有不利影響，故請將教廷立場據實報告鈞長，望能從外交觀點謀致妥善調處方案；稍假時日固無不可，但實質則難變更云云。該副國務卿態度十分嚴

<sup>47</sup> 陳方中，《于斌樞機傳》（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2001年4月一版），頁二六一。

<sup>48</sup> *Letter of Apostolic Pro-Nuncio Accogli to Paul Cardinal Yu-Pin. August 24, 1970.*

<sup>49</sup> *Letter of Paul Cardinal Yu-Pin to Apostolic Pro-Nuncio Accogli. August 26, 1970.*

肅，強調教廷對此事最高度之關切……。<sup>50</sup>

這是一次非常罕見的外交談話，有可能是教廷國務院的確對輔大校長辭職一事有超乎尋常的反感，但另一種可能性是國務卿（不知是彭耐里或卡薩羅里中那一位），在接到艾可儀報告後，對中華民國大使做了不適當的談話。這兩位次卿都接任未久，國務卿又任其發揮，難免有盛氣凌人之可能。在談話中所謂「對台灣地位之維護，一再越出通常範圍盡力協助」，顯示出這位國務次卿對過去這十餘年，教廷對中華民國友好的作法，不盡以為然。然後語出威脅，希望中華民國政府慎重考慮，不要讓輔大校長辭職事，影響教廷在其他事上對中華民國的支持。並強調此係外交事務，要中華民國政府不可等閒視之。什麼事情會讓中華民國政府投鼠忌器，必須要慎重考慮的呢？答案很簡單，聯合國的中國會籍問題。對中華民國而言，聯合國會籍的重要性，當然超過輔大校長。

九月十二日蔣中正接見了于斌，談及許多問題，其中亦提到輔仁大學。蔣中正稱輔大已有規模，勿再萌退志。于斌則回答：「將慎重服務」。<sup>51</sup>這似乎是一種明確的表示，即使有某種程度的外交壓力，蔣中正仍不同意于斌被迫辭去輔大校長。

同時的外交磋商則在進行，輔大校長辭職事因為扯上了聯合國會籍問題，在外交部駐聯合國代表團任職的沈劍虹，為此寫了一份報告給外交部：

輔大校長一職教育部及中央方面仍有意支持于斌連任，職以該校易長業經教廷決定並經其副國務卿向陳大使提出交涉，為免影響雙方關係，似不宜多加干涉。爰擬就致陳大使電稿如下：「第一七六號電悉。（一）輔大組織規程已照我國法令修正，深堪欣慰。（二）私立大學校長之任免，依法應由各校董事會通過後報請教育部核備，輔大易長亦需照此辦理。于校長辭職既經該校董事會決議慰留，教育部亦唯有依法准予備案。（三）我對教廷以往熱忱相助，向甚欣慰，對輔大內部事務，向未加干涉，茲悉于樞機將於短期內前往教廷述職，當可就該校易長有關事項，面商解決。（四）該校擬設 Chancellor，我大學法無此規定，併希婉洽免設。」此稿亦曾酌採教育部意見，現正由鍾部長張秘書長寶樹協議中。……<sup>52</sup>

<sup>50</sup> 〈駐教廷大使陳之邁致外交部電文〉，一九七〇年八月二十八日發電，《外交部檔案——輔大易長》。

<sup>51</sup> 于斌一九七〇年記事本，九月十二日。

<sup>52</sup> 外交部致陳之邁電，即以此稿為完全內容。〈駐聯合國代表團沈劍虹擬致教廷大使陳之邁電稿〉，一九七〇年九月三十日，《外交部檔案——輔大易長》。

深諳撰寫公文之道的沈劍虹，表面上在他所擬稿件中是符合教育部要求的，但真正的重點則在第三點，他要陳之邁可奉外交部命令向教廷表明，政府「對輔大內部事務，向未加干涉。」而問題可待于斌到羅馬後再在教會內自行解決。懂得看公文的陳之邁也抓到了重點，於是再與教廷副國務卿接洽。<sup>53</sup>站在職業外交官的立場，沈劍虹及陳之邁當然都覺得聯合國問題是比輔大校長問題重要多了。

在這中華民國外交部與教廷國務院交涉的時刻，教廷突然在九月二十九日公佈艾可儀調駐厄瓜多大使，駐華繼任人選尚未發表。陳之邁稱：「此事多少與輔大事有關。」<sup>54</sup>這是一個從時間點上的巧合所作的合理推斷。駐華教廷大使已與台灣教會的領袖發生嚴重的摩擦，無論如何，是對所在地教會不利的事情。一位當時與艾可儀頗有往還的國籍神職，證實了艾可儀的離去，確實是與輔大校長辭職事有關。<sup>55</sup>艾可儀在離去之前，仍積極運作讓于斌的「暫緩離職」只能持續最短的時間，而這也是教廷國務院的立場。

一九七〇年九月二十九日，羅光也已在羅馬見教廷教育部長；九月三十日則往見駐教廷大使陳之邁，陳之邁向羅光表明，他不贊成中華民國教育部將此事提昇為外交層次，他認為這是「教會內部事務」。十月三日，羅光覲見教宗保祿六世，保祿六世仍向羅光表示他認為應由羅光繼任校長，但羅光則向保祿六世表達他願繼續擔任台北總主教。羅光並請保祿六世將此事在于斌述職時，與其商量。<sup>56</sup>

保祿六世既已瞭解羅光態度，乃由其決定改變教廷過往的立場。于斌在十月十七日覲見保祿六世，他在記事本中記載：

教宗表示對輔大事已完全明瞭，並告對予之成就非常敬佩，所發命令乃推崇之表示，亦為使大學因予之督導更入佳境，而樞機之健康亦為大家所掛慮，故校務繁雜似非所宜。此次處置似嫌操切，徐圖之可也。<sup>57</sup>

處置操切的人指是艾可儀，他已為這件事負責轉調他處；而「徐圖之」則成為一個真正的政策，既然羅光已表明不願接受，似乎在一段時間內，于

<sup>53</sup> 〈駐教廷大使陳之邁致外交部電文〉，一九七〇年。

<sup>54</sup> 〈駐教廷大使陳之邁致外交部電文〉，一九七〇年十月一日發電，《外交部檔案——輔大易長》。

<sup>55</sup> 龔士榮回憶，他在十月十五日參加了神父們為艾可儀辦的歡送茶會，艾可儀說他自己是奉命離職，因此應該不是自己請調。九月二十九日羅光已在羅馬，艾可儀被調職可能與教廷此時瞭解其在華作風有關。

<sup>56</sup> 羅光，〈輔大改組日記〉，《台北七年述往》，頁一六二。

<sup>57</sup> 于斌一九七〇年記事本，十月十七日。

斌留任是一個合理的情形，一段中梵外交間的插曲就此突然落幕。教宗推遲的命令直到一九七八年才終於下達，那已是八年後的事。

## 肆、龔士榮與輔大易長

### 一、兩種身份、三種思考的龔士榮

龔士榮身為輔大主任秘書，他是實際參與輔大校政的靈魂人物，他基本的思考是如何在現實中使輔大成長，因此歷史發展中的不愉快經驗，在此種身份的考量下，如果對輔大成長沒有實質助益，其實是沒有必要公諸於世的。他的修養也使他覺得不一定需要為自己辯解，世人對他有何誤會並不重要。或者他也常自我反省，是否自己確有過失。無論如何，往事已矣，在此種心情中，他也不必把過去的資料拿出來。

不過身為于斌的助手，別人對龔士榮如何誤解沒有關係，但不能誤解在他心目中，堪為聖者的于斌。在普遍的觀感中，常會認為于斌參與政治太多，與政治人物有太多關係。而在輔大易長的過程中，確實是政府干涉了輔大改組的進度及內容；于斌任校長與否，更釀成外交事件。因此身為于斌的助手，他有必要為于斌辯解，以避免因對過程不夠詳盡的詮釋，產生對于斌的誤解。

龔士榮的另一個身份是歷史學者，雖然他自北平輔大畢業後，並未實際從事歷史研究工作，但歷史學者求真求實的信念，在他平常的生活態度中已然展現。他對于斌資料鉅細靡遺的蒐集，是符合他所受歷史訓練的。而在他接受邵台新訪談時，津津樂道於輔大歷史系往事，都可看出歷史信念已在他身上生根。歷史學者的身份，是不容許龔士榮說假話，或是明知事情是如此發生而不承認的。而他歷史學者的身份，也讓他意識到自己的觀念或多或少會有主觀。

這兩種身份的三種思想會產生矛盾。第一種思想使他不願意將資料拿出來；第二種思想使他只願拿出有利於于斌的資料；第三種思想使他盡力保存了所有的資料，但他不願拿出自己記載的直接資料。但其實龔士榮所寫的〈輔大改組日記〉，有相當高的客觀性。而本文之所以能夠寫成，代表了龔士榮將歷史學者的身份優先看待，他處理的方式是：他準備這些資料，在他死後由其他歷史研究者進行研究。

### 二、愛國的龔士榮

他認為既然要在台灣辦學，教廷也好，外國傳教士也好，都必須遵守

中華民國政府的法規。這種愛國精神並非龔士榮所獨有，是這階段中國神職人員普遍具有的思想。愛國的另一面即為反對帝國主義，在龔士榮的〈輔大改組日記〉中，記有徐誠斌、郭若石、羅光、杜寶晉及成世光，在評論輔大易長時，皆曾表達過類似說法，而他本人也在與費濟時談話中，直指對方為帝國主義。這種愛國心是他在與兩修會領導者的相處時，不經意會表現的態度。

因這種愛國心，龔士榮認為應要求外籍傳教士與中國人平等，不可有任何特權。換句話說，他對所謂的特權特別敏感，基本上，他認為在輔大組織與政府教育法規相牴觸時，不應要求政府有任何讓步。反之他視兩修會堅持在一校之中行使獨立權利為特權，不論是基於校長統一行政權的考量，或是由於對特權的反感，在政府因此指責輔大時，他不會特別為兩修會辯護，甚至有點順水推舟，看著事態發展下去。費濟時和蔣百鍊在數年與龔士榮合而不同的相處過程中，對龔士榮有一定程度的瞭解，因此甚至會懷疑龔士榮在背後動了什麼手腳。不過龔士榮是以輔大利益及教會發展為首要考量的，他不會為了要打倒兩修會而傷害輔大，因此他也要說明于斌辭職的消息外洩責任不在他，是于斌自己多嘴，然後中國神父人多口雜的結果。他也要點出總教官在此次改組事件中的關鍵角色，絕非龔士榮，甚至也不是林棟的責任。

艾可儀打從一開始就承認，原則上在中華民國辦學，就應遵守中華民國法令，但在此前提下，他也認為應保護兩修會權益，因此他一直在法尋求法律或執法上的灰色地帶。從龔士榮眼光看來，這就是特權。他更受不了艾可儀動不動就搬出教宗代表的身份，因此他也記下數則艾可儀不尊重于斌及其他本地主教的故事，用以證實了艾可儀確實是帝國主義者，而且他和要求特權的兩修會，才是該為輔大此次風波負責之人。不過持平說來，艾可儀身為教廷外交官，將教會利益作為優先考量其實無可厚非，他犯的錯其實是來華時間不夠長，對於何者是本地教會的最大利益，考量不夠清楚。

### 三、富於正義感的龔士榮

面對所謂的特權或不合理的事物，龔士榮是不會屈服的，這其實也是他的人格特質。無論是委婉的推辭或是剛強的抗議，他都按照心中一致的道德尺度評斷，基本上不會有反覆的表現。

在于斌身邊他扮演的是逆耳忠臣的角色。當他得知于斌將教廷命其辭職消息告知眾中國神父時，他立即前往于斌所在的耕莘醫院，告訴于斌此事將有不良發展。在民國五十九年六月底于斌曾告艾可儀為免除改組及辭

職的聯想，最好他在一年後再辭職，當時龔士榮就生氣的告訴于斌：「為何許此一年？如此，校務無法進展，因為彼等可根本不理會你，（他們）心理上忍耐一年，以後他們還是做他們的，今年一年，由校長前去敷衍教育部。」為一年辭職事，七月五日龔士榮與于斌又有交談。于一句「沒有什麼關係」使龔士榮十分生氣，他回答說：「在你看起來沒有關係，過去一切事情，我給你建議忠告，你都輕視不在乎，一切沒有關係，現在落得這麼一場，……請千萬注意。」<sup>58</sup>于斌雖然雍容大度，但極有主見，一般人是不可能這樣和他說話的，只有龔士榮的話，有時雖然刺耳，但在經常的省察中，于斌知道龔士榮是有道理的；這也是于斌倚重龔士榮請他擔任主任秘書的原因。

這種正義感也表現在他處理輔大日常事務上，特別是有關人事問題。如果不合資格，任何人介紹，他都不接受。在改組問題最嚴重時，總教官要求增教官員額不被同意，總教官想要介紹進學校的人亦被拒絕。甚至于斌礙於同鄉朋友之情，想要介紹進學校之人他都擋駕，如果于斌堅持要聘，龔士榮即以辭職相應。<sup>59</sup>在龔士榮精心保留的數十卷資料中，沒有太多與他個人有關，他只是留下了十來封在不同時期的辭職信，他的目的應該是告訴以後的研究者，他不戀棧任何任置。君子無欲則剛，這也正是龔士榮的最佳寫照。

#### 四、帶著時代限制的龔士榮

費濟時、蔣百鍊等人固然有其觀察上的盲點，但他們意圖設計使于離開校長之位，亦有其客觀性。除了學校組織問題的摩擦外，當時于斌還因積極籌設康寧醫院，以及準備設立海洋學院而負債累累，甚至必須向文學院的總務單位借錢。于斌過於樂觀的態度，同樣也是龔士榮所不贊成的。另外不夠審慎的決策模式，在復校最初幾年其實也是經常造成摩擦的原因。例如陸續發生的聖心修女會籌設學院，以及方濟會神父籌設農學院問題。對艾可儀來說，他到台灣主持教廷大使館後，面對接踵而來的爭議，要他對于斌有好印象也難。再加上他無法體會于斌這一代中國神職，強烈愛國心的歷史背景，所以才會說出于斌是國民黨樞機這樣傷害人的話。

與于斌同樣富於愛國心的龔士榮，加上性格中的正義感，使他在某種意義上說，帶著放大鏡觀察費、蔣等人。在每件動機複雜的磨擦事件中，往往他所挑出的都是帝國主義，都是特權，但費、蔣等人是絕不會接受的。他們都有在中國傳教的經驗，都被中共驅逐出境，其實他們一定經常反省

<sup>58</sup> 龔士榮，〈輔大改組日記〉。

<sup>59</sup> 〈龔士榮致于斌函〉，民國六十年七月二十四日。

自己的行為是否像帝國主義。這是費濟時被指責為帝國主義時勃然大怒的原因，或許這也是龔士榮不願自己寫《于斌樞機傳》的原因，因為歷史學者的直覺已經告訴他，有某些成份限制了他的客觀性。

由此角度看，龔士榮所寫的〈輔大改組日記〉是一份他自己也知道主觀的記錄，因此不適合在他在世的時候公諸於世。

## 伍、結語

輔大真正的整合，是在民國九十一年左右。有關組織體系的問題，是在台復校以後輔大校史中重要的主題。藉由本篇文章的整理，可以一窺當年解決三單位問題的複雜與困難。龔士榮的〈輔大改組日記〉固然填補了許多資料上的空白，但無論如何那是龔士榮觀點的展現，要按照他的想法直指費濟時、蔣百鍊及至艾可儀為帝國主義者，是不盡公允的。在彼此長時期的磨合過程中，在不斷的錯誤及爭吵中，三單位才逐漸走向真正的整合。如果沒有三單位願意在不斷的反省中放棄自我，是不可能現在真正整合成果的。另一方面，即使已有現在的整合，也不代表彼此就已完全放棄己見。

前已述及，龔士榮所珍藏的資料，絕大部份都屬於于斌，他沒有給自己留下太多資料足以作清楚的回顧。既然龔士榮把他一九六〇年以後的人生和于斌綁在一起，因此本文的另一個目的就是藉著他保存于斌資料中最重視的一段，用來介紹這位基於謙虛的理由，隱藏自己的龔士榮。他畢竟是留著歷史學者血液的，他既願意保留于斌的相關資料給後人研究，也願意將他自己的人生交給後來的研究者公評。即使意見不同，即使有些難堪，他也不會在乎，因為這就是歷史。

在龔士榮生命的尾聲，他有三個仍在關心的主題，都與于斌有關。兩個屬於現實：南京教區及益世電台。一個屬於歷史：于斌歷史資料。他願意輔大在他去世後取得所有資料，當然絕不只是保存而已，在適當時機應該要寫成可供評斷的歷史。希望這就是適當的時機。



## 學蘊八十載：探討輔仁大學的大學競爭力(Comparative Capability) 與領導(Education Leadership) 特質 ——以前校長羅光總主教為引(lead)

程予誠\*

### 摘 要

在目前普遍講求校園民主與大學自主精神的教育氣壓下，國內大學紛紛採取民主式的校長遴選與校務行政革新方案。輔大八十載，歷經八位校長，從神職人員領導轉換成教友的專業學術教授領導時代；同時明顯可見的是，輔大組織體制與學術脈絡也逐漸成型與轉型，無論與國內、乃至國外大學的教學品質評比競爭中，其全人教育理念和獨特的品格修養課程，均展現出輔仁清楚的學風，展望未來校長的領導風格與理念，是否考慮會要求在融合宗教精神與大學市場競爭策略中，尋求和諧共榮的契機？

高等教育的領導(Education Leadership in High Education)逐漸在劇烈的全球教育競爭中，與激烈變遷的社會中被用來檢視未來國家競爭力的指標，並且發展出具有實質意義的教育經營方向與未來校務規劃；輔大具有宗教、學術、與教育的悠久傳統特質，校園民主的領導理念更應具備能力與觀念上的創新，以面對的未來要求。

本篇論述將概述目前台灣的大學發展現況，及一般國內大學的競爭市場與方法，隨後則由輔仁原先成立之背景與目的加以剖析，並檢視輔仁創校期間之領導策略與當時社會狀況，引用前校長羅光總主教的領導概念來說明所謂的教育領導理論(Theories of Education Leadership)，在分析所有的領導論述與策略中，推論出輔大競爭力的優、缺點，及應該考慮的幾點大學競爭與領導觀念，希冀作為輔大未來領導走向與經營策略之參考。

關鍵詞：領導、領導者、領導統御、大學競爭力、教育領導

---

\* 輔仁大學影像傳播學系副教授。

## 一、前言

二十一世紀的高等教育所面臨的是個資訊發達的社會，網路的大量應用於教學環境，打造出一個豐富的數位化學習空間，不只改變教師教學技巧，同時也改變學生的學習態度與方法，然而，台灣當前高等教育已有 170 多所大專院校，<sup>1</sup>顯而易見的是，利用的政府資源與對大學的數位化及教學品質要求，往往不成比例，企圖創造學習的數位空間又需要大量投資，在當前教育政策普遍尋求立即效益的前提下，衍生出當前大學的一些棘手問題，也就是一方面大學想維持大學教學的目的，一方面又必須配合政府、學生及產業所追求的即時性效益，<sup>2</sup>面對未來可能的教育國際競爭壓力，教育部要追求高等教育品質及效能，以提升國際競爭力，似乎只有從個別學校的內部作調整，學術的競爭力不是短期可以速成，但是學校的管理與行政效能卻是可以加強，競爭力因此是要回歸大學內部的自我要求，檢視輔仁大學的定位與資源，應是相當具有啟發性。

高等教育的領導 (Education Leadership in High Education) 逐漸在劇烈的全球教育競爭中，與激烈變遷的社會中被用來檢視高等教育品質的指標，並且發展出具有實質意義的教育領導者的要求與自我提升，一種哲學的觀點，去觀察大學領導統御如何在不斷快速變化的社會中，能適切地表現出所應具有的人格特質與師生期盼 (perspectives)，領導的模式 (models) 有許多種，包括教學的領導 (Instructional Leadership)、權變性的領導 (Contingency Leadership)、願景式領導 (Visionary Leadership)、促進性領導 (Facilitative Leadership)、倫理領導 (Ethical Leadership)、教育科技領導 (Educational Technology Leadership) 等，每一種領導模式都有其特有的要求、技巧，與其所依存的時空環境，每一種領導者都會有一種信念 (belief)，由此而衍生出一些政策 (policies) 與執行 (practices)；學者 Wallace, Sweatt 及 Acker-Hocevar (1999) 認為「沒有一種實際地領導模式能適合所有的環境，尤其在一種多元的環境現實中，教育領導者想要能實際運用一種領導模式於各種狀況是不可能的。」因此這批學者用開放式系統架構 (open-systems framework) 的四種的觀點來看教育領導的定義：特質領導觀點 (trait approach)、風格領導觀點 (style approach)、權變性領導觀點 (contingency approach) 及新領導理論 (New Leadership Theories)，

<sup>1</sup> 至 2005 年 11 月止，見 [http://www.sciencela.org/n\\_rocedu.htm](http://www.sciencela.org/n_rocedu.htm)。

<sup>2</sup> 黃俊傑，《二十一世紀大學教育的新展望》(台北：台灣大學東亞文明研究中心，2005 年)，頁 IV。

本篇研究將以這四種概念來看輔仁大學的領導模式，尤其以前校長羅光總主教的領導模式看之前及之後的領導趨向。

本篇探討所引用的關鍵「字」與「詞」之意義說明如下：領導(Leading)，有引領、帶領之意；領導者(Leader)，指組織或團體中能領導的人；領導統御：(Leadership)，指領導者在引領、帶領一個團體或組織中的活動所採行的策略、方法、技巧。

## 二、研究動機

21 世紀的全球化高等教育，不斷的在討論高等教育的特色與未來發展，輔仁大學具有 80 年的歷史傳統背景，展望未來大學教育講求高等教育品質及效能，以提升國際競爭力，同時考慮的還有「教授治校」的校長遴選，校長應清楚學校的學術特色與未來發展，並應具有全球化競爭所具備的資源與領導理念，以彰顯學校的教育品質提升與競爭力，所謂「知己知彼 百戰百勝」。

## 三、研究目的

本篇研究有兩個主要問題：一個是「如何能了解輔仁大學的競爭能力？」，另一個問題是「了解輔仁大學的校長領導(leading)作風(style)如何？」，並且以前校長羅光總主教於輔大校長任內的作風為線索，了解羅光校長任內十多年間，如何領導輔大進入一個多元發展的綜合大學體制，其領導風格雖有爭議，但可以作為分析一個大學校長的領導統御(leadership)如何才是適當(adequate)的實例？結合上述兩項問題，本研究之主要目的為「探討輔大未來競爭力與校長的領導統御技巧？」。

輔大於 1925 年創建於北京，到台灣 1961 年新莊復校，前後至今 80 年，在這一段悠長的歷史歲月中，不光是政治的變化，同時隨著時代的進步，社會變遷在科技與商業競爭推動中多所轉變，教育理念與政府態度是其中重要關鍵，本篇所能探索的方向限於輔仁大學在這段期間的適應與發展，因此政治與社會將不是分析重點，而是著重在輔大自己所演化出的教育目標與宗旨，因此本研究將會分析輔仁的教育理念與學術專長，這是第一個問題解答的提示。

探索校長「辦學理念」是另一個追求教育競爭力的重要指標，因為校長是一個學校的領導者(leader)，他的抉擇(decision-making)與態度(attitudes)將會使一個大學校園團結或是暗濤洶湧，因為輔仁創校、復

校到目前的校史中，校長一直是全校的中心與精神支柱，然而在這 80 年的過程中，校長一直在神職人員領導與學者民主治校中輪替，尤其當目前學者治校將成為大學民主制度的一個典範性標的，可以想見未來大學校長的領導風格勢必會影響一個大學的發展，乃至於其競爭力，因此從輔大的辦學歷史中，可以找出第二個答案的提示。

在美國 90 年代逐漸發展出的教育領導 (Education Leadership) 研究，指出教育領導理論不光是學術的研究，而是實際對教育發展有根本影響的觀念 (concepts) 與行為 (practices)，美國是以民主自傲的國家，特別在政策的執行上，有許多人研究在如此多元價值差異很大的民族融爐式國家中，如何能貫徹領導的理念？因此有許多的學術研究落實在領導講習會與研討會中，以協助領導者在技巧與觀念上作革新；因此本研究將試圖用教育領導理論，來檢視輔仁大學過去校長的作為，並提醒未來領導候選人應具有的道德、觀念及技巧上的能力，這將會說明第三個問題的答案，就是未來輔仁大學校長在談學校競爭力時，應如何看自己的學校、老師、學生及學術地位、能力，此外，具備有相當的領導統御能力與條件也是不可缺少的。

#### 四、研究方法

本篇研究是採用文獻探討的方式，並且輔以質性研究的特定人物訪談，以了解這八十年來輔大的發展，研究是以在輔大發展歷史中，對輔大行政與學科規模改變最大的神職領導之前校長羅光總主教，以其為線索，因此，也就特別訪問前校長羅光總主教任內的主任秘書李振英神父，李神父也是後來接替羅光校長的輔大校長，同時也是將神職人員治校交由學者治校的最後一任校長，另外輔大校史室也提供非常多的文獻作為研究參考，研究者本身曾完成輔大七十週年的紀錄影片、輔大簡介影片、于斌樞機多媒體光碟製作等工作，因此對輔大的發展脈絡也具備清楚的輪廓，可以作為研究此項問題的基礎。

#### 五、輔仁大學的成立與復校宗旨

輔大是結合宗教、學術與教育的有歷史特質的大學，成立於今已有 80 年歷史，明顯可以窺見在這八十年的過程中蘊藏許多學術資源與特質，這也是其他國內許多大學所難以望其項背之處，也就是所謂學蘊八十載的概念，本研究所強調的在這動盪的八十年中，輔大在政治情勢下劃分的兩個

時期：北京輔大時期與台灣輔大時期。

北京輔大的研究，已多所闡述在輔仁的成立對當代的大學教育與天主教宣揚有重大的意義，依北京輔仁大學校史紀錄，1913年天主教知名人士英斂之創辦的輔仁社成立，主要目的是學習國學，取輔仁之意為「以文會友、以友輔仁」，是為輔仁大學的前身，後來教廷希望在中國辦公教大學，於是在教宗碧岳十一世（Pope Pius XI）的指示下，經本篤會的努力，於1929年得到當時政府立案許可，正式成為北京的輔仁大學，在僅遵守政府的法令下，將宗教與教育分開，其創校宗旨是介紹世界最新科技、發展中國傳統文化、養成碩學通才之士，其課程主要是強化基礎知識和基礎理論教育、現代科學方法的訓練、培養學生應用能力；在八年對日抗戰中，由於是德國聖言會所辦的大學，因此是唯一在後方不受日本威脅能獨立自主的大學，因此在當時吸引了許多後方有識青年，當時政府也特別承認輔仁大學在敵後方的畢業文憑，第一任校長是美國籍的奧圖爾（Rt. Rev. George O'Toole），後依教育部的規定，校長必須為中國人，於是聘請校中原來的副校長歷史學者陳垣教授出任校長，這是第一次學校由神職領導轉換成教授領導，因此輔大在歷史上已因為教育部的要求，做了第一次的「學者治校」模式；推究最早輔仁社的成立目的，可以見其招生簡章的第一句話：「敝人因感於人才消乏、國學日就倫胥，乃於一九一三年，組織輔仁社於京西香山靜宜園……」，<sup>3</sup>由上述可知，不論是輔仁社或是輔仁大學的成立，早期宗旨可以看出來，**輔仁大學一直與當時社會發展、文化傳承、知識青年培育及政府態度有深厚的因果互動關係（見附錄）**，這層密切的社會關係與文化的傳承也一直延伸到後來台灣輔仁的復校。

1961年，輔仁大學在台灣新莊現址復校，其復校之艱難在校史中及于斌樞機傳都多有描述，有種種政治、經濟、宗教等的考量限制，但是後來都在當時的于斌總主教的奔走下一一克服，而其復校成功對當時台灣社會有很大的啟示，分析如下：

1. **愛國理想**：1956年輔大在台校友會成立，積極推動輔大在台復校的活動，當時的教育部長張其昀深知于斌總主教與教愛國的理念，表示願意在可能範圍內予以協助，<sup>4</sup>這表現出社會對輔大在教會與國家社會地位中的一份肯定的熱誠。
2. **艱苦創業**：1958年，于斌總主教在寫給聖言會第六任會長舒德時信中，提到台灣需要一所高等教育機構，是根據教會的原則與理想辦學，對

<sup>3</sup> 北京輔仁大學校友會，《北京輔仁大學校史》（北京：中國社會出版社，2005），頁9。

<sup>4</sup> 陳方中，《于斌樞機傳》（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2001年），頁212。

於台灣教會與教育及年輕人都有一種迫切的需要，<sup>5</sup>但是財務的問題是主要待解決的事項，經過于總主教多方籌款及美國庫興樞機的大力幫助，終於能將輔大復校之事付之實現，自始輔大是一所私立的大學，財務的緊張在復校之初就已定型，但終能藉由領導者的信心而得以化解問題。

3. **貢獻教會：**當時台灣教會規模尚小，僅有道明會所主持的高雄教區，同時在中國大陸淪陷之前，在國外培養的許多人才，以及 1951 到 1955 年間，中國大陸驅逐出境的神父、修女，許多希望到台灣服務，開發台灣教區會是一個好辦法，在此情況下，輔仁大學授命於教宗而成立，自然形成移轉中國大陸教會資源到台灣的好機會，<sup>6</sup>輔仁大學的復校對台灣天主教發展的影響是深遠的。
4. **愛的教育：**1963 年 11 月，輔仁大學的大學部開學，校長于斌樞機自羅馬返台，在文學院大講堂訓示，其記事本上清楚說明輔大的辦校方式：

輔大為有歷史之大學，精神遺產彌足珍視：a. 精神：愛的教育乃天主教之精神；仁者愛人；b. 校風：勤樸；c. 教與學的態度：博學、審問、慎思、明辨、篤行……<sup>7</sup>

5. **青年救國：**大陸淪陷之後，當時于斌總主教運用其個人在國際間的關係，將台灣無數的年輕人送出國外求學，是沿襲大陸輔仁的精神，希望有識青年能救國家於未來，其想法可以見之於其寫給聖言會士舒德（John Schuette）當選聖言會第六任總會長的致賀道函中：

你在中國身為堂區神父及輔大教授的豐富經驗中，你比任何人都了解中國教會的需要及呼求，整體來說中國教會最迫切的需要就是在台恢復輔仁大學……因為台灣及海外華人一直沒有一所高等教育機構，是依據我們教會的原則及理想辦學的，如果輔仁在台復校，至少在大學階段，我們就沒有必要送青年男女負笈海外，我誠摯的希望你能認真考慮輔仁在台復校的可能性，我個人將會予你我所有的支持。<sup>8</sup>

輔仁復校對當時社會情勢的影響，除了上述作用外，尚有穩定當時政治作用、經濟開展、社會心理穩定、落實教育政策、文化傳續與宗教正常

<sup>5</sup> 同上，頁 213。

<sup>6</sup> 2005 年 10 月 21 日，於輔仁大學神父宿舍訪問李振英神父有關前校長羅光總主教的治校理念。

<sup>7</sup> 陳方中，《于斌樞機傳》（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2001 年），頁 233。

<sup>8</sup> 同上，頁 213。

發展等，<sup>9</sup>由上述的說明，可以知道輔仁大學絕不能以一般人眼中所見的大學看待，因為它除了具有宗教上的地位之外，在動盪的社會中，具有中國人文傳統的儒家修身救國的理想，所秉持的是宗教家的熱誠與興辦教育事業的理想，其目的是全人格的養成教育，而非急功近利的世俗短視的教育。這些是輔仁大學的歷史信念與資產，同時也是其與眾不同之處，如果說在目前 170 多所大專院校中，這就是輔大獨特競爭力的基礎，應善加珍惜。

## 六、二十一世紀的大學競爭市場

依據教育部的公佈，1950 年政府遷台之初期，私立學校才有 25 所，2001 年時，公立大學已有 53 所，私立則有 101 所，總共有 154 所大專院校，學生總人數達 1,187,225 人，到 2005 年大專院校則上升到 177 所，可為世界教育市場的奇特現象，學校之多就形成教育競爭與比較，同時政府原來補助各校的教育經費相對減少，學者涂經詒（2005）認為台灣高等教育存有三項隱憂：（1）學生和教師數量大量增加，研究所擴增，而教育預算減少；（2）各大學的籌款、募款成就有限；（3）預算分配的平均主義，無法顯現各大學的特色。他建議要「以少作多」(Doing more with less)，如果這些屬實，就會是台灣大學教育將會持續的現象，唯有要求學校在管理上能提高效率，以有限的資源作更多的工作，這一點說明了就管理的角度來提高學校辦學的效率是未來必然的考慮。<sup>10</sup>

台大前校長陳維昭（2005）以他的多年行政經驗說出台灣目前大學的問題，有四大困境：（1）校園民主發展的偏差；（2）量與質的失衡；（3）國際化之不足；（4）政策與目標不明確；<sup>11</sup>以下分別就這四點提出大學生態外在現象與輔大內在對應分析。

### 1. 外在現象分析

- （1）1994 年大學法修正，修正的精神是賦予大學自主權和制度化，例如健全董事會、財務公開、人事自主、招生與課程自主等，希望校園走向更開放與民主的方向，其中校園民主中最重要的是「教

<sup>9</sup> 2005 年 10 月 21 日，於輔仁大學神父宿舍訪問李振英神父有關前校長羅光總主教的治校理念。

<sup>10</sup> 涂經詒，〈大學系所在二十一世紀高等教育挑戰中的角色〉，《二十一世紀大學教育的新展望》（台北：國立台灣大學東亞文明研究中心，2005 年）。

<sup>11</sup> 陳維昭，〈全球化趨勢中的大學交流與合作〉，《二十一世紀大學教育的新展望》（台北：國立台灣大學東亞文明研究中心，2005 年）。

授治校」的理想，希望透過大學師職人員共治學校，鼓勵全員參與校務，為學校貢獻意見，透過討論、溝通、協商以建立共識，解決問題，達到包容異見、尊重少數、服從多數的民主法治意涵。但是當社會敗壞的選舉風氣影響校園民主發展時，選出的校長人選往往在品格能力上有所爭議，學者劉兆漢指出大學如何能找到適合的校長，其學識能力及風格直接影響學校更上一層樓的能力。他進一步指出，近年來在校園民主的演變下，選出來的校長們常常感到有責而無權，而在一些情況下，校長與校務會議之間互動不良，而成為學校不安定的因素（2005），更別談學校競爭力了。因此可以知道這項政策有其瑕疵，原因就是學者如何能擁有管理與治校能力？這和學者平時研究學問是不同的；學者 Nworia 及 McGriff（2001）研究轉變中的大學（Transformation of Higher Education）中指出，改變（change）的新現象在現代的組織經驗中是不足為奇的，高等教育的改變也是不可避免的，但真正的問題是如何及由誰來轉變（the real question is not whether higher education will be transformed but how and by whom?），Wright（1997）也提出相同的問題，大學的領導者往往出於教師層級，他們的之前的學術訓練與經驗，不足以應付大學管理者的新身分，新的領導者在創新未來眼光之際，必須先了解自己的組織文化及價值，許多的國內外教育學者都發現，在不斷轉變的社會下的學校發展中，校長作為領導者（Leader）應該要有能力及技巧來帶領學校發展與市場競爭，這就是領導（leadership）的真意。

學者 Montez（2003）研究指出一般人都將大學的管理視為一般話題，用一般的企業管理來評估效能，但是有五個範疇是值得思考的：整合（Integral）、合理性（Relational）、信度（Credibility）、能力（Competence）、方向／引導（Direction/Guidance）範疇。他認為一個有效率的領導者（Effective Leaders）是應該接受訓練（leaders need training），它也提出常為人們所了解的傳統領導典範（paradigms）理論：特徵典範（trait paradigm）、個人情況典範（personal-situational paradigm）、觀念認知典範（perceptual-cognitive paradigm）、轉變/交易典範（transformational/transactional），這些理論讓領導者應該要知道自己的條件及知識，許多的校長在身居其間時，才知問題的複雜性與困難性。

- (2) 大學院校數量的極度擴張是政府施政的事，導致管理與大學品質的失衡，這是外在環境的大學競爭壓力根本，但是內在的大學院

系擴張太快就是大學自己內部失衡的問題，想擁有為別校所無法開成的系所，成為一所完美的綜合大學，但是卻因此導致校內管理、行政及財務與相關資源喪失競爭力；學者 Lovett, Mundhenk, Shulock, Reed, Rust Jr., Layzell, Burke, Christ (2004) 等人指出，大學自己應先定義出自己的目標，必須平衡於學校、大眾、市場，然後才知道該如何發展，對自己學校失去一分研究與了解，必然導致失衡發展的壓力。

- (3) 工業先進國家透過世界貿易組織 (WTO) 的運作，會員國必須依其承諾開放教育市場，並給予其他國家最惠國待遇，這項國際協議除了強化教育的產業和商業特質，也引起新一波國內高等教育市場的危機意識。國際化談的是與國外大學的接合 (connections) 與競爭，高等教育的競爭能力不是短時間能培養出學術實力，就算是目前所爭議的五年五百億元的教育補助費用，其結果也可能是另一個短視的解決爭議的做法。管理大師彼得聖吉 (Peter Senge) (1990) 曾說過：「最容易解決問題的方法往往是錯誤的，會帶來無窮的問題」，所以競爭是長久培養出來的實力，而不是一時的衝動能量。接合的問題不是語言上的問題，而是接合形成之初的教育課程內容問題，開分校、進行遠距或網路教學 或結盟，或結為姊妹校，都可能是一種與國際接軌的假象，實際要看的是課程內涵，或是否能截長補短，實際有益於自己學校內的學生。大量招收外籍學生也可能產生負面影響 (戴曉霞 2005)，例如馬來西亞與澳洲就有這類問題，陳維昭 (2005) 認為國際化的最確實的做法是去培養全球意識的公民，擁有越多的全球意識公民，自然競爭力就提升了，大學的全球化與國際化是重新檢視自己的課程中是否有對不同文化的課程與研究，或是具有其他學校所沒有的特長課程與研究。學者有人提倡全球化的本土化 (Global-localization)，例如吸引外國留學生的課程不是社會科學，而是傳統人文學，這樣的看法，國際發展失衡的問題就容易解決。
- (4) 政策與目標不明確可以是政府單位所發生的問題，也可以是自己大學本身的問題，重新檢視自己大學成立的目標與宗旨，加上考慮社會快速轉變的因素，是否需要調整原來的政策與目標，都是大學領導者待解決的當前發展困境，首先，應該要去研究自己大學的條件與資源，然後以領導策略 (Leadership Strategies) 去達成 (executive) 全校一致的共識 (consensus)。

## 2. 輔大因應之道分析

- (1) 談輔大校園民主的發展，可以推回到北京輔仁的時期，而台灣輔仁的校園民主，也依教育部的要求，如今有第三屆遴選出的校長，值得慶幸的是歷屆民選校長都能秉持天主教大學的精神治校，而歷屆校長也都對輔大有所貢獻，所以並沒有外界所發生的問題，但是以長期觀點而言，校長遴選的人格、操守、心性、教育認知、領導理念，還是應建立一套長久的制度標準，以期能發揚北京輔大建校之精神。
- (2) 輔大是一所許多人羨慕的綜合性大學，然而在擴張中形成十一個學院，這些學院是否能突顯輔大的特質與競爭力是值得思考的，畢竟學校的資源有限，例如最簡單的土地、自來水、電力等，是否能如當初復校時所規劃設計的 5000 學生的校園標準，而其它如師資、行政效率、管理是否能配合，也應有所考慮，這些都會造成量與質的失衡的顧慮。
- (3) 輔大的國際化一直都是輔大的特色，因為外籍神職人員的介入，使得輔大在發展中一直是所有學校中最具國際化的大學，因此使得歷年輔大在台灣大學教育界中一直具有開放、自由的聲譽，其多元文化課程也一直具有令人稱譽的水準。從以前的畢業校友的談論中，輔大的國際觀點與多元化認知對他們在後來的生活中產生很大的影響。然而，未來輔大是否能認知這份優勢是值得懷疑的，國際化不光是和國外大學建立關係或是課程英語化，它是一種全球視野的多層次認知與規劃，然後找到自己的立足點，是一種務實的「由外向裡面看」，而不是「由裡面向外面看」，「由外向內看」可以看到學校的整體，「由裡向外看」只看到別人的好，卻忽視自己的整體優點。
- (4) 輔大的政策與目標在歷任校長的態度上有明顯的差異，輔大的教育政策與目標不光是校長或行政人員的做法與看法，應該落實到真正的輔大精神與目標，並且有效果的渲染到校園中各個角落(溝通的能力)，如此接續的新校長才會持續發展而產生持續的競爭力。一個有任期制的機構，最怕前後任的政策目標無發接續，如此重新檢視及適應的耗費，自然無法產生競爭力。

## 七、輔大的治校理念

### 1. 復校期——于斌總主教時期

1963年輔仁復校的大學部開學，共收了十一班四百多名學生，當時學校正大興土木，學生宿舍也在興建，第二年各院宿舍也相繼完工，學生招收了六百多名，當時的學校設備與當時的國立大學相比，有過之而無不及，同時又設有獎學金，因此在全國聯考中排名不低，在治校理念上，于斌的態度是相當開明的，在談到學生的頭髮時，他說：

……我對這個問題沒甚麼意見，因為我覺得它不是一個重要問題，大家青年人嘛，多少總有點厭故喜新，這是免不了的，但是弄得怪誕不經，太過於放浪形骸，甚至於不注意自己身體的健康去蓄長髮著奇裝，我覺得那也不能算是做人的正規辦法，只要不太過分，不違反禮俗，我是沒有甚麼意見的。這就好像在輔大，我並不強迫同學穿校服一樣，每個人都可以依照自己的審美觀念去選擇衣著，只要不違反禮俗，不丟棄內心的莊重，雖然是萬紫千紅，也沒有甚麼不好。我只是希望同學們不要有那種目空一切、標新立異的觀念就好，因為一個人的外表就是一種極重要的資產，他不僅能代表你個人，而且人們對你最初的估計就是看你的外表的，這和他人是毫不相涉的。<sup>12</sup>

復校之初于斌對大學的大原則的掌握非常清楚，又對學生態度表現在尊重個人，及關注在學生內心與外在的禮俗意涵上，非常重視且注重學生心性的培養，所以和當時其他大學仍穿軍訓服上學之時，表現輔仁的確在教育學風上的自由度和開明，是其他大學所無法達成的，是一種人格與心性的培養，這也可以說在當時的社會中創造了獨特的輔仁學風與氣質，這種治校的觀點和于斌在世界各國的建校募款活動中見多識廣有關，也造就了輔仁一貫的國際視野，當然這種國際視野的養成也包括了和教廷與其他修會的密切關係。

輔仁大學在制度上是直屬於羅馬教廷教育部，在實際管理上是由三個修會共同合作的，當初在復校之初即言明財務及人事獨立，也就是三單位有自己的預算審查及人事權，但依我國教育部的法規，學校董事會需將全部大學預算簽署後送教育部，因此當時的學校運作基本上是各自獨立，根

<sup>12</sup> 陳方中，《于斌樞機傳》（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2001年），頁234。

據李振英神父的說法，于斌校長常年在國外募款，經常有些時候不在學校，而校務都交由當時的主任秘書龔士榮神父負責，而校務也能在自治的精神下發展，雖有不順之處，但基於相同的信仰與教廷的關注與信賴，也沒有太大的不順利，但基本上是個相當特殊的聯合又分治的辦學模式，當時教廷駐華高理耀大使，曾於 1967 年輔仁大學首屆畢業典禮上含蓄的說出其中的困難度，他說：

……在過去，傳教團體間聯合管理的例子固然有，但是大部分都是暫時性的，或是個人性的，而輔仁大學的這項計畫，要教區聖職人士和修會團體，問題就在惟一校政之下，通力合作地、聯合管理一個龐大的學府，據我個人所知還是教會史上的第一個實例，……可以說是一個聯合企業，這個聯合企業行的通嗎？這個聯合企業會成功嗎？答案是肯定的，……困難是有的，問題是有的，辛苦也是有的，在某些時期、某些階段，彷彿要實現這個崇高理想，是近乎不可能的，……輔仁大學並非僅是一座私立學府，而且在某些意義下，也是一個政府事業，教會在教育事業方面，總是願意與他人合作的。<sup>13</sup>

由上面的說辭，可以依稀想見，學校的組織是個有共同目標的大學，校長不僅是行政的負責人，化解各獨立單位間的問題，同時也是一個精神的中心，不光是宗教所賦予的地位，而是為校務發展大方向掌握的人，成立之初能達成前述所謂的為國家、社會及青年的影響與作用，校長的治校理念其實是將權力分享給三個修會，任何有關全校事務的事都要經過三個單位的協商，當時耶穌會的費濟時院長曾一再強調所謂的權力分享，<sup>14</sup>這種分治獨立的問題在學校擴大之後，必然產生校務行政作業上的問題，中美堂的興建，一部分是解決此項行政問題（部分行政人員辦公室在其中），同時也突現學校的權力運作要有效率，必須要有所調整，1969 年 11 月 26 日發生在校園內的「蔣匪事件」，激起國內教育部關切學校行政組織運作的情形，而為後來繼任校長羅光總主教留下改革的空間。

## 2. 發展期——羅光總主教任職校長時期

羅光總主教任職輔大校長期間對輔大的發展與制度化努力是無庸置疑的，他的種種治校領導理念和他的生平歷練有密切的關係，他也是輔大成長的關鍵，考察其經歷就可以探究出其領導才能。

<sup>13</sup> 同上，頁 239。

<sup>14</sup> 同上，頁 247。

1930年，羅光離開家鄉進入羅馬傳信大學，開始了他的海外生活，至1961年止，共在國外生活了30多年，期間曾獲得傳信大學哲學博士，之後又考取神學博士和法律博士，又從1945年開始第一本著作「儒家思想概要」，接著又有「儒家貧富觀念」、「道家思想」、「陸徵祥傳」、「徐光啟傳」、「中國哲學大綱上、下集」等十七本海外著作（羅光 1997），內容包括散文、傳記、哲學、詩歌、宗教、儒學等方面，可以說是不但才華洋溢，並且其人宗教與哲學中心思想純熟，其在國外多年，非常精進與努力在思想的陶成上，同時也奠定了他的生命價值觀與思想觀，以其在國外多年必然見多視廣，回到當時國內的各方面草創成就，定然心中有所主張，因此被認定組織力強、企圖心高的教會人才（陳方中 2001）。

1978年8月，羅校長接掌輔仁大學校長工作，強調以人格教育、人文教育、愛心教育三點為教育目標，因此落實到校內的導師制度，他於1992年退休時，共計14年時間，全部著作超過60冊之多，以今日的眼光看，社會上少有人能與之相提並論，又其任內校內建樹，其院系擴編與行政體制的建立和其著作一樣多的令人懾服其魄力與眼光，他將原來散置各處的校本部行政人員集中辦公於新建的野聲樓內，並完整編制新的部室，堅持己意興建淨心堂聖堂，為學生建築焯烱館學生活動中心，巧心規劃原來聖言會所擁有的土地為今天的國際化運動場，設立天主教文物館、學術交流室、東西文化中心、出版社、中國天主教資料中心，這些構想的實現，不但必須有遠見與魄力，同時也必須有領導能力才能實現於當時的多元環境中——對各種異見必須尊重的大學組織，又設立藝術學院、醫學院、民生學院及婦女大學。除了校內職務責任外，他更經常參與許多國內外的演講活動，在其短短的十多年間，能有如此領導校務發展成就，令人不得不去思考他是如何能領導至如此地建設，是甚麼樣的個性與能力促使他將輔大帶入一個成長的綜合大學之路？在其建樹中，有一些例子能說明其領導的性格。

- (1) **淨心堂的興建**：于斌樞機治校十多年間，為了維持校務的發展經常將時間貢獻在教會、國家與社會上，然而輔大卻沒有一個天主教大學所應該擁有的聖堂，卻也是一項遺憾，事實上，三單位對於這座聖堂都持認同的想法，但是實際在尋找一個合適的地點上時，卻很難能有一塊適當的地方建聖堂，羅光校長學習于斌校長的治校，並清楚該做的事，聖堂之事在其任內也開過無數會議，但都不能解決，於是羅校長快刀斬亂麻的說：「既然你們無法決定，開了這麼多的會，那我就幫你們決定。」於是找了聖言會的現在淨心堂位置，蓋了淨心堂，這對輔大的後來在促進的宗教活

動上是一大轉折點。<sup>15</sup>

- (2) **宗教學系的建置**：政府一向規定教育與宗教必須分開，在大陸北京時期如此，遷來台灣也如此，但是輔大沒有宗教學系實在也講不過去。於是羅校長邀集佛教、道教人士，共同向教育部呈請，希望能將宗教課程列入大學內容，終於突破了困難及政策限制，成立了台灣第一個宗教學研究所，對輔大來說是名實相符了。<sup>16</sup>
- (3) **運動場的建設**：早期學校的運動場在當時中美堂附近，面積不大，實在應該另闢地方建運動場，在一個機會上，羅校長知道聖言會有一塊地，於是抓住機會將那塊地變更收歸學校，改建為國際級的運動場。<sup>17</sup>

上面三件事的作為，可以知道羅校長對於一個天主教大學的發展與經營是了然於心，這和他多年在國外唸書、授課有關，其處理的決斷也和中國人的個性不同，行政大樓野聲樓的出現就是一個最強而有利的領導措施，將領導權力明顯運作在一個權力分享的組織中，昭示了中央領導的地位。但是他的民主也是眾人皆知，他說：「你們有意見可以來找我，從工友到教授，你們有意見就說，但是我有決定權，一旦決定就不要再說了。」李振英神父認為羅光校長的積極精神是令人佩服的，受儒家思想的影響，其「捨我其誰」的精神是讓人尊敬與佩服的。

促成中央行政組織的出現，除了羅校長的決心之外，當時「蔣匪事件」也讓教育部關切輔大的領導行政系統，這也是時代的共識，教育部與輔大的關係一向很好，除了是因為早期于斌校長與政府的合作關係之外，蔣宋美齡的董事長身分也讓輔大的教育理念獲得政府的肯定，當時教育部希望輔大能成立哲學系與外語學院，以及當時社會所需要的系所，輔大獲得政府的信任不光是因為政治關係，而是輔大的人文治校精神。<sup>18</sup>

羅校長任內的新院系的出現，除了是別人的建議之外，羅校長看的遠（visions）是一重要因素，早期于斌校長時代，理工學院的設備與外籍教師師資都是當時國內上上之選，但是當設備逐漸無法跟新設大學競爭時，輔大有其特殊的專長，在全校共同必修課程方面自始即爭取 4 學分的人生哲學課程，之後又加上大學入門課程及專業倫理課程各一學分，因為這是一個天主教大學最能發展的標的與方向，相信這也是輔大與其他大學講求即時效益不同的地方。這和許多學者所強調的大學教育目的是一致的，

<sup>15</sup> 2005 年 10 月 21 日，於輔仁大學神父宿舍訪問李振英神父有關前校長羅光總主教的治校理念。

<sup>16</sup> 同上。

<sup>17</sup> 同上。

<sup>18</sup> 同上。

認為大學教育注重的是人格的陶冶、獨立思考能力與智慧的養成，也有學者認為，大學教育是廣泛地培養大學生對自己內在身心特質的了解，求取新知的的方法與能力，適應個人生活及社會生活所需要之能力，理解與關懷全世界、全人類所需之能力、情操及行為，<sup>19</sup>輔大一貫的治校理念與時下名校文憑主義的想法是應該有差別的。

學者 Eddy (1993) 及 Murphy (1997) 研究 21 世紀的大學如果想提升標準、地位及增加整體校園氣氛，就必須在領導統御上加強觀念與實際訓練，他們說如果一個有效能及效率的大學產生危機，那就直接是領導 (leading) 上出了問題，因此想要成為一個有競爭的有效率及效益的大學，除了能達成大學教育的目的之外，要有大學間的競爭地位，就必須有個有效率的大學領導統御 (Education Leadership)，美國耶魯大學校長雷文 (Richard C. Levin) 宣稱將帶領耶魯成為全球化的大學，並設立「耶魯全球化中心」(Yale Center for Globalization)，在 2004 年 8 月為中國大學校長或領導人開設大學領導課程 (Advanced University Leadership Program) 的訓練，可見大學的提升競爭力必需先由大學領導人的訓練與提升開始，由教育領導 (Education Leadership) 的課程訓練來展開對未來大學治校的競爭氣氛。

## 八、高等教育的大學領導

根據學者 Shoemaker (1998) 的觀點，組織領導者面對不同的人會有不同的角色，同時要能具備改變 (changing)、挑戰 (challenging) 與管理 (managing) 的能力，一個大學為了達到各種教育活動的品質，在一個資訊化與社會變遷迅速的時代中，必須將改變與挑戰納入領導的管理機制中，領導者要進行一連串的程序 (consequences) 以完成一個有效益的決策 (decision-making)，為了確定有個品質的活動 (quality activities)，這些程序包括評估需求 (assessing needs)、去計畫 (planning)、去行銷與推展 (marketing / promoting)、去執行 (implementing)、去評價 (evaluating)、去報導 (reporting)、成立專案 (projecting)、去建立預算 (budgeting)，Shoemaker (1998) 相信上述的程序都與高等教育的服務責任 (missions) 有關---教學 (teaching) 服務 (service) 研究 (research)，而其中的行銷 (marketing) 與溝通 (communication) (傳播) 是兩個最重要的條件 (factors)，尤其是當新的領導者上任，面對許多在反對改變中所發生的反

<sup>19</sup> 徐式寬、岳修平，〈大學教師教學目的與策略〉，《二十一世紀大學教育新挑戰》(台北：國立台灣大學東亞文明研究中心，2005 年)

抗 (resistance)，因為大部分的人都害怕改變會影響到自己原來的地盤與利益 (turf and advantages) (Shafritz & Ott, 2001)，於是領導者就必須運用其領導的能力資源來得到最佳的結果，一般來說，組織的領導者具有 5 種能力資源 (sources of power)：如獎賞 (reward power)、威嚇 (coercive power)、合法 (legitimate power)、參考 (reference power)、專家 (expert power)，這些都可以增進其領導者的管理策略 (management strategy) 與其影響力 (influence)，從這些力量 (power) 中，最常見到的是獎賞與威嚇力量，例如升遷或記功等，都是獎賞力量，而逞罰或拒絕給予補助，則是威嚇的力量，一個大學校長面臨一個各有主張又必須尊重的學者團體，如何能運用其能力去達成一致的 (consensus) 執行與效果，就必須有領導統御能力。

輔大的復校初創時期，于斌校長以其宗教、政治與社會文化上的地位，而具有合法、參考、專家的力量來經營學校，在一個共同奮鬥努力的時代是沒有問題的，但是當學校擴大、師生與行政人員不但變多，且非相同宗教信仰的教職員介入的時代，問題便逐漸浮現，三修會單位的本位主義於是會產生利益磨差，同樣繼任者羅光校長也具備了于斌校長相同的力量 (powers) 外，他們在經營、管理策略中明顯可見其對於教育理念於領導中的能力也非常清楚，唯一的差別是羅校長善於運用新成立的夜間部收入，作為擺脫領導者財務上的支配困窘，財務上的分配能力是最現實的領導資源，同時也善於將獎賞與威嚇的力量加在前述的領導能力上，其夜間部的獨立收入是一大關鍵，不仰賴三個合辦修會的經濟資助，讓領導者更能發揮其領導者的獨立領導能力，校長是個成功的領導實例。

## 1. 教育領導理論

在一個快速改變的教育環境中，昨日的領導活動已不適合明日的要求，不能適應的領導者將不會繼續存在；教育領導者的挑戰是要如何有效率及具有倫理的領導於這個資訊社會，因此，甚麼樣的教育領導觀點可以適應這快速變遷的社會？學校是個社會建構的組織，領導統御是互動的過程，校長的壓力來自於命令是否貫徹 規範要求與最後成果，然而學校人口素質變化也是經常改變，將學校視為開放組織 (open systems organization)，也許能有積極的看法，學校管理 (management) 是一般性維持組織運作的概念，而領導則是具有開創 (creating) 與引領 (leading) 方向的概念，後者必須有信念的跟隨者 (followers)，沒有跟隨者的就不能稱之為領導者，既使名銜上是如此稱呼，也注定是失敗者 (loser)，失敗者與領導者之間的差異是有沒有跟隨者 (followers)，或是有多少跟隨者的

關係；其實大學校長具有多種角色，他必須是促進者（facilitator）、設計者（designer）、服務者（servant）、自我信仰者（self-believer）、園丁（gardener），領導統御是一種反應與創意的過程，當學校被視為一種經常流動且支援社會教育的場域時，在社區、師生間的互動中產生學校的地位與發展，一個大學校長如何領導？具有創意、智慧、品德是重要的，以下分析領導統御的基本理論。

#### （A）特質觀點（Trait Approach）

領導的概念一般人可以想成是如帝王般的地位，中國人五千年的歷史中，想領導的人士是想控制與中央集權，因此領導一詞的概念類似於用權力讓人屈服的想法，在軍事中的領導統御加強了這種觀念，就算是你不願意，你還是必須服從，這是在中國的一般想法，在美國 1927 年舉行一次領導會議，領導統御（leadership）一詞被定義為，一種領導者能壓迫意願的能力，而產生出遵從、忠誠和合作，早期的研究領導統御者相信，能力（ability）與權力（power）是根植於領導者所展現的個人特質中（Rost 1993），一直到 1940 年代，大家還一直相信一定的特徵（traits）與個人品質（personal qualities）是領導者所天生具備的，於是有一方面的特質被分類（1）身體的特質；例如高度、外貌等，例如于斌樞機主教的身高，又如馬英九市長的外貌；（2）能力；例如聰明才智、演說口才；（3）個人特色；例如自信（Wallace, Sweatt, Acker-Hocevar 1999）；這類的想法一直持續到 1980 年代，Locke 和他的同事（1991）研究成功的領導者發現，成功領導者有共同的特徵，例如有強烈的驅動力、願望去想實現權力、誠實、正直和自信，另外有學者研究美國的總統，相信領導者是天生的，而不是後天培育的，選擇「對」的領導者是依據個人的特徵，如此才會有跟隨者（followers）相隨。

這類的領導模式通常發生在一個民主意識不甚要求的團體或組織，輔大創校之時的社會依然動盪不安，想復校成功並且三個修會參與的人也都竭盡心力促成教學目標與道德良心，彼此個人也知道如何合作與協調，因此于斌校長以領導者身份只需用其個人原則檢視各單位的績效，以其特質加上具有合法、參考、專家力量三種地位，輔仁復校之初的教育領導模式應該是相當清楚與單純的。

#### （B）風格觀點（Style Approach）

1940 年代末，學者的研究焦點從觀察有效率的領導者，轉移到他們在組織中所反應的言行，定義領導統御有伴隨著影響其團體目標達成的意思，俄亥俄州立大學學者 Stogdill 於是定義領導統御（leadership），是一個

在組成的組織中影響組織行為的過程 (processes)，它能努力的達成原先設定的目標與成就，這種觀點強調領導者有一定的風格，研究中發現，領導者的言行也會改變，於是強調領導者是可以被訓練的，而不是天生被挑出來的，研究領導者與屬下間的關係都是正面的工作關係，因此目的易於達成；羅光校長在國外多年，成就其個人思想、哲學、宗教基礎，因此衍生出他為人、處世的原則與看法，基於天主教辦學的精神，而非常清楚知道輔大發展中的需求，於是階段性的以其個人原則達到治校的理想，其教育領導模式就是一個典型的風格領導。

### (C) 權變性觀點 (Contingency Approach)

1960年代末，研究的焦點集中在權變性的領導模式，這個模式是把環境情況的因素放在研究的中心，發現領導統御是人跟當時環境的因素有關，也就是說領導統御的效率是跟當時有利於領導者的情況有關，因此比較實際的暗示是一個成功領導者的個性是很難改變的，但是有效率的領導者是將自己放入於一個有利於領導的環境中領導，1980年代的主流領導統御強調的定義是，一種能影響人們分享目標的行為，也就是領導的行為能夠特別的使領導者在團體成員中有指示 (directing) 與合作 (coordinating) 於工作的功能，這種定義傾向於將領導統御視為領導者的權力、地位、資源的投資，而能操弄 (manipulate)、詮釋 (interpret)、協商 (negotiate) 於限制條件與資源中，而成為政策 (policy)，這種講法是高度的政治性，及需要討價還價與協商以達成目的、聯盟、跟很清楚的人為策略，他們是成功者，也是失敗者，主要的例子是美國的雷根 (Reagan) 總統、蘇聯的戈巴契夫 (Gorbachev) 總理及英國的首相柴契爾 (Thatcher) 夫人，他們所強調的是，領導統御是一個說服其他人去依領導者意願所採取的行動過程。

### (D) 新領導理論觀點 (New Leadership Theories)

新領導理論是自 1980 年代開始被描述，主要是認為領導統御是一個團體或組織中相互作用、影響、促進、彼此關係的過程，以及意義的掌握 (management)，最早是由 Burns (1978) 所提出，認為領導統御是一個轉變的過程 (transformational process)，也就是一個人或許多人有如領導者與跟隨者的關係，能提升相關人士的良知到更高的動機與道德中的方式，也就是轉變式領導 (Transformational Leadership)。

## 2. 領導模式

更多的相關理論出現，界定在一個領導者如何能轉變他的組織成為一

個義意的經營者 (manager of meaning)，Pfeffer (1981) 認為這是一個象徵式行為的過程 (process as symbolic action)，領導者確定團體組織的優先順序，並且注入方向及目的，使得團體向前邁進，在這種宣示下，有效率的領導者 (effective leaders) 被定義為代表多數人的行為、創造及分享意義，發展社會認知於結果的意義上，是一種分享心智的模式 (a shared mental model)，這種模式於是有幾種領導模式：轉變式領導 (transformational leadership)、魅力式領導 (charismatic leadership)、願景式領導 (visionary leadership)、浮現式領導 (emergent leadership)。

上述的各種領導模式並不是哪一個比較好，而是在一個環境因素中被考慮其所需要的領導知識，在社會民主不甚發達的時候，也許都是特質領導 (于斌樞機時代)，到了社會民主略有進展的時候，也許是風格領導 (羅光校長時代)，到了近代的 21 世紀，資訊如此發達，領導者可能應該採用權變式性領導或是新領導理論的模式來面對資訊充裕的「可能」跟隨者，用道德、動機、技巧、遠景去說服跟隨者，但是不論採用何者模式，第一件事是意義必先詮釋清楚、分享目標。

## 九、輔大的競爭優缺點

沒有事情不會改變，而改變也不容易；輔大 80 年的教育與學術的發展，都有相當的聲譽與社會地位，在社會不斷的改變中也面臨改變的壓力，每四年一任的校長帶來新的作風、計畫與改變，但是改變是必須伴隨著遠景與組織目標，學者 Raphael Wilkins (2002) 說，一個學校要舊酒裝新瓶必須要掌握核心原則，首先制定優先順序，一切依事實成果來看，將發展內置於工作中、不求短期效益與其他學校合作成夥伴關係、為教職員創造學習的時間而成為專業學習社群 (professional learning communities)、建立整體的擁有者關係 (ownership)，這其間要建立清楚的道德目的 (moral purposes)、掌握多元化 (diversity)、合作 (collaboration)、創意 (innovation)、網路 (networks) 及中層階級的凝聚力 (middle-tiers & coherence)，事實上這些原則在輔大校園都多少有些蛛絲馬跡，例如多元化、道德原則、合作、創意、網路，唯尚未見有效率的學習社群的學習形組織 (learning organization)，知識經濟時代的知識會迅速產生與失去價值，知識的產生與學習必須更加快，但也必須有效率與方法，學習形組織是認為每個成員都需要不斷學習，與謙虛於所學，與社會脈動同步，將個人的能力創造成組織的未來，但保有組織內部的核心意識與文化，會更能提供組織內部的成長 (Senge 1990)；Wallace 等學者 (1999) 說一個學習形組織需要領導

者是設計者、老師、看護 (stewards)，又說學校的成功或失敗責任通常是在教育領導者 (誰是教育領導者?)，Pfeffer (1978) 說學校的成果通常歸因於個人的領導統御地位，通常沒有考慮外在的環境，領導者如校長的位置因此是重要的關鍵，一個開放式組織的學校的領導統御應該是焦點在於人與環境 (human-environment) 互動及組織發展上。

輔大的競爭力在於傳統文化、人性了解、宗教愛人情懷及一些專業課程，根據黃崑巖 (2005) 的說法，國內尚未有一所把倫理當作一門獨立學問來研究的學校，輔大的全人教育中的專業倫理課程在這後現代社會中，當可加強成為強有利的競爭實力；劉兆漢認為通識教育在未來人才培育上具有關鍵的地位，以博雅教育 (liberal arts) 稱之通識教育在輔大也行之多年，以人文學術著稱的輔大，加強哲學性課程的教學與教法，也是其他講求技術與科技的名校，所難以競爭的，快速變遷的社會需要重新檢視人生價值與義意，需要重新定位社會倫理，輔大可以提供社會這類知識，相信輔大有其學術上的優勢。

輔大基本上在校地、人員、師生上都接近飽和臨界線，每一屆校長的企圖心是輔大不斷擴大的原因，但是，一個基於基督精神辦校的學校是否應該與其他大學一樣那麼有地位競爭心，是值得思考與反省的，畢竟教育的品質、學生的權益與未來發展是應該一起被考慮的。

## 十、領導者特質

所有的想法與發展都必須有個有效率的領導者 (effective leader) 來執行，根據學者 Perkin-Gough (2002) 的說法，學校中不僅校長在學校中是領導者，而許多學者都相信大學中的院長是最大的院系管理領導者，而每個老師更是他班上學生們的領導者，如此說來，所有的領導者都必須具有領導者的特質與技巧，這包括應該是個有願景的領導 (visionary leader)、促進式的領導 (facilitative leader)、倫理的領導 (ethical leader)，以共同創造一個學習型大學組織，幸好依照耶魯大學的「全球化中心」的訓練，領導統御的觀念與技術是可以被訓練出來的。

Alexander Austin 和 Helen Austin (2000) 認為有效的領導統御是自我了解 (self-understanding)、能聆聽 (listening)、有技巧 (skills)、具同情心 (empathy)、誠實 (honesty)、正直 (integrity) 及有能力一起合作工作，他們也認為領導統御 (leadership) 應該是能關注於一種醞釀中的改變，其本質是價值導向的，而所有的也人都是領導者，領導統御是團體中的必然程序，而 Daft 和 Lengel (1998) 認為有六種簡單的力量能促成有

效率的領導統御：

1. Mindfulness：包括獨力思考能力、個人創意、開放的心智。
2. Vision：能使工作在整體努力上產生意義與靈感。
3. Heart：代表關心與寬恕是種正面的情感，能有助於工作關係的建立。
4. Communication：關係到聆聽與關心，是能用尊重的遠見、價值、情緒去影響他人。
5. Courage：能勇於冒險、放棄安逸、追求領導。
6. Integrity：誠實、信任、服務別人、排除「我」的想法。

如果進一步區分領導為兩種分類：一種是團體中的領導條件，一種是個人自我要求的領導條件。

1. 對團體來說，應該是合作的（collaboration）、分享目的（shared purpose）、尊重意見不一致者（disagreement with respect）、認為每個人皆能對團體有所貢獻（each individual has significant contribution for group efforts）、形成合作式學習環境的服務（serve as a collaborative learning environment）。
2. 對個人的領導者來說，必須要有自己能掌握的知識（self-knowledge）、確信對團體的忠誠（authenticity/integrity）、一種全心全意的承諾（commitment）、體諒與了解他人（empathy/understanding of others）、具有充足的知識、技術及專家能力（competence）。

在所有的領導理論中最後都強調倫理、道德的重要性，領導者要以身作則，其重要的責任是做決擇（decision-making），而相互信任（mutual trust）是決擇的基礎，領導者一旦失去組織成員的信任，領導的問題將難以有效率及結果，並且很難恢復原來關係，所以信任是一切領導活動的開始，失去信任的代價是難以描繪的嚴重，從羅光校長談起的歷任神職人員校長的特質與能力，說明輔大已奠定良好的轉變型領導風格（transformative leadership）模式，因為是神職人員的操守被肯定，所以衍生的信任能使歷任神職校長能順利推動學校事務，未來的學者治校的校長遴選也應強調品格、道德、信任度及領導理念 因為他是 leader、adviser、designer、mentor、coacher、steward、gardener、participator、scholar、researcher，但是不是 warrior。

加強全校師生的領導統御技術與觀念，可以促進個人在解決一些遇到的問題上的創意解答，在談到服務學習（service-learning）課程或是社團負責人訓練的時候，領導統御的課程可以提升個人面對問題的能力與看法，美國許多大學在社團活動中都安排有學生領導研習營

(Student-Leadership Camp)，來加強學生的個人能力與責任感，同時因為技術的練習，可以減少當面對難題時的自我挫折感，因此領導統御不僅是治校管理學者的必修課，同時也是有企圖心的學生最愛，如此上下提升學校解決問題的能力，學校自然增加競爭力，校園氣氛也終能導向共同願景、分享目標之路。

## 十一、結論

目前社會動盪不安的政治情勢，衝突、改變、震驚都形塑我們的生活空間，人與人之間因詐欺充斥而缺乏信任，影響所及於大學校園中的情緒，對於大學明天的未來，我們應喚起熱情與希望，未來的校園領導者應不僅需要新知識與技巧以面對各種艱難的挑戰，包括經費的短缺、校園的擁擠、各種不同的異見等，同時卻要展現高度的領導熱情、智慧與成熟度，輔大以羅光校長的領導風格，多少給予我們一個領導者的風範，積極、魄力、智慧、知識、遠見、自信及最重要的宗教熱誠與愛及寬恕的天主教信念，引領輔大自信地走向一個競爭的時代，輔大的學術教育地位必須依附在校長領導能力上，並且反映在院長、老師的領導態度上，如此方能完全地投入一個全員領導的競爭時代，找到自己方向與目標是先決條件。

### 輔大的競爭力關鍵

學者 Koch (2004)談天主教內常引用的僕式領導(Servant Leadership)提到服務對象時說，學校的服務對象是學生，因此如何培養學生的學習效果，所有的努力都是希望有個完善的環境提供給學生，他說校長授權、支持、提供資源給副校長，副校長提供相同的資源給院長、職員，終究以此方式提供最好服務給最終的學生，因此學校的競爭力是全體的總合；根據上述的陳述，輔大的競爭力可以有以下的建議，一個有競爭力的大學不僅止於學術上的競爭實力，相對的應該把全校形成一個競爭力的學習型組織，透過共識、能力提升、活動執行力、反省，而能有下列可能的考慮：

- (1) **加強領導能力與技巧**：領導位置來自於校長、院長、老師，透過授權，來帶動一個有效率的學習型組織，不光是學生需要學習專業課程，老師應帶領他們做有效率學習，院長應引領老師的研究與發展，校長應營造一個學習與研究的學術環境，提供最佳的環境來挽留人才、創造人才，如此才能真正有競爭力，而不是一個口號。

- (2) **加強服務老師的各項工作**：在教學、服務、研究、福利上能為老師多所設想，如此能留住人才，激起群體意識，而不會淪為國立大學師資的跳板，培養別的學校的競爭力。
- (3) **加強老師與學生品格上及人格情操上的活動**：舉辦校外活動，例如健行與登山，將校長與院長的領導放在戶外大自然的環境，一種參與式的領導（Participate Leadership），感受人與大自然的和諧關係，促進彼此的尊重與情感交流，將天主教的聖堂放在心中，帶到郊外的高山或海邊做祈禱，真正認識自己、學校，反省於所追求的一切。
- (4) **加強各級新進人員的輔助（mentoring）工作**：包括各級主管、老師、職員，對他們親切輔導，以建立一體的學校共識，不要讓他們迷惑、痛苦於新的組織文化中，從而建立信任、互助的模式，長久下去，學校的競爭力就會大幅提升。
- (5) **成立菁英領導學程（The Elite Leadership Program）**：利用本校特殊之全人教育理念，組織哲學、社會學、傳播學、全人教育中心、歷史學、中國文學、政治學等學系，進行跨學系之領導人才培育，授予證書，向校內外徵選領導人才，可提升本校人格養成教育之名聲。

根據 94 年 10 月立法院第 6 屆第 2 會期，教育部主管 95 年度施政計畫及收支預算案報告書內容，教育部 95 年度施政計畫重點有三點，其中第二項為促進高等教育品質及效能，提升國際競爭力，細目則是如下：

- (1) 拓展國際學術交流，加強吸引外國學生來台留學，改進公費留學考試制度，獎勵國內學生出國留學及建立留學、遊學輔導機制。
- (2) 發展國際一流大學及頂尖系所，鼓勵設置跨校研究中心。
- (3) 檢討技職教育政策與體制，調整私立技職專校院獎補助比例與增加競爭性獎助款。
- (4) 推動大學校際合作與整合，擬定階段性重點人才培育政策。
- (5) 建立大學評鑑機制，提升高等教育品質。

這些都是輔大未來可以衡量發展的空間，但是一個有效率的領導者將需要反省自己所掌握的資源、能力、專長與師生期望，重新評估可能造成的結果，去做最有價值的倫理抉擇（ethical decision-making）；學者 Susan McLester（2004）認為，今日的領導者更需要擁有較之以往更多且實際的領導技巧（Today's leaders must also possess more practical leadership skills than ever before）以面對全球化的未來。

## 參考資料

- 北京輔仁大學校友會，《北京輔仁大學校史》，北京：中國社會出版社，2005年。
- 李震英，「訪問有關前校長羅光總主教的治校理念」，2005年10月21日，輔仁大學神父宿舍
- 徐式寬、岳修平，〈大學教師教學目的與策略〉，《二十一世紀大學教育的新挑戰》，台北：國立台灣大學東亞文明研究中心，2005年。
- 涂經詒，〈大學系所在二十一世紀高等教育挑戰中的角色〉，《二十一世紀大學教育的新展望》，台北：國立台灣大學東亞文明研究中心，2005年
- 陳方中，《于斌樞機傳》，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2001年。
- 陳維昭，〈全球化趨勢中的大學交流與合作〉，《二十一世紀大學教育的新展望》，台北：國立台灣大學東亞文明研究中心，2005年。
- 陳維昭，〈當前我國大學教育的困境及其因應〉，《二十一世紀大學教育的新挑戰》，台北：國立台灣大學東亞文明研究中心，2005年。
- 黃俊傑，《二十一世紀大學教育的新展望》，台北：國立台灣大學東亞文明研究中心，2005年。
- 黃俊傑，《二十一世紀大學教育的新挑戰》，台北：國立台灣大學東亞文明研究中心，2005年。
- 黃崑巖，〈二十一世紀大學教育的新展望〉，《二十一世紀大學教育的新挑戰》，台北：國立台灣大學東亞文明研究中心，2005年
- 輔仁大學，《羅光主教思行傳略》，台北：天主教台北輔仁大學，2004年。
- 劉兆漢，〈二十一世紀我國大學教育理念〉，《二十一世紀大學教育的新挑戰》，台北：國立台灣大學東亞文明研究中心，2005年。
- 戴曉霞，〈高等教育的國際化：外國學生政策之比較分析〉，《二十一世紀大學教育的新展望》，台北：國立台灣大學東亞文明研究中心，2005年。
- 羅光，《生活自述》，台北：輔仁大學出版社，1997年。
- Astin, A. W. & astin, H. S. "Leadership reconsidered: Engaging higher education in social change," *Kellogg Foundation*, Battle Creek, MI. 2000.
- Burns, J.M. *Leadership*. NY: Harper & Row. 1978.
- Daft, R.L. & Lengel, R.H. *Fusion Leadership*. SF: Berrett-Koehler Publishers,

- Inc. 1998.
- Eddy, J.P. "Higher education perspectives for leaders," *Edina*. MN: Burgess International Publishers. 1993.
- Koch, C. "Servant leadership," *America*, 7/5/2004, Vol. 191 Issue 1, p17-20.
- Locke, E.A. & associates. *The essence of Leadership: the Four Keys to Leading Successfully*. NY: Lexington. 1991.
- Lovett, C.M., Mundhenk, R.T., Shulock, N., Reed, C.B., Rust, Jr., E.B., Layzell, T.D., Burke, J.C. & Christ, C.T. "How can colleges prove they're doing their jobs?" *Chronicle of Higher education*. Vol. 51 Issue 2, pB6. 2004.
- McLester, S. "Does smart leadership look like?" *Technology & Learning*. June. Vol. 24, Issue 11. 2004.
- Montez, J. *Developing an instrument to assess higher Education leadership*. The Annual Meeting of the American Educational Research Association, Chicago, IL april 21-25, 2003.
- Murphy, S.D. "21<sup>st</sup> century leadership practices needed for higher education," *Academic Search Premier*. Spring, Vol. 117, Issue 3. 1997.
- Perkins-Geough, D. "Beyond instructional leadership," *Academic search Premier*. May. Vol. 59. Issue 8
- Pfeffer, J. "Management as symbolic action: The creation and maintenance of organizational paradigms," *Research in Organizational Behavior*, 3: 1-52. 1981.
- Rost, J.C. "Leadership for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Westport, CT: Praeger*. 1993.
- Senge, D.A. *The Fifth Discipline: The Art and Practice of the Learning Organization*. NY: Doubleday. 1990.
- Shafritz, J.M., & Ott, J. S. *Classics of Organization Theory*. Orlando, FL: Harcourt College Publishing. 2001.
- Stogdill, R.M. *Leadership*, membership and organization. Psychological Bulletin. 1950.
- Wallace, S.O., Sweatt, O. & Acker-Hoceav, M. "Leadership accountability models: Issues of policy and practice," *The Annual Meeting of the University Council for Educational Administration*. MN: Minneapolis 47: 1-14. 1999.
- Wilkins, R. "The core principles: New wine in old bottles?" *Education*, 71:9. 2002.

---

Wright, D.L. "Faculty development and centers in research universities: A study of resources and programs," In M. Kaplan (Ed.), *To Improve the Academy*, Vol. 18, 1997, pp. 291-301. Bolton, Ma. Anker Publishing Co. and the Professional and Organizational Development Network in Higher Education.

## 附錄

### 從七零年代開始的社會背景

#### 七〇年代

##### 1. 政治

從一九四九年國民政府撤退至台灣，五〇年代的慘澹經營，六〇年代的辛勤開拓，在國人的努力之下，經歷二十多年，台灣地區已經蛻變出與昔日不同的風貌。在這個時候國際情勢詭譎多變，台灣的國際空間逐漸遭到壓縮。

在國際現實利益的前提下，國際局勢的變化對台灣當時所處的國際位置極為不利。

一九七〇年八月十二日美國政府認為釣魚台列島為琉球群島的一部份，欲將其歸還給日本。此舉激起美國華人的憤怒，於是全美各地紛紛成立「保衛釣魚台列島運動委員會」，這個運動很快就獲得台灣內部的響應。一九七一年四月台大、師大等校學生走上街頭遊行示威，而「保釣運動」便揭開了台灣七〇年代民族主義波瀾狀闊的序幕。

從「釣魚台事件」開始，台灣的外交關係遭到一連串的挫敗，國際地位也逐漸滑落。一九七一年十月二十五日聯合國通過決議，台灣被迫退出聯合國。接之而來的，是與世界強國終止外交關係的骨牌效應。一九七二年二月，美國與中共關係正常化，各大強國也都紛紛與中共友好。一九七二年二月，我國與日本斷交，一九七九年中美斷交，更使我國當時的外交關係雪上加霜，台灣成為國際社會的孤兒。於此，中華民國的邦交國由一九七一年的五十四個國家，到一九七八年僅剩二十一個國家。然而，這些國際情勢，使得台灣七〇年代瀰漫著極強烈的民族情緒。

七〇年代全球民主和共產兩大集團的對峙持續升高，台灣與中共的鬥爭依舊僵持在「漢賊不兩立」的局面，原來的國家認同，也出現了「台灣」與「中國」的分立聲浪。這十年當中，共歷蔣中正、嚴家淦、蔣經國三任總統，由十年來的元旦總統宣言看來，不難發現國家一切發展的終極目

標，均在反共。從蔣中正總統強硬的「倒毛」、「討毛」革命，以「莊敬自強，處變不驚。」勉勵全國軍民；嚴家淦總統和蔣經國總統強調精誠團結、建立開明政治、開放社會，都在與中共「以武力解放台灣」對立。報紙中也充斥著大陸人民對毛賊的痛恨、對三民主義的嚮往而投奔自由的報導。無時不刻地強調我國政治修明、經濟蓬勃、社會和諧、教育普及……等等優勢，並在元旦閱兵大典上展示軍容。這些都是為了凝聚國人向心力和對國家的信心，達成全民反共的神聖目標。一九七五年四月蔣中正總統去世，代表了嚴厲型威權體制的告終，但後任的總統反共的意念仍是不變。

大抵而言，由於我國與中共長期的惡劣關係，加以保釣運動的發生，中共和日本成為我國七〇年代的兩大宿敵。而在一九七九年中美斷交的危機下，反對勢力掀起一連串的街頭運動，引爆群眾與軍警人員激烈衝突的「美麗島」事件，為七〇年代畫下了句點。就在這樣國際與內部都在變動和紛亂的情形下，整個七〇年代可說是台灣社會環境急遽變遷的十年。

## 2. 經濟與社會結構

相對於國際外交與國內政治局勢的動盪，經濟的發展到七〇年代有了長足的進步。一九七四年一月政府提出「穩定當前經濟方案」，而在蔣經國擔任行政院長後，更突破當時經濟蕭條的局面，於一九七四年展開「十大建設計劃」，期望以大規模的公共投資，帶動國內經濟景氣。一九七六年又推動「六年經濟建設計劃」，發展資本與技術密集的工業，使台灣在七〇年代儘管歷經外交上的挫敗與二次能源危機，仍能在穩定中求進步，逐步邁向工業國家的行列，國民年平均所得亦大幅增加。據報導，台灣地區從六〇年代初期到七〇年代初期，非農業人口（包括工業人口）升至百分之七十五，農業人口降至百分之二十五。這個國民社經屬性的轉變，便是國民政府致力經濟現代化的結果。

七〇年代，伴隨著社會經濟的成長與私人資本的累積，中產階級逐漸興起，帶動了社會結構的改變，也帶來一股新興的旺盛活力，造出了新的台灣文化。

## 八〇年代

八〇年代是一個爆炸性的年代，其威力在九零年代仍餘波盪漾，其時雖為遠，但路程卻漫長。這一個多事的旅程，代表著台灣社會全方面的改革，由一元到多元，政治上的本土化傾向以及反對黨的出現；經濟上外匯存底年年創新高，台幣一路升值，股價、房價飆漲；大眾消費社會已然成

型，商品的國際化，品牌觀念也取代了傳統的節儉觀念。同時，這是充滿社會運動的時代，不同的社會團體走上街頭搖旗吶喊，環保運動、女權運動、學生運動……紛紛在八〇年代燃燒起來。

## 社會變遷與現象

關於八〇年代台灣的種種社會現象，將區分為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等方面做較詳細的敘述。

政治上，七〇年代末期爆發了高雄『美麗島事件』，在野反對勢力受到極為嚴重的打擊，但是卻為八〇年代的政黨政治埋下了伏筆。『美麗島事件』雖然使得當時許多在野反對菁英身繫囹圄，但是卻引起當時一些知識份子的同情，其中尤以為此事件參與法庭辯護的律師為首（如陳水扁與尤清接因此而加入在野勢力）。

一九八零年六月恢復增額中央民代的選舉，在野勢力亦循著此種體制內的遊戲規則，整合一些經由選舉所產生的黨外人士，聲勢日益壯大，建立政黨的呼聲也日漸升高。一九八六年九月成立了『民主進步黨』，十月，當時總統蔣經國先生宣布將儘速解除戒嚴，開放黨禁。一九八七年七月通過解嚴案，此時台灣才正式結束長達四十年的各項禁制，回歸民主憲政。

一九九八年一月蔣經國先生去世，李登輝繼任總統。在李登輝的主政下鼓勵由大陸時期選舉產生的國會代表卸下職務，終結台灣『萬年國會』的惡名，使國會全面改選，加快台灣民主化的腳步。八〇年代，在野勢力長期對民主政治的訴求，加上隨著經濟發展而擴大民主參與的層面，而能在九零年代開花結果，『政治奇蹟』成為台灣執政當局向國際炫耀的成績單。

經濟上，台灣經過三十年的辛苦經營，經濟轉形成功，創造了舉世稱羨的經濟奇蹟，成為一個眾所矚目的新興工業國。外匯存底屢創新高，從一九八三年破百億美元，到一九八七年破五百億美元。然而這種繁榮的景象，造成貨幣供給量的遽增，過渡膨脹的結果導致一些負面的現象產生，如房地產、股市的狂飆，民間游資到處充斥，社會上盛行大家樂、六合彩等投機性的行為，在加上嚴重的『十信金融風暴』，形成經濟與社會發展的隱憂。

而在社會文化上，在經濟掛帥與一片民主化的八〇年代，台灣社會文化的發展呈現兩種極為顯著的特質：一是泛政治化與社會運動的訴求；一是休閒文化事業多元與大眾消費時代的來臨。

工商社會的急速到來，傳統農業社會的價值體系崩解，嶄新型態的社會價值信仰與行為規範還未建立，隨著經濟的發展，中產階級興起，教育

水平與知識水準的提升，擴大這些中產階級對社會的高度期望。在對社會的參與逐漸升高之際，出現了社會抗爭與批判的人文思潮。

一九八三年，三重二千多戶居民為反對興建二重疏洪道，具路抗爭，成為『自力救濟』的濫觴，往後許多團體為爭取自己的福利都以『自力救濟』為名。一九八八年的五二〇事件，農民北上請願，爆發流血衝突，為四十年來首見。

在環保運動方面，一九八六年，杜邦公司欲在鹿港設置二氧化鈦廠，鹿港民眾起而示威反對設廠，台大學生在暑假期間下鄉調查，發表調查報告。隔年，杜邦便放棄設廠，環保署也在同年成立。一九八八年，台灣第一個地方性反核組織——鹽寮反核自救會，一九八九年，發生規模最大的反核遊行。

原住民的權益也開始受到重視，一九八七年，布農族原住民對『東埔風景區規劃』強遷先人墓地抬棺抗議。另外原住民團體抗議要求刪改吳鳳神話的課文，及更改吳鳳鄉地名，一九八八年，『台灣原住民族還我土地運動聯盟』在台北遊行。

八〇年代，各個社會團體紛紛起而發聲，走上街頭爭取自己的權益，初期是一連串的工運與農運，末期則由於大陸的『天安門事件』，知識份子與社會各階層的聲援，觸動台灣沈寂已久的學運。

而隨著七〇年代經濟發展的成長，使台灣人民的消費能力大增，有餘力多關注於本土文化。到了八〇年代麥當勞等速食連鎖店在台掀起一波熱潮，其他國際名牌商品也開始進駐台灣市場。而人們也開始致力於通俗的消費文化上，包括現代民歌與現實取向的鄉土文學。在國際資訊的自由開放之下，國外高級藝術表演活動，也成為此種消費文化上的另類商品，因而開始大量引進國際知名的藝術表演。此外，隨著政治的開放，報禁的解除，促進了傳播事業的發展。而以上重要的社會變遷現象，便由紀錄片反映出來，作為歷史的見證與記錄。

## 九〇年代

90年代對原住民議題的轉變與重視，和整個國家的社會、政治、觀念變遷息息相關，歸納90年代所發生的事件、思潮，可指出影響的關鍵：

- (1) 建基在「反大中國主義」下的「台灣本土化」意識高漲。
- (2) 文化弱勢社群的自覺及來自大環境對其的關懷。
- (3) 聯合國「國際原住民年」的理念、活動推展。
- (4) 「正名運動」的全國性議題效應。

分析如下：

(1) 有關本土化意識的高漲

1990年李登輝總統上任，1993年郝柏村先生辭去行政院長一職，使得台灣政壇轉向另一新階段；在社會、政治、教育、藝術，甚至是企業形象的塑造，要求摒除大中國、漢本位主義，而將主體放在台灣的「台灣意識」浪潮，使得過去同被大中國意識壓制的原住民在此能有個反動的空間。

(2) 對於弱勢團體的自覺及外來的關懷

同樣是對舊有政權的反動，許多強調弱勢團體或學者、輿論同樣在此得到發聲的空間，其主要目的通常是為了對政府或社會資源不合理的資源壟斷及分配，提出權利的要求及合法的保障，如：殘障、性別歧視、同性戀，乃至族群等等，對其社群本身而言是一種對壓迫的事實的一種自覺，而興起的自主性運動，對其他學者和記者而言，90年代的多元文化主義的學術、思潮主張，強調族群、社群的認同及差異，亦能對弱勢社群投注以相對的關懷旨趣。

(3) 國際原住民年的效應

在台灣原住民追求自主、反壓迫的運動中，1993年聯合國將該年訂為「國際原住民年」，除了宣誓各項保障世界原住民的計劃外，也確立了世界「民族權利宣言」將於1994年正式通過的決議。同時這也是使得國內原住民運動菁英及媒體，得以將其論述置於與全國原住民聲氣相通的情境來討論，成為一個兼具國際話題討論的空間。

(4) 「正名運動」的全國社會性議題效應

自民國73年起，原運菁英便開始針對族群的名稱做訴求及爭取的工作，在歷經十年的過程中，即使像76年解嚴後四、五年的社會條件下，仍無法解開這樣的體制。「正名運動」在民國81年、83年兩次修憲階段，由於原運團體對國大議會的請願抗爭，甚至造成衝突，使得正名運動在此時才成為了全國性的公共議題，而被報紙媒體設定議題，而受到學界、輿論的廣泛討論和辯論。

90年代由於「本土化」、「社區」、「地方」意識的擴展及觀光休閒行為的改變，使得原住民文化、藝術備受注目。自1991年結合各族原住民所組成的「原舞者」表演團體，從成立以來一直受到文化藝術界的矚目，除了多次受邀至國家劇院演出外，於1993年8月應紐約林肯中心之請赴美公演，隔年亦至歐洲表演等等，使其得以受到國內外媒體的重視，也獲文建會列為「國際扶植表演團體」。



## 輔仁大學校史檔案概況

吳瑞珠\*

### 摘要

輔仁大學校史室正式設立於 1980 年（民 69 年），設立之初以收集復校以來秘書室重要公函，以及復校初期的發展規劃案中，擇要保存的一些相關的信件、紀錄和照片。至 1987 年依據「輔仁大學校史室簡章」，校史室有了較明確的工作內涵後，開始拓增資料收藏的內容。

校史室設立迄今 25 載，按筆者認為，校史室的主要工作就是：將具有縱深及保存價值的學校歷史資料加以蒐集、編目、保存，並且進一步推展與校內專業領域的研究結合，而能對今日「輔仁人」在思考發展方向、研擬對策、追求創新之際，有所啟發及助益，如此才能展現校史的價值與意義。

因此，本文擬對目前校史室編目登錄之資料，系統化的情形加以介紹說明，使有興趣的研究者能掌握校史資料脈絡，而易於從事相關研究；另一方面則希冀藉由系統的資料，提供給校園文化更大更多的刺激和創造契機，因為它是有情感、有生命、兼具特色的集體記憶。

關鍵詞：輔仁大學、北京輔仁、台北輔仁、校史檔案、檔案目錄

---

\* 進修部哲學系副教授兼校史室主任。

## 壹、前言：“有傳統才有根源，有創新才有歷史”

輔仁自一九二五年在北京創辦，一九六一年在台灣復校，歷經國家社會環境劇變，人事更迭，在歡渡八十週年慶之際，回首這段豐富的歷史，藉由人、事、時、地、物的回憶考察，所觸動的不應、也不僅是每個研究者個人主觀內在的感動而已，在輔仁歷史編年的紀錄中，相信可以在此時此刻，提供我們面對外在激烈的大學競爭，及校內所進行的大規模校務整合時，更大更多的啟發和創造的元素，因為她是有情感有生命兼具特色的集體記憶。這對於肩負俗世大學與天主教會大學雙重使命的輔仁大學而言，確是邁向整全的輔仁大學可資運用達到「唯一」<sup>1</sup>的利器。

## 貳、歲月流光中的輔仁

輔仁大學的創辦追溯歷史可前推至一九二五年<sup>2</sup>的北京。民國初年，基督教積極在華籌設大學，天主教教友亦感中國傳統文化與世界新知脈動接軌的迫切需求，而有上書羅馬教廷來華創辦公教<sup>3</sup>大學之舉，一九二五年始以英斂之<sup>4</sup>創辦之「輔仁社」作為大學設置的基礎。

輔仁大學因於中西文化交融之校風，又逢社會變遷與國家命運交纏連結而別具特色。至一九五二年中共教育部以院系調整名義將本校大部分併入北京師範大學為止，短短不到三十年的歷史，正式入學的學生共有 12,355

<sup>1</sup> 「唯一」，係現任校長黎建球教授就任後提出之治校目標，以與時下因缺乏價值觀引領，又無歷史典範依憑，以致無所不用其極追求「第一」之心態加以區分。

<sup>2</sup> 本校創校年代，因採標準有異，認定自有不同，歸納言有如下四個年代：(1) 1929 年—國民政府正式核准立案 (2) 1927 年—以單一學院准予試辦，「輔仁大學」之名始立 (3) 1925 年—北京公教大學在教廷支持下成立，以附屬「輔仁社」之名招生。(4) 1913 年—輔仁社初社之年，該社成立背景與輔大淵源極深。長久以來，北京輔仁大學校友會以 1927 年為輔仁創辦年代，而在台灣復校後，此間又以 1929 年為據，兩年之差距造成北京及台北兩地師生困擾。本室於八十九年間針對本項問題，經蒐羅各項文件、資料、紀錄、出版品及學術研究報告，論文彙集成冊，並邀集歷史學者、修會代表及資深校友提供意見，並取得共識，以一九二五年為本校創辦之始，北京校友會亦正式同意採取該年代為輔仁創辦年代。

<sup>3</sup> 「公教」(Catholic)一詞來自希臘文，包括兩部分：Kata (按照)，holou (全體)，原來西方名詞譯為「公教」爾後在中國則譯為「天主教」。按 1999 年世界天主教大學名錄，全世界共有五十一所直屬羅馬教廷教育部之「公教大學」(Catholic University)。

<sup>4</sup> 英斂之 (1867—1926) 正黃旗旗人，1888 年信奉天主教，1902 年辦天津大公報，與馬相伯為忘年之交，兩人均認為要促進公教在社會上地位，必須在中國開辦高等學府，於是兩人就合撰「上教宗求為中國興學書」，但未立即反應，英斂之遂先行於其居處—北京西山靜宜園中成立輔仁社。(參考陳方中教授：湯若望與英斂之宗教思想的聯繫，1992)

人，並躋身為北京四大名校<sup>5</sup>之列。一九六一年由於來台校友們的努力，終得以復校，並開始招收哲學研究所學生八名，至一九六三年購置新莊校地正式參加大學聯招而有最初的四百餘名大學部學生，至此，於焉展開輔仁第二階段「十年樹木，百年樹人」的教育事業。

### 參、「校史室」的任務及工作

掌理輔仁大學校史的校史室正式設立於一九八〇年（民 69）年，由時任董事會秘書龔士榮教授（一九四四年畢業於北京輔仁歷史系）兼任主任職務，並以復校以來秘書室重要公函（含教育部、教育廳之復校規章、公文、羅馬教廷教育部文件及董事會重要記錄等等）及具有歷史意義之非文件類物品保存為主要工作。至一九八七年由復校後第二任校長羅光總主教手書〈校史室簡章〉，校史室業務始有明文依據。<sup>6</sup>為了能將校史做較精準之蒐集，本室於一九九六起將分佈於北京師範大學檔案室、美國本篤會院及校史室已有之文件、雜誌、函件、論文資料統整，於二〇〇〇年並擬定校史八階段<sup>7</sup>工作及蒐集方針和內容，五年來本室即按此方針逐步進行蒐羅，不斷地將所得資料整編。

校史工作在本質上就是一個了解或收集學校歷史的單位，基本上學校當局並不會也不必要特別注意，只要完成資料收集的任務，並在慶典或特殊日子中為師生或社會大眾提供學校歷史上重要的人、事、物記錄的功能即可。但是筆者認為「校史」必須與現實時空結合，才有意義和價值，而這層意義和價值又必須與學校重要活動或事件結合才能達到。因此宣示校

<sup>5</sup> 時稱北京四大名校，為北京大學、師範大學、燕京大學及輔仁大學。

<sup>6</sup> 該簡章共六條，條文如下：

- 一、依照本校組織章程第三章第十三條，本大學設置校史館，以收藏有關本校之歷史資料。
- 二、凡有關本校成立、復校及增加院系所之公文，俱交本室收藏。  
凡有關本校與他校締結姊妹校或簽訂合作協議之證書及協議書俱交本室收藏。  
其他有關本校歷史之資料，亦交本室收藏。
- 三、本室編寫所藏史料目錄。
- 四、本室置本校大事紀，按月記錄本校重要事件。
- 五、本室設校史陳列館，陳列有價值之史料供大眾參觀。
- 六、本簡章由行政會議通過後施行，修改亦同。

<sup>7</sup> 此八階段分別為：第一階段 1919~1923「輔仁社」之創辦及中國之教育環境研究；第二階段 1923~1932 本篤會創校和營運之研究；第三階段 1933~1950 聖言會接辦和時代背景之影響；第四階段 1950~1952 中共教育部院系調整之法令暨原則與輔仁院系調整之分佈研究；第五階段 1952~1956 校友師生之活動情況；第六階段 1956~1961 在台復校之籌備階段；第七階段 1961~2000 復但經多次座談修訂後，建議為校史蒐集方向參考，詳參，吳瑞珠，〈天主教輔仁大學的歷史與今日願景之整合〉，發表於〈益世評論〉，第 266 期或參考：<http://www.fuhu.fju.edu.tw/about/writings.htm>。

史工作的重要性，本身收集政策的明確性，保存知識的專業性，和建檔工作的流暢性都屬校史工作必須注意的事項亦同時為重要工作內涵。

### 肆、校史資料內容及分類概況

本室正式設室時，由前于斌校長之主任秘書龔士榮教授兼任主任，龔神父為著名歷史學家陳垣校長<sup>8</sup>器重的學生<sup>9</sup>。一九九一年轉由曾任羅光校長秘書之張淑芳女士掌任並與中國天主教文物館合併管理。筆者於一九九六年八月接任迄今將近十載。回顧十年的校史工作，資料的蒐集過程經緯萬端、整理工作耗日費時，至於研究與推廣工作，則需要更明智的規劃和積極鼓勵更多參與者的投入，才能展現校史的價值與意義。

為了便於爾後研究者，或專案活動檢索資料，特將本室近年蒐集所得資料按可參考資料、本室檔案分類及內容，擇要分項陳述如下：

#### （壹）一九六一復校之資料

##### 一、可參考資料：

- （一）、校內秘書室重要公函。
- （二）、復校初期規劃案。（擇要保存的相關紀錄、信件和照片）
- （三）、校長室、秘書室之雜項物件。

\*、背景說明：就校史室主管職務之便及個別認定之「重要」資料而予以保留所得部分。

二、檔案分類：除原先保存之文件，加上近年蒐集，歸入「復校類」（編號 200·0·0）、「台北輔仁類·文件」（編號 310·0·0）。

三、資料內容說明：主要為復校之籌備和初期相關重大事件之原件及重要記錄，重要檔案內容例舉如下—

- （一）、1963 年（疑）輔仁大學校歌之始末由作詞到作曲之討論（于

<sup>8</sup> 陳援庵名垣，1880 年生於廣東新會 1971 年逝於北京。1926 年至 1927 年任北京公教大學副校長，1927 年至 1929 年任北京輔仁大學副校長，1929 年至 1952 年任北京輔仁大學校長。1949 因中共教育部學習蘇聯教育制度，採單科制大學政策而對國內院系加以整併，輔仁大學院系大部分併入北師大，輔仁著名的經濟系併入人民大學，農學系 50 年併入農業大學，52 年家政系撤銷，輔仁西語系包括英語及德語，則將高年級學生及年資較長之教師併入北京大學，低年級之學生和年資淺之教師則改學俄語而成為俄語系。陳校長則於 1952 年至 1971 年任接北京師範大學校長。

<sup>9</sup> 參見邵台新，《龔士榮神父訪問記錄》輔仁大學學術叢書，校史系列（台北，輔仁大學出版社，2000），頁 53-54。

斌與黃友棣之親筆函)

- (二)、1963 英千里副校長述校務問題之稿件
- (三)、1963 輔仁大學學則 (學生守則)
- (四)、1965 輔仁商學院與 Santa Clara 大學之五年技術合作計畫
- (五)、1967 第一屆畢業典禮邀請函、教宗賀辭、剪報資料
- (六)、1968 海洋學院籌建計畫
- (七)、1960 于斌校長與谷欣樞機主教討論捐款及運用報告
- (八)、1963 聖言會對招生、師資之設備規定；以及行政人員之津貼、準則問題題綱及計劃
- (九)、1965 輔仁大學校地相關事
- (十)、1967 日本產業大學簽約
- (十一)、1969 《輔仁學誌》登記證
- (十二)、1969 捐款募集 (中美堂、文友樓)
- (十三)、1970-1975 之行政會議記錄
- (十四)、1972 哲概人哲課程之設置首次討論會議紀錄
- (十五)、近年與如上事件相關發展事項 (如黃友棣為校歌譜訂正事)

(貳) 一九七九年《輔仁五十季》<sup>10</sup>出版之意義

一、可參考資料：

- (一)、輔仁五十年大事紀
- (二)、紀念文輯
- (三)、處院系簡介

二、檔案分類：以上資料歸入「台北輔仁類·出版品」(編號：361·2·0)

三、資料內容說明：

按本刊物之出版，除了為慶祝輔仁大學 1929 年從北京正式以三院(文學院、理學、教育學院)獲准設立後的五十週年慶，時任校長之羅光總主教在序文中指出「全校師生願意追懷已往，策勵將來，乃編集《輔大五十年》，共相勉勵」書明了本刊物的主要目的。在這本刊物中由龔士榮神父主編之「輔仁五十年大事紀」，從 1866 年北京創校前之醞釀，建校之狀況與初期之發展，葦路藍縷的歷史以及在台灣復校之大事，首次以「編年體」的方式呈現，將北京與台北的輔仁歷史加以聯貫。另外就「紀念文輯」中邀稿的內容及撰寫者的代表性，實有助於對輔仁初創的目的、主事者之

<sup>10</sup> 輔大編輯委員會，《輔仁五十季》(台北：輔大出版社，1979 年)。

思想，以及輔仁在五十年中所成就或未完成的教育理想和文教事業的掌握。至於「處院系簡介」在當時可能是一份輔仁大學在台灣自 1961 復校後，十八年來在組織、人事編制、教學設備的完整介紹。在「編後記」中編委會特別提出其遺憾「……對文史以外的外籍師長，也多飽學碩德的人士，竟沒有一篇專文為之紀述，而有關司鐸書院則篇幅比例較多，這全是稿源問題……」也說明了這本刊物在「紀念文輯」部分因徵稿問題所生之問題，但另一方面亦指出校史中不可忽略「外籍師長」的貢獻部分。

### （參）一九八〇年設立校史室之後

#### 一、可參考資料：

- （一）、行政會議記錄 1979 起
- （二）、校務會議紀錄 67 至 69 學年度起
- （三）、七十一年度大事記要（公共關係室編）
- （四）、各單位之彙編、名錄（冊）、通訊錄、出版品

二、檔案分類：以上資料歸入「台北輔仁類·會議紀錄」（編號：313·0·0）、「台北輔仁類·出版品」（編號：360·0·0）

#### 三、資料內容說明：

本階段保存之資料因於校史室主任龔神父同時擔任董事會祕書，因此以各單位呈送董事會保存之出版品及會議紀錄為大宗。原應屬本階段之資料，因為 1997 年校史室銜命開始整理于斌校長遺物，及陸續由龔神父「釋出」之文件而得以補足，唯需再整理並歸併入檔。

### （肆）一九九一至九五年之進展

#### 一、可參考資料：

- （一）、輔仁大學大事紀要（自 80 學年度起，正式由校史室主編）
- （二）、接續收集之各單位之彙編、名錄（冊）、通訊錄、出版品
- （三）、輔仁大學新聞、校內新聞、校史及與本校相關人物之剪報資料（自 1979 年起迄今，1998 年後已與公共事務室合作）
- （四）、校內及校外舉辦之重要活動照片（自 1973 年起）

#### \*背景說明：

本階段因龔神父辭去校史室主任，而由原羅校長祕書張淑芳女士接任，以兼管「中國天主教文物館」名義聘為專任主任職務，並配置一位專任組員。專職人員的設置，及落實一九八七年羅校長所擬具的「輔仁大學校史室簡章」工作，使校史的資料收集及計畫有了初步雛形。又基於對校

史館的設置及展示需求，開始與在台校友會，及創辦本校之本篤會有較密切之接觸，並開始蒐集北京輔仁大學資料、出版品及擬定計畫。

二、檔案分類：以上資料歸入「台北輔仁類·出版品」（編號：362·0·0）、「台北輔仁類·文件」（編號：311·0·0）、「台北輔仁類·圖片」（編號：370·0·0）。三、資料內容說明：

由校史室彙編之大事紀要，按時間序，採條列方式，列舉各處、室、院、所、系在年度內各項重大活動，資料由各單位自行提供，本室按照「大事紀要編訂內容擷取辦法」加以刪定。自八十學年度迄九十一學年度共 11 冊（如列入公共關係室編七十一年度大事記要則為 12 冊）。其他之彙編、名錄（冊）、通訊錄、出版品。

最早的資料是 1964 年之「輔大新聞」創刊號，最完整的則是自 1967 年第一屆迄 2004 年 38 屆共 51 本的畢業紀念冊（因日、夜分開出版，或加入「婦女大學」亦或如管理學院單獨出版及形式之關係）。

#### （伍）一九九六年後之規劃

一、可參考資料：

北京輔仁創校前、初期之文獻、史料

台北復校前、初期之文獻、資料

台北輔仁之發展

\* 背景說明：

因於職務調整，1996 年由筆者接任校史室主任，業務交接時最重要的是一卷剛完成的六年（1996-2002）「校史室暨文物館特別計畫」工作專案，內容分校史室及文物館兩部分。校史館以（甲）創校、復校前之文獻、史料及修會檔案收集，（乙）有功人士資料收集、及對輔仁貢獻事蹟編纂為主軸的計畫，同時編列六年預算共新台幣 3,830,000 餘元。本項計畫雖從未向層峰正式提出過，卻給予筆者接掌的校史工作許多重點方向的啟發。

在心態上，筆者認為校史工作必須尊重前人努力的過程，無論在資料的收集、整理的方法或計畫願景上均盡可能持續，尤其不可因主觀認定的因素，而導致資料收集、整理工作和計畫執行的中斷，這是從事校史工作者最不能發生的情況，而這也是筆者一項校史工作倫理的堅持。

在實際工作中，自 1996 年始，本室致力於收集北京創校和台北復校之史料，併將「校史」與現實環境的需求與重要事件加以結合，例如與「大學入門」課程的配合，參與本校創辦七十週年慶的校刊《輔緣》編輯計畫，同時以該計畫蒐集之資料促成「校史陳列室」改館工程的實現。又在蒐羅

學校重要關鍵人物的資料時，除了平時持續的進行外，配合紀念活動或特殊節慶為快速有效的方式，例如于斌校長「傳記」出版及「百歲冥誕紀念」活動即為實例。另外由各創辦單位執行院、系、所史的撰寫計畫，和系所創辦人和名師的訪談和整理活動中，的確能讓師生在歷史的氛圍中體會到「使命，是一股使人在困境中仍能往前走的力量；特色，是一種說明為何存在的標示」<sup>11</sup>的意義。例如「法·管學院發展委員會」在 1996 和 1997 年間共融活動之訪談活動，「聖言會使命室」自 2000 年開始推動的「聖言會與輔仁大學歷史淵源」的研究尤具代表。

總體來說，本階段校史資料的蒐集和發展，主要以前三階段的基礎，系統地將文物資料加以整理建檔，另一方面，則是將校史業務重新詮釋並賦予現代關聯與意義為重點工作。

二、資料分類：以上資料歸入「北京輔仁類」、「復校類」、「台北輔仁類」三大類中之「文件」、「人物」、「修會」、「系所建制」、「建築」、「出版品」、「圖片」七大綱中。

三、資料內容說明：

(一)、北京輔仁校史資料：

如前「1991 至 1995 年之進展」之說明，經過四年的摸索，由校史室同仁按校長指示所擬具的「特別計劃工作專案」，按其內容我們可以理解校史室基於業務軟、硬體的需求，必須加強蒐集北京時期資料的迫切性。

最初由創辦修會「美國本篤會」與輔仁大學的研究收集開始，此時以本校康士林教授 (Prof. Nicholas Koss, OSB) 的聯繫協助及美國舊金山大學利瑪竇中西文化歷史研究所的研究員吳小新先生對「北平輔仁大學前期 1927-1933 部分歷史檔案資料的介紹」(編號：112·1·0) 最為有效，本室因此得以掌握該期資料分佈地點如下：a)北京師範大學檔案室，b)St. Vincent Archabbey Archive，c)Newark Abbey，d)St. Benedict's Convent Archives，e)St. John's University。

關於北京輔仁的出版品，最早及最具參考價值的是本篤會為募款在美國發行的雜誌〈Catholic University of Peking Bulletin〉(編號：161·2·0) 本室保存的為 1926 年 9 月之 No. 1 至 1934 年 9 月之 No.9 的影本，其中缺了 1930 年之 No.7 一期；及自 1933 年北平輔仁大學轉由聖言會 (Society of the Divine Word) 接辦後，同樣為了募款目的，在芝加哥出版了〈Fu Jen Magazine Catholic University of Peking, China〉(編號：161·

<sup>11</sup> 魏思齊，〈前言〉，收於《求真之道—徹悟生命·洞悉萬象賢知識》，理外民使命與特色叢書系列之一（台北：輔大出版社），頁 1。

3·0)，本室保存了 1935 年至 1940 年 6 冊影本；〈輔仁年刊〉（即為北平輔仁大學之畢業冊）（編號：162·1·7），本室原收集 1944，1947 至 1950 年共 5 冊影本；1989 年由李國良教授贈 1942 年刊原件乙冊，2001 年由聖言會柯博識教授贈入 1945（1 冊）、1947 年（2 冊）原件。

《輔仁學誌》（編號：161·4·0），具代表輔仁學風的學術傳統的刊物，於 1928 年 12 月創刊，由陳垣校長主編，本室蒐集了第 1 卷至 15 卷之出版。

《民俗學誌》（Folklore Studies）（編號：161·5·0），係本校在東方民族學（人類學）之學術出版，於 1942 創刊，由聖言會士葉德禮教授（Prof. Matthias Eder, S.V.D.）主編，本室蒐集了第 1 卷至 8 卷之出版。

另外則可藉由其他相關研究加以輔證，如 1993 年施麗蘭之〈Ying Lien-chih and Archabbot Aurelius Stehle OSB: the Beginning of Fu Jen Catholic University of Peking〉，1995 年吳小新之〈A Case Study of the Catholic University of Peking during the Benedictine Period〉，1997 年本校史研所研究生謝沁霓之〈《華裔學誌》研究 1950-1970〉等，得進一步了解北京時期資料及內容。其他出版品如董鼎編輯之《學府紀聞—私立輔仁大學》、孫邦華編著之《會友貝勒府—輔仁大學》教會在中國系列，在校校友會之《輔友生活》，《輔友報刊》均可做為了解北京輔仁大學之素材。以上可參考「北京輔仁類·出版品」（編號：160·0·0），「台北輔仁類·出版品」（編號：362·0·0）

1999 年由校友經校長自北京轉來存於北京師範大學檔案室之「私立北平輔仁大學檔案目錄」乙份，後因 1999 年籌印校慶特刊，委由本校新聞傳播學習賢德副教授由北京師範大學檔案室擇要影印乙批檔案<sup>12</sup>，本室於 2000 年經整編歸入 62 卷，補充了 1999 年僅有目錄之缺憾。詳參「北京輔仁類·文件」（編號：111·0·0）。

〈輔仁校友通訊〉為「北京輔仁校友會」1984 年恢復活動後之刊物，內容有許多可補充正式文件檔案不足之功能。本室完整蒐集了第 1 期（1984）至 27 期（2005）之出版。「北京輔仁類·出版品」（編號：162·1·8）。

〈私立北平輔仁大學一覽〉，1937 年及 1947 年之影本 2 冊

〈Catalogue of Catholic University of Peking〉，1943 年至 1948 年之影本共 4 冊。本室對北京輔仁時期資料之分類多置於「北京輔仁類」中，其中又分成文件、人物、修會、系所建制、建築、出版品、圖片七綱。

<sup>12</sup> 參見習賢德著，〈自序〉，《北平輔仁大學札記》，輔仁大學學術叢書，校史系列 1012（台北：輔大出版社，2004 年）。

## (二)、北京輔仁照片類：

早期北京輔仁的照片，祇能由各項出版品中翻拍蒐集，近年來由於專案、活動之辦理及校友及相關人士的慷慨捐贈，本室已按性質加註圖說，分別列冊保存。本項資料置於「北京輔仁類·圖片」(編號：170·0·0)分類保存。

## (三)、台北輔仁復校校史資料：

在台復校首任校長的主任祕書龔士榮教授如是說：「輔仁大學在台灣能夠復校，北平輔大在台校友的功勞，是不能磨滅的，這是于故校長一再所說過的」<sup>13</sup>。因此本室在蒐集校友會的資料時分為兩大部分進行：第一部分、紀錄與文件資料的蒐集，第二部分、出版品的蒐集。

第一部分由校友會王紹楨校友生前彙整之史料已歸「復校類·文件」(編號：212·0·0)。

第二部分則指 1958 由輔仁校友會創刊之「輔仁」至 1972 年第七期，本刊物對復校始末及至 1971 年之發展報導的內容翔實而豐富，本室完整保存乙套七期。

另一份校友之刊物為由校友總會於 1967 年發刊之「輔友生活」，主要在代替「輔仁」之增刊，因自 1967 年復校後第一屆畢業校友已加入校友會，因此活動增多，報導篇幅亦需擴增，為應實際需求而縮短出刊時間以三個月發行乙期，內容則以報導母校狀況、校友動態、會務情形等等，成為母校與校友非常有效之溝通橋樑。本室完整保存了創刊至 1982 年之第 18 期之刊物。「復校類·出版品」(編號：262·2·0)。

1980 成立「校友連繫室」出版報紙型之「校友通訊」創刊號，每季發行一期以連繫校友為目的，發行至第 9 期(1982)後，因申請登記為新聞紙類更改名稱為「輔友」雜誌發行至 21 期，至第 22 期改以雜誌編輯方式出刊，以每年出刊四期作為與校友聯繫之平台，本室保存創刊至 1996 年之 38 期共乙套，參見「台北輔仁類·出版品」(編號：362·1·10)

關於台北輔仁之復校史料，除了可參考如上所列之資料外，本室由董事會影印之呈報文件，及數年來因各項專案及遺物之整理而「出土」之文件，亦為一手之資料，參見「復校類·文件」(編號：211·1·0)。

## (四)、台北輔仁校史資料

### 1. 正式文件

台北輔仁的發展在歷任校長，相關人員及修會的參與中，逐步在「時」

<sup>13</sup> 參見龔士榮，〈台北輔仁大學復校簡述〉，<http://www.fuho.fju.edu.tw/about/writings.htm>

間的流轉裡、在輔仁這片校「地」空間中，由「人」為主體，構築了許多「事」件和「物」件。人、事、時、地、物五個向度，成為校史室在歷史文據的蒐集和實物保存的參考點。因此在資料分類項下，內容包括了「人」的部分，如歷任校長、副校長，董事長、董事，有功人士，行政主管，榮譽博士，校史人物等等。在「事」的內容，則以復校初期及四十年來發展之重大活動或事件，例如「哲學概論」課程最初規劃會議紀錄，校歌之作詞譜曲相關討論，第一屆畢業典禮以及院系單位成立相關資料，特色及學術活動等等，均可參考「復校類」（編號：200·0·0）、「台北輔仁類」（編號：300·0·0），更確實的部分在「台北輔仁類·文件」（編號：311·1·0）

在「物」件設備的發展上，本室將校園建築按院系、年代、特色加以區分彙整，參見「台北輔仁類·建築」（編號：350·0·0）。

## 2. 佐證資料

台北輔仁的發展，除了可以由如上的資料入手外，還可由本室蒐集之各種報紙、出版品、剪報及學生刊物甚至照片中得到豐富的佐證資料。例如「輔大新聞」、「傳播者」、「輔訊」、「輔仁大學新聞輯要、簡報」皆是，資料內容詳見「台北輔仁·出版品」（編號：360·0·0）、「台北輔仁·圖片」（編號：370·0·0）、「台北輔仁·剪報」（編號：314·0·0）

## 3. 專案文件（于斌、羅光、龔士榮）

此處所指專案文件，係校史室在執行專案時所蒐集的資料，雖與校史不全然有絕對關係，但是卻可供校史在人、事、時、地、物各方面加以佐證之資料。

例如：為了 2001 年在紀念樞機百歲冥誕時完成《于斌樞機傳記》的任務，1997 年本室開始籌備撰寫工作時的蒐集與整理<sup>14</sup>，帶動了因照片整理而出版的《畫傳》，在《傳記》出版的同時，亦出版了《言論集》、《詩集》、《光碟》，同時完成歷任校長資料收集的範例，奠定了日後有關「人」物資料蒐集的方針。于斌校長資料可參考「台北輔仁·人物」（編號：321·1·0）。羅光總主教生前已有系統地將與輔仁有關事件，在其著作中清楚

<sup>14</sup> 參見吳瑞珠，〈摸索與淬煉－《于斌樞機傳》編撰經過〉，收於 <http://www.fuhu.fju.edu.tw/about/writings/7.htm> 「……首先由委員就所知部分撰文或提供線索資料。第二，規劃名單進行口述歷史工作。第三，重整樞機遺存本館廿七本自 1939~1976 年的日記行程本。第四，儘可能收集樞機所有出版品，報章、雜誌、錄音之言論內容並加以分類。第五，他人撰寫有關樞機之文字之收集。第六則是檔案、評論、文件（含外交部、國史館之檔案，以及復校期、耶穌會、聖言會、中國聖職等單位）之收集。至一九九八年九月，校史室已可以大致將資料分析出兩大類：一為樞機遺物；一為研究樞機之可用相關資料。」

交待，參見總主教《羅光全書》第二十五冊，其他文件資料則陸續轉入校史檔案中，2004年逝世後遺物中最重要的是乙批自1951年至2001年之日記本四十五冊，經台灣主教團同意轉入本室，參見「台北輔仁·人物」（編號：321·2·0）。（因未整理，暫不公開）。

龔士榮神父生前極少個人資料留存，但因其在本校復校過程中扮演極重要的輔佐角色，個人資料及觀點具有代表性，因此歷史系邵台新教授於2000年完成的《龔士榮神父訪問紀錄》<sup>15</sup>，已將龔神父生平及思想完整的呈現。2002年重病彌留時，交待吾於1998年為整理于斌校長資料數年來，所提各種有關輔仁大學復校問題，已初步撰寫成手稿及于斌校長交付之文件可轉由校史室保存處理。2002年8月逝世後，2005年由筆者與天主教史料研究中心主任陳方中教授具名，獲使命副校長室專案補助整理龔士榮神父與輔仁大學有關文件，初步研究成果可參考此次研討會陳方中教授論文「龔士榮神父所參與的輔仁大學—輔大易長事件」。相關目錄詳見「台北輔仁·人物」（編號：322·1·0）（此份資料僅開放供學術研究）

#### （五）、創辦修會與輔仁大學

縱觀輔仁的歷史，如果沒有天主教會各修會人力、物力的投注，實難竟其功。但是在1950年間，當于斌主教為復校奔走時，

……接觸了十幾個修會，或因在大陸損失慘重，或因台灣局勢未定等等理由，都婉拒了。只有聖言會答應，但無力單獨負責。耶穌會方面，臺灣耶穌會士都有負面的反應，他們那時有幾位在台大任教，且有相當大的教授宿舍成立了伯達書院，為教書、接近青年學生，照顧在校教友同學非常方便，既不需負學校的行政責任反可領取薪水來從事他們的工作。後因羅馬總部已答應教宗協辦，乃勉強接受，於是和聖言會協商，要求相當程度的自治。<sup>16</sup>

按龔神父的看法「這就下了三單位以後不易整合的種子」<sup>17</sup>。

但是，如果從修會檔案資料，及實際參與復校工作的神長與團體長上的報告和書信當中，又可以了解輔仁在同一事件下不同角度的觀點。因此本室近年來積極敦請修會團體，以修會立場研究與輔仁大學關係的用意，即在呈現歷史元的面向，以利我們在豐富多元的歷史內涵中萃取輔仁的精

<sup>15</sup> 參見，邵台新訪問，林宜欣紀錄，《龔士榮神父訪問紀錄》，輔仁大學學術叢書1002，校史系列（台北：輔仁大學出版社，2000年）。

<sup>16</sup> 龔士榮，〈創校維艱〉，2001年畢業典禮講話，收於<http://www.fuho.fju.edu.tw/about/writings.htm>

<sup>17</sup> 同上。

華。

### 1. 本篤會

按時間序，修會與輔仁大學的資料可分為北京及台北兩期，北京時期以「本篤會」(Benedictine Order)與「聖言會」(the Society of Divine word)為主，台北時期則應以「聖言會」、「耶穌會」(the Society of Jesus)與「中國聖職單位」為代表。

美國本篤會身為輔仁創辦修會，1923 至 1933 年那段期間為輔仁投注的心力和該會的傳統和特色，在輔仁歷史中，實已內化為輔仁精神的一部分，此段令人動容的歷史可參考《北京輔仁大學創辦史：美國本篤會在中國 1923~1933》一書，其中有翔實的說明。該書係摘譯自傑若米·歐特金 (Jerome Oetgen) 所著之《美國聖文森總修會傳教史》中第六、七章中三大段落，由校史室徵得本篤會尚義院 (Wimmer Priory) 院長康士林修士同意並協助於 2001 年所出版。

### 2. 聖言會

聖言會於 1933 受邀接管輔仁大學，至 1949 年大陸政權轉移，1950 年中共教育接辦，1952 年以院系整併入北京師範大學，北京輔仁大學第一階段結束。在聖言會經營輔仁的這段期間，學校發展快速，在抗戰期間捍衛學術自由，反抗日本人的威權，使輔仁大學的歷史中又加入了身為天主教大學的堅持與愛國的傳統。有關此段歷史，在聖言會方面一直未有人加以全面整理。約在 2000 年左右，經筆者前後與該會柏殿宏教授及省會長柯博識教授反映說明後，獲得其認同並全力協助，以信件或趁往返羅馬總會訪問之便，赴「總會檔案室」多次了解，並複印北京時期及台北復校時修會保存之資料，轉本室存參。內容有總會保存與輔仁有關之檔案目錄，呈報會長之董事會紀錄，與耶穌會分工備忘錄，于斌主教討論復校事宜紀錄等等，置「台北輔仁·修會」(編號：332·1·0)(部分資料暫不公開)，後又陸續複印北京時期本篤會及聖言會買地之契約紀錄和財務報表，見「台北輔仁·修會」(編號：332·2·0)(暫不公開)，最珍貴而有研究價值的是柯博識教授於 2002 年 09 月赴羅馬檔案室影印攜回本校的報告及會議紀錄乙批，經筆者逐頁整理並按聖言會羅馬檔案室編號對照彙整後，裝幀成四大冊以利研究，詳見「台北輔仁·修會」(編號：332·6·0)(僅供學術研究用)。因參與蒐集上述資料的過程，「激發」了柯博識教授強烈的使命感，柯教授於是在 2003 年開始著手編著《聖言會與輔仁大學》約十萬餘字，目前翻譯即將完成，已進入校編階段本室預計在 2006 年正式出版。

有關台北復校後聖言會檔案原件，因該會無人能決定是否轉交校史室，因此目前暫存耕莘樓 312 室，由本室協助完成檔案資料目錄乙份，參見「台北輔仁·修會」(編號：332·7·0)。

聖言會除了在資料的蒐集與本室密切配合外，在「使命室」的規劃的系列活動中亦與歷史靠攏，鼓勵院、系、所史之蒐集撰寫，發動單位內之教師、行政人員從事與聖言會與輔仁大學相關之舉措，有貢獻人物之研究與側寫，豐碩的成果展現在聖言會三冊出版品中，請參考：《求真之道—徹悟生命·洞悉萬象貿知識》，《致善達仁—善省己身·明達道德與科技》，《尋美之旅—美感經驗·藝術與審美》。「台北輔仁·出版品」(編號：361·20·0；361·21·0；361·22·0)

### 3. 聖神婢女傳教會 (the Servants of the Holy Spirit, SSpS)

在輔仁大學的歷史中，女生向以不同於一般的優雅，並以展現女性聰慧氣質而聞名，這可能或多或少必須歸功於修女們如慈母的護佑，和嚴格的生活常規訓練所致。早在 1930 年當明尼蘇達州聖若瑟的聖本篤女修會 (St. Benedict's Convent, St. Joseph, Minnesota) 的六位修女抵達北京，欲在大學中成立一所女子學院即展開女修會加入輔仁大學的教育行列的歷史。<sup>18</sup>這所女子中學於 1932 年秋天開學，有二十名女學生。1933 年因學校轉由聖言會接管，部分修女到開封工作，直到 1948 年被迫離開。<sup>19</sup>

1933 年聖言會開始在北京輔仁大學工作，聖神婢女傳教會亦隨之開始在北京輔仁女中工作，由盧德思修女 (Sr. Othgerina Gertrud Luters) 及戴修女 (Sr. Siena Maria Derbogen) 與北京的本篤會修女進行談判。<sup>20</sup>1937 年吳秉雅修女 (Sr. Urbania Maria Tueshaus) 到北京，1939 年在聖言會的協助下創辦了家政系。<sup>21</sup>聖神婢女傳教會認為「忠於會祖的遠見，我們和聖言會攜手合作，共同在輔仁大學從事教育工作。……藉著我們在輔仁大學的角色助長教會的使徒福傳」<sup>22</sup>。1963 年吳秉雅修女在聖言會支持下成立家政營養學系。

聖神修女會與輔仁大學的關係，對輔仁大學的貢獻以及就歷史的發展和使命的反省，最完整的研究可參考，羅麥瑞教授 (Sr. Maryta Laumann)

<sup>18</sup> 參見傑若米·歐特金 (Jerome Oetgen) 著，張琰譯，《北京輔仁大學創辦史：美國本篤會在中國 1923~1933》，台北，輔大出版社，2001，頁 58-59。

<sup>19</sup> 同上，頁 93-94。

<sup>20</sup> 參見雷立柏，《聖神會在華 1905—1955 年》，為其編寫之《聖言會與聖神會人物考》之部分，2002 年已完成大半，尚未出版，頁 10，72，75。

<sup>21</sup> 北京輔仁大學校史編輯委員會，《北京輔仁大學校史 1925—1952》，北京，中國社會出版社，2005，頁 243。

<sup>22</sup> 參見〈聖神修女會在輔仁大學〉，收於《聖神婢女傳教會在台五十週年紀念冊》，台北，頁 14。

所撰〈Fu Jen University and the Holy Sprit Sisters 1963-2004〉<sup>23</sup>。以上相關資料置「台北輔仁·出版品」(編號:361·22·0)。

#### 4. 耶穌會 (the Society of Jesus)

關於耶穌會與輔仁大學的資料，本室在史料蒐集上自 2000 年迄今共得：

- (1) 自省會長辦公室影印之 38 張蒐集而得之信件、剪報及出版品照片頁。
- (2) 《寧靜致遠 德厚流光》—張宇恭神父執教三十週年紀念刊物。
- (3) 輔仁大學法管兩院發展委員會編輯，《星光熠熠伴我行》，輔仁大學法管兩院與耶穌會共融訪談系列文集
- (4) 沈起元神父 (Fernando Mateos, S.J.)，〈耶穌會史 第九章—輔仁初期的困難〉(Chronicle IX The difficult beginnings of Jujen University) 為該會參與台灣復校初期，相關協調、考量及計畫，以及投入資金的估計等等之紀錄。(本份資料未獲同意，暫不公開)
- (5) 費濟時主教 (Msgr. Eugene Fahy, S.J.)，〈Bamboo Shoots I-XVIII〉，為 1952 年-1996 年向會長報告的影本，共裝幀成十八冊可供耶穌會史研究參考。(暫不公開)

以上相關資料置「台北輔仁·修會」(編號:334·0·0)。

#### 5. 中國聖職單位

中國(國籍)聖職在復校初期，即與于校長共同肩負各項校務籌備、執行及與修會整合協調的工作上，因此在校史室的資料上即已重點涵括。

2005 年中國聖職單位使命室在代表林吉基教授的敦促下，開始進行「溯根系列」之工作，首先著手整理的是文學院院長高思謙神父之行史，並已出版。進行本計畫所得之訪談紀錄、資料影本已存入校史檔案，見「台北輔仁·修會」(編號:331·0·0)。

### 伍、未來發展的努力方向

綜合以上的說明，「系統整理」在校史工作的執行順位上，這幾年被本室列為優先的工作，因為我們深刻體認到，大批的文件資訊如僅是蒐集保存而缺乏整理，基本上祇是沒有多大意義價值的資訊而已，當然也無法

<sup>23</sup> 羅麥瑞，〈Fu Jen University and the Holy Sprit Sisters 1963-2004〉，收於《尋美之旅—美感經驗·藝術與審美》(台北，輔大出版社，2004)，頁 408-502。

讓現在的人與過往產出關連，更遑論延續精神或借鑑了。基於數年具體推展校史工作的經驗，筆者認為在下一個階段，校史的工作應再朝以下幾個方向努力：

### 一、落實〈校史室簡章〉資料蒐藏政策

所謂校史就是「在輔仁大學這個空間中，每段時間由人從事的活動所留下的紀錄」，雖然不是每一件事都會對這個具體存在的實體有重大影響，或值得紀錄，但是嚴格的說，如果我們將比例尺放的愈大，那麼在這個空間所曾發生的事物都可能都與校史有關。基於這個想法，我們除了依照〈校史室簡章〉所規定之業務及資料蒐集標的執行，對現階段資料，以每年各單位提供的「大事紀」為基礎，做為校內單位橫向發展的紀錄依據，因此如果各單位檔案文件能順次收集，並依規管理，校史室的工作能較為完備的原因即在於此。另一方面我們則謹慎的將校史室及「檔案室」<sup>24</sup>的業務功能加以區分，筆者認為校史室與檔案室的業務分野在於，檔案室應以文件之收發、管理及保管借調為主，而校史室則是對具有縱深及保存價值的檔案資料加以蒐集、編目、保存及研究甚或出版和展覽做為重心。因此目前散佈在研發處有關增設院系所之公文、締結姊妹校、簽訂合作協議之證書及協議書，祕書室保管之本校成立、復校公函原件，甚至董事會掌理之業務中對學校整合改革相關議決，在某年限後都應整理入校史保存，否則經過時空轉移、人事更迭的因素，恐將「永不可考」。

### 二、建立校史資料的蒐集網絡

「網絡」的意義在於建立一套屬於校史應蒐集的資料，可以藉由制度或人為的意識準確的流入校史檔案系統的概念。

以本校「大事紀」為例，就是一項建立的制度，雖然在實際執行上的確造成基層同仁的業務負擔，但是如果我們以一種負責及務實的態度來看，則我們又不得不肯定這個制度的必要性，它的問題祇是在執行上校史室及各單位間應如何精簡作業並加以改善而已。

再以人為的意識來說，如果在輔仁的同仁都能意識到，我們所奉獻的歲月和我們每一日的工作，自然的都將在輔仁組織中留下痕跡，但是以人短暫的生命所成就的事物，祇有經過歷史的檢證才能呈現其客觀的意義和價值的事實上，將個人所完成的事物整，加以整理歸檔，的確是一項值得及負責任的作為。如果能肯定這樣的制度和概念，那麼我們同時也就建立起了一個校史資料的蒐集網絡，使學校每一項創新的建樹都能成為編織輔

<sup>24</sup> 輔仁於一九八七年間曾設置「檔案室」，然因人力、空間問題而停辦。

仁歷史的素材。

### 三、建構校史與專業（特色）研究系統

輔仁的創辦原就與時代命脈相聯結，在東西方文化的交會處所展現的辦學宗旨與目標已可顯現其端倪，這種說法我們可以從歷史事件中去印證。一九二九年十一月十三日宗座代表剛恆毅樞機主教在北京主持教學主樓的奠基典禮中的演講詞中指出「一個民族的革新所面臨的最大挑戰是思想的改革；……輔仁大學是保持完整中華文化的有力工具，正如教宗庇約第十一曾以莊嚴的語詞所過說的『輔仁大學擔負著中國新生的使命』……」<sup>25</sup>，又在台灣復校後，于斌校長曾說：「這個學校雖是天主教主辦的大學，實在是為教育普，為好學的青年來辦的……」<sup>26</sup>，由之可知輔仁的歷史在使命的角度來看蘊涵了極多元的內容，而這正是目前各個特色使命單位可開展的思維點。

從事校史工作除了大量的文書資訊的蒐集和處理工作，最重要的核心應是以上所提及相關研究的進行，因此本室在進行是項工作時，多年來以採取橫向聯結的方式，與校內相關所系教授及研究中心配合，不論是口述影音製作、文字撰寫或軼聞軼事的採集，翻譯工作進行或各項資料收集及座談會的舉行，都是在促使本校校史各個面向呈顯並益增完善的途徑，下階段本項工作將成為校史工作的重點。

### 四、持續進行校史教育及應用推廣

本校在校訂必修的「大學入門」課程開設之初，校史室即擔負課程之一：「輔仁校史簡介」，積極扮演使校史與辦學宗旨目標前後呼應，讓師生體會出輔仁的獨特性及歷史的價值的角色。除此之外在各項師生同仁的活動、訓練、講習等場合中，均以校史與各該活動的關係加以介紹，近年則以輔助教材之編輯，出版為方法，協助老師們在教學上之應用，往後此項工作應更普遍至教職同仁間，因為我們確信這是輔仁能以「唯一」去建構使命特色的基礎。

歷史是人特有的活動方式，人的歷史展開於空間與時間內，如果有所謂歷史的必然性，則我們可以由此看到人如何在多重限制中，經由明智創造出嶄新局面的努力，校史的確見證了這個事實，也處處產現當代的新意。

輔仁的歷史和其孕育的校風是本校最豐富且珍貴的資產，而校史工作

<sup>25</sup> 參見張振東、李貴榮譯，〈輔仁大學的建校目的—剛恆毅樞機的演講詞〉，收於輔大編輯委員會，《輔仁五十季》（台北：輔大出版社，1979年），頁39。

<sup>26</sup> 于斌，〈校長歸國返校演說〉，記於1961年記事本，9月14日及9月20日，頁42。

就是去協助大家彰顯這項特色。校史工作絕非一蹴可及，它是一個需要集體關心和參與的工作，但是如果我們確信「有傳統才有根源，有創新才有歷史」，那麼我們已經攜手同心地在這條路上邁進。

後記：本文所檢附之「天主教輔仁大學校史檔案目錄」為爾後檢索校史，以及資料蒐集之依據，並為本室檢索系統之準備。整理期間得台南藝術大學博館所賴玟忻與輔仁大學史研所陳建宇兩位研究生之協助，得以完成此目錄，「居功厥偉」，在此一併致謝。

## 《北京輔仁大學校史》編寫工作淺談

王振稼\*

北京輔仁大學校友會自 1984 年恢復活動後，就將校史編寫工作列為工作重點。經過長期校史資料的收集整理，在此基礎上於 2000 年 5 月，在校友會常務理事會的領導下，建立校史研究組。隨後建立以王光美為主任的《北京輔仁大學校史》編輯指導委員會和《北京輔仁大學校史》編輯委員會。進一步收集史料，組織校史編輯工作，從始至終以北京輔仁大學辦學宗旨為主線，即遵照 1927 年 6 月，北京輔仁大學第一次董事會制定的《私立北京輔仁大學組織大綱》的規定，以介紹世界最新科學、發展中國傳統文化、培養碩學通才的宗旨。在校史各章中便以各系史為重點，突出教學，將〈院系史〉、〈輔仁名師〉、〈輔仁校友〉這三章融為一體，構成了《北京輔仁大學校史》的核心內容，形成了北京輔仁大學校史特色。

北京輔仁大學校史的編寫工作，遵循求真存實的方針，敘事有據的原則，堅持從實際出發，按北京輔仁大學的本來面目，是什麼樣就寫什麼樣，據實直書。這次編寫的《北京輔仁大學校史》共十章，全書七十多萬字，相片千餘幅。系史是重點，系史內容分為歷史沿革、課程設置、辦學特色。各系辦學特色，可以概括為，主要是強化基礎知識和基礎理論教育，現代科學方法的訓練，注意培養學生的應用能力，使學生修業期滿後，無論是工作或做高深理論研究，都有較好的基礎。各科教學，重視理論實際結合和調查研究活動，重視實習和實驗課程。針對社會上用人需要，在部份課程設置上，力求適應實際工作的應用，實行學分制，可選擇其他系課程，培養學生一專多能。

學校有一套嚴格的教學，行政管理制度。課程設置、學分制、選修課制、轉院系制、畢業實習制、論文答辯制、學銜學位制等整套的教學管理制度，為學校營造了嚴格的管理和嚴謹的學風。

輔仁大學名師群賢薈萃，反映了輔仁大學的教學水平和學術水平。輔仁大學中外名師在各系系史均有表述。

北京輔仁大學歷年在校入學學生共計 12355 人，他們離開學校後，分佈在全國各地，有些校友定居海外，從事各行各業工作，他們的名字記錄

---

\* 輔仁大學北京校友會副會長兼總幹事。

在〈北京輔仁大學師生員工名錄〉，〈輔仁校友〉這一章，記錄了以下幾個方面的校友：第一方面是知名人士、政治活動家、社會活動家；第二方面是有突出成就的專家學者；第三方面是在各方面有代表性的校友。

《北京輔仁大學校史》的編著，完全出於北京輔仁大學校友會的自覺，完全出於廣大校友對於輔仁大學的熱愛，完全出於廣大校友對校史編寫的責任感和使命感，完全依靠廣大校友群策群力，盡心竭力地團結合作精神。這支校史編輯隊伍的成員都是七、八十歲的老人，他們不顧年高體弱、不顧疾病纏身，全力投入校史編寫工作中，他們自 2000 年參加校史編寫工作後，便發出誓言：「我們不幹誰幹！我們現在不寫，再等待什麼時候寫！」經過廣大校友多年的努力，《北京輔仁大學校史》於今年北京輔仁大學建校八十週年紀念日之際出版發行，我們這個任務終於完成了。在北京輔仁大學校史編寫過程中，一直得到台灣輔仁大學校領導和校史室的關懷和支持，校史的編寫和出版凝聚了海峽兩岸輔仁一家親的情誼，推動了兩岸兩校校史研究工作的開展，今天我代表北京輔仁大學校友會表示衷心的感謝。

2005 年 12 月 7 日

## 與會人員名錄

姓名	單位
尹美琪	輔仁大學學生輔導中心主任
尤煌傑	輔仁大學研發長
王芝芝	輔仁大學歷史學系教授
王振稼	輔仁大學北京校友會副會長兼總幹事
古怡心	輔仁大學德國文學系副教授
田默迪	聖言會神父
朱蓮	輔仁大學護理學系講師
朱秉欣	耶穌會神父
朱修華	輔仁大學聖職單位使命特色發展室主任
汪榮祖	中正大學歷史學系教授
余惠芬	東吳大學企劃組組長
吳子清	輔仁大學校牧室秘書
吳忠魁	北京師範大學珠海分校副校長
吳堅凌	耶穌會使命室專員
吳瑞珠	輔仁大學進修部哲學系副教授
吳靜倩	輔仁大學經濟學系副教授
李世瑜	天津古籍出版社編審
李秀華	輔仁大學進修部經濟學系導師
李振英	輔仁大學哲學系兼任教授
李珠然	輔仁大學聖神會修院
李添富	輔仁大學中國文學系副教授兼主任
李淑芬	輔仁大學進修部宗輔室宗輔
李惠美	輔仁大學哲學系組員
李瑞國	實踐大學圖書館(校史館)
李瑀婕	輔仁大學學務處課指組組長
杜金煥	輔仁大學義大利文學系主任
車宏生	北京師範大學心理學院院長
周國正	輔仁大學北京校友會副總幹事、 輔仁大學北京校友會美術研究會秘書長
周善行	輔仁大學化學系教授

- 房志榮 耶穌會神父
- 林安妮 輔仁大學中國聖職單位使命特色發展室專任約聘組員
- 林秀娟 輔仁大學推廣部婦女大學秘書
- 林政誠 龍船窩文史社主任
- 林銘雄 輔仁大學學務處僑外組組長
- 武金正 輔仁大學耶穌會單位代表
- 邱浩彰 輔仁大學醫學系教授
- 柯博識 聖言會神父
- 姜惠美 明志科技大學圖書館
- 姚平子 陝西師範大學教育學院心理學退休教授
- 柏殿宏 輔仁大學化學系教授
- 紀鷹如 輔仁大學使命特色發展室組員
- 范春英 輔仁大學總務處出納組組長
- 英潔良 社會服務修女會
- 胡僑榮 輔仁大學心理學系教授兼行政副校長
- 夏林清 輔仁大學心理學系教授兼主任
- 孫邦華 北京師範大學教育學院歷史與文化研究所副教授
- 孫昌識 陝西師範大學教育學院心理學退休教授
- 孫昌齡 中央教育科學研究所研究員
- 徐傳雄 輔仁大學全人中心副教授兼主任秘書
- 高天明 輔仁大學法管學院宗輔室
- 康士林 輔仁大學外語學院教授兼院長
- 張厚粲 北京師範大學心理學系教授、國務院參事江西師範大學教授
- 張振東 主徒會神父
- 張善禮 輔仁大學德國語文學系教授兼主任
- 張萃文 輔仁大學聖神會修院
- 張聖昱 輔仁大學進修部歷史學系導師
- 張翠霞 輔仁大學中國聖職單位使命特色發展室宗輔組員
- 張鴻安 輔仁大學聖言會使命特色發展室組員
- 郭維夏 輔仁大學全人教育課程中心副教授兼使命副校長
- 郭忠驥 輔仁大學北京校友會常務理事、北京宮廷公司總經理
- 陳文榮 輔仁大學聖神會修院
- 陳方中 輔仁大學歷史學系副教授
- 陳貴糖 輔仁大學全人教育中心、織品設計學系兼任講師
- 陳猷龍 輔仁大學法律學系教授兼院長

- 陳曉涵 輔仁大學外語學院視聽教學中心技士  
程予誠 輔仁大學影像傳播學系副教授  
單啟新 中山涉外金融職專退休教師  
黃孟蘭 輔仁大學法國語文學系教授兼主任  
黃韶顏 輔仁大學餐旅學系教授兼院長  
惲瑛 南京東南大學物理學系教授  
雷俊玲 輔仁大學歷史學系副教授  
楊仕裕 輔仁大學使命副校長室秘書  
楊志顯 輔仁大學體育學系教授兼主任  
楊漢琛 輔仁大學體育學系教授兼學務長  
楊維漢 輔仁大學織品設計學系講師  
雷華 輔仁大學宜真學苑組員  
廖若欣 輔仁大學心理學系組員  
黎建球 輔仁大學哲學系教授、輔仁大學校長  
劉兆明 輔仁大學教務長  
劉佩容 輔仁大學聖言會使命特色發展室組員  
潘小慧 輔仁大學哲學系教授兼主任  
蔡淑麗 輔仁大學進修部全人教育課程中心副教授  
鄭穆熙 輔仁大學聖言會單位代表  
盧宗榮 輔仁大學心理學系組員  
錢中媛 實踐大學圖書館（校史館）  
戴晉新 輔仁大學歷史學系教授  
戴麗馨 輔仁大學總務處保管組組員  
鍾安住 輔仁大學校牧  
鍾蔚玲 輔仁大學宗輔中心主任  
簡秀雯 輔仁大學進修部企管學系導師  
簡國瑩 輔仁大學中國聖職單位使命特色發展室組員  
魏思齊 輔仁大學全人教育中心副教授  
羅志偉 聖言會神父  
嚴任吉 耶穌會使命特色發展室主任  
蘇香如 輔仁大學中國聖職單位使命特色發展室組員



## 八十週年校慶系列活動校史組

主任委員：黎建球

執行長：陳猷龍

組長：吳瑞珠

副組長：程予誠

秘書組：賴玟忻、黃靖蘭

議事組：袁小涓、沈嘉琦、吳怡蓉、劉佳琳

庶務組：許文鈴、張欣婷、陳玟錡

接待組：陳建宇、王惠卿、林書韻、羅英綺、李芳婷、蔡琬琦